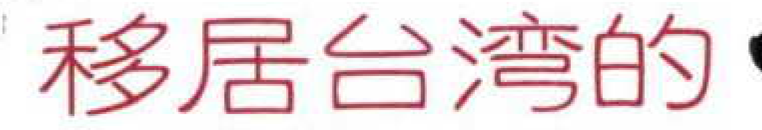

移居台湾的
YIJU TAIWAN DE
JIUDASHI
九大师
师永刚 冯昭 方旭◎著
江西出版集团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林语堂
梁实秋
钱穆
罗家伦
蒋梦麟



移居台湾的大师

梁实秋、钱穆、罗家伦、林语堂、蒋梦麟、殷海光、雷震、傅斯年、胡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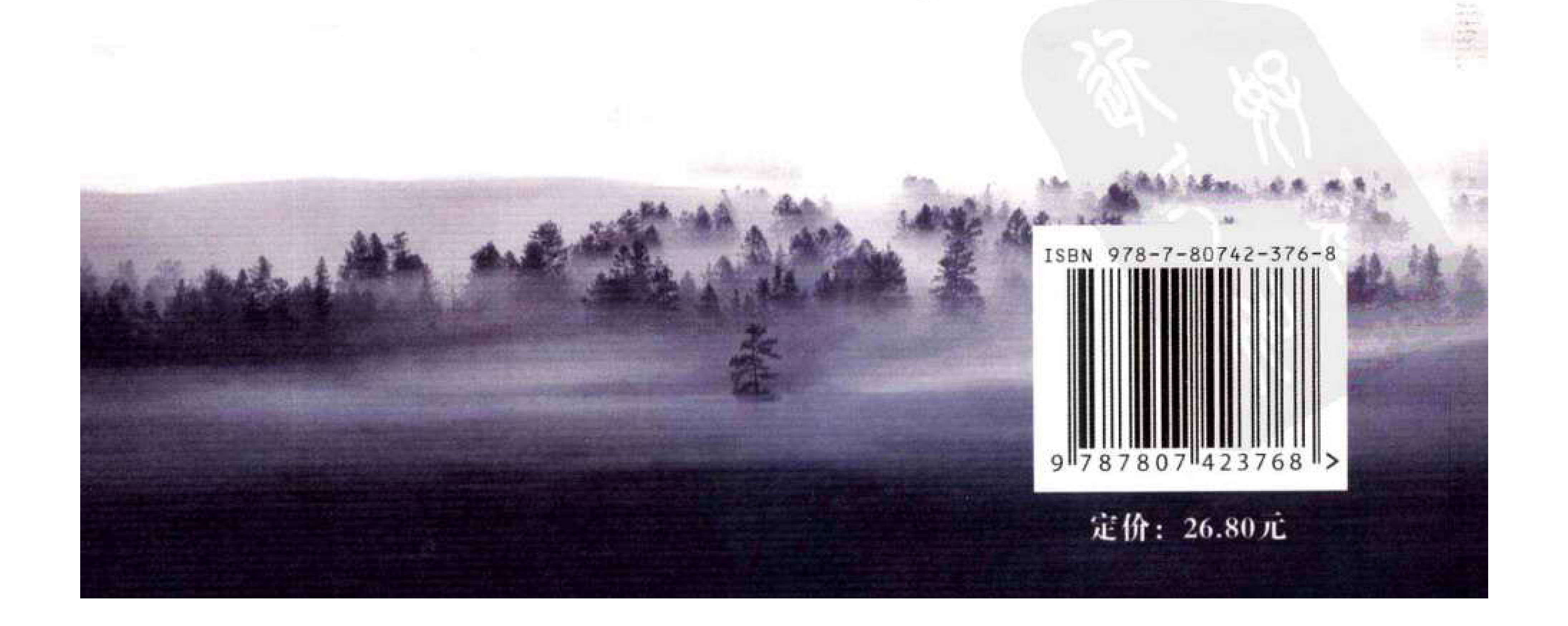
他们，都曾因深厚的学养与非凡的资历，活跃在上个世纪的中国。

他们背负一身盛名，却颠沛流离，绝唱台湾。

在严酷的政治环境面前，有人选择了明哲保身、偏安一隅，有人则选择了迎难而上、据理力争，以方寸之地守护着最后的人格底线。阴影无处不在，甚至，他们中的某些人至今还在被误读。

如今，抹去落在他们名字上的政治尘埃，我们会更加清晰地看到他们的前世今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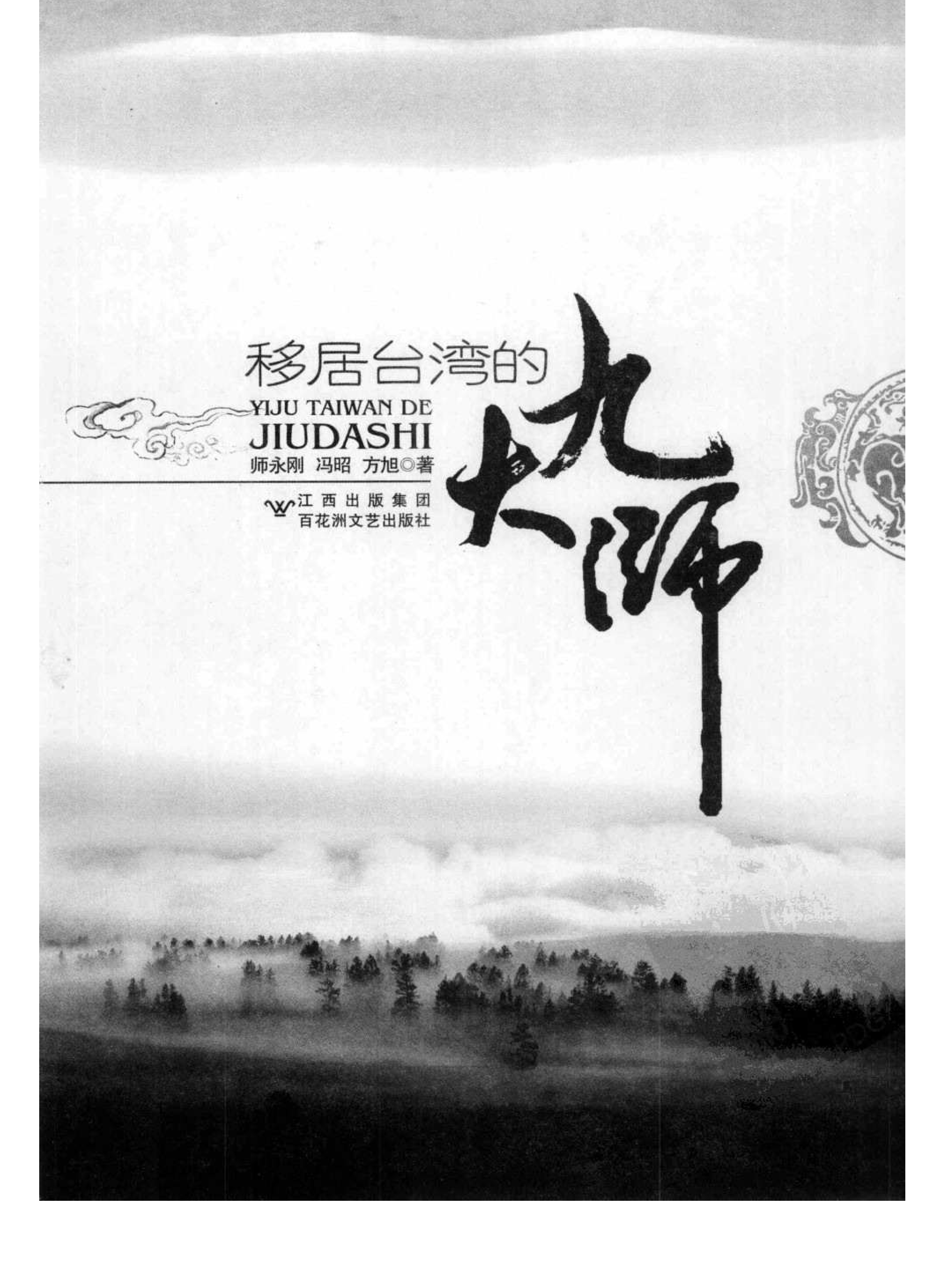
或许我们不应该再囿于他们是在海峡这边，还是海峡那边，因为无论在哪里，他们都是这个世界的安慰。



ISBN 978-7-80742-376-8

9 787807 423768 >

定价：26.80元



移居台湾的
YIJU TAIWAN DE
JIUDASHI
九大师
师永刚 冯昭 方旭◎著
江西出版集团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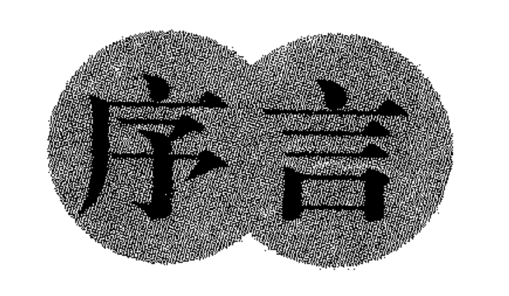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移居台湾的九大师/师永刚、冯昭、方旭著.—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8.8
ISBN 978-7-80742-376-8

Ⅰ.移… Ⅱ.①师…②冯…③方… Ⅲ.文化-名人-列传-中国-现代 Ⅳ.K825.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081346号

出版者　江西出版集团·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南昌市阳明路310号　　　邮编　330006
电　话　0791—6894736（发行热线）　0791—6894790（编辑热线）
网　址　http://www.bhzwy.com
E-mail　bhz@bhzwy.com
书　名　移居台湾的九大师
作　者　师永刚　冯昭　方旭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天正元印务有限公司
厂　址　北京通州区梨园镇小稿村
开　本　1/16　700mm×1000mm
印　张　14.5
字　数　235千
版　次　2008年7月第1版
印　次　2008年7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26.80元
ISBN 978-7-80742-376-8



1949年后的背影

1962年，胡适在一个酒会上突发心脏病去世。在台湾，他度过了人生最后的四个年头，如今他静静地躺在台北近郊的墓园中，不少经过台湾的学人会在这里献上一束鲜花，脑中仿佛滑过一个世纪来中国知识分子的沉浮。

随之云散的是一些彗星般的名字或者浮突在书册上的足迹。1976年，林语堂病逝于香港，随后移灵台北；1979年，雷震病逝台北，由于他生前要求不要声张，丧礼稍嫌冷清；1987年，梁实秋驾鹤西游，一代学人就此画上句号……斯人独去时，身后留下怅然一片，他们当年渡海赴台，身陷学术与政治旋涡中而不得自拔，则在今日再渡大海，被海峡对岸的学界追认并膜拜。

这些逝去经年的名字，何曾有几个脱离出政治的评价与学术的臧否！如同一篇评价胡适先生的断论所称："可以认同的一点是：胡适是个学者，甚至是很著名的学者，然伟大与否则各有认识。胡适一生既有在中国推行民主的大志愿，又遭遇了国共双方不待见的尴尬，直至国民党败退台湾，胡适受蒋介石之邀任'中央研究院院长'职务，胡适的自由、民主实践也只是纸上之梦。不过，1962年在台以院长身份去世，多少使国民党政府博了个尊重文化人的名声。这对胡适来说，是幸与不幸，都难以盖棺定论。"

而钱穆当年甚至曾被毛泽东点名批评为"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中国的反动

政府” 所能控制的“极少数人”之一。为了对抗 1966 年中国内地的“文化大革命”，蒋介石发动“中华文化复兴运动”。七十三岁的钱穆在此时受邀移居台湾，其学术终难脱逃政治利用的尴尬。而多年后的今日，他的著作开始大面积地在大陆进入读书人的视野，人们已忘记了他身上的那些政治痕迹，甚至忘记了他在台湾，更多的人记住的不过他是中国的一位学术大家而已。

历史在他们面前显得总是如此的吊诡。

如今，“文化断层”已日益成为频繁而沉重的话题。从“五四”的文化断层开始，中国近代文化史上出现过多次断代。对过去的文化精髓的淡忘或无视，已是大多数人的第一反应。但这种文化知觉麻木的现象并非是新知识爆炸的副产品，而更多地缘于思想与文化的被屏蔽。

1949 年，中国发生了重要的变化。这一年，在中国的文化领域，发生了两件大事：从人文上来讲，很多文化大师都去了台湾；从物质上来讲，故宫的大多数国宝被转移到了海峡对岸。

这一个地理与政治意义上的文化断代，不期然地也给国人的心理造成了文化断代。以人文为例，那些前半生对我们还如雷贯耳的文化名人，其后半生就消失在我们的视野以及文化记载之中。

在将近一个甲子以后的 2008 年，当我们重新回顾这些人物的时候，会发现我们对他们的记忆与认识仍有许多的残缺。他们离开中国内地之后的行踪、作为，并不完全地见载于我们的文化档案里。

譬如，并非很多人都知道：那个被鲁迅痛骂的梁实秋，他后来对台湾的英文教育影响甚大；而被毛泽东点名批评的钱穆，受到蒋介石的高度礼遇，晚年又被卷入民进党对国民党的政治斗争之中；罗家伦，曾经的清华大学校长，他在台湾曾经努力推广过简体字，最后落寞地成为一个国民党党史研究家；1967 年，从海外被邀至台湾定居的林语堂，在岛内掀起一场“红学”大辩论，他以客卿身份与蒋介石相处在台北阳明山上；蒋梦麟，当年的北大校长，晚年居然成为“台湾现代农业之父”，他还坚持推动了台湾的人口节育政策；而上世纪 40 年代毕业于西南联大哲学心理学系的湖北黄冈人殷海光，在台湾经历了从追随蒋介石到反对蒋介石的巨大转变，最终成为台湾自由知识分子的领袖；还有雷震，1950 年他成为蒋介石的智囊，却最终反对蒋而成为台湾著名的政治

迫害案件主角……

这些当年的知识精英分子，现在我们已习惯于称呼为“文化大师”，他们的命运在我们的记忆中是不连贯的。在这个时候来重读他们，寻找他们留在台湾的故事，给予你的将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意味？

梁实秋、钱穆、罗家伦、林语堂、蒋梦麟、殷海光、雷震、傅斯年、胡适，这九个个案是我们多年的研究心得。这些经验不是史家的，也不是学术的，而是人文的，甚至是报告体的，甚至是他们的一些野史，更或者是报道中的传说。所以说这不是他们严格的历史传记，而只是我们作为旁观者的记录。

而更为重要的是，从现在开始，将如何去修复我们被损坏的文化硬盘？这才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也是我们编著这本书的初衷。

目 录

CONTENTS



梁实秋
Liang Shiqiu
将西风带进台湾的浪漫干将

梁实秋，以散文、翻译、批评闻名于世。年轻气盛时，他曾与鲁迅等左派作家大打笔战，被冠上“资本家的乏走狗”称号；更被毛泽东点名批判，成为了“资产阶级作家”代表。1949 年，新中国成立，梁实秋在百般无奈下偕妻女去台，虽然躲过了一波波政治运动的侵袭，但从此再也无缘踏上他所深爱的故乡。

到了台湾后，梁实秋决心自断宦途，致力于教育与翻译，历任台湾师范大学教授、英语研究所主任、文学院院长，并在台湾各大专院校兼课。梁实秋于 1956 年在台师大创办中国语言文化中心，目前该中心已成为外国人学习中文的重要训练机构。1966 年，梁实秋自台师大退休后，专事写作和翻译二十余年，至死方休。

梁实秋与元配夫人程季淑育有四名子女，二女儿夭折。梁氏夫妇去台时仅带着小女儿梁文蔷，大女儿梁文茜和三儿子梁文骐则都留在



⬆ 梁实秋与韩菁清

祖国大陆。与他们一起相依为命的幺女后来在取得美国华盛顿大学高等教育博士后，定居美国。由于思女心切，再加上程季淑患高血压身体孱弱，梁实秋夫妇于1972年移居美国西雅图。可惜，这种享清福的日子没有持续多久。1974年4月30日，两人如往常一样牵手在街上散步，不料路边突然倒下一铁梯，压在程季淑身上。程季淑被压伤，最终不治，享年七十四。梁实秋痛不欲生，遂动笔写下记述四十七年恩爱岁月的《槐园梦忆》，期待能稍解心中思念。

但是在程季淑过世后不久，年逾七十的梁实秋又火速地陷入爱河。他与明星韩菁清自热恋而结婚，不但众所瞩目，更掀起文坛一波波的涟漪。

在文学主张上，梁实秋年轻时服膺浪漫主义，亲近崇天才、主情感、为艺术而艺术的创造社，却在进入哈佛大学修习新人文主义者白璧德教授的“16世纪以后之文艺批评”课程后，转为重视儒家，主张古典清明的新人文主义；在行为上，程季淑的过世，却是梁实秋生命的重大转折，从他出版的《槐园梦忆》到过世前预留的遗嘱中都可看到，原本行事趋于理性的梁实秋，突然在晚年行为转向浪漫，就像是弥补年轻之不足。

早年以文学批评的笔锋闻名

梁实秋，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1月6日生于北京，籍贯浙江，学名治华，字实秋。1915年考进外交部清华留美预备学校后，梁实秋开始尝试写作。第一篇翻译小说《药商的妻》发表于《清华周刊》增刊第六期，第一篇散文《荷水池畔》1921年发表于《晨报》。

1923年8月，梁实秋自清华毕业赴美留学前，与程季淑定下三年之约。离别前，梁实秋竟大哭了一场。后来在赴美的船上，梁实秋与同船的冰心等人结为好友。不过相较于说自己要去研习文学的冰心，梁实秋则不客气地说，他到美国要学文学批评。在美期间，梁实秋先后于科罗拉多大学英语系、哈佛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学习，并与留美学生共同创办大江社，出版社刊《大江季刊》。

1926年2月15日，梁实秋在徐志摩主编的《晨报副镌》上发表《现代中

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外界一致认为这是他思想转变的重要分水岭：转而重视古典，主张在理性的指引下，从普遍的人性出发，进行文学创作。

1927年2月，因为国民革命军北伐，新婚的梁实秋夫妻离开北平，避居上海。这一年梁实秋经常以“秋郎”为笔名发表小品文，部分作品后来结集成《骂人的艺术》交新月书店出版，畅销一时。

到上海后，梁实秋担任《时事新报》编辑，又与张禹九合编《苦茶》杂志，不久转任暨南大学教授，后历任光华大学、复旦大学、中国公学、知行学院、青岛大学、北京大学教授。他与徐志摩、闻一多创办新月书店，主编《新月》月刊，创办《自由评论》，先后主编《世界日报》和《北平晨报》副刊。

七七事变后，梁实秋离家独自到后方，1938年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并于重庆编译馆主持翻译委员会。

1938年12月，梁实秋接任《中央日报》副刊主编，却意外遭遇了相当大的抨击。原因在于，他在一段关于编政的文章中，提及反对抗战八股的空洞文字，表示“有人一下笔就忘不了抗战，我的意见稍微不同”。他表示，虽欢迎有关的抗战文字，但与抗战无关的材料，只要真实流畅，也是好的，不必勉强把抗战搭上去。有人著文抨击、指责梁实秋在抗战中要找寻与抗战无关的真实材料是自相矛盾，甚至展现了资产阶级学者的糜烂生活。梁实秋气愤地以文章反击，却又为左派增添了批评他的新依据。

随国民党迁台

1949年，梁实秋随国民党搭“华联轮”到台湾，之后于台湾师范大学英语系任教十余年。在台湾，时人只知梁实秋是文学与翻译大家、谦谦君子，没人还记得，梁实秋有支常以言贾祸的利笔。

在主编《新月》时期，梁实秋因为与鲁迅等左翼作家论战，与创造社的成仿吾、文学研究会的茅盾、太阳社的钱杏邨、语丝社的韩侍桁，有“全国五大批评家”之称。但一连串的纷争，让他成为左派作家眼中的头号“战犯”，并被毛泽东点名批判。甚至于1940年国民参政会筹组华北慰劳视察团时，延安方面

直接由毛泽东点名拒绝梁实秋与余家菊来访。[1]

在抗战后，梁即表明“无意再作任何评论，唯读书尚知努力耳”。去台后的梁实秋，着力在散文、翻译和英汉字典编纂方面较多，对台湾的英文教育影响尤其大。其曾经用来讥讽时政与政治人物的快笔已然封了起来。

其实在抗战胜利后，梁实秋一家由于找不到门道，在四川多待了一年，后才搭乘国民参议会的专轮返回南京。当时国共内战已爆发，局势大乱。梁实秋与程季淑商量后，决定重返北京师大英语系任教，并四处兼课，以维持家用。但随着解放军挺进京津，梁实秋于1948年底带着儿子文骐、女儿文蔷南下到广州中山大学任职，长女文茜则留在北大继续就读。

1949年6月底，梁实秋受国民党政府教育部部长杭立武之邀到台湾参与“国立编译馆”工作，遂举家迁台，但梁文骐选择留在新中国而返回北京。

梁实秋抵台后，先由昔日清华大学同班同学徐宗涑安排住在家中。随后台湾大同公司总经理林挺生经介绍认识梁实秋后，不但立刻将德惠街一号的日式住宅借给梁实秋一家暂住，并安排梁实秋在大同工业学校授课，解决了其温饱问题；日后林挺生主持的协志出版社又延续了这份交情，帮梁实秋出版了《英国文学史》这部两百多万字的巨著。

国民党政府原本帮梁实秋安排了“国立编译馆”人文科学委员会主任委员职务，不过因为“国立编译馆”馆长是由杭立武兼任，与其在“教育部”的工作“两头烧”，因此一度由梁实秋代理馆长。

但是与妻子商议之后，梁实秋无意于继续当官应酬，因此在1950年杭立武辞职后，也主动请辞，从此不入公门。并于1955年应台湾师大校长刘真邀请，出任文学院院长兼英语系主任，直到退休，前后在台湾师大工作了十七年之久。

①梁实秋在《秋室杂忆》中记录了这封由毛泽东转参政会的电文，文中点名梁实秋是“因拥汪主和在参政会与中共参政员发生激烈冲突”，也因此视察团最后并未前往延安。

文学创作

梁实秋的散文以《雅舍小品》为代表，总计出版四辑，收录各种说古道今的长短文，悠闲自由、清新脱俗，建立了他写作散文的声望。但这部在四川写成的散文名著，虽然获得商务印书馆的青睐，但因为战争、金融混乱，始终没有付印。因此台湾正中书局不断造访梁实秋，要求代为印行《雅舍小品》时，梁实秋百般为难，并告知正中书局需为版权负责后，才让这部名著顺利问世，成为畅销一时的热门书。①

但是梁实秋初抵台湾的前十年，出版的都是翻译小说，中文创作少之又少。仅在 1951 年，谣传作家冰心在祖国大陆因故死亡，这让梁实秋相当伤心，特地写了一篇《忆冰心》。直到 1958 年，梁实秋才写了一本薄薄六十页的《谈徐志摩》，传记兼散文的写作风格，令文坛耳目一新。对于文坛给予的掌声，梁实秋似乎有些不好意思。第二年，他在《实秋自选集》自序中说："我研习的学科是英国文学，我的职业是教书，在著作上可以说是等于零。"

《谈徐志摩》这本"小书"的出版，却是梁实秋以散文重返文坛的重大预告。同年 9 月，梁实秋辞去台湾师范大学英语系系主任的兼职，专任文学院院长。第二年，他发现自己罹患糖尿病，又辞文学院院长职务，专心投入他从 1930 年就着手的《莎士比亚全集》的翻译工作。之后，包括《谈闻一多》、《清华八年》等散文集陆续问世，更奠定了梁实秋"文坛祭酒"的地位。

在完成莎翁全集翻译前，《雅舍小品》是梁实秋最重要的散文作品。二十五年后梁实秋又以"雅舍"之名，收小品三十二篇，继续交正中书局出版《雅舍小品续集》。差不多同一时间还出版了一本怀念故旧的书《看云集》。只是梁实秋自 1966 年卸下教职后，散文作品虽增，但都不及《雅舍小品》赢得的回响。1999 年，在梁实秋过世十二年后，《雅舍小品》获选为"台湾文学经典"。

①台湾正中书局于 1949 年 11 月出版《雅舍小品》，光是在台湾，印行就超过五十版，极为畅销。

编写英汉字典，则是梁实秋此时的另一项工作。包括世界书局、远东书局的英汉字典大约也都在上世纪的50到60年代问世，都非常畅销，成为台湾学生学习英文的重要工具。梁实秋一生曾主编过二十余本字典。但他也说，为五斗米折腰是他之所以编字典的原因，并非有什么兴趣。由此可见，梁实秋在台湾的生活仅仅小康，算不上手头宽裕。他也曾说，“有一些事，有能力的人不肯做，无能力的人做不好，编字典大概属于此类。”

梁实秋与字典编辑工作最初的接触是在1949年，与几位朋友为《世界四用字典》编补篇，后来才为远东图书公司编仅收五千字、初中程度适用的小型辞典。不过当时美国桑戴克和巴恩哈特河编的英文字典按读者年龄层分成启蒙版、初中版、高中版、普通版等四级，给了梁实秋很大的借鉴。为了适应读者的需要，他一次又一次扩编，最后造就收字八万左右的增订本《远东英汉大辞典》，成为他主编的行销最广的英汉辞典。

至于梁实秋引进的KK音标，至今仍是台湾学生学习英语的主要注音方式。当年不少英语教师主张用英国的音标发音，但梁实秋认为，台湾接触的几乎都是美国英文，顺理成章应该使用美国发音。为应付实际需要，《远东英汉大辞典》后来再扩编十五万字的增订本时，注音才兼顾英美两种发音。

《莎士比亚全集》问世

在散文与编辑字典之外，完成莎翁全集的翻译才是梁实秋毕生的心愿。

中国迟迟没有翻译莎翁全集，始终是文学界的遗憾。因此在新月时期，最初由胡适倡议，当时的计划是由梁实秋、徐志摩、闻一多、陈源和叶公超五人合译，每人每年译两本，这样不到五年就可以完工。只是计划刚拟好，徐志摩因空难英年早逝，再加上闻一多、陈源出国和叶公超无意于这项工作，最后只剩下梁实秋一人孤军奋战。

这项艰巨的工作才刚起头，不料1931年发生九一八事变，1937年发生七七事变，足足十多年，全中国人随时都在逃难。抗战胜利后，梁实秋回北京老家，父亲在去世前一个月曾勉励他，“希望在有生之年能看到莎剧翻译完成”，“无论如何要译完它”。后来胡适也多次对梁实秋说，莎剧翻译工作完成时，他

要为梁实秋主办一个盛大庆祝会。只是没想到，胡适也来不及看到这件“中国新文学史大事”的完工。

1967年8月，梁实秋用尽了在退休后的时间与精力，耗费了三十六年，译完莎翁全集，并由台湾的远东图书公司出版。梁实秋终于成为中国翻译莎士比亚作品全集的第一人。如此巨大的工程由一人独力执行，如无深厚的英文与中文底子绝不可能完成。为此，台湾当局特意举办了一个三百多人的大宴会为梁实秋庆功，当时的“副总统”严家淦亲自到场致贺。被视为梁实秋门下三大弟子之一的著名诗人余光中指出：“五四以来，西洋作家的译述，何止数千百家，但译述一位大作家而能竟其全集者，梁实秋先生还是第一人。”

余光中并在《梁翁传莎翁》文中强调：“莎士比亚只写了二十年，梁实秋先生却译了三十六年。不过我们不要忘了，莎翁是连续地写，在太平盛世的伦敦连续地写；而梁翁是时作时辍地译，在多难的中国时作时辍地译，从二次大战之前译到二次大战之后，从严寒的北国译到溽暑的南海，且把昔之秋郎译成了今之梁翁。”

现代中国投入西洋名著的译作者不少，翻译理念却大不相同。写文章的基本要素是“信、达、雅”，翻译不比直接以中文创作，难免无法同时兼顾，尤其以“信”与“雅”常无法兼得。大师级的文学家兼翻译家林语堂有“屈信以全雅”的倾向，部分译作韵律十足，朗朗上口，有时却与原意大有出入。

梁实秋以“就信”为原则，有时宁可“舍雅”而“就信”，因为他认为“无论哪一国文字，都不是为了翻译而存在的”。在《翻译莎氏全集后记》中他自述：“我想，忠于原文宜为翻译的基本条件，在不失原文本意的范围之内，力求译文之流利可诵，那才是任何翻译者所应遵奉的信条。但是谈何容易！这两方面的要求常常是冲突的，要顾到原文之丰富的内涵与繁复的语法，往往就无法适当地写出流利的译文，又往往不能不牺牲原文中若干实在不忍牺牲的东西。”

梁实秋以“信”为原则的翻译方式，并不表示他不重视“雅”。早年他和鲁迅等左派译者发生论战，就是因为他认为，鲁迅流畅的文笔，一遇上西洋文字就变成别扭的中文。梁实秋公开反对“硬译”，并主张文学应该植根于人性。与倡导文学阶级论的鲁迅笔战后，梁实秋和左派文人形同水火。

基于相同的理念，梁实秋以为，中国人用中国字写新诗给中国人看，不能

完全抛弃中国旧诗的传统。他支持胡适一点一滴改良的主张，认为旧诗已经到了必须改革的时刻，但要写令人能懂的诗。他说："我们有理由要求新诗写得更像样，不是官方的文艺政策所能奏效，亦不是文学批评家的意见所能左右，完全要靠诗人们自己的努力创作。旧诗做不下去，要做新诗，但新诗仍然要使用旧诗的若干技巧。"

程季淑意外过世

完成了《莎士比亚全集》的翻译工作，了却心中大愿后，梁实秋欣慰地说，沙翁全集能够问世，有一半的功劳应当属细心照顾他的夫人程季淑。他也因此于1970年带着程季淑前往美国进行为期四个月的"蜜月之旅"，顺道到西雅图，探望取得美国华盛顿大学高等教育博士后定居美国的小女儿梁文蔷一家人。除了举家到东岸旅游外，梁实秋也重回哈佛大学，故地重游。因为平常帮梁家操持家务的小姐要结婚，夫妻俩才兼程赶回台湾。

说到程季淑，实在对梁实秋影响深远、意义重大，难怪他曾以"形影不离"来形容两人相伴五十年的时光。

程季淑比梁还大两岁，是中国第一代未缠足、受西式教育的女性。两人相识为媒妁之言。1921年，程季淑同学黄淑贞的母亲，拿着程的八字到梁家说媒。梁实秋有些担心媒人三寸不烂之舌的可信度。不过那是五四运动后两年，充满新思想的梁实秋还是决定与程季淑先做朋友。于是，他打电话约程见面。

一个周末，身穿灰蓝色棉袄、及膝黑裙，梳着发髻的程季淑由黄淑贞陪着，出现在她工作的北平宣南珠巢街女子职业学校，那是第一次约会。第二次见面，因梁认为"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男人、一个女人、一个花园开始的"，选在中央公园。后来，程季淑转到母校女高师附小教书，梁邀她出游。没想到在民风保守的年代，这种行径让学校相当不顺眼，一年后，程季淑就没能继续拿到学校的聘书。

1926年7月，梁实秋因为与程季淑有约，放弃尚余的两年公费，自美返国，任教于南京东南大学。两人商定于1927年2月11日结婚。新婚不过二十天，因为国民革命军北伐，这对年轻夫妻离开北平，避居上海。

抗战开始后，梁实秋以国民参政会参政员身份，随参政会赴重庆。但幼年失怙的程季淑，由于弟弟与弟媳相继去世，母女相依为命，考虑到母亲年迈，经不起长途跋涉，因此迟迟未随夫婿南下，而带着三名儿女在北平侍奉公婆和母亲三老。之后她一路随梁实秋颠沛流离，毫无怨言，甚至劝梁实秋不要入国民党政府当官。此外，对梁实秋起居的细心照料，也都是程季淑一手操办。

虽然程季淑向来身体硬朗，但自美回台后，除了思女心切，两老的身体都突然出了状况：一方面，梁实秋的糖尿病开始发作，并且听力也开始衰退；程季淑则因高血压昏倒，身体孱弱。加上尼克松密访中国，并发布《上海公报》，台湾情势突然急转直下。因此，在女儿的要求下，梁实秋夫妇卖掉了房子，于1972年移居美国西雅图。

在西雅图的日子，程季淑虽与女儿团聚，却很寂寞，因为梁文蔷结束十年专职主妇生活，回到大学教书，白天只有老夫妇在家。程季淑言语不通，不敢与美国邻居说话，也害怕独自进店铺，看不懂电视；又因为身体不好，当了一辈子家庭主妇的她，不大能做家事，织毛衣和窝在家中拼图成了她打发时间的主要方式。

相较之下，梁实秋每天早晨四点多起床，散步一个钟头，无论刮风下雨，一伞在手，照走不误；上午陪老伴买菜，中午下厨小试身手。只是日子虽过得闲逸，但安土重迁，对远游海外不感兴趣的梁实秋，始终对去国远游一事耿耿于怀，不但抱怨当地“乏善可陈”、让他只能“静待晚年”。所以只申请了长期居留证，而不愿加入美国籍。梁实秋说，入籍必须宣誓忠于美国，“这一点，我做不到，因为我爱我的中国”。梁文蔷也只好刻了一方“四海为家”的印章送给父亲。

但好景不长，曾向往两人一同喊着“一、二、三”便同时死去的梁实秋与程季淑，[①]终于到了诀别的时刻。1974年4月30日，两人如往常一样在街上牵手散步，不想超级市场边的铁梯突然倒下，压伤了程季淑。

虽然送去医院时程季淑仍喊着要梁实秋“不要着急”，但在手术中仍疑因麻

---

①梁实秋：《梁实秋自传》，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年，页305。

醉过量不醒。当晚，医院即宣告程季淑因心脏衰竭过世，享年七十四。老伴突然撒手而去，情感细腻的梁实秋痛不欲生。他把程季淑葬在西雅图北面的槐园墓地后，急急动笔写下记述四十七年恩爱岁月的《槐园梦忆》，期待能稍解心中思念，并在当年11月搭机返台。

浪漫性格如火

梁实秋在散文创作上的代表作《雅舍小品》，成书于抗战时期。当时梁实秋随国民参政会驻在重庆，与身处沦陷区北平的家人通信时，本想用单名“梁秋”，怕被敌人识破，因联想到“春秋多佳日”，于是取了“佳”字和取名常用的“子”字，成为“子佳”。

日后《星期评论》主编刘士英向梁实秋邀稿，梁就用“子佳”的笔名发表，名曰《雅舍小品》，①大概到了第十篇才改回真名。其后，梁实秋认为“用真名，可使自己下笔谨慎”，几乎不再用笔名。直到1974年12月3日在《联合报》发表《吃在北平》一文时，才再次用了“子佳”这个老笔名。

只是两次使用“子佳”的时间却有微妙的巧合：当时梁实秋的身边都正巧传出有红粉知己的小道消息，前次是龚业雅，后来则是韩菁清。

当年梁实秋只身赴重庆，妻儿一别六年余，他是否另有女友，一直是文坛上的公案。不过前《联合副刊》编辑、作家丘彦明于1996年撰文指出，梁实秋生前曾证实“四川的女朋友确是业雅”，“《雅舍小品》也是因业雅的名字来的。《雅舍小品》第一篇曾先给业雅看，她鼓励我写。《雅舍小品》三分之二的文章，都是业雅先读过再发表的。后来出书，序也是业雅写的。我与业雅的事，许多朋友不谅解，我也不解释，但是一直保留业雅的序作为纪念”。

所谓“业雅”指的即为龚业雅，她是梁实秋三妹梁亚紫在北京女师大的同学，湖南人。梁认识龚业雅是在程季淑之前。根据梁实秋的说法，龚业雅

①多年后梁实秋老友张佛千回忆，文章刊出后某天的筵席间，有人提到《雅舍小品》写得好，猜想恐怕是梁实秋写的。徐仲年却是摇头，认为梁实秋“写不出这么好的文章”。同座的刘士英不说破，事后才转告梁这则趣闻。

在北平念书时曾和三妹到梁家玩，“全家人都很喜欢她”。他还形容“业雅是我见过最男孩子性格的女性，爽快，长得明丽。非常能干的，先后在四川、北平做商务编译馆的人事主任，管两百多人，连家属六七百人，很有能力。当年所有编译馆的事，从重庆回到南京，都是她一人处理的。她不是文才，是干才”①。

重庆大轰炸后，梁实秋与龚业雅一家合资买了间平房。因为没有门牌，朋友不好找，邮差也不方便，就以龚业雅的“雅”为名，在山下路口钉了块木牌写上“雅舍”。因此先有“雅舍”，才有后来的《雅舍小品》。抗战后，梁实秋与龚业雅先后回北平。

因国共内战，梁实秋未及道别而匆匆离开北平，到了广东才写信给龚业雅。龚业雅则回信埋怨他不该离开。梁实秋初抵台湾后，两人仍鱼雁往返，直到两岸断绝邮电才失去联系。“文化大革命”后，梁实秋托在美友人打听，得到的却是龚业雅的死讯，过世时方六十九岁。梁实秋曾说：“这一生影响我最大的女人，一个是龚业雅，一个就是我太太程季淑。”

据梁在晚年对这些情史的解释是，程季淑原谅了他与龚业雅的事情。在美国发生意外去世前，程即常常因为高血压突然晕倒。某天，她对梁实秋说：“我知道我不行了，我死后你要马上结婚，这么多年，最懂你的就是我。”

1974年，梁实秋选在5月4日于异乡安葬携手相伴四十七年的老伴。梁给老友张佛千的信中说，他在槐园里同时买了四块地，预备留给自己、女儿梁文蔷和女婿邱士耀；一家四口安葬在一起，“不教她在异乡孤寂……内人一生忠厚，她把一生的精力、感情、时间，全部生命都奉献给我了，我看着她突然舍我而去，幽冥永隔，我何以堪！”“此后我当更加倍努力工作，以慰亡妻在天之

---

①龚业雅与梁实秋的关系十分微妙。1927年，梁偕新婚妻子避居上海，刚自女师大毕业的龚业雅和梁亚紫到上海住过短时期，同在东南大学服务。那一年，梁实秋经由龚业雅堂兄龚业光的引荐，也任教于该校；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北平沦陷，梁实秋只身辗转赴长沙待命，正在湘潭的龚业雅特地赶到长沙见梁。1939年4月，日本敌机开始轰炸重庆，梁随教育部教科用书编辑委员会迁往北碚办公。5月3日发生大轰炸，第二天梁实秋竟冒险从北碚乘船到重庆探视龚业雅及其夫婿。正好又遇上敌机大举轰炸，龚业雅的房屋坍塌，梁实秋因此偕龚业雅全家迁往北碚，且合资购买平房一栋。平房位于半山腰上，有六间，龚业雅出四千元，梁实秋出两千元。他们同一个屋檐下，龚业雅与先生、孩子住三分之二，梁住三分之一。

灵”。

老伴过世后，梁实秋有好一阵子借写作寄托感情。他以深情的文笔写下《槐园梦忆》，记录四十七年夫妻的恩爱与患难。半年后，11月3日，老友、远东图书公司老板以校对《槐园梦忆》之名邀约梁实秋独自回台看朋友，并安排新书出版。

《槐园梦忆》流露的深情深深感动了读者，尤其女性读者，几乎是一手翻书，一手持手帕拭泪，哭成泪人。这本新书立刻成为极轰动的畅销散文。

只是书中“季淑没有死，她仍然活在我的心中”等语犹在耳，1975年初的台北文坛却有耳语：梁教授可能要续弦，对象是已经转入幕后的影星、歌星韩菁清。梁实秋回到美国后，有报纸谨慎地揭露了这则传言，指“他的生活需要有人照顾”，但又引述梁实秋朋友的话“梁实秋做事稳健，大概要经一番考虑，才能决定这桩婚事”。

韩菁清本名韩德荣，为盐商韩惠安之女，湖北黄陂人，在上海长大，取名引用《诗经》中的“其叶菁菁”，以“菁清”当做艺名。由于家境非常好，自幼学唱京剧，后来迷上周璇和姚莉的国语歌曲，十四岁瞒着家人参加上海“百乐门”的招考歌星活动，一举赢得榜首，1946年又当选“歌唱皇后”，成为上海滩名人。

国共内战期间，韩菁清随家人迁徙香港，父亲希望她念书，送她到台湾读法律。韩菁清对法律没兴趣，又回到香港的万国美专，一个机缘被新华影业公司看中，登上银幕。她演过《大众情人》、《一代歌后》、《香格里拉》等电影，也曾灌录唱片，并出版过散文集。与梁实秋认识时，四十三岁的韩菁清正转入幕后，在台视学编导，两人年纪相差近三十岁。

作为一名红星，韩菁清的感情之路不顺遂，情史经常成为人们谈论的话题。她曾因与一名男性主持人在家中小坐五分钟，即遭人诬指横刀夺爱，所幸法院判决还她公道；最常被人提起的，是她与曼谷盘谷银行总裁相恋八年却无疾而终的故事。

消息曝光后数天，传媒引述韩菁清的谈话，“跟梁教授很谈得来，同在一起度圣诞及新年假期，而且梁教授去国之后经常来信，写得很勤”。至于有多勤，韩菁清说，“有时候早晚各写一封”，显示两人有特殊情谊之说并不只是流言而已。

从鸿雁往来到互结秦晋

梁实秋回台筹措《槐园梦忆》出版事宜，赁居在台北辛亥路上的华美大厦。

某天，韩菁清的义父谢仁钊要写英文信，向韩菁清借了本英文辞典。由于正巧韩拿的是《远东英汉大辞典》，谢表示与远东图书公司的老板熟识。1974年11月27日，谢介绍韩与他认识，三人饮茶时提到梁实秋住在附近，提议一同散步到华美大厦拜访，促成韩与梁初识。韩的说法是，本来想为梁教授做媒，不料梁对红娘一见钟情，两人陷入热恋。五天后，12月2日早晨，梁实秋给韩菁清写了第一封情书：

菁清：

昨晚看了你的信，十二点以后才睡。你这封信我本想不复，怕你不高兴，所以还是写几个字给你。其实见面谈，不是更好么？

你的信写得极好，不但含蓄，而且深刻。我看了不知多少遍，当什袭藏之。你要我“趁早认识我的为人”，我也要以同样的话叮嘱你。事实上我有更多的话叮嘱你。你不要任性，要冷静的想一想。从11月27日到今天还不到一星期，谁能相信？我认为这是奇迹，天实为之！我们还有漫长的路要走，希望我们能相互扶持。

今早起，我吃了一片糯米藕，好甜好甜[①]；我吃藕的时候，想着七楼上的人正在安睡——是侧身睡，还是仰着睡，还是支起臂肘在写东西？再过几小时就又可晤言一室之内，信不要写了。

梁实秋

六三、一二、二早

梁认识韩之后，就像是年轻人恋爱。两人不仅天天见面，而且每天一封信，这比年轻人谈恋爱还快。一封12月4日的信中透露，为了一张梁实秋与女性友

①当时梁隐瞒自己有糖尿病宿疾，因此韩亲手制作糖藕送梁实秋。

人的合照，韩还小小地怄了气。

梁在信中申辩“有一件事我受了委屈，我与人合照的一张相片，我露出笑容，其实那是在拍照时勉强做出的笑貌……而且那张照片是11月21日照的，是在我们的27日以前照的！猫咪，你该哑然失笑了吧？可是为了翻查那张照片是哪一天拍的，害得我检视日历费了半小时的工夫！”

相识一个月，梁实秋即以韩菁清“孤零零一个人也不是办法”为由求婚，甚至早在认识第十天——1974年12月6日梁写给韩的情书中，即谈论婚姻之事。梁写到“有些问题是你提出而我事前没料到的，我苦思焦虑，辗转反侧，不能得到万全的解答”。另一封12月15日的信则提到：“我的女儿又有信来，再没有提一个字。慢慢来，最后她会谅解我们的。”为处理亡妻的赔偿官司，梁实秋于1975年1月10日再次前往西雅图，但他出国前甚至在信中说：“没有任何人任何事能妨碍我们的婚姻，我将在最早可能的时候回来办理我们的终身大事。”

浩瀚的太平洋，没有隔开老教授的热情。从搭机当晚在东京转机开始，他就天天写信。回到西雅图，梁不畏寒冬，迫不及待地一早就去邮局买了一百张邮票。他在给韩菁清的信中写道：“这一百张邮票用完时，我们相见之日就不远了。”同时为了避免受他人瞩目，梁实秋写给韩菁清的信，一律署名寄给“韩德荣”①。

梁文蔷对父亲打算续弦一事十分不能接受。从她到机场接机发现父亲指上戴着一个大指环开始，父女俩就展开一连串不愉快的对话。其后三个月，梁实秋几乎每天不能不提到韩。

某天，梁实秋面色凝重地问女儿：“文蔷，你知道我现在心里是怎样的一种感受吗？”“我知道。你就像一个溺水的人，一直往下沉，马上就要淹死了，你在挣扎。你抓住一根水草死也不放手。”梁文蔷认为，她的答案击中了父亲的要害。父亲开始哭泣，她也陪着哭。

尽管女儿排斥，梁实秋常情不自禁地对女儿说“韩小姐……”、“韩小姐……”，让女儿又气又好笑。他特地从台湾的《女性》杂志上找到一篇介绍韩

①为免外界物议，梁实秋也写信和韩菁清沟通，表明希望两人的往来私信，起码要等他过世后才能对外发表。



⬆1975年，梁实秋和韩菁清在婚礼上。梁实秋晚年与韩菁清的二度婚姻，被梁氏自比为浴火的凤凰。两人原本择定4月6日结婚，而4月5日蒋介石去世，使他们的婚期不得不推至5月9日。那一天，数十家台湾报纸和电视台的记者拥来，争着报道这对不平常恋人的婚礼。

菁清的文章，拿给女儿看。梁文蔷却问他：文章上写着韩这两年陷入爱河，“对方当然不是你，那是谁？”面对女儿的疑问，梁实秋虽说信任韩，心里仍是七上八下。3月底再度回台，目的就是挑选黄道吉日，完成婚礼。

再回台湾，梁实秋对于恋情毫无隐瞒之意，他在台北市忠孝东路韩菁清家中，左手无名指上戴着宝石定情戒，浓情蜜意地与韩菁清一起接受《联合报》专访。“结婚不为什么，是一种自然的发展。我和韩菁清结婚，和别人并没有两样啊！”别离两个多月，这位七十三岁的老教授写了八十余封情书倾吐相思，每封信都按照顺序编号，期间还不小心遗失了第六十六号信。为了怕情书被有心人利用，梁多在信中称韩为“小娃”，韩则称梁为“秋”。

三十年前的台湾社会，观念还十分传统，即使不提韩菁清与梁的三子梁文骐同年，七旬老教授与年纪相差三十岁、情史丰富的歌星陷入热恋，已很难为社会接受；何况梁实秋才刚写了《槐园梦忆》，读者泪还未干，他却又展开新恋



情，“被骗”的读者气愤不已！

有人扔了梁实秋的书；他的学生甚至组成“护师团”，希望老师打消再婚念头；有朋友把韩菁清过去花边新闻的剪报寄给梁实秋，要他参考；甚至有杂志以两人的婚事为题办了个征文比赛。

在一片反对声中，仍有少数读者和学生给予支持。一位读者热情地寄给梁实秋新台币一百元作为贺仪；陈之藩是朋友中少数同情梁实秋的，他写信告诉梁“只要有爱，什么都别顾虑，外人的话都别听”；也有朋友写信祝他能找到幸福，无须顾虑外界的风风雨雨。梁实秋回信竟说自己“感激涕零”。

至于梁实秋最在意的幺女梁文蔷，在一篇纪念父母的文章中这么记录她的想法：“父母爱子女，关怀子女一生，但不可控制子女一生，子女对父母亦然。”

外界的批评声并没有动摇老教授的决心，他甚至抱怨“我不是在追求特别护士，我是在爱情中，没有一个人了解到这一点”。只是原定4月6日结婚，因不巧前一日蒋介石逝世，才延至5月9日悄悄地在法院公证结婚。



⬆ 梁实秋和韩菁清，本是两个生活习惯截然不同的人，却奇妙地组合在一起：梁实秋早睡早起，晚上9时必睡；而韩菁清晚睡晚起，凌晨三四点钟才睡，中午起床。梁实秋清早5时起床，上午是最佳写作时间。他一口气写到中午。写累了之后，正好韩菁清起床，烧好了中饭。下午是两人最愉快的时刻，要么一起外出，要么在家接待来客，要么聊天。当初，有人曾预言，梁实秋和韩菁清的婚姻只能维持三天。然而，1985年5月9日，两人愉快地度过了结婚10周年纪念日。台湾许多报纸发表文章，称之为“不老的爱情”。

梁实秋表示，“结婚是个人的事，我不想太惊扰别人，也不想引起别人注意”，因此只宴请四桌至亲好友，证婚人就是梁实秋来台后帮他张罗住处的大同公司负责人、当时的台北市“议会”议长林挺生。新房设在韩菁清位于台北市忠孝东路的公寓，约一百八十平方米。结婚前，韩菁清就住这儿，除了买一套橘红色沙发，没有添购太多新家具。

一位生活规律、拘谨朴素、连电影院都嫌嘈杂的老教授，一位爱热闹的

息影明星，生活习惯南辕北辙的两人结合在一起，反而让梁实秋找回远离的青春：恋爱时，两人一块儿吃夜宵，梁实秋说，那是他“生平第一次”深更半夜在外面吃清粥；婚后，七十四岁的他开始学跳舞，在家里的饭厅翩翩起舞；尽管饮食习惯不同，但因韩菁清烧得一手好菜，梁实秋婚后心宽体胖，八个月体重上升五公斤；外界还注意到，原本搁笔已久的梁实秋又开始了创作。

尽管一般认为梁实秋觅得第二春后生活充满活力，梁文蔷却不这么认为。梁实秋过世后，文蔷抱着为父母立碑的心情，写下《梁实秋与程季淑——我的父亲母亲》一书，或因个人孺慕之情的选择性记忆，或是梁实秋面对幺女始真情流露，梁文蔷认为，自母亲弃世到父亲过世的十三年半，梁实秋无时无刻地不在怀念妻子，而且“相思之情与年俱增”。

梁文蔷摘录一封家书，梁实秋在里面写道：“×××常问我，你为什么忽然发愣？我则以谎言支吾，因我心里痛苦，不愿累及别人不快。”

在谈到梁实秋性格时，梁文蔷记下 1979 年梁赴美与她闲谈的一段对话：“忽然父亲若有所思地说，‘我这个人如果做事做错了——就一直错到底。’我知道爸爸何所指，无须说明。”

最后的岁月

梁实秋的内心世界已不可考。但婚后，梁实秋确实又有了动力重新投入到被搁置了好一阵子的另一项巨大工程中去——撰写《英国文学史》。他每天上午专心读书、写作，一天写五千字。与翻译莎剧情况类似，梁实秋多年前就准备找志同道合的朋友合著一本给中国人读的《英国文学史》，等了好些年。他等不及了，1973 年索性自个儿来，但第二年因妻子发生意外而中断。

1979 年 6 月，梁实秋终于历时七年完成《英国文学史》和《英国文学选》，前者约一百万字，后者约一百二十万字。虽然写作完成时，当年协志工业丛书出版公司就决定购买二稿，但校稿耗费了好一段时间，两本书出版则在六年后。期间，梁实秋获得“文艺贡献奖”。

此外，梁实秋在这段时间内，也陆续与留在中国大陆的长女梁文茜、儿子

梁文骐取得联系。1980年6月，在林语堂女儿林太乙与余光中的协助下，梁实秋远赴香港与梁文骐会面；梁文骐随后取道美国赴台，在“中研院”、“中央大学”统计所任职。1983年6月，梁文茜也前往美国西雅图，如愿与梁实秋团聚，圆了梁实秋三十年来的心愿，并陪女儿到程季淑的墓上献花。梁实秋更期盼着有生之年能回到祖国大陆的故乡。

只是八十岁后，梁实秋听力开始衰退，他较少出席文坛的餐会、聚会，以免久坐后，让自己的腰、腿“活受罪”。1986年底，作家季季访问梁实秋时，梁只能用书面回答。

虽然听力不好，也不再参与教科书和字典的编纂，但直到去世前一年，梁实秋仍不断读书、写作，有四家报纸副刊不时索稿，且每月持续翻译两三篇，并于八十五岁那年获得“《中国时报》文学特别贡献奖”。

1987年，梁实秋双耳几乎全聋，由于听不到门铃声，在家时总是开着门，并安置了一盏信号灯，借此提醒他门铃响了，有人来访。但他仍乐观地说，一个人活过了六十岁，活一年便赚了一年。只是在他去世前几天，梁实秋对朋友感叹道：“老，是一件不愉快的事，因为所有的机能都在衰退，所以要老人快乐是很难的。”又提到他走路去邮局时，拄着拐杖，走两三步就得停下来休息，因为心脏跳动不太稳定。

11月1日晚上，韩菁清出门洗头，梁实秋突然心脏不适，于是打电话给住在台北市郊南港的儿子梁文骐。梁文骐赶到时，先让父亲平躺。不一会儿韩菁清回家，即警觉事态严重，找来医生稳住状况，随后送到附近的中心诊所。医院急救同时发出病危通知。老教授心脏血管阻塞，一小块心肌已死。医生看X光片怀疑还有肺癌。

在旁帮忙的作家丘彦明找来在台大医院当医生的弟弟与值班医生一起察看梁实秋的病情。两位医生认为主要还是器官老化，心脏血管阻塞引起肺水肿，呼吸困难。当然，这与他长期糖尿病也有关系。

11月2日晚上，老教授安静地睡了，半夜却又因为缺氧闹了一夜，医生帮他换了大的氧气罩才安静下来。数小时后，3日早上7时余，梁老教授又不安地动了起来，他比手势要纸笔写了字，但在旁照料的梁文骐和丘彦明都看不懂。梁文骐猜是“救我”。后来他扭动得受不了，双手将氧气罩提高大喊：“大量的氧气，我要大量的氧气。”医生和护士赶来，但说氧气已是最大的极限了，可是

他仍凄惨狂喊“我要死了”，“给我大量的氧”。

医生看情形不对，才忙着换床位使用更大的氧气急救设备。就在这边小氧气管摘掉，推到另一床位接大氧气筒时，梁实秋心脏停止跳动，时间是清晨7时30分，三次电击也挽救不回。

早在三年前梁实秋即预立遗嘱，不组治丧委员会、不发讣闻、不登报、不举行公祭、不收奠仪，也不举行任何宗教仪式，但他改变心意，不葬在元配程季淑安葬的槐园，而是土葬在离台北不远、较高、视野广阔的地方。

关于墓地的选择，梁文蔷指出，早在1975年父亲给她的《临别留书》即提到“我如死在台湾，即葬在台湾”；1981年留书再提：“……我死不能与汝母同穴，将是我一大憾事。人生苦短，如石中火，炯然一现，万事皆空，思之亦不必耿耿于怀……”

面对死亡，梁实秋的笔仍感性地让人泪潸潸。他在给儿子最后的信中提到：“死欲速朽，何用铺张？”在给韩菁清的信中说：“我依然爱你。我故后，你不必悲伤，因为我先你而去，是我们早就预料到的事。”

梁实秋过世后，韩菁清也紧急为梁实秋留在海峡对岸担任律师的长女梁文茜和外孙女王群申请去台奔丧。当时在蒋经国的推动下，隔绝数十年的两岸刚刚恢复交流，台湾已有不少居民回祖国大陆探亲、扫墓，但大陆同胞来去台却还卡在台湾“国家安全法”中“离开沦陷区未在自由地区连续住满五年者不予许可入境”的规定，仅少数高官过世，曾基于人道以项目核准大陆家人入境。心急如焚的梁文茜从北京经深圳到香港等消息，11月17日等到的却是“不予许可入境”。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其中一个理由为“基于公平原则，在政策未改变之前，不做个案处理”。

11月18日，在长女遗憾缺席的情况下，梁实秋安葬于台北郊区的北海墓园。第二年，梁文蔷与兄姊商量后，将一件父亲的旧上衣、染有母亲血迹的纸巾、一缕父亲留了多年的母亲的头发以及一张父母合照，端端正正埋入槐园，并换上父母合葬的墓碑。

梁文茜抱憾回到北京，但此事引起台湾社会的广大反应。“立法委员”赵少康批评台湾当局的“鸵鸟心态”，“违背法律本质与正义”，应对大陆居民奔丧问题审慎考量。一年后，梁实秋忌日当天，台湾当局终于公布“大陆同胞来台奔丧办法”。

另一方面，于1980年才与分别三十一年的父亲重聚的梁文骐，没能见到母亲最后一面，又在短短八年后送走父亲。11月13日，梁文骐在报上发表《我所知道的父亲》纪念文。文末提到，他父亲是在“完全中断输氧的五分钟里”死亡的，引发了梁实秋是否因为缺氧死亡的争议。

中心诊所主治医师黄大为虽解释，梁实秋是因为心肌梗死合并心因性休克，引起呼吸不畅，并非没有给予充足氧气。但韩菁清和梁文骐不能接受，向台北地方法院控告中心诊所涉嫌业务过失而导致梁致死。

不过医疗官司谈何容易！进入诉讼后，连当初支持他打官司的少数全程在场的证人丘彦明也打了退堂鼓，还是法官以将拘提警告才出庭作证。这场诉讼自然胜算不高，半年后法院宣判中心诊所院长和医师无罪。

“铁肩担道义，棘手写文章”，是梁实秋极爱的一句诗。前半生作为文学批评家，乃至于时论家，梁实秋无疑用身体践行了如斯理念。只是到了台湾后，梁实秋毅然抛开了宦途与文学批评的路向，将精力贯彻在翻译与散文创作上，其中变革不可说不大。

强调古典主义的清明，反对浪漫主义的冲动，以及质疑革命文学、普罗文学的局限性，是梁实秋在文学理论上的重要主张，甚至是参与各项论战时的立论依据。他的故去，也因此被台湾文坛视为“一个时代的结束”。

在文学创作上，梁实秋多次提倡白话文也必须用字简洁，避免夹缠不清。为了克服这些不足，还是必须到“唐宋八大家”等这些“古书里去讨教训”，也就是酌取文言之长，摒弃西化之短。至于翻译，仍需一扫硬译的弊病。从文学角度推敲杜诗的用词、达情，则是梁实秋终其一生的“享受”。

但是从梁实秋早年的文学倾向，乃至于晚年轰轰烈烈的恋爱记录来看，他在本性上却又是个热情奔放、我行我素的知识分子。长年寄情文艺，强调简约克制，恐怕还是因为长期以来内外各种因素对梁实秋个人的制约，才使得他的本性与行为上出现如许的割离。梁实秋晚年在大批散文中展现的隽永与幽默，或许才是他观遍人生后，自然而然的发挥。



钱　穆
Qian Mu

"一生为故国招魂"的史学大师

我把书都写好放在那里，将来一定有用。

——钱穆



国际知名的儒学大师钱穆自学不倦，在学术上成一家之言。他虽无大学文凭，却成为当代大儒、史学导师。在九十六年的生命中，他历经抗战、流落香江、定居台湾，颠沛流离，却能因为对学术的坚持与狂热，取得了令人赞叹的学术成就。一向坚持传统的钱穆，始终给人古板、保守的刻板印象，更让他在老年成为反对者批判的目标，以至于在台湾狂飙的年代，遭受政治人物的无情践踏。

不过钱穆一生全心发扬传统文化，坚持以历史救国、"一生为故国招魂"（余英时语）的浪漫主义，却是后人难以比肩的。尤其是他在抗战流离之际，冒着生命危险著作的《国史大纲》，成为两岸史学的重要经典文献。钱穆的这份坚

持，以及期待后人在国史中浸润生命，拓展视野以救国、复国的气度与格局，成为他留给后人的无形遗产。

重视中华文化与历史传统，钱穆始终没有丝毫动摇。他主张现代中国人必读九本传统经典：《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老子》、《庄子》、《六祖坛经》、朱熹《近思录》以及王阳明《传习录》，以领略故人先贤的文化抱负。他在毕生力作《国史大纲》正文前，高举四项对国史的殷切期待："一、当信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二、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三、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本国已往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亦至少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已往历史最高之顶点，而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于古人。四、当信每一国家必待其国民具备上列诸条件者比数渐多，其国家乃再有向前发展之希望。"

钱穆在晚年多次强调，国民必须认识自己国家的历史，否则不是合格的国民。这或许正是重视传统的史家所提出最具浪漫主义色彩的宣言。

自幼苦读　北大任教时期成一家之言

钱穆，字宾四[①]，江苏无锡人。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七月三十日，生在江苏省无锡县荡口镇南延祥乡啸傲泾上七房桥之五世同堂。[②]原名钱思𡷊，1902年改名为钱穆。笔名有公沙、忘未学斋主等。

钱穆自幼天资聪颖，有强记不忘的本领，虽然家境贫寒，仍刻学苦读。1901年入私塾，父亲钱承沛即称赞他"前世曾读书来"。1906年，钱承沛因肺病逝世，临终前叮咛他要好好读书。[③]私塾老师期许他能效法"文起八代之衰"

---

①"宾四"语出《尚书·舜典》："宾于四门，四门穆穆。"

②钱穆：《八十忆双亲》，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3年，页2。

③钱承沛的天资颇高却身体虚弱，极年轻就考上秀才，但三次想更上一层楼考取乡试，都因为身体无法负荷沉重考务而在考试中途放弃，只能在家乡开私塾授徒。日后，钱承沛染上吸食鸦片的恶习，钱家家境更加没落。印永清：《百年家族——钱穆》，台北立绪文化事业出版有限公司，2002年，页57。

的韩愈，在国学上成大器。

钱穆以姚鼐的《古文辞类纂》与曾国藩的《经史百家杂钞》为入门，踏入国学经典的瀚海中。1908年进常州府中学堂。诗人刘半农是钱穆的中学同学，瞿秋白则晚两人一届入学。

钱穆自小不但爱读书，且口才极佳，七岁就在鸦片馆为客说《三国演义》，曾为同学讲《水浒传》。[①]十六岁时，受到谭嗣同“仁学”的影响，愤而剪去长辫。[②]因辛亥革命爆发，学校解散，无法完成中学学业。十八岁，钱穆出任无锡市郊秦家水渠三兼小学校教师，开始发表文章。1918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第一本著作《论语文解》。

其后，钱穆任教于厦门集美中学、无锡师范学校、苏州中学，讲授国学概论。1920年秋，钱穆转任后宅镇泰伯市立第一初级小学校长。但1928年夏秋之交，他的妻子邹氏、新生婴儿及兄长钱声一先后逝世，钱穆开始挑起全家的经济担子，长侄钱伟长随他在苏州中学就读高中一年级。1929年钱穆续娶张一贯，迎养母至苏州，长子钱拙在此时出世。《墨子》、《王守仁》等著作也陆续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

1930年秋，顾颉刚荐钱穆至北平私立燕京大学国文系任讲师，时年三十六。他在《燕京学报》发表《刘向歆父子年谱》一文，辩驳康有为《新学伪经考》误言，平今、古文经学之争，震惊北京学术界。隔年转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师，开设中国上古史、秦汉史等课，讲授史学，终于成一家之言。

钱穆名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于此时成书，力矫时弊，指陈民初学者推崇乾嘉考证之风，而贬抑宋明理学之弊。抗战后，钱穆历任西南联大、华西大学、中央大学、齐鲁大学、武汉大学等大学教授以及无锡江南大学文学院院长，讲授上古史、秦汉史、政治制度史等课程。并于1939年云南避难期间，在岩泉下寺完成巨著《国史大纲》。

---

①钱穆与兄长钱声一自幼就喜欢丝竹、京剧、昆曲、吹箫、围棋，影响所致，成为他中年后的重要消遣。

②李木妙：《钱穆教授传略》，台北扬智出版公司，1995年，页12。

投身香江教育　创办新亚书院

1949年由于时局紧张，大批自由派学者随蒋介石迁往台湾。钱穆虽没有赴台，却也因为左派学者对他的排斥，以及忧心时局，并未留在祖国大陆。钱穆先是拒绝上海、北京等地学校的邀约，又应江南大学荣德生之聘，返回家乡无锡教书；继而应张其昀之约，与不少知识分子经广州南避香港。

处在战乱时期的英国殖民地，自认是流亡知识分子的钱穆，除在徐复观主持的《民主评论》发表文章外，又与谢幼伟、唐君毅、崔书琴等学者，借用华南中学在九龙伟晴街的课室三间，筹办“亚洲文商夜学院”，招收港台学生六十余人，开始钱穆在香港的办校生涯，实现为中国人办教育的目的。

1950年秋，上海商人王岳峰斥资在九龙深水埔桂林街61–65号购得新楼三楹，供作新校舍。占地虽不大，也无图书馆，但亚洲文商从此由夜校改为日校，并更名为“新亚书院”，钱穆出任院长。

“新亚”之名，据钱穆所言，希望借提倡“新亚洲”，为在香港的中国人争取稍微光明的未来。钱穆之子女指出，钱穆看到生活在香港的中国人失去精神支柱，希望借由在百年殖民之地上办校，倡导中国文化，让流亡者别忘了要做中国人。

新亚书院的创办宗旨，强调上溯宋明书院的传统，采西欧导师制度，以人文精神教育为宗旨，沟通中西文化。[①]钱穆教中国通史，唐君毅教哲学，崔书琴教政治学。

最初，新亚书院只是一所难民学校，收容流亡青年，以免断了学业，教师不支薪。钱穆担任校长兼老师，对学生谆谆教诲，坚持曾国藩“扎硬寨、打死战”的精神，为新亚书院四处奔走募款，争取优秀学者任教。他还说服当时的香港政府，认定新亚书院是以办教育为理念而非以营利为目的的机构，让学校免于商业登记，以免损害学院的教育精神与本质。

---

①钱穆：《新亚遗铎》，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9年，页6。

度过极度艰困的草创时期，新亚书院获得美国哈佛燕京学社、洛克菲勒基金会支持，与耶鲁大学合作交换学人，情况有所好转。新亚书院在1952年有了第一届毕业生三人，其中一人便是史学大家余英时。

积极办校的钱穆自奉简朴，创校时栖身在简陋的新亚校舍中；日后搬到贫民区的钻石山，赁屋而居，每天搭巴士到学校；后又搬到偏远乡村沙田西灵寺旁，仍旧每天搭巴士、火车上课，从未向校方申请公费补助。

赴台演讲意外　造就一段姻缘

钱穆虽在港办学，并没有断开与台湾的联系。随着蒋介石在台政务与各项文化建设逐渐展开，钱穆多次受邀赴台讲学，传授中国文化与历史精神。

抗战时，钱穆就数度于四川晋见蒋介石，谈及理学与历史。蒋介石托钱穆编写《清儒学案》，邀他到重庆中央训练团演讲，素有交情。

钱穆创办新亚书院后，蒋介石不但亲自邀请钱穆去台一叙，而且由宋美龄、蒋经国招待，同时指示台湾行政当局每月拨给港币三千元，供新亚纾解资金困境，前后长达四年，直到耶鲁大学提供新亚书院补助为止。1950年之后，钱穆大约每年受邀到台湾演说或与蒋介石小叙，蒋经国多会作陪。钱穆曾考虑在台兴办新亚书院分校，但因未获国民党支持，不了了之。

1952年4月16日，钱穆应朱家骅邀请，赴台为“联合国同志会”演讲。活动借用淡江文理学院新落成但尚未验收的“惊声堂”举办，有四百余人前来聆听钱穆关于唐宋史的看法。演讲完毕，在答问之际，讲台前的屋顶突然掉下大团的水泥块，第一排的贵宾听众、活动主持人以及钱穆均遭波及，多人受伤，应邀听演说的“立委”柴春霖当场死亡。

意外发生时，钱穆头部遭到石块重击昏厥，险遭掉落的碎石活埋。众人将他从石堆中救出，送台北中心医院急救，幸无性命危险。蒋经国、张群、何应钦等人闻讯，立即赶赴探望。钱穆身受重伤、不便行动且须治疗，只能赴台中存德巷养病四月，直到1952年8月才返港。

讲堂的塌陷却意外地开启了钱穆的另一场人生意外。养病期间，任职于台中师范学院图书馆的新亚书院学生胡美琦，常来照料，陪同钱穆到台中各地散

步、旅游，也协助钱穆搜集藏书研究，为日后共结连理埋下了种子。

胡美琦出身名门，江西南昌人。父亲是国民政府时期的江西省主席胡家凤，与钱穆本是旧识，1950年由港赴台任“国策顾问”；兄长胡美琼曾担任台湾省公路局局长。胡美琦对历史与教育别有研究，日后曾在文化大学任教，文笔颇佳。钱穆晚年因眼疾无法专心著述，皆由胡美琦代整理付印才能顺利出版。

胡美琦曾说，两人之间并非浪漫的爱情，她因景仰钱穆的人格学养，愿意委身下嫁，照料不时为胃疾困扰的钱穆。

1956年1月30日，钱穆与胡美琦在九龙亚皆老街更生俱乐部举行婚礼，老夫少妻相差三十五岁，且是师生恋，外界议论纷纷。这对新人因而格外低调，仅邀新亚书院同事眷属十余人参加婚礼。

婚后，钱穆与胡美琦仍暂住九龙钻石山，虽然不富裕，但生活饶富情趣，夫妇俩每天必然携手散步。著名作家金庸日后于小说后记中提到：“看到钱穆夫妇婚后幸福生活，实感敬佩。”

婚后钱穆并未忘记学术，《先秦诸子系年》由香港大学再版，《王阳明先生传习录及大学问节本》、《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也陆续出版。新婚这一年，钱穆为新亚书院争取到美国方面每年两万五千美元的补助，解除了新亚书院的经济危机。注重英语教学与文化的香港大学，也在同年颁给钱穆名誉博士学位。

从新亚书院迈向创设中文大学

1960年1月，时任新亚书院校长的钱穆，应美国耶鲁大学东方学系邀请讲学半年，并获耶鲁大学颁赠名誉博士学位。一生未上大学的钱穆，不愿浮夸穿戴礼服方帽，在颁赠典礼上依旧穿着普通衣服出席，以强调他是以普通人的身份接受荣誉学位的头衔而已。钱穆在美国讲中国史，依旧力主历史须以人为重心的观点；强调没有人就没有历史，即使没有具体功绩也能因为人格的优越让颜渊、伯夷、叔齐等人物在历史中留名。

钱穆在耶鲁讲学期间并赴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芝加哥大学等考察，又赴英国牛津、剑桥、伦敦等大学参观。新亚书院也在当年添设物理化

学系。

不过为了大批在香港攻读中文的中学学生升学需要，香港政府决定在主要提供英国学生就读的香港大学外，合并由美国人支持的崇基、新亚、联合三家书院，催生一所新大学，这为钱穆办校带来新变化。

钱穆等人为在香港弘扬中国文化，希望设立有别于香港大学英语教学的大学，加上创校初期收容流亡学生的意义不再，还必须考量学生的学历承认问题，因此积极呼应英国政府的主张，倡议重新组织各个流亡学校，另创新校，这就是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也因此成为香港中文大学教务筹设委员会成员之一。

当时为取校名争议难下，有人主张应该叫“九龙大学”，也有人认为“中山大学”为佳。钱穆提议，在香港这个特殊地区，使用“中文”作为新大学名称，具有一定象征意义，并符合筹设时英文直译的背景，终将名称定案。也由于钱穆坚持国家民族立场，向英国政府极力争取，中文大学首任校长由中国人李卓敏出任。

但中文大学成立后，钱穆称需要时间进行学术研究，露出倦勤迹象。另一方面，中文大学呈现集中发展的趋势，成员背景复杂，办校理念与钱穆主张应联合书院成立大学组织的想法相左，一时引发议论。钱穆多次请辞不成，只好向新亚书院请长假表态。办校纷扰未决，钱穆又为解决视力模糊问题，动了白内障手术，可谓多事之秋。

1965年夏天，新加坡南洋大学拟聘钱穆为校长，但遭婉拒。当年6月，钱穆正式辞去新亚书院校长之职，结束在香港办学十六年的生涯。当时香港人士多不解钱穆为何将一手开创的学校奉送给中文大学。对于纷扰，钱穆淡然以对，只说自己刚好能有时间以学术自娱。

钱穆赴吉隆坡马来西亚大学讲学一年后，迁居台湾，结束香港客居生涯。在这段兵荒马乱的时间里，被胡适称为“不脱理学家习气”的钱穆完成了他晚年大作《朱子新学案》。[①]

①钱穆写《朱子新学案》，始自1964年，于1969年11月定稿，约九十万字。1970年完成的《朱子学提纲》，约八万字，较为简要。钱穆著作认真严谨，一丝不苟，据闻光是相关笔记就总列三千条大纲。

一代鸿儒离港赴台

离开一手创办的新亚书院，钱穆以著书读书为主，以执教为副业，盼尽速完成朱熹的学术研究，以对中国历史文化学术有所贡献。中国文化应以人与人文主义为核心，以道德为基础的理念，成为钱穆的治学大纲。

早在北大讲学时期，钱穆已声名鹊起。而他抗战期间出版的《国史大纲》，从政治制度着手，继而推及学术思想与社会经济的撰写方式，更是开通史写作之先河，并被国民政府列为部用大学用书数十年。

此外，钱穆关于重建国家必先复兴文化，让民众认识历史的主张，也成了蒋介石等国民党在台官员的基本信条。因此钱穆虽然人在香江，但在台湾亦有名重士林的地位。

1966 年蒋介石发动“中华文化复兴运动”。为将台湾建设成国际汉学的中心，蒋介石力邀散居海外的大师级人物赴台，钱穆称许此举是“自辛亥以来最大的一件事”，自己也成为蒋介石极力敦请的对象。除钱穆之外，在美国的林语堂、侨居巴西的张大千，也是重要人物。

一方面有蒋介石的盛情邀请，另一方面香港情势丕变，形成新一波难民潮，左派抗争不断，政局不稳，刚发表《四书道贯》、被视为一代儒宗的钱穆在 1967 年 5 月应中大新亚书院学生之请演讲五四运动之后，终在 8 月决定赴台定居。同年 10 月，七十三岁的钱穆携夫人胡美琦迁居台北，终老于此。

在台期间，钱穆与蒋介石的关系融洽与否，至今仍众说纷纭。

1949 年国民党军队兵败如山倒之际，钱穆是主张蒋介石应下野的人士之一。日后，蒋介石却对钱穆礼遇有加，甚至公开说，或许钱穆等人当时所言，“对国事是有利的”。为表达对钱穆的敬重，蒋介石在面见钱穆时，特别将中山装改为一袭长袍。钱穆对朱熹与王阳明学说的专精，与崇尚王阳明的蒋介石更是一拍即合。

移居台湾之初，钱穆先住进台北市区的“自由之家”，继租居于台北金山街。后来在蒋介石的高度礼遇下，国民党当局拨出位于台北外双溪东吴大学旁的土地，并拨公款建屋，供钱穆夫妇居住。这栋雅致的别墅式两层楼房，便是

大名鼎鼎的“素书楼”。台北“故宫博物院”特聘钱穆为研究员，不仅让他免于为生活发愁，亦得以遍览《四库全书》等重要典籍，安心创作。

盛情难却之下，钱穆又应“中国文化学院”（今“中国文化大学”）校长张其昀[1]之邀，于历史研究所执教并出任所长。较钱穆早年赴台的林语堂，住在阳明山上中国文化大学附近，与钱穆住得近。原本并无深交、作风一中一西的两人从此往来频繁，成为莫逆。英文造诣深厚的林语堂甚至说，看过钱穆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让他决定从此改用中文著作。

1968 年，时年七十四岁的钱穆与郭廷以等人，膺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这是台湾当局对各领域研究者提供的最高学术荣耀。

其实以钱穆的分量，早在 1948 年，胡适主持首任中研院人文组院士选拔时，就该被提及。但钱穆与胡适、傅斯年等的治学途径与西化理念截然不同，他的史观与治学方法更不能被主张以西方科学治史的傅斯年接受。傅斯年曾嘴硬地说，自己从不看钱穆的文章。不仅 1948 年的院士提名钱穆连边都没沾上；1945 年北大复校时，随国民政府西迁大后方的教授群唯独钱穆未获续聘；之后钱穆长期停留香港办学，自然也不会被提名。

1958 年 4 月，胡适赴台接任“中研院院长”，不少钱穆的学生质疑“中研院院士”独缺钱穆，欠缺代表性。不过双方歧见已深，门户之争的结果是钱穆仍无缘被提名。钱穆一度动意气，1966 年，虽有多名资深院士主张提名钱穆，但他断然拒绝。钱穆反问，早在 1948 年，“中研院”就提名八十多名院士，他难道不该人列？虽然弟子们反复劝说，直到两年后钱穆才愿意接受提名，并随即获得全票通过。

素书楼讲学　著作等身

之所以选择落脚外双溪，钱穆表示，住在外双溪台北“故宫博物院”附

[1] 张其昀，字晓峰，浙江鄞县人，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创办人。张其昀与钱穆是旧识。国民党迁台后张其昀曾任“教育部部长”，不时邀请钱穆来台演讲，并亲自开车载他旅游，所以得以邀请钱穆就地利之便，为博士班学生召开讲座，每周一个下午。



⬆ 1967 年，钱穆携妻从美国到台准备长期定居。他的到来，为台湾的史学界注入新的力量。但钱穆与时任"中央研究院院长"的胡适关系素来不和，在胡适去世后，终得任"中央研究院院士"。李敖曾为此抱不平："他（指钱穆）在古典方面的朴学成就，却更该先入选成院士。"一般说来，钱穆被认为是属于文化保守主义，近年来更是被归于"新儒家"。

钱穆夫人胡美琦曾回忆道："我最爱听他吹箫。我们住在九龙沙田的那一段日子，每逢有月亮的晚上，我喜欢关掉家中所有的灯，让月光照进我们整条的长廊，我盘腿坐在廊上，静听他在月光下吹箫，四周寂静，只听箫声在空中回荡，令人尘念顿消，满心舒畅。宾四告诉我，他年轻时学唱昆曲，所以也学吹箫笛，他曾下过很大工夫。冬天下雪在户外练，在当风口处练，还要一腿而起，做金鸡独立式慢慢蹲下又起来练，要练到那箫笛声音不断不变。迁到台湾后，他的牙齿全部拔光，装上了假牙就没有兴致再吹箫了。"

近，可以就近利用故宫图书馆，看到世界上最丰富、珍贵的善本书。将重心放在学术著作的钱穆，婉拒了许多大学的讲学邀约，以避免舟车劳顿，好专心著述。[①]但钱穆因为鸿儒的身份，依旧推辞不掉四处的短期演讲与讲座。

“素书楼”之名源于钱穆无锡七房桥五世同堂故居中第二大厅的名称。先人取名来源已不可考，钱穆尝自解，或脱衍自《中庸》所记：“素贫贱，行乎贫贱；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难，行乎患难；君子无入而不自得焉。”胡美琦指出，钱穆年幼患伤寒，又服错药，性命怠危，全赖母亲日夜陪他在故居素书堂养病而得痊愈，钱穆为纪念母亲生养之恩，因此命名，

素书楼不大，兴建时周边是一片荒凉的墓地，杂草丛生，产权为阳明山管理局所有。为表达对大师的敬重，台湾当局将素书楼无偿全权交给钱穆夫妇打理。房舍由胡美琦亲自设计，楼内一砖一石、一草一木都是主人多年心血照顾而来；步道两旁的枫树、房舍后方的竹子、四棵苍劲的古松，更是素书楼知名的景观。向来崇尚朱熹理学的钱穆，在素书楼藏有一座朱熹的木刻像，又将朱熹所言“静神养气”、“立修齐志，读圣贤书”写成对联，张贴楼中。

钱穆在素书楼展开讲学著述，除散步运动外，每天看书、写稿、讲学，无一刻闲暇。《中华文化十二讲》、《孔子与论语》、《世界局势与中国文化》等经典著作都在素书楼完成。

钱穆在素书楼讲史、谈经、作育英才。老人家一口无锡官话，神采飞扬，从不带课本。客厅为讲堂，正式修课的研究生依惯例坐在钱穆身旁的圆桌边，旁听者自行觅座。讲课固定每周一下午 4 时至 6 时，但总是提前半小时开讲，延后结束，座无虚席，成为台北重要的文史沙龙。

素书楼讲学期间，钱穆常常烟斗在手，触类旁通。有人在素书楼听课，一听就是二十多年。前后五六代学子同堂，接受国学大师亲炙。钱穆常以是否常读书训诫子弟，要求后进明白厚积而薄发的道理，不要年轻时轻易发表作品，以免到了年长学问贯通后后悔。

---

①钱穆到台湾后，至文大授课前，仅到政治大学开了一个学期的讲座，主讲“中国传统教育与制度”。之后由于各方邀约不断，除演讲外，偶尔到各大学兼课或发表讲座。同时应黄季陆的邀请，出任“国史馆顾问”。印永清：《百年家族——钱穆》，页 298。



知名史学家严耕望回忆，钱穆教导学生立志宏大，拿出气魄与意志，做个领导社会、移风易俗的大师，否则学术局限一隅，纵使当代是第一流学者，回归历史之后，仍是第二流学者。他说，五四一代的学者迅速成名，学术却谈不上；清华一代的学者有成绩，却太早当上教授，过舒适日子，谈不上大成就，反不及以一生精力著一本书。

数度到港探亲　与亲属团聚

好棋、好箫、好抽烟、好甜食，“好诗而不能诗”的钱穆，在素书楼度过了一段平静而丰富的岁月。这时的钱穆虽自十岁养成的烟瘾无法戒绝，但身体尚硬朗，唯独在新亚书院任教时期引发的胃溃疡偶尔折磨一下他。1977 年冬季，钱穆胃病发作，几乎不治。

1978 年，钱穆又因黄斑变性症眼疾剧烈发作，无法正常视物看书，前后开了三次刀，静养半年后，并无显著成效；加上胃疾转剧，因此钱穆兴起口述录音写作自传的念头。

视力受损后，在胡美琦协助下，钱穆仍先后出版《历史与文化论丛》、《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国民族性及中国文化》、《中国通史参考资料》、《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宋代理学三书随札》等著作。

1979 年 8 月，钱穆携夫人赴港，参加新亚书院创校三十周年纪念，新亚书院正式成立“钱宾四先生学术文化讲座”。钱穆除重新赴港讲学，也将所著《朱子新学案》原稿赠送香港中文大学的钱穆图书馆，实现了离开新亚书院时的承诺。

1980 年夏，钱穆再度赴港，与留在祖国大陆的儿子钱拙、钱行、钱逊和幼女钱辉（晦）欢聚一周。钱穆很是自责对子女没尽到责任；对于幼女因他的缘故受委屈，格外感到愧疚。

未料这次团圆后一年半，长子钱拙即因淋巴癌去世。而钱穆回台后，又被外界质疑他是否已返回大陆探亲。

1981 年借着侄子钱伟长与长女、中国工程院院士钱易到香港作学术演讲的机会，在新亚书院院长金耀基的安排下，年过八十的钱穆再度赴港探亲。见到

数十年未见的长侄、长女，钱穆相当激动，一起在香港中文大学宿舍共度天伦两周。对于几名子女经历的艰苦，他勉励钱易，“吃些苦没什么”，“只希望能做好一个中国人，用功读书做学问”。

钱穆格外记挂钱伟长。据钱穆回忆，这位曾任清华大学副校长的侄子，是他母亲在子孙辈中特别细心教养的，钱伟长的父亲更是他毕生敬仰的长兄。当年在苏州教授国文时，家中人丁凋零，长兄又辞世，钱穆特地把读高中的钱伟长带在身边念书。

钱伟长的名字还是钱穆取的，袭自晋代建安七子徐幹的字“伟长”，希望他见贤思齐。钱穆年轻时与钱伟长同在灯下读书，钱穆母亲一旁缝纫伴读，更是钱穆老年相当记怀的一个画面。叔侄两人情谊深厚，却数十年无法相见，又听闻钱伟长曾被戴上“右派”的帽子，让钱穆相当挂念，此番探亲终于了了个大心愿。

1983 年 4 月，北京大学教授朱光潜应邀到香港，参与中文大学“钱宾四先生文化学术讲座”，讲授“维科的新科学”。钱穆为一会故友，顶着年迈身躯，再次赴港，场面甚为感人，也看得出钱穆的真性情。此行恰逢钱伟长夫妇也到港参加学术活动，一家人又有了欢聚的机会。翌年，钱穆借着到港过九十大寿的机会，四度与子女团聚。

1985 年，苏州市政府通过知名学者钱鍾书写信，邀请钱穆访问并庆祝苏州建城两千五百年，但因居中转信疏漏，加上客观的政治环境限制，钱穆始终未能赴约。但钱穆对故土的怀念与情感毋庸置疑，他对中国的改革，乃至于要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更是满怀希望。

中国人不要忘记了中国

钱穆的风骨在他对著作的坚持上得见一斑。台湾孔孟学会曾邀钱穆撰写《孔子传述》一书。钱穆一改常人写作生平历史的习惯，从各项孔子行述学说的疑义着手，成一家之言，并坚持《易经》非孔子所著的史学论点。这让孔孟学会大为不满，要求钱穆改稿，否则即拒绝出版。但钱穆坚持不改，把稿件交其他单位出版。



此事发生的五十年前，钱穆《国史大纲》出版后，同样也遭国民政府审查处刁难，坚持要钱穆更改对太平天国的评价后始得付印。钱穆同样坚持不改，以致拖了半年才出版。

《国史大纲》为钱穆一生力作，除了学术贡献外，爱国的精诚更是让人动容。对钱穆而言，《国史大纲》的写作构想是源自九一八事变后的乱局，本来就是一部抗日救亡、宣传爱国的国史教科书，因为唯有熟习历史，培养国民对历史的关切与温情，才能达到救亡图存的真正目标。

钱穆晚年多次指出，中国人对中国文化失去信心是中国文化的最大危机，学校教育偏重自然科学，崇洋蔑己，更是中国文化的隐忧。他强调，中国从无帝国主义侵略他国的文化传统，向来推崇“不嗜杀人者能一之”，才是真正的世界性和平观。

钱穆还认为，中国国家的完整与持久统一性，是中国固有传统；改朝换代只是国内政府改组，而非中国人征服中国人。因此未来中国走向和平统一目标，才符合历史传统文化的民族性；不同政治意见都必须在同一个国家的框架下，由中国人来领导中国。

1985 年，江苏古籍出版社提出出版钱穆全集的构想，却被打了回票。一是钱穆不赞同以简体字出版中国学术作品；二是很多他手边未发表或即将发表的新作未被纳入出版计划；此外，钱穆在两岸对峙期前后，曾发表部分政治性言论，但他主张负文责，反对修改、删节，此争议几经协调才暂告落幕。

1986 年，在蒋经国的邀请下，九十二岁高龄的钱穆受聘为“总统府资政”。为表达对钱穆的敬重，蒋经国特委由“秘书长”沈昌焕亲到素书楼致送聘书，一时被传为美谈，显示两蒋对一代儒宗的高度尊重。钱穆则说，在他之前从无学者出任“资政”的前例，他是为知识分子开这个先例。

1986 年 6 月 9 日是钱穆告别杏坛的“最后一课”，他以“正视历史，胸怀中国”为题，发表告别演说。老学生纷纷回台共襄盛举，曾是新亚书院学生的台大教授逯耀东，曾是北大学生、担任过台湾“警政署长”的上将孔令晟，担任国民党“文工会主任”与蒋经国私人秘书的宋楚瑜，都赶赴外双溪素书楼上课，这一堂课冠盖云集。“国府行政院院长”俞国华特赠一幅“鸿儒硕望”镜屏，以示敬意。

钱穆最后给中国青年的赠言是：“你是中国人，不要忘记了中国！”他希望

后辈不要看轻自己，将自己的文化一笔抹杀，必须抱着“士不可以不弘毅”的精神，从事理中探寻中国本源。

国学大师钱穆当天正式宣布自中国文化大学荣休，结束七十四年教育生涯。但基于对教育的热爱以及对毕生心血的珍惜，钱穆晚年虽不良于行，且身体不佳，仍于1989年赴香港参加新亚书院四十周年庆，足见一代大师的坚持。

只是在西风东渐之际，钱穆的主张与看法逐渐失去商业市场。钱穆强调“君子不党”，捐弃党派私见的主张，更与台湾逐渐党同伐异的政治现实有相当差距，显得不合时宜。这或许也是被尊为“当代师表”的钱穆，无法摆脱的悲剧命运。时代的无情，让钱穆如同旧传统与政治象征的神牛，晚年竟遭遇无情对待。

晚年凄凉　遭政治批判清算

钱穆晚年数度轻微中风，加上年事已高，不适宜出国旅行，因此殷切期盼在清华大学教书的大女儿钱易能去台探望。但台湾方面对何时开放大陆亲属赴台探亲奔丧迟迟没有下文。1987年底先有梁实秋之丧，长女梁文茜不得其门而入的遗憾，钱穆看在眼里。他清楚自己的健康日益恶化，却更怕流言伤人，夫妻俩既伤心又无奈。

所幸梁实秋之丧和钱穆之愿获得广大民众同情，形成强大的社会压力，台湾当局火速于1988年11月公布探亲奔丧办法，以解民怨。办法公布时，人在荷兰阿姆斯特丹进行学术访问的钱易，当月即申请赴台，成为两岸分隔四十年来第一位赴台探亲的大陆人士。

能和女儿在外双溪共聚天伦，让钱穆激动而欣慰。只是当年迈的钱穆听到女儿细数家乡景色的变迁，不由得黯然地说：“此生恐怕是回不去了。”

钱穆曾说希望女儿赴台是趟单纯安静的旅程，民进党却在钱家一偿难得的天伦之乐时揭发钱易赴台申请时掩饰了其具有共产党员等官方身份，要求国民党政府立刻处理；还以钱易在国立大学教书为由，检举她参加台湾方面定义的“叛乱组织”。陈水扁更具状控告钱易曾是共青团员，引发轩然大波。

虽然钱穆父女都说以平常心看待这些不实在的说法，但树欲静而风不止，素书楼风波连连，还有人要告钱穆“知匪不报”，连串风波让钱家不得安宁。虽然台湾“高检署”在1988年底即对各相关控告处以不起诉决定，但钱易只能黯然离开台湾，希望争议到此为止。垂垂老矣的钱穆哀伤地说：“这些人已经完全抛弃了中国文化传统，不承认父女间的亲情，更不能理解他的女儿为何会从这么远的地方来看望父亲。”

钱易的妥协并未如愿替父亲带来平静，民进党又盯上钱穆的素书楼。这栋建筑原是蒋介石礼贤下士、协调用地供钱穆长期居住的住所，未想时空变迁，产权已由阳明山管理局转移到台北市政府。民进党台北市议员质疑，钱穆住所是台北市政府财产，却无租赁契约，又没有优遇条例可供适用，形同被占用。

民进党人士纷纷要求九十五岁高龄的钱穆限期搬家。时任“立法委员”的陈水扁也在立法院提出质询，要求市府尽速收回公产。他并以“侵占市产”为名，点名批判钱穆，给国民党政府与钱穆带来相当大的压力与羞辱。对于收回素书楼之后的处理，民进党可笑又可悲的主张之一是，改设“钱穆纪念馆”。

当初素书楼兴建蓝图是钱穆夫人胡美琦所绘，建筑费也非台北市政府负担，风波之初，双方一度订约住到1992年为止，未料仍遭到如此对待。将近一年的时间，钱家因房产问题不得宁静。因坚信“学术自有公论，人格不容污蔑”的钱穆，终于在不愿被民进党羞辱的愤慨中，于1989年8月向国民党政府提出，愿迁出素书楼远离是非，毅然离开这块伤心地。

1990年5月，这位已全盲的国学大师黯然迁出居住数十年的素书楼，改在台北杭州南路辟屋居住，并将素书楼内不少藏书捐赠给各学术单位。钱穆离去时幽幽地说了一句：“活的不许住，还没死就要做纪念馆。”

眼疾缠身的钱穆，搬家时已不太能出门，也不太肯多讲话进食，记忆力明显减退，仅希望子女能在他生前去台一聚。但天不从人愿，在度过九十六岁的寿诞后，也就是迁出素书楼才三个多月，1990年8月30日，一代国学大师钱穆逝世于杭州南路新寓所。虽然钱穆生前多次拒绝返回故乡探亲与讲学，夫人胡美琦却宣布，将完成钱穆的遗愿，让大师骨灰回到江苏无锡老家安葬。

哲人西辞 政治纷扰却依旧不断

钱穆故去，李登辉以台湾地区领导人身份亲往致哀。家属定于9月26日在台北举行公祭，没想到子女亲属奔丧却又引发风波。受到前次钱易探亲酿成轩然大波的影响，钱穆亲属赴台奔丧问题不断被放大处理，民进党磨刀霍霍，台湾当局也相当保留，争议难息。

时任全国政协及民盟副主席的钱伟长早在钱穆身前就表达有意借着学术交流的机会赴台探亲，并盼会见过去的清华大学同学俞国华。未料消息一传出，立刻遭到在野党人士不断质疑与批判，甚至直指钱伟长是共产党高干，要求台湾当局禁止钱伟长入境。

有了不愉快的经验，钱伟长在钱穆故去后致电钱夫人，解释无法来台的原因。他说，身为侄子当然应该赴台奔丧，但台湾仍有许多不合时宜的限制规定，能否赴台要看台湾当局的决定。

女儿钱易、钱辉和儿子钱行等则表达了赴台奔丧意愿，但不希望如上次探亲时闹出事来，影响先人清静，只盼顺利成行，不要再有干扰。台湾方面受到在野党的舆论牵引，各界关注的却是钱家后人是否会依台湾官方规定，签署“参加叛乱组织自首书”，或是宣告脱离共产党后赴台，让钱家左右为难，终究放弃申请钱易等人去台奔丧，改由三子钱逊的长子钱军以及已故长子钱拙的儿子钱松去台，着重服在告别式会场答礼。

钱伟长无法赴台，仅能电函挽联，感念幼时失怙而由钱穆提携的恩情；也抱怨海峡未通而无法赴台奔丧的悲伤。钱易等人则说，无法见到父亲最后一面，与父亲作最后告别，让子女感到相当遗憾，因此家属决定全力实现父亲归葬故里的心愿。

申请赴台奔丧未果的钱穆子女，仅能参加9月30日在香港新亚书院举行的公祭。1992年1月，钱夫人遵照钱穆生前遗愿，奉钱穆灵骨归葬太湖之滨，安葬于苏州太湖中的西山四龙山，钱伟长亲往致祭。钱穆生前数部著作如《先秦诸子系年》、《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国史大纲》等均陪葬墓中。

政治终究是一时的，历史始终公平而迅速地反击在时人身上。钱穆在台湾仍具有高度的声望与影响力。在钱穆被迫迁出素书楼过程中不遗余力进行打击的陈水扁，在 1994 年当选台北市长后，即为当年的无情进逼向胡美琦道歉，但胡美琦漠然地说："迟来的道歉已没有意义。"

主人迁出后即闲置的素书楼，被台北市立图书馆于 1992 年 1 月 6 日辟为纪念馆。但由于房舍年久失修，必须进行长时间修缮，直到 2001 年 12 月 31 日才就近委托东吴大学经营，并于 2002 年 3 月 29 日重新开馆，摆设维持钱穆居住时旧貌。马英九主政下的台北市政府承诺，钱穆纪念馆必定对全民开放，以发扬钱穆的风范。

马英九代表台北市政府，为钱穆遭受的不公平待遇正式致歉，并为钱穆平反。他强调，素书楼虽是市府财产，但登记为宾馆，是以招待国家重要贵宾的名义，邀请颠沛流离的钱穆夫妇长期居住，因此毫无占用房舍的问题，更是台北市的莫大光荣。胡美琦与马英九共同为钱穆纪念馆主持开馆，并栽种一棵"希望之松"，希望奠下后世史学的根基。2004 年，台北市政府更进一步计划将钱穆、胡适、傅斯年等入祀孔庙。

正视历史　胸怀中国

一如钱穆夫人所撰的一副对联："尘世无常，性命终将老去；天道好还，人文幸得绵延。"钱穆作为一代硕儒，在史学、经学上别有成就，见证了中国的起起伏伏，虽历经颠沛流离，却始终未忘著作、讲学，毕生为文超过一千五百万字。这其实是奠基于一股对中华文化、传统价值的热爱与信仰，期盼有待来者，从此也可以看出一代思想家的格局与胸襟。

尤其在传统价值与经典不断受到西方文化与科学精神的挑战之际，坚持传统需要很大的勇气。对中华民族与历史文化的热爱，或许才是驱使钱穆不断奋战下去的原动力。

对钱穆而言，他引用顾炎武的看法，强调"亡国"与"亡天下"有本质上的差异，亡国不过是改朝换代，无改中国的文化精神与气运；不过一旦天下将亡、文化将亡，中国也就岌岌可危了。

钱穆在治学上，主张后学需熟读经书古籍，体会历史通变，厘清常变的主从关系，避免烦琐钻牛角尖的研究自限，只有如此始可在史学上成一家之言的看法，迄今仍历久弥新，别有见地。利用文献本身互相释证的治学方式，也成为当代中国历史研究方法的重要流派。同时钱穆一生不断扩大治学领域，期待寻找"吾道一以贯之"的基本价值，又凸显出他求新求变的学者性格，以及在不同层面所扩散的巨大感染与影响力。

一如为反驳民初以来以疑古为学术主流的风潮，钱穆的首部巨作《刘向歆父子年谱》，以考证辩驳了康有为《新学伪经考》中认为许多古籍是刘歆托古改制的流行说法；他又以《先秦诸子系年》对典籍中被提及的先秦诸子年代、事迹进行考证，将可疑的历史变为信史，也终于让历史回归定论，了却一番公案。

从新旧的角度来看，钱穆是站在维护旧的文化观点出发，质疑当代流行说法，究竟是保守，还是批判？拉开在历史的长河中观察，或许当代论战之际极易被人抨击，但结果不证自明。尤其他以个人力量和学术专业，坚持"道统"，与大环境"政治正确"思潮对抗的气魄，甚至直言质疑大师胡适的"全盘西化"论调，毫无畏惧与退让，更让人景仰。

钱穆于1949年离开祖国大陆后，他的学术关怀已经由为古人申冤的史学研究，改放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与发扬上。一如经学、理学，钱穆都在期待能找寻出一条属于中国人而非西方文化背景的思想大道，以文化中表露的历史精神，厘清中国的民族与文化定位，甚至找到延续民族生命的原理。钱穆生前最后一篇未完成的思想文稿，主题即在"天人合一"，希望借中国人调和天道与人道的历史关怀，迎接未来的新世代挑战。

20世纪以降，正是所谓"国魂飘失"的时刻，历史已经成为漂流在后现代氛围中毫不可知、不可信的客体，"为往圣继绝学"的气度往往成了不切实际的空谈，甚至是众人的笑柄。钱穆曾哀伤地表示，遗忘了国史的爱国精神，不过是一种商业之爱，仅寻求对己有利之爱，无从激发高贵的历史精神。

钱穆的学术生涯始终走得很寂寞，期待国人对历史拿出温情的诉求，却往往无法获得市场认同，使他显得万分的"不合时宜"。但或许这种寂寞正是中国历来文人所必经的考验，因此虽身困海隅一角，作为中华历史文化守护者的钱

穆，仍能在学术上有所突破，充分体现“为往圣继绝学”的精神，并为中国未来的文化与学术发扬打下了重要基石。



罗家伦
Luo Jialun

被政治消磨了五四光芒

现在日本在国际和会要求并吞青岛，管理山东一切权利，就要成功了。他们的外交，大胜利了！我们的外交，大失败了！山东大势一去，就是破坏中国的领土。中国的领土破坏，中国就要亡了。

所以我们学界，今天排队到各公使馆去，要求各国出来维持公理。务望全国农工商各界，一律起来，设法开国民大会，外争主权，内除国贼。中国存亡，在此一举。今与全国同胞立下两个信条：

一、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

二、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

国亡了，同胞起来呀！①

这是在五四学生爱国游行中散发的“北京学界全体宣言”里唯一的中文传单，共印了两万份。宣言由一名北大学生以简洁的白话文写成。日后这名学生成了蒋介石的部属，当了数十年国民党官僚。他就是以《新人生观》闻名的文人罗家伦。

起草五四宣言　性格惹争议

罗家伦，字志希，浙江绍兴人，光绪二十三年（1897 年）12 月 21 日在江西进贤县出生。

父亲罗传珍，字沛卿，曾任江西省内万年、都昌、奉新等县县令。②罗家伦出生时，其父为进贤县知县。罗传珍能诗善文，工于书画，对罗家伦的文学造诣培养颇有影响；他勤政爱民，对新传入的西方文化很感兴趣，常托友人购书供罗家伦阅读；又因为常与新军、革命党人联络，罗家伦自幼即接触革命党的思想与著作。罗家伦的母亲周霞裳也颇具文采，时常教导他识字、读诗。③

罗家伦四岁入私塾，九岁母亲去世，



➡ 罗家伦（1897~1969），学者、教育家。1928 年 8 月至 1930 年 5 月出任国立清华大学校长。

①《五四运动宣言》，《罗家伦先生文存》，台北“国史馆”、“党史会”，1976 年，页 1。

②蒋永敬：《罗家伦先生的生平及其对中国近代史的贡献》，《罗志希先生传记暨著述资料》，“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1976 年，页 36。

③罗家伦：《心影游踪集》，台北华国出版社，1957 年，页 48。

十三岁读《周礼》、《仪礼》、《尔雅》，十五岁始进美国传教士高福绥所办、位于南昌的英文夜校学习外文。[①]1914 年，罗家伦十八岁，进入由于右任、马相伯等革命党人创办的上海复旦公学。当时孙中山被推为复旦公学董事会主席。

罗家伦在复旦公学时期开始主编刊物，曾任《复旦杂志》编辑，文字颇佳，崇拜学术立场从君主立宪转向民主的梁启超；对传统文化、伦理多有批评，同学间有“老夫子”的称号。并于此一时期，开始与戴季陶等人接触。[②]

1917 年，罗家伦进北京大学文科主修外国文学，与高一届的傅斯年以及顾颉刚、康白情等人一拍即合，创办《新潮》杂志，强调以近代人的言语表达近代人的思想，以解放学术自由，呼应胡适、陈独秀等人在《新青年》倡导的新文学革命，倡导白话文。

罗家伦在校园内很活跃，常与胡适等人往来辩论，也对外国文学与原文书籍感兴趣。他曾在《新潮》的文章中表示，与其登些头脑不清的课艺内容，不如多译几篇西洋长短篇或关于西方科学常识的论文。因此，罗家伦与傅斯年几乎每个月都要向日本丸善株式会社买新书。新潮社也组建“西书研究团”，并成立译书团。此外，五四运动领导者之一的段锡朋、合办《新潮》杂志的杨振声，都是罗家伦大学时期好友。

北大时期，罗家伦与友人接触了大量亲近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福利主义的著作与阅读材料，与北大的国故派对立。他还与傅斯年等人提倡用科学方法整理国故，解放传统封建禁锢，乃至于积极主张民主、自由的爱国与民族思潮。

1919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同属战胜国的中国，竟在巴黎和会被迫签下屈辱和约，由日本全面接收德国在山东的所有权利，引发爱国学生愤慨，酝酿游行抗争，争回山东主权。

5 月 4 日，在北大新潮社、工学会、国民杂志社、共学社、同言社等五个

---

①罗家伦：《怀念尹仲容先生》，《逝者如斯集》，传记文学社，1967 年，页 202。

②由于当时罗家伦与宋教仁遗孤比邻而居，因此在黄兴过世时，罗家伦也是少数能在黄兴遗体前行礼志哀的人。

社团发起下，北京十几所学校的数千名学生在天安门集合游行。先前发言激烈、多次主张发动学生到天安门游行的罗家伦，负责起草《北京学界全体宣言》，提出"内除国贼，外抗强权"主张；后又被推选为四名学生代表之一，前往东交民巷使馆区内向美、法、英、意各国公使馆递交抗议书。

游行气氛高亢，大批学生冲入日本大使馆，后又火烧赵家楼殴打章宗祥，结果遭北洋军阀逮捕，这就是五四运动。

"五四"后，罗家伦继续负责总务以及与商界、报界联系工作，发动学生筹组演讲团，巡回各地向人民演说争取支持。5月26日，罗家伦以笔名"毅"，在《新潮》杂志《每周评论》上发表《五四运动的精神》，首创"五四运动"这个名词，指五四学运有三种真精神，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存亡：第一，学生牺牲的精神；第二，社会制裁的精神；第三，民族自决的精神。

罗家伦在五四运动中是风云人物，但作风以及与政治人物的关系却使他毁誉参半。不满罗家伦的人，批评他热心追逐名利权势，争风头，自我吹嘘。他经常主动表达对北大校长蔡元培的推崇与敬意，发表《伟大与崇高》、《文化的导师》、《人格的典型》等文章，颇受人物议。

"五四"之后，个性火暴的傅斯年与其他学生闹得不愉快，一气之下退出抗议行列。带头拿大旗的人临阵退却，自然谣言不断。此时又传出罗家伦私下受邀到太平湖安福俱乐部，参加军阀段祺瑞宴会，可能遭北洋政府收买的传闻。为此罗家伦遭受很大批评，①甚至被游行学生围住当面质疑。

不满的北大学生画了幅画，又写打油诗讽刺罗家伦"一身猪狗熊，两眼官势财；三字吹拍骗，四维礼义廉"，暗指罗家伦其貌不扬，长得像"猪狗熊"，又骂他无耻。胡适等人为此在《北京晨报》登载《他也配》一文辩驳："安福部是什么东西？也配收买得动这两个高洁的青年？"算是帮罗、傅两人担保，才化解争端与疑虑。

罗家伦在"五四"之后，又参加过多次抗议游行，但因风头太健，不得不与张国焘前往上海避难，并计划串联上海等地学生活动，寻求与南方革命

---

①傅斯年：《新潮之回顾与前瞻》，《新潮》第二卷第一号，1920年10月，页201。



➡ 1920年，罗家伦等人在纽约的合影。后排左罗家伦，右冯友兰，居中者杨振声。

军政府建立关系，以对抗军阀掌控的北洋政府。[①]透过戴季陶、朱执信引介，刚完成《孙文学说》、《三民主义》等学术著作的孙中山接见了罗家伦，罗才正式与国民党牵上线。[②]

出身贫苦的上海棉纱大王穆藕初是从学徒做起，一路靠自修出国留学，返国创业成为巨商。因自身苦学经历，穆氏通过蔡元培在北大设立“藕初奖学金”，帮助家境清贫但成绩优秀的学生出国留学。1920年，罗家伦北大毕业，与段锡朋、康白情、汪敬熙、周炳琳、孟寿椿等“五四”活跃学生都获得藕初奖学金资助赴美。

---

①张国焘：《我参加五四运动的始末》，陈少廷主编：《五四运动的回忆》，台北百杰出版社，1979年，页135。

②李云汉：《罗志希先生的大学时代》，《罗志希先生传记暨著述资料》，页106。



追随蒋介石　开办大学教育事业

罗家伦进普林斯顿大学研究院，攻读历史和哲学；次年转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随后又转到英国伦敦大学、德国柏林大学、法国巴黎大学，却未获任何学位。

1926 年，罗家伦返国，任教于东南大学历史系及其附中。由于蔡元培辞去北大校长，南下支持国民政府，不少参与五四运动的学生也先后加入国民党，[①]促使罗家伦不得不确定政治路向。与一般自由派学者不同，罗家伦义无反顾地投入到了国民政府的北伐队伍，追随蒋介石，担任国民革命军司令部参议、编辑委员会委员长、战地政务委员兼教务处处长。

蒋介石攻下南京后，罗家伦出任法制委员会委员。又因为蒋介石“清党”后需要建立国民党全新信仰与党政人才班子，好与武汉政府以及汪精卫、胡汉民等人抗衡，在罗家伦协助下，蒋介石创建“中央党务学校”，亦即“中央政治学校”、台湾政治大学前身，蒋介石亲任校长，罗家伦以教务主任、代教育长等职务出掌校务。

1927 年 11 月 11 日，时年三十一岁的罗家伦和上海闻人张钧丞之女张维桢结婚，蔡元培证婚。张维桢不仅家世好，沪江大学政治系毕业、美国密西根大学硕士，且是校园美女；罗家伦其貌不扬，但以五四运动名扬南北，两人结合一时成为八卦话题。

回首当年，五短身材的罗家伦，苦恋沪江大学校花张维桢，以八年一百多封情书感动佳人，才将校花追到手。传说张维桢曾开出三个条件才点头下嫁：一、要留学取得洋博士学位；二、学成后回国任大学校长；三、夫妻不可公开并行，要保持相当距离。不过日后友人的说法则显示，上述传说可能仅是街头巷尾穿凿附会而已。两人得结良缘，主要是罗家伦的文章写得漂亮，字出色，有感情，善于辩论，并且勇于尝试。

---

①傅斯年、段锡朋等人都先后加入国民党。参见傅启学：《国父逝世前后的北京青年运动》，《革命思想》第三十八卷第三期，1975 年 3 月，页 5。

承蒋介石之命，罗家伦自1927年开始，与戴季陶在南京筹设中央党务学校，以理论、历史、地理和组织四领域进行授课研习，以培养国民党党务人才，强化党务，训练学生关于党务与社会运动的参与与宣传，配合国民党推动训政、发动清党的需要，并宣传国民党作为立党精神基础的“三民主义”。在罗家伦的建议下，蒋介石延续孙中山颁给黄埔军校的“亲爱精诚”为校训，以展现党校的革命与军事性质。

“中央党务学校”几经变革，迁台后改制为“政治大学”。为纪念罗家伦，台北政治大学于1955年在校门口兴建两座两层楼教学馆。其中“志希楼”用以纪念罗家伦，本是图书馆，目前为政大理学院教室。

随北伐军势力兴起，北方民间兴起反对军阀的主张，一度对国民革命军抱持很大期望。1928年，罗家伦在蒋介石全力支持下，取代无意就职的孙科，前往北京将原先因“庚子赔款”办校、隶属外交部管辖、培养留美学生的清华学校改制为清华大学，直接受国民政府教育部管辖，继而任首任校长。清华大学开始招收女生始于罗上任后。同时他淘汰不适任教师，停办国学研究院，创设大学各系研究所。

中原大战即将爆发，蒋介石与平津附近的山西军阀阎锡山关系恶化，北伐军形象每况愈下，身在北京的罗家伦承受很大压力。又因罗家伦倡导“廉洁化、学术化、平民化、纪律化”的“四化”办学，提倡军训等课程，作风专断，引发部分清华大学学生、校友不满，刮起一股“驱罗”风。

入主清华大学不到两年，罗家伦即辞职南返，清华大学校长因此空悬一年多。这段时间，罗家伦以国民政府战地政务员身份，与熊式辉共赴济南，向日本军阀交涉五卅惨案的善后事宜，但遭日本军阀蛮横拒绝，同样无功而返。

返回南京后，1932年9月5日，罗家伦接掌由东南大学与江苏境内其余八所大专学校合并改组的中央大学。由于重视实验，充实了研究与图书器材，又延揽了不少人才担任教授，罗的治校成绩颇突出。在蒋介石支持下，中央大学下设文、理、法、教、农、工、商、医等八个学院，成为全国院系最完整、规模最大的大学。罗家伦强调，中央大学的使命就是“创造一种新的精神，养成一种新的风气，以达到一个大学对于民族的使命”。

罗家伦提出“国防中心论”，认为一切创作与社会建制均需配合国民政府未

来战争需要；提出中国需要希特勒式的军事强人，以一党专政，扭转中国一盘散沙的局面；加上与陈立夫、洪兰友筹组“三民主义革命青年团”，罗家伦的思想与蒋介石扩张个人军事势力的倾向暗暗契合，罗家伦从此成为蒋介石的文胆。包括蒋介石在南京国民会议的致词，以及《大英百科全书》关于中国抗战的历史纪实，都出自罗家伦手笔。罗家伦名著《新人生观》也在这段时间问世。其浅显易懂，颇受右派学者好评。

对日抗战后，罗家伦出任国难会议筹备委员，全力配合蒋介石迁徙计划，将中央大学由南京溯江迁到重庆沙坪坝新校舍；次年设立柏溪分校，同时出掌西南联大校务工作。艰苦抗日期间，中央大学屡遭轰炸，他写了《炸弹下长大的中央大学》以勉励学生。

罗家伦为中央大学任期最长的校长。1941 年 8 月 13 日，罗家伦请辞任职十年的校长一职，从此由教育工作正式转向党政工作。

国民党迁台　印度外交生涯告终

1943 年，蒋介石派罗家伦为国民政府滇黔党政考察团团长，随即转任国民政府监察院首任新疆监察使兼西北考察团长，从事陕西、甘肃、宁夏、新疆等五省国防建设的考察与设计，曾提交《新疆调查报告》供国民政府参考。

抗战胜利，罗家伦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筹备会议代表。国民政府是世上第一个承认印度独立地位的政府。1947 年罗家伦被蒋介石任命为国民政府首任驻印度大使，兼世界各国驻印使节团团长。据闻，印度宪法制定以及印度国旗设计，罗家伦均曾提供意见，①并率先签订《中印友好通商条约》。

虽然有资料显示，英国首相丘吉尔在开罗会议期间对蒋介石冷淡，甚至刻意冷落，但他对居中翻译的宋美龄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由于英国与印度的密切关系，据台北此间资深媒体人回忆，丘吉尔曾多次通过使印的罗家伦，表达希望邀宋美龄赴英国访问。但丘吉尔明确表明仅邀请宋美龄，漏了蒋介石。罗家

①罗家伦：《印度国旗制定和我》，《逝者如斯集》，页 43。

伦的使印日记记载了这段史实，对丘吉尔的邀请及其刻意冷落蒋介石“至为困扰”，“几乎手足失措”，不知如何处理也不知该如何反映。罗家伦无计可施，只能以拖待变，最后不了了之。

1949年，罗家伦得知国民党情势不利，共产党管制范围推至四川，便力邀由四川飞往香港的国画大师张大千访印度。张大千是罗家伦在中央大学的故旧。罗想到以文化艺术促进交流，于是在新德里举行张大千画展，以张大千临摹敦煌佛教绘画为主，受到尊崇佛教的印度民众注意。

画展其实原定于1951年举行，但有消息传出，印度考虑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罗家伦为此颇感棘手。在张大千要求下，展览提前到1949年举行。虽然两方关系暧昧，画展结束后，张大千并未立即离开，而是前往印度阿旃陀石窟考察、比较中国和印度壁画艺术间关系，临摹印度画。

果如传闻，继英国之后，赶在缅甸前，印度于1949年12月30日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双方决定建交。积极穿梭期盼化解外交烽火的罗家伦黯然结束印度大使生涯，与张大千夫妇及旅印侨胞在使馆举行最后了一次降旗仪式，然后与甘地的媳妇、孙儿女前往甘地火葬场上献花圈、行礼、默立后，隔天飞往台北定居。

离开印度前罗家伦发表简短声明：“在两年八个月以前，我带了我国政府和人民热烈的希望到印度来，催促象征印度独立的及早实现。就这方面来说，使命是达到了。我很高兴，印度现在是自由、独立的。”最终他不忘以正式外交照会驳斥印度政府企图借承认民国初年“希姆拉会议条约”，将西藏一部分完全脱离中国的阴谋，总算保住中国领土不在政权交替时被外国势力分离。

1950年3月1日，蒋介石在台复行视事，罗家伦除担任国民党“总统府”的“国策顾问”，也获指派任“国民党中央党史编纂委员会”主任委员。1952年，在蒋介石提名下罗家伦又出任台湾当局“考试院副院长”，1957年又被派为台湾“国史馆馆长”，此后直到1968年逝世。虽然是政界、文坛闻人，担任公务人员高等考试典试委员、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政治大学常务监事、台北《中央日报》常驻监察人、台北“故宫文物管理委员会”委员等繁杂的党政、教育工作，以及“国史”、党史编纂业务总负责人之职，罗家伦却始终未进入党政核心，仅勉强可称为党政要员。反而在各类送往迎来、婚丧喜庆场合，比较能看到罗家伦的身影，过往五四时代的风采早已成明日黄花。

提倡简体字　遭各方围剿

虽然没有显赫的实缺，“五四”中的功绩，以及提倡新文化运动的招牌，仍让罗家伦在台湾赫赫有名；也许比不上胡适、傅斯年，罗家伦在知识分子与文人圈中仍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向来处世圆滑的罗家伦，却在文化政策与文艺工作上跌了一次大跟头，成为国民党迁台初期各方势力围剿的公敌，这就是“提倡简体字”风波。

主张中文字体简化并非始自新中国成立后。早在1922年北洋政府时代，钱玄同即在“国语统一筹备会”提出《减省汉字笔化方案》；1935年8月，国民政府教育部正式颁布三百二十四个俗体简字，虽有罗家伦与吴稚晖大力鼓吹，因抗日战争爆发以及戴季陶等人全力反对，并未正式推行；其后又由国民政府中研院公布刘复等人合编的《宋元以来俗字谱》；蒋介石也曾提到，标语用字应尽力避免十画以上的难字，以免识字不多的学生或民众费解。

罗家伦等新文化运动推动者，坚决主张要提升知识水准，就必须先提升识字率，增加识字率就要将复杂的中国字简化。包括胡适在内，都认为简化文字不但有必要，并且“简得好”，并早在1923年就于《国语月刊》中提倡破体字与简体字，以避免笔画太多的汉字形成书写障碍。所以，罗家伦提倡简体字有其一贯的学术信仰背景。

1953年6月30日，时任“考试院副院长”的罗家伦受聘为国民党“教育部”简体字研究委员，负责简化部首的工作。作为新文化与白话文运动的推行者之一，罗家伦以一篇万余字专文，公开提倡中文字体简化。

同年9月10日，罗家伦在国民党“总理纪念周”发表演说，再度提倡简体字，强调欲保存中国文字，须先简化中国文字。他指出，文字必须大众化，属于大众的文字若不能大众化，如何人能行之有效？尤其文字旨在表情达意，非文人欣赏品，所以从甲骨文、金文、小篆、隶书、草书到楷书，简化是中国文字必然的发展趋势；并主张推行简体字必须率先寻求标准化、部首简单化。

这番论调受到舆论支持，蒋介石年底也于主持国民党“总动员运动汇报”时指示：“简体字之提倡，甚为必要。”

不过，台海情势紧绷，加上守旧派不满，简体字运动招致很大反对。1954年2月，国民党“立委”廖维藩发动一百零六名“立委”连署，以“毁灭中国文字及国家命脉”为由，主张通过正式决议，制定《文字制定程序法》。反对者无限上纲，高声批判罗家伦“和中共隔海和唱，共同为民族文化罪人”，是“不肖知识分子”，“类似匪谍行为”。支持者、反对者激烈论战，双方立场南辕北辙，冲突一触即发。

反对者通过各种方式发声：批判提倡简体字是“集错字、古字、俗字的大成”；质疑提倡简字有助于国家文化发展的说法；强调整理、增添新字、文字，必须有简要规律，不应混乱；并指中华文化的成就，从未因文字没有简化而有减损，轻率为之反而有危国家命脉。

面对批判，罗家伦在国民党党办《中央日报》上，一连连载四天《简体字之提倡甚为必要》长文，强调文字政策要检视中国传统社会面对的知识平均分配问题，而繁复难学的中文增加了中国社会在知识学习方面的困难；简化中文字体是简化学习的工具，也是使中国加速进步，扩大知识平均分配的关键。

1954年3月4日，罗家伦又为文主张变革现行文字的计划应采取承认已简化字或简体字，以求顺乎时代，让文字浅显易懂；简化规则应从最古的简体字、汉魏以来碑帖墨迹、宋元以来木刻书、军中文书常见简体字、民间常用简体字等字体中选取。面对种种排山倒海而来的压力与人身攻击，他为文皆着重于理念伸张，并未为个人辩驳。

但是祖国大陆推动汉字简化运动是不争事实。除了在抗战时期创造的“解放字”外，1952年2月，大陆成立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收集民间及民国以来主张汉字简化的学者们的建议，于1954年底提出《汉字简化方案》草案，顿时让罗家伦的处境尴尬且艰难。

面对责难，罗家伦拿出客观数据统计佐证。他说，“臺灣”与“台湾”，谁难谁易，是否耗费时间，一看可知。小学一年级基本字五百四十九个，十画以下仅三百三十一个；小学六年期间，用字四千零三十个，十笔以下只有一千四百七十二个，比例偏低，对学生而言太繁重。

他主张，简体字是相约俗成的习惯，是生活必需。追忆当年“五四”前后推动新文学革命，实赖北洋军阀不抵制，才让国语课本迅速改为白话，因

此简化书写应从取消禁用简体字的命令开始。但他澄清，并未全面强迫使用简体字。

罗家伦强调中国文字需要简化才能保存，文字简化可节省时间，才能多花力气在学术而非文字上，让新文化运动得以展开；胡适在中国语文学会座谈中也呼应，简体字是新文学运动的一部分，简则易行，对发扬文化关系重大。但背负被质疑隔海唱和的大帽子、红帽子压力，罗家伦显然已无力回天。

反对者在台湾"立法院"集结力量，批判简化字容易混淆、失去文字原有意义，甚至毁灭文化，因此全面简化只是破坏传统文字与六书原则，并未改革，必须坚决反对。由于台湾"教育部"开始发放罗家伦所撰《简体字运动小册》，将内部讨论的简体字公之于世，更引发反对派强烈不满，造成强势反弹，最终让简体字运动胎死腹中。

1956年6月7日，台湾当局通过"教育部"公报宣称，中国共产党为"毁灭传统文化"，所以推行拉丁化之简体字，破坏结构，混乱形声，必须急速彻底予以纠正；并规定各校学生作业均应用正楷，不得写简体字，并且书写文字必须一律依传统由上而下、由右而左，不得横排或横写。

"文坛祭酒"配合国民党"文化清洁运动"

在国共对立的年代，罗家伦不避讳可能与中国共产党主张呼应的嫌疑，从语言工具角度出发，要求改革和简化中文字体，不仅阐明了他的历史和文学观，也彰显了自"五四"以降中国文化中愈加稀薄的道德勇气。但半途而废，也暗示了罗家伦在国民党政府内远离核心的窘境。

国民党面对来自彼岸的压力，以及岛内由雷震、殷海光等主导的《自由中国》杂志通过舆论对蒋介石统治进行的强力批判，决定由"立法院院长"张道藩领军，发动台湾文坛的政治路线与报道内容清洗；借重申政治与主义的重要性，强调要建立"三民主义的文艺政策"。

根据张道藩的理念，文学不能是单纯的休闲或美学，文艺作品必须配合整体的备战心态，所以他在1952年5月5日以台湾"中华文协"理事长身份，提

议文艺界应配合时代需要，从事文艺复兴，“率先向大陆进攻”，让文艺界成为“反攻大陆的最前哨”。

蒋经国自担任台湾“国防部总政治部”主任开始，也大力提出“让文艺到军中去”的号召，坚持发展“战斗文艺”；罗家伦则以蒋介石的“国策顾问”身份，兼任蒋经国主管的“总政治部”心理作战组召集人。另一方面，在蒋介石刻意主导下，张道藩、罗家伦、陈纪滢、王蓝等人，发起“文化清洁运动”，从文章的创作、形式、主题上“全面净化”，掀起新一波文艺管制风潮。

由于台湾民间各种揭发社会黑暗面，盼借小道消息求报份业绩的报道，“陈腔滥调、蛊惑人心”，不利于国民党执政、备战，因此国民党政府决定成立“文化清洁运动专门研究小组”，发动各种文艺社团，扫除“赤、黄、黑”三害运动，以正“文坛歪风”。

1954 年 7 月 26 日，台湾的“中国文艺协会”由陈纪滢出面，在国民党党报《中央日报》上撰文，发起“文化清洁运动”，主张铲除各种“内幕”杂志恶行。

同年 8 月 9 日，台湾文教界展开“文化清洁运动”，并以蒋介石所著《民生主义育乐两篇补述》为纲要，要求文化界必须“反对赤色的毒、黄色的害、黑色的罪”。宣言强调，“三害”让文化界蒙羞，摧毁军民身心健康，伤害“反共复国大业”，为了“消灭共谍”，必须拒绝淫乱、猥亵、靡靡之音；并指出揭露社会黑暗面的黑暗新闻伤害台湾建设进步，引诱青年堕落，必须彻底铲除，“不能让三害以言论自由为名，享有造谣惑众的自由、伤风败俗的自由、诽谤的自由、危害国家民族的自由”。

“文化清洁运动”在蒋介石与国民党文艺班子的推动下全面展开，让文化界面临思想与路线压力；“文艺协会”等单位又要求文字工作者“加入反共复国的文化战斗行列”，创造新文化，誓言“绝不做三害帮凶，绝不与三害制造者做朋友，全面铲除三害之祸”。由张道藩、罗家伦、程天放、陈雪屏、张其昀、陈纪滢等人担任委员的“中华文艺奖金委员会”，通过文艺奖金诱使创作者配合文艺政策的大方向。

随后蒋介石主张以“战争文学”引领“反共抗俄”风潮，带动文艺与社会改革，确立台湾自 50 年代以降，为期约二十年的战斗文艺创作路线。

在“文化清洁运动”的政治风潮下，罗家伦完全配合，成了个“没声音的

人”；同时他接下台湾的“中国国际笔会”会长一职，俨然是国民党的“文坛祭酒”。

“笔会”为一国际性的组织，旨在提供国际文人进行文学意见交流与社群互动的机会。“中国国际笔会”于1925年在上海成立，首任会长是蔡元培；由于战乱不断，笔会一度中断运作，直到1957年才在台北复会；第二任会长是张道藩，时任“考试院副院长”的罗家伦在1959年出任第三任会长。笔会参与者梁实秋、余光中、王蓝等都是散文名家、文学家、诗人。但张道藩、罗家伦两人的公职、党政身份，让笔会的政治味太浓，运作颇尴尬。罗家伦卸职后，交由林语堂接手，笔会的运作才又正常化。

“国民党党史会”于1930年5月1日成立，原称“中央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由胡汉民、戴传贤等五名常务委员执掌党史编纂；1936年改采主任委员制，副主任委员就是罗家伦。1948年底，内战紧张，蒋介石决定将国民党史料移至台湾彰化糖厂，再陆续搬迁至洪家祠堂等三处民房存放。当年8月8日，“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会”通过罗家伦担任党史会主任委员案，吴敬恒、于右任、丁惟汾、钮永建、王宠惠、邹鲁、李文范、张群、张其昀、王世杰、吴铁城、张厉生、狄膺、洪兰友等同时获任“党史会”委员。罗家伦任党史会主委九年后，基于国民党党政一体的体制，又于1957年6月30日兼任“中华民国国史馆馆长”。

罗家伦在台虽被归类为文坛大老、党国大老，但无论在创作或施政领域并无显著成绩。简体字争议风波之后，罗家伦全力配合蒋介石的各项决策，更让他成为蒋介石一阵阵宣传攻势的配角与代言人。虽然国民党赋予他主要任务是为国民党与“中华民国”编纂史料，但除了他在1951年扩编了胡汉民在二十年代编纂的《总理全书》以及1958年出版了《国父年谱初稿》外，罗家伦对国民党党史始终欠缺具体而明确的研究成果。

据“国民党党史会”人士解释，罗家伦在“党史会”的工作从学术着眼，希望通过充实史料，以科学方法保存、复制、归档管理，以提供系统化史料让学者研究。但蒋介石尚在，许多敏感性历史档案未开放，资料不齐全，因此罗家伦主张民国史不能修，民国文献丛编也无法出版，“党史会”、“国史馆”自然只能保存史料，“努力从事准备工作，建立良好基础”，让未来史家凭史料

"继续发扬国史"[①]。罗家伦晚年健康不佳、精神不济，修史抱负还是无法实现。

"国民党党史资料馆"于1960年落成，存放国民党迁台前后的大笔资料。罗家伦向台湾"立法院"报告的历史档案显示，经史料编纂委员会征集，握有抗战与国共内战史料一万八千多件，保管各级政府档案史料六百余箱，完成史料编目二十五万多件，出版孙中山年表、年谱、革命文献、先贤文集等多种著作。进一步归档工作，则是在1979年秦孝仪继任"党史会"主委后，才将蒋介石存放于大溪与芝山的史料移到阳明书屋统一管理。

对编纂史料、推广国民党党史，罗家伦倒是别具创意，曾经提出不少新点子。为了让台湾民众了解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的贡献，1952年罗家伦促成开放位于台北市圆山旁的忠烈祠，供民众瞻仰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仪容与事迹图片。1953年11月，他力促"党史会"开放位于中山南路台北火车站旁、日据时代的梅敷屋旧址，改为孙中山史迹馆，以纪念同盟会时期，孙中山曾于梅敷屋短暂停留，与同志共谋反抗清廷的历史。

罗家伦主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认为在文字之外，历史传述应由图片、绘画展现历史精髓。所以在"党史会"任内提出"史画"的概念，主张以图画表现国民党革命建国时代的重大事件，避免文字传述历史流于枯燥。大批史画至今仍保存在国民党党史馆内。

不过罗家伦保留史料、修纂历史、解读历史的方法与看法，常引发争议。他耗费十余年、上千万元新台币主导编纂的《孙中山年谱初稿》，至少出现了二十八项历史诠释观点及史料考证错误，一度成为历史学者质疑的焦点。[②]

学者吴相湘等指出，"党史会"出版孙中山著作不够积极。另外《孙中山年谱》除漏列大学各科成绩、研修课目等重要且已取得的史料外，罗家伦主张孙中山在伦敦"蒙难"，是因自行走入清廷驻英大使馆"两度斥责"清廷官员，以致被清廷扣押，更遭多位国民党史研究者批判，指罗以政治观点无端美化孙中山，不但歪曲历史，更无法解释清廷在英国领土绑架孙中山的事实。

老年性格趋于沉稳的罗家伦，手握"党史"、"国史"诠释大权，面对外界质疑，并未公开反驳从而避免了新一轮的文字论战，最终他选择用人际手腕化

①《国史馆四十六年施政纲要》，《罗家伦文存一》，页345。

②沈云龙：《我和罗家伦先生的文字论争》，《传记文学》第三十卷第三期，1977年3月，页79。

解僵局。为响应关于“孙中山与革命时期等专门著作、论述数量太少，欠缺权威版本”的批评，罗家伦于1965年9月2日借庆祝孙中山百年诞辰之机会，以“国父学术论著编纂委员会”召集人身份宣布，将发行《孙中山学术论著全集》约一千五百万字，内容包括蒋介石关于孙中山七十余万字的论述和著作，还一并编纂了三百多篇中华民国先烈先贤的传记。

国民党五四运动样板

在国共内战时期，关于五四运动究竟由谁发动，一度引发笔战。罗家伦在一篇《“五四”的真精神》文章中[1]，坚持五四运动完全基于青年的爱国情操，没有任何政党或政团介入。但他说，当初是孙中山支持蔡元培接任北大校长，因此五四运动应该与孙中山的主张一致。罗家伦也一反五四运动打倒旧传统、旧思维的主张，认为传统国粹应该与近代教育融合。

但国民党迁台初期，对五四运动并无好感，守旧派甚至认为胡适等人推动的新文学运动，是想摧毁传统，形同为中国共产成立新中国铺路，所以在张道藩主持的“文艺协会”所出版的相关著作中，对五四运动、新文学革命运动只字未提，等于认定五四运动属性有问题。

胡适虽是台湾的学术大家，也遭到国民党偏激分子不断批判。所幸有人提出，孙中山曾说：“五四运动革新青年学生思想，为中国未来事业革新做出准备。国民党得以收革命之功，均赖五四运动的思想变化，以及革心的功效。”五四运动与五四运动健将这才不至于被国民党划为“左派”。

直到中国共产党对五四运动的强力宣传让国民党很不是滋味，台湾当局才有所警觉并态度丕变，迅速决定为争夺“五四”的诠释权发动五四主导权论战。由于胡适常在美国，五四期间拿大旗的傅斯年已猝然而逝，国民党只好推出曾为五四游行撰写宣言的罗家伦领军。

从此原被戴上红帽子的五四运动，摇身一变成了学生爱国运动与白话文革新运动，并将5月4日定成“文艺节”。1955年5月4日，罗家伦承命向大陆

①台北《中央日报》，1947年5月4日。

广播，指五四运动是一群有文化意识的爱国青年，基于国家民族之爱的自动自发运动，是新文化运动与爱国行动的合流，与“五四”之后两年才正式成立的中国共产党组织无关，李大钊当时也非共产党员。罗家伦关于中国共产党尚未成立也无独立组织的说法，同时成为国民党的官方宣传版本。

罗家伦认为，五四运动核心在于“外争国权”——打倒帝国主义，“内除国贼”——打倒军阀势力，标榜“科学、民主”，因此是中国的启蒙运动。他提出五四运动的三阶段论：第一阶段是文学革命，推行白话文；第二阶段是新文化运动，解放人民思想；第三阶段则是爱国运动。

同时，罗家伦指出，五四游行当天，虽然攻进曹汝霖住宅，殴打章宗祥，二十三名学生被捕后获释，毕竟属于小规模冲突；也是因为爱国学生觉得和约问题并未解决，亲日政客也未打倒，必须再接再厉，才有六三游行示威，北洋军阀逮捕千余游行群众，引发全国公愤；其后，上海、天津等地陆续响应罢课、罢市，阻止巴黎和约签字，让亲日政客下台免职，才初步达到爱国运动的目标。

为声援罗家伦，国民党多次邀胡适赴台讲学。胡适说，“五四”就是青年的爱国运动，强调自由思想，抵制教条主义、刻板主义。

面对中国共产党提出陈独秀以“文学革命论”带领“五四”之前文学革命思潮，李大钊带动学生共产主义信仰与行动的宣传战，乃至鲁迅等人在文学创作上的冲锋效果，国民党政府被迫必须肯定胡适等人的历史定位与发展新文学、新文化的努力，方能解决“五四”是否由共产党领导这一重大问题。所以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以及文学解放的观点，被国民党重新赋予极高的评价。

事实上，傅斯年、罗家伦等人虽然发动并参与五四学生游行，但被当做五四精神导师的胡适，却是彻彻底底反对罢课抗争的“复课派”。他一度批判学生用罢课做武器是“下下策、不经济”，使原本新文学运动的思想运动意外触发了政治运动。受到胡适的影响，傅斯年、罗家伦、段锡朋等人在“五四”后迅速退出抗争。罗家伦甚至批评，继续发动罢课是“失败、无聊”，力主大学生应该把精力放在校园学术、西方科学新知的研究上，避免介入社会运动。因此《新潮》这种转向探索西方现代科学，只钻研学问，不问外事的退缩、保守态度，长期以来遭到左派严厉的质疑和批判。

在这场“五四”定位论战中，罗家伦的角色不过局限于协助蒋介石在五四主导权之争上争取发言地位罢了。反倒是与胡适的密切关系，使罗家伦成了为蒋介石传话、拉拢胡适的重要人物。1951 年间，《自由中国》与国民党、两蒋因《政府不能诱民于罪》一文发生摩擦，几乎被查禁，罗家伦为此衔命赴美与胡适沟通，劝说胡适不要继续担任《自由中国》发行人。

精神透支过世　书画珍品捐赠台北“故宫博物院”

随着记忆力急剧衰退，身体转趋虚弱，毕生相信科学的罗家伦，虽然无法接受脑功能衰退的诊断结果，以及需要更多时间休养的医师建议，无可奈何之下，还是在 1967 年决定退休，于山清水秀的台北外双溪静养。“国史馆馆长”由复旦公学的同学黄季陆取代，“党史会”职务也在年底一并移交黄季陆；“中国国际笔会”会长一职则在次年交给林语堂。

不过罗家伦退休后健康不见好转，几近神志不清。友人形容，向来精明的罗家伦，连盆栽与画作都无法分辨，几乎整天在病床上度过。

1969 年 12 月 25 日，罗家伦因肺炎、血管硬化并发，病逝于台北荣民总医院，享年七十二。一生重要著作有《科学与玄学》、《新人生观》、《文化教育与青年》、《新民族观》等。

罗家伦被安葬于台北阳明山第一公墓十二区，墓道正面刻有蒋介石所题“学渊绩懋”挽词。家属与学生并将罗家伦于 1934 年亲笔所书的《玉门出塞》歌词刻在墓旁石碑上，以为纪念。

罗家伦生前与张群、王世杰等约定，愿将个人收藏的明末书画捐赠台北“故宫博物院”。1976 年 3 月，罗家伦遗孀张维桢在美国托夏功权将八大山人《山水轴》、石涛《自写种松图小照卷》、《诗画舍装卷》、石溪《岩穴栖真轴面壁图轴》携带回台，捐赠台北“故宫博物院”。其中《诗画舍装卷》中的《海宴河清册》最为珍贵，这是石涛为康熙南巡特别进御的珍品。

1995 年 11 月，为庆祝台北“故宫博物院”成立七十周年，罗家伦女儿罗久华、罗久芳又将罗家伦三十六件收藏无偿捐赠台北“故宫博物院”，其中部

分是罗家伦远赴国外，费心收集因战乱流落在外的人物画。这批历经战火辗转回到台北“故宫”的珍品，包括唐朝周房的《调婴图》、宋代苏轼的《雨竹》、元代赵孟頫《兰亭休憩图》、马远的《松溪清眺》、明代四大才子之一文徵明的《云山烟雨图》、明末清初石涛的《诗书画三绝》等。罗久华说，罗家伦担任数十年台北“故宫”常务理事，有深厚感情，加上古董脆弱，书画不易重裱，与其私人收藏，不如捐出让更多人欣赏。

1997元月，张维桢再捐赠台湾“中央研究院”共一百一十四件道光、咸丰年间外交史料，都是罗家伦在欧洲游学时搜购的。绝大部分是鸦片战争前后广东各衙署与西洋人交涉的史料，可借此了解19世纪中叶澳门因华洋杂处所衍生的道德、司法、商务、关税等纠纷。

“五四”成名光芒　让政治消磨殆尽

据闻当年北大入学考试后，胡适批阅罗家伦的作文试卷，给了满分。招生委员会翻阅他的成绩单，却发现数学零分，其他学科平平。主持会议的蔡元培爱才，还是同意破例录取。也有一说，钱鍾书于1929年报考清华大学时，国文特优、英文满分，但数学也只考了十五分。阅卷老师报告后，担任清华大学校长的罗家伦立即破格录取这位大才子。

罗家伦白话文章写得好，很少有人质疑。除为“五四”起草行动宣言外，在抗战时期为鼓励青年抗日意志所写的《新人生观》，直到今日还有相当影响力。

罗家伦早在学生时代即锋芒毕露，识才、爱才、惜才，得高位时不吝于拔擢人才；于五四同侪中，他的政治关系佳，但优游于政治，让他的光芒日趋黯淡。

如果不谈政治倾向，罗家伦不失一位爱国主义者。他曾回忆，辛亥革命前，父亲同情革命党，袖中藏着邹容所著的禁书《革命军》回家给他阅读，激发了

他的爱国情操与信念。[1]

抗日战争开始后，担任中央大学校长的罗家伦，认为中国国难深重，中华民族已临生死关头，国立大学当然要对民族和国家尽特殊使命，要为中国建立“有机体的民族文化”。他提出“诚、朴、雄、伟”，以勉励中央大学学生，强调对学问要有诚意，学术气象务求朴厚崇实，必须一改宋朝南渡以来的柔弱委靡风气，求中华民族的大雄无畏；并力求伟大崇高，从整个民族文化的命运着眼，放弃门户之见，不再故步自封。

即使日军连番轰炸，他也始终坚持认为学生必须正常接受教育，心智不能动摇；还在日军炸弹轰炸的学校遗址上办公，借此要求学生要时刻把民族存亡的念头放在胸中。

罗家伦虽居要职，办教育的成绩却比不上好友傅斯年的壮阔与辉煌。回顾早年在清华大学，罗家伦衔命将“庚子赔款”成立的清华基金改由“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管理，为清华回归教育部管辖打下基础，他却因作风专断，在两年后匆匆下台。

同样出身北大的知名学者毛子水回忆，罗家伦性格热情、奔放、积极，做事活跃。出掌清华大学期间，为争取最好的教授不遗余力，他挟丰厚资源以及万般争取的诚意，用水磨功夫不断死缠，把在南开大学任教的蒋廷黻挖到清华，成为杏坛一项美谈。

在中央大学校长任内，因获得蒋介石经费支持与担保，罗家伦的确风光一时。他延揽艺术领域师资用力颇多，徐悲鸿、张大千、傅抱石、汪宋白、张书旗、黄君璧皆曾在中大执教；方东美、唐君毅、牟宗三、宗白华等哲学大师，也曾被中央大学哲学系延揽。

到了重庆，中央大学足以与北大、清华等校合组的西南联大相抗衡，日后终于成为南方第一大学，并于1949年后改名为南京大学。

罗家伦虽然称不上史学大家，但是他开风气之先，于20世纪20年代中期在东南大学首开中国近代史课程，培养青年正确的国家与历史认知。知名史学家郭廷以便是罗家伦教的第一批学生中的一员。

罗家伦晚年为人圆滑，依旧不失提携后进的大老风范。他读过历史学者傅

---

①蒋永敬：《罗家伦先生的生平及对中国近代史史的贡献》，《罗志希先生传记暨著述资料》，页36。

启学所著的《中国外交史》后，亲自聘他为“国民党党史会”副主任委员①；他曾与蒋介石的另一名文胆陶希圣，安排年轻狂放却又光芒耀眼的李敖到台湾的“国史馆”从事研究；“国史馆”所编纂的孙中山文献遭年轻学者指称有疏漏，罗家伦没有学阀趾高气扬的态度，反而默默地三次修正遭指责之处，运用人际关系化解双方冲突与歧见。

但罗家伦热心宦途，终究让他与其他五四人物不同道。蒋介石多次邀请罗家伦的恩师胡适加入国民政府，甚至发动胡适得意门生傅斯年出面说服，但不仅傅斯年直言建议胡适应拒绝，胡适也以坚持作为在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为由，婉拒蒋介石的提议，而继续留在学术圈、教育界。

遥想 1948 年 3 月，在国民政府情势混乱之际，由王世杰做中间人，要胡适勉为其难，在国民政府第一届国民党大会召开后参选总统。蒋介石不断施压，甚至开出胡适出任总统，由他担任行政院院长的条件。蒋介石在 4 月 4 日的国大会议中，虽然还是推举胡适担任总统候选人，却遭国民党一致反对，坚决要求蒋介石出马参选，先前的劝进等于戏弄了胡适。更难堪的是，在场数千名国民党国代中，仅吴敬恒与罗家伦支持由胡适担任总统候选人。

作为五四狂飙年代的宠儿，罗家伦的生命曾经光芒万丈，却在步入青壮年之后，与政治、权位的关系越扯越深。

与其他自由派学者不同，罗家伦专注于五四精神中的现代化诉求，相信通过党派、强人政治才能落实一切目标，因此先是承蒋介石之命经营党校、党政，晚年又帮蒋介石经营文人关系，出掌国民党党史研究工作。

但由于官僚系统的长期磨损，让这位五四文胆没能交出像样的学术研究成果，失去应有的风采与胆识。罗家伦曾劝义愤填膺的傅斯年“别和蟋蟀一样，被人一引就鼓起翅膀来”，还感叹傅斯年“好动气而不善养气”。但数十年过去，元气淋漓的傅斯年浩然之气犹存，而罗家伦如今安在哉？

加上受到两岸对峙情势牵累，甚至一度连罗家伦“五四”的历史贡献都遭人质疑，凡此种种，显示罗家伦以文人身份介入政治之失以及越来越模糊的气度与人格。这位曾引领风骚的五四健将，终于在权力的蛛网中渐渐凋零。虽然

①傅启学：《我与罗志希先生》，《传记文学》第三十卷第一期，1977 年 1 月。

罗家伦生前曾说，“伟大的人，到死后才能被人认识”[1]；他也说，“人须有独立人格，在某些方面我总是独来独往”，但从掷地有声到到晚年的暗哑，罗家伦离开舞台的背影，是如此的落寞。

①《书诒天下才，我为苍生哭》，《逝者如斯集》，页164。



林语堂 Lin Yutang

中西以及两岸的人生哲学

当今中国人看到“幽默”二字，莫不会心一笑；若对人冠以“幽默”二字，更是一大恭维。“幽默”一词源自英文单词 humour 的译音，存在于中文世界不过八十余年。首先将 humour 转化为“幽默”二字带进中国的，即为有“幽默大师”美誉的文学家林语堂。1924 年创造“幽默”一词时，他不过三十岁。而鲁迅对“幽默”的不满与批判，更让林语堂的形象鲜明。

君子不器，林语堂发光发热未局限在中国文坛。他是以英文著作扬名海外的中国作家，也是集语言学家、哲学家、文学家、旅游家、发明家于一身的知名学者。他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也曾与胡适一同被美国文坛列为“20 世纪智能人物”之一。

林语堂用通俗达练的英文，向世界介绍中国人的观点、文化，这是他有功于中华民族之处。

美国总统老布什于1989年在美国国会为中国政策作证时说，林语堂作品反映中国文化的观点，至今影响美国政府。

上承“五四”的新文化流风，下开中西沟通之门户，林语堂的一生成就，反映中国面对西方文化冲击，在文化、历史、社会、生活上的各种歧异、扭曲与自得，仿佛中西合璧，又仿佛负隅抵抗，形同复杂的矛盾综合体。但林语堂的独到之处，在于乐于享受矛盾，戳破矛盾，与中西矛盾共生，在小处做大文章，使他成为中国文坛上最难形容与归类的大师。

被郁达夫形容“生性憨直、浑朴天真”的林语堂，曾自傲地说，“我是一团矛盾，但我以自我矛盾为乐”。因此他的座右铭“文章可幽默，做事须认真”，衬托他的人格，更显得鲜活有力。

林语堂为“文人”下的定义，也很难让人忽略。他主张：“做文人而不准备做文妓，就只有一途：就是带点丈夫气，说自己胸中的话，不要取媚于世，这样身份自会高点。要有胆量，独抒己见，不随波逐流，就是文人的身份。所言是真知灼见的话，所见是高人一等之理，所写是优美动人之文，独来独往，存真保诚，有骨气，有识见，有操守，这样的文人是做得的。”

享誉西方文坛　奠定大师地位

林语堂于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10月10日生于福建省龙溪（漳州）县。原名和乐，读大学时改名玉堂，后又改名语堂。排行第五的他有兄弟六人、两位姐姐。母亲杨顺命。父亲林至诚是长老会牧师，因此林语堂六岁入学就读于基督教会兴办的铭新小学，四年后转往厦门鼓浪屿同样由教会兴办的小学，十岁即开始接触西洋文化与生活。

从鼓浪屿的教会中学寻源书院毕业后，林语堂进入上海知名英文学校圣约翰大学，大二时以英文短篇小说赢得学校金牌奖；取得学士学位后获聘为清华大学英文教师。1919年，他与厦门富商廖悦发次女廖翠凤完成婚礼，并申请到清华的半官费奖学金，携妻赴美深造。

虽然拿着奖学金出国，但先遇到廖翠凤因盲肠炎手术并发感染，动用了大笔旅费；抵美第二年，意外发生半官费被无故取消风波，林语堂只好向北

大申请预支。所幸时任北大文学院院长的胡适自掏腰包，谎以北大校方名义，紧急汇给他“近乎天文数字”的两千美元，且两度私下伸出援手，林语堂才得以继续学业。后应聘前往法国战场勤工俭学，教华工读书识字赚取生活费，这样才能取得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硕士学位和德国莱比锡大学语言学博士学位。

林语堂二十九岁获博士学位。他履行当年对胡适的承诺，随即担任北京大学英语系教授，又兼北京师范大学英语系讲师，并开始以“语堂”之名发表文章。第二年他将英文的 humour 译为“幽默”，为“幽默”一词出现之始。

1926 年，林语堂兼任北平女子师范大学教授及教务长时，与鲁迅密切往来，同为《语丝》杂志写稿。在开明书店编《开明英语读本》时，林语堂也和鲁迅、郁达夫等人共事。从收集早期作品的《翦拂集》中，即可看到林语堂青年时期革命左倾的一面。他曾积极参加反抗军阀统治的抗争，为此南避厦门大学任教，同时延请鲁迅同到厦大。不过林语堂与鲁迅的关系，却因文艺路线与人生观的不同，发生论战，演变为几乎互不往来。①

另一方面，因赛珍珠（Pearl S. Buck）的鼓励，林语堂立下以英文写作、忠实地将中国面貌引介给西方的宏愿，花费一年时间，撰写《吾国吾民》（*My Country and My People*）一书，1935 年交由赛珍珠协助出版。这部英文著作让林语堂享誉欧美文坛，也开启了他生命的另一扇窗。

1936 年，抗战前，林语堂举家赴美，原先打算停留一年后返回北京，但因避战火，全家长期滞美。旅美期间，林语堂致力于写作。在赛珍珠的全力推介下，《生活的艺术》一书大为畅销，使他在西方社会声名大噪。

林语堂离开上海前，曾为搭救被国民党拘禁的牛兰夫妇，与宋庆龄等人筹组民权保障同盟；也曾与鲁迅、巴金、郭沫若、茅盾等人，联署知名的《文艺界同仁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主张不分新旧派别，为抗日战争而结合，

---

①林语堂自述，他与鲁迅相得两次、相离两次，都是出于自然，他也始终尊敬鲁迅。林语堂的女儿林太乙也记载，林语堂心中根本世上无恶人；鲁迅对他的不悦，林语堂归因于多半是鲁迅身体不好所致。但两人的文艺观与世界观的确随着时局变化越来越不同，导致关系恶化。就连 1936 年 10 月，鲁迅病逝于上海，林语堂在纽约为文谈鲁迅，虽称誉鲁迅的短篇小说是当代第一，但似乎惊愕仍多于悲悼，表示“鲁迅不乐，我亦无可如何”；且称鲁迅“与其称为文人，不如号战士”。不过林语堂也强调，他与鲁迅的不和从未有私人意气，他心中仍当鲁迅是长辈。

并争取言论自由。[1]

七七事变后，身在异邦的林语堂在《时代周刊》发表《日本征服不了中国》，强调具有高度士气与团结一致的国家，绝不会被外来势力所征服。并以他的知名度，应中国驻美大使王正廷邀请，以西方知名作家身份，到华盛顿为中国演说，驳斥欧美对中国苦难的忽视，为故国争取权益与国际舆论支持。随着战火波及上海，林语堂家中保留的五十二册辞典创作手稿，毁于日军炮火。但也就是在国家遍地烽火之际，林语堂在美以英文写成《京华烟云》巨作。才子佳人的包装，字里行间藏着林语堂对国家的热爱。

林语堂曾说，《京华烟云》是为“纪念全国在前线牺牲的勇男儿”。林语堂强调，作家在国难当头时报国的唯一方式，还是用笔锋宣传爱国的精神，[2]这比在国内躲警报要重要得多。此书叙述家族悲欢离合，以八国联军进北京的逃难开头，以日军入侵的逃难结尾，寓意深远，深受海外好评。只是林语堂一度托郁达夫将全书译成中文却未果，反倒是日译本先行问世。

抗战期间，林语堂仅于1940年和1944年两度回国，不忘撰文为国家宣传，指出日本的困境；并指责美国两面手法，不愿援助中国，反而出售废铁、汽油等物资给日本，间接协助危害中国。林语堂在《读者文摘》上发表文章，强调国际面对的威胁不在炸弹，而在观念。他强调，文明一定会战胜愚昧，侵略者一定会失败。抗战期间，《京华烟云》的姐妹作《风声鹤唳》亦迅速出版。

1949年未随国民党去台

林语堂曾说，“我在文学上的成功和发展我的风格，完全是国民党之赐”，

---

①林语堂是同盟的宣传主任，鲁迅是委员，双方一度因为有志一同，化解了心结而言归于好，这就是林语堂所说的“第二次相得”。但林语堂关于纯文学的坚持以及翻译的主张，让他与鲁迅格格不入。直到同盟的杨杏佛被杀，鲁迅没看到林语堂去吊唁，双方误解越结越深。但林太乙为父亲辩白，林语堂是等到监视他的特务离开后才前往参加告别式，只是鲁迅并未看到。

②施建伟：《走向世界的幽默大师林语堂》，台北武陵出版社，1994年，页58。

"如果民权不被取缔，恐怕我永不能成为一个文学家"[①]。因此在创作初期，林语堂的文风中间偏左，与国民党、军阀势力敌对的倾向鲜明。在《吾国与吾民》十三版中，他加入《中日战争之我见》，称誉张学良借由西安事变迫使蒋介石联共抗日，立下伟大功绩；他认为中国共产党是最早坚持抗日的中国政党，毛泽东与朱德能放下党派仇恨，不计前嫌地在西安事变后释放蒋介石，是争取全民抗日的积极表现。

但在抗战时期，许多自由派学者、文人期待中国能出明君，带领国家摆脱亡国命运。蒋介石的声望与分量，正是这群人的希望所系。胡适、傅斯年如此，林语堂也不例外。

1940年在日军猛烈轰炸时，林语堂访问重庆，不仅晋见蒋介石夫妇，也接受蒋介石侍从室顾问的职务，以国府官员身份常驻美国。他虽未支薪，但从此与国民党政权的关系日益密切。1943年归国访问，他随宋子文同搭一机，备受外界质疑。

林语堂有与人打笔仗的习性。在继鲁迅之后，他与郭沫若对东西文化能否互补起了争端。延安《解放日报》等报刊纷纷发表文章批判，林语堂则归结争议起自左派文人相轻、不讲理。

抗战末期林语堂与蒋介石关系趋于密切，但越来越多美国人不能接受蒋介石的专政。这使林语堂饱受质疑，在中国与美国皆树敌，评价也日渐下滑，甚至传言他遭蒋介石收买。林语堂在字里行间、在演讲时，毫不掩饰他认为是美国背弃了国民党，是美国帮中国共产党战胜了蒋介石。

家事也让林语堂神伤，因为长女林如斯在1945年订婚前一天，与一名美国青年私奔了。

经济上，林语堂的麻烦接踵而至。原本为了响应爱国行动，他将著作所得两万三千美元存款，改以银元法币存在中国银行。但抗战后币值狂贬、通货膨胀，这笔钱形同废纸。此外，国共关系紧张时刻，林语堂在美国虽重拾年轻时的爱好，发明中文打字机卓有成就，却也使他的财务状况雪上加霜。

早在1916年，林语堂就对中文打字机有兴趣，日后他因研究中文打字机兴起改良传统部首检字的愿望，接连发明"汉字号码索引法"、"国音新

①林太乙：《林语堂传》，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9年，页95。

韵检字”、“末笔检字法”等；又出任教育部“国语罗马字拼音研究委员会”委员，于1928年推动国民政府颁行国语罗马字拼音法，让中文可以用英文字母音译。种种努力其实是希望发明简明易用的中文打字机，让中文脱离只能书写的时代。

在美国期间，除大量著作，林语堂其他精力都投入“明快中文打字机”的研究。1947年在纽约发明成功时，这部所费不赀、大多数零件都要依赖手工打造的机器，造价十二万美元。林语堂在发布会上骄傲地说：“这是我送给中国人的礼物。”

虽然当年这是最轻巧简便、不学即能操作的中文打字机，但现实中，却因中国内乱未能立即授权生产推广；加上林语堂未假手他人，整个研发费用一手包办，这项发明让他濒临破产。

经济上诸多不如意，让妻子十分忧心，也改变了林语堂的生涯规划。1947年，林语堂获邀担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美术文学组主任，因美国政府向他催缴积欠的三万多元所得税，差点无法赴巴黎上任。但是联合国繁忙的工作，令人烦闷。不久林语堂毅然辞职，回到写作维持生计的生活。直至1951年林语堂才顺利地将打字机专利出售给默根索拉排字机公司，翌年取得美国专利局批准专利，但因造价过于昂贵，仍未大量生产。

国民政府迁台后，林语堂并未立即去台，而是与二女儿林太乙在纽约兴办《天风》刊物，林语堂任社长，借台北“中央日报社”唐人街办公室办公。但杂志销路不佳，发行数期即停刊。又因不满好友赛珍珠数十年来以约翰·黛出版社名义抽取他所有发行作品百分之五十的版税并享有版权，发生版税纠纷，导致两人在1953年后恩断义绝。被郁达夫形容为“容易上当”的林语堂说：“我看穿了一个美国人”，“过了一二十年才发现朋友开书局也是为赚钱”①。

林语堂的盛名之累还不止于此。1953年3月，台湾传媒一度大幅报道林语堂将为搜集写作题材访台；甚至在预告日当天，接机团浩浩荡荡一行人在机场等待大师，最后却是乌龙一场。隔天即有亲政府的报纸撰文称这是“幽默的预告”，甚至指“幽默大师”来也只是贩卖“幽默噱头”，因此“不来也

---

①林太乙：《林语堂传》，页254。

罢”。

早在1940年，林语堂返回重庆相当短的时间内即宣布将返美，当时就有不少人批评他国难当头还要离开，是因为图安逸，或批评他舍不得在美国的家产。连他的大女儿林如斯也发出不平之鸣，并于1943年重返重庆，留在中国奋斗。唯郁达夫力排众议，强调作家要靠着著作才能证明自己，林语堂在美国积极为中国宣传功不可没，这才平息这段纷争。

国民政府迁台初期，林语堂对到台湾访问似乎缺乏兴趣。1954年，国民党政府将林语堂列入“联合国第九届大会中国代表团”的八位顾问名单内。即使有任务在身，林语堂也没有到台湾。直到1958年秋天他才首度访台。

南洋大学争议促使态度转变

1955年爆发的南洋大学事件，是林氏夫妇态度转变的关键。

1954年8月，林语堂应华侨陈六使与南洋大学执行委员会之邀赴新加坡，就任兴建中的南洋大学校长。陈六使为马来西亚富豪，掌握全东南亚橡胶储藏。据林语堂的说法，陈六使富可敌国，对市场的影响力比起任何政府皆有过之，但他对政治一片空白，根本未料到创办南洋大学会引发政治问题。

这所由华侨集资四百万元美金兴办的大学，由于位于形势敏感的东南亚，开办之初就商定，校长应具国际声望，且不宜由国共任何一方党员出任。正因内外情势复杂，胡适、钱穆等人纷纷推辞，直到校方派代表到纽约邀请时任“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顾问”的林语堂，承诺未来会有足够经费与权力支持，林语堂才首肯接任。

就任校长前，林语堂坚持理事会须给予具体保证，其中之一是“南洋大学应有一个非常单纯而无政治性的目标”，教授应享有绝对的思想自由；又要求理事会在1954年底和1955年底以前，至少分别筹集三百三十万美元。陈六使不仅同意，而且承诺个人立即捐出一百七十万美元。获得具体承诺后，林语堂着手规划校务，并将在联合国担任翻译工作的二女婿黎明挖到南洋大学，出任他的执行秘书。

办校期间，先因为建筑与办校经费吵吵嚷嚷一阵子，继而政治气氛日趋紧

张，从而衍生一连串争议。

继而新加坡的《南洋商报》等中文报纸开始攻击林语堂。林语堂接到威胁他生命的恐吓信。学校捐款也出了问题，大商贾捐款迟迟不到位，学校半数捐款来自新加坡踏三轮车的、理发的和街头小贩等最贫苦华侨。

不过半年，学校尚未开课，即传出校长和董事会关系紧张、林语堂可能离开南洋大学的消息。1955 年 4 月 1 日，林语堂和教授集体辞职。一个星期内，董事长陈六使签发总值马币三十万余元的十三张支票，作为林语堂和教授群的补偿与遣散费。林语堂随即搭机飞往法国巴黎。

就在林语堂离开新加坡后，美国《时代周刊》揭露内幕，指这起表面上起因于经费和教育方针的争执，实际上为思想斗争的战场。紧接着，林语堂于 1955 年 5 月 2 日出刊的《生活》杂志发表长文，表明自己是“被迫辞职”；之所以没有立即向大众说明真正原因，是因为他和家眷“有惨遭枪手暗杀的危险”。而且林语堂指出，在他辞职前后的几个星期中，“我们住在新加坡就有英国警察的特别保护”。

南洋大学事件让林语堂耿耿于怀，且终其一生对于无法将南洋大学建成一所具有国际水准的大学感到不平。

国民党全力拉拢　赴台定居

离开新加坡后，林语堂外表依旧坚强而幽默，夫人廖翠凤则一度因南洋大学风波而精神衰弱，于是夫妇俩暂时旅居法国戛纳，随后数年悠游于欧美。他曾于 1955 年夏天，带着妻子、幼女与甫离婚的长女，在欧洲进行所谓“林语堂式的漫游”。感情丰沛的他，在莫扎特墓前流下激动的眼泪。

直到 1958 年 10 月，林语堂伉俪才应台北“中央日报社社长”、昔日厦门大学学生马星野之邀，首度赴台湾，这距离他上次返回中国土地已十四年。但这一次，林语堂只能在台湾与故乡闽南隔海眺望。

为表示对林语堂的推崇，蒋介石当天派出何应钦、蒋梦麟、罗家伦和曾虚白等政界、学术界人士数百人接机，另有厦门大学校友会、圣约翰大学同学会与林氏亲友多人。接机场面热烈，廖翠凤还一度遭人潮冲散。第二天出

刊的报纸形容，为林语堂接机是继胡适之后，欢迎学术界人士最热烈的一次。

虽然是第一次赴台，但台湾的闽南乡音，让林语堂难忘，情不自禁透露出期盼叶落归根，希望在阳明山觅地终老的心愿。

当时正值金门炮战紧张之际，蒋介石夫妇仍抽空在官邸会晤林语堂，与他大谈《红楼梦》考证的问题。国民党政府又借机会，给予林语堂一项新职“外交部顾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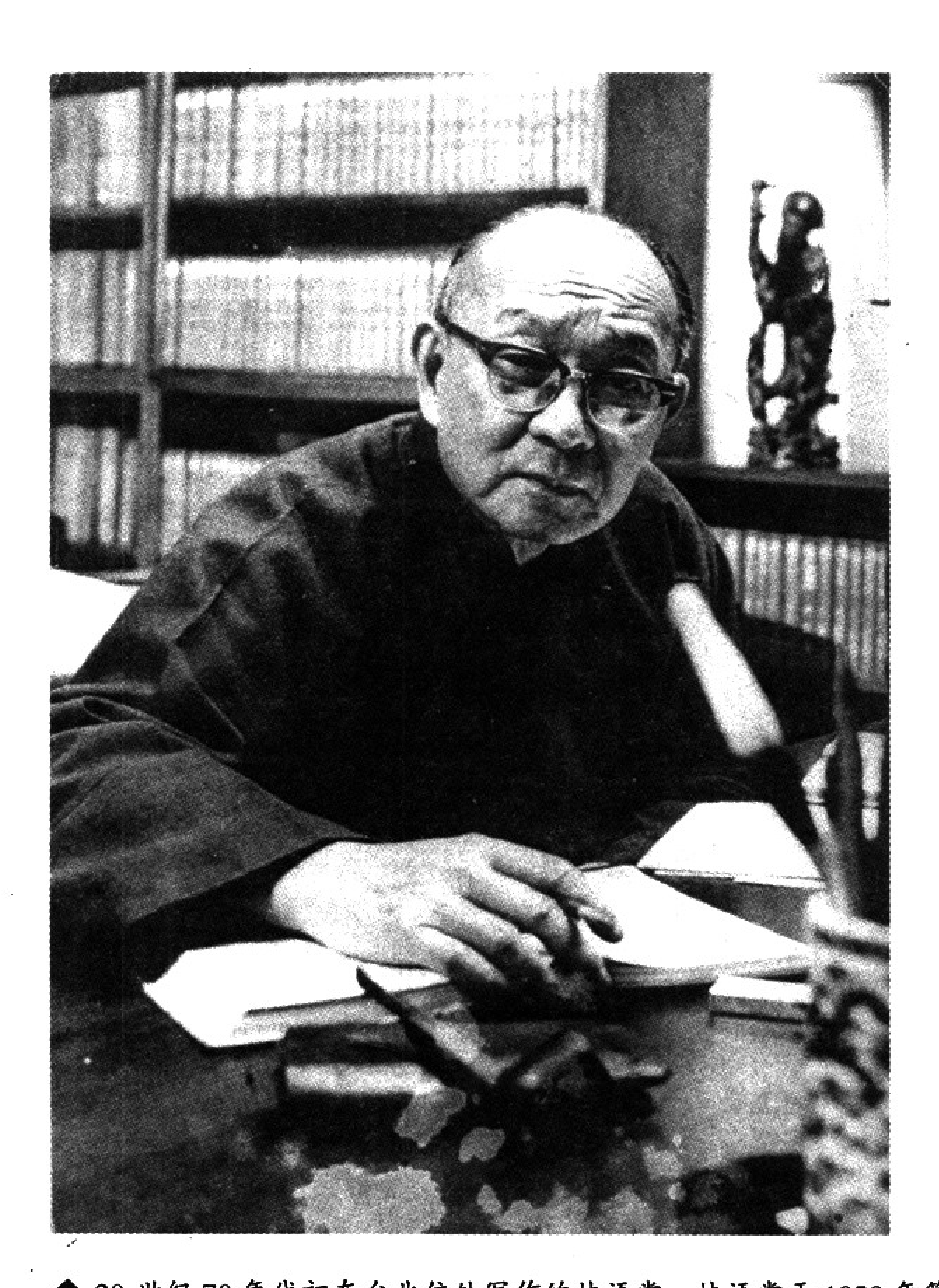
林语堂结束短暂访问返美后，对美国政界兴起“两个中国”的说法相当不以为然，多次激烈批判，指美国观念错误，不了解中国人。他说，美国人想搞“两个中国”，不但“不了解蒋介石”，“也不了解毛泽东”。

1965 年 7 月，林语堂夫妇在美国纽约庆祝七十双寿，在诗词应酬间透露将离开美国的信息。1966 年，蒋介石发动“文化复兴运动”，敦促各文学大家、学界大师来台定居，将台湾凝聚成为中华文化的中心，这进一步促成七十二岁的林语堂下定决心离美赴台。

林语堂先是两度访台。1966 年 6 月返台定居台北市郊风景秀丽的阳明山上，并以客卿身份与蒋介石相处，推辞国民党政府的官爵。仰德大道二段 141 号新居，是两蒋政府的礼物，由林语堂亲自设计，由台湾第一代建筑师王大闳建造完成。

这座白墙蓝瓦的别墅，以中国四合院的架构，结合西班牙的设计，是融合了中国与南欧特色，现代感与古典美兼具的建筑。庭院中的游泳池，被林语堂当做鱼池，以持竿观鱼的悠闲，增添生活情趣。

新居地点选择貌似福建故乡山景的阳明山，建筑风格是林语堂年轻时梦想的上海楼房形象。在这里，最让他欣慰的是，可以听到亲切的闽南话。他曾经形容这座宅院：“宅中有园，园中有屋，屋中有院，院中有树，树上有天，天上有月，不亦快哉！”右边的书斋“有不为斋”，是他著作阅读的地方；阳台是林语堂常停留的地方。吃完晚饭，他最喜欢坐在桌旁的藤椅上，口含烟斗，欣赏夕照沉没于观音山际。



↑20世纪70年代初在台北住处写作的林语堂。林语堂于1958年第一次到台湾；1966年决定定居台北，度过晚年。他在阳明山的房子是当时国民党政府送给他的，由林语堂亲自设计。整座房子以白墙蓝瓦中国四合院的架构，结合西班牙的设计，兼具现代感与古典美。林语堂曾经形容这座宅院："宅中有园，园中有屋，屋中有院，院中有树，树上有天，天上有月，不亦快哉!"

林语堂把书房命名为"有不为斋"。林语堂对于住处的想法是："我想，一个人的房间，应有几分零乱，七分庄严中带三分随便，住起来才舒服。"晚饭后，他最喜欢坐在桌旁的藤椅上，含着烟斗，远眺观音山和淡水河。

1976年3月林语堂辞世，林夫人廖翠凤将先生的房舍、物品捐赠给台湾当局。1985年5月以"林语堂先生纪念图书馆"名义对外开放，1990年3月台北市政府决定将图书馆移拨文化局主管。其后，台北市文化局以委外招标的方式，由佛光人文学院经营，以活化古迹，加深其人文广度，让隐遁山林的文学重现踪迹。林语堂故居于2002年3月26日开馆，成为结合参观、艺文讲座、餐饮休憩的多元空间，完整呈现了林语堂的格调、思想、创意、生活态度与文学成就。2005年10月1日其改由东吴大学接手管理。

著作等身　论战不断

赴台定居后的林语堂，重拾年轻时的理想，再次投入到英语辞典编纂和改良汉字检索拼音之中。

他并应聘于香港中文大学，主持编纂《当代汉英辞典》，以“上下形检字法”和“简化国语罗马字”为检索和拼音，重编《新开明语堂英语读本》，应邀担任《国语日报》董事。出任“中华民国笔会”会长时，邀请甫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日本作家川端康成来台，又于国际笔会第三十七届大会中发表《东西方的幽默》演说。

著作等身的林语堂，虽以幽默著称，但面对不同的批判与意见，他的攻击力十足，为自己理念的辩护。因此即使年近古稀，林语堂在台湾因论战引发数次风波。

林语堂卷入文艺论战的事迹，可写成长篇故事。1928 年，林语堂在鲁迅、郁达夫合编的《奔流》月刊发表独幕悲喜剧《子见南子》，质疑南子的“礼”与孔子的“礼”不相同，引发争议；又因山东曲阜第二师范学校在孔庙附近排演《子见南子》，立即遭到孔子后代孔传堉等人的抗议，六十户孔室族人联名向教育部控告学校校长宋还吾“侮辱宗祖孔子”，虽经查“尚无侮辱孔子情事”，但校长仍未能免除池鱼之殃，还是遭调任处分。

林语堂与鲁迅、郭沫若等人的论战，更是经典。依《林语堂文选》自述，他与鲁迅两人友谊“相得者二次，疏离者二次”。但与鲁迅闹翻后，双方关系恶化，左派不谅解林语堂创办《人世间》的文学见解，林语堂也不愿牺牲自己的看法；两人关于翻译究竟应该“信、达、雅”还是直译的争执，更惹得鲁迅十分不快，从此互不往来。

即使两人交恶，林语堂也没有抹杀鲁迅在白话文学上的重大贡献与成就。1961 年，林语堂受邀在美国国会图书馆演讲，他肯定“五四”以来中国最好的诗人是徐志摩，但最好的短篇小说作者是鲁迅、沈从文、冯文炳与徐讦。他说，鲁迅用讽刺当利器，用笔锋当箭，自认为是战士而非作家，绍兴师爷那种一笔定生死的刀笔本领，正是鲁迅文章风格的来源。林语堂还肯定，鲁迅在打

倒旧中国上是个主将，对青年思想的转变发挥了重要作用。[①]

1967 年，林语堂到了台湾，依旧不改本性，因为发表《红楼梦》后四十回出于曹雪芹手笔的论述，掀起一场红学大辩论。

《红楼梦》在两岸是文坛研究的显学，尤其后四十回是曹雪芹还是高鹗所写，一直是红学研究者感兴趣的课题。林语堂来台之后，在受邀为“中央社”写的专栏“无所不谈”诸多题目中，也包括许多红学的考据文章，成为当时台湾文坛的研究重心之一。没想到就是这些观点，引发了两次大论战。

1967 年 5 月 4 日的“五四文艺节”，林语堂在“文艺协会”十七周年纪念大会上发表专题演讲，大赞史湘云在书中的地位。除当场展示自己收藏的不同版本外，他并指经过年余研究已发现七点证据，包括曹雪芹亲笔写空空道人一节中的“道”字，和后四十回的“道”字比较，笔迹相似；以及从情节上推敲，可证实全部《红楼梦》是曹雪芹的手笔。林语堂还揶揄，胡适因为太过于“小心求证”，以致误认高鹗续书后四十回。

林语堂这场学术演讲轰动全台。未料，半个月后，旋即有红学研究者葛建时和严冬阳合撰长文投书《联合报》，根据林语堂依《乾隆抄本百二十回稿》所提出的七点论证提出十项疑问。其中最大的疑点为，林语堂于稿本发现“已卯秋月，堇堇重订”等语，认为“堇”谐“芹”声，因此“堇堇”是曹雪芹的别号。

葛、严合撰之专文指出，林语堂可能是眼花看错，“堇堇”两字应为稿本收藏者杨继振的号“莲公”二字的草写，而并非“堇堇”；且林语堂认为的“乾隆己卯”（1759 年）曹雪芹忙于改稿之年，应为杨继振的幕客于源题署的“咸丰乙卯”（1855 年）。

这篇专文指出，林语堂在演讲中所谓新发现曹雪芹手写手订本，应是在曹雪芹过世九十年后，咸丰年间由杨继振（字又云）题署重订的一个本子。专文刊出后，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教授赵冈亦投书，观点与葛、严两位先生的专文不谋而合。

隔天，林语堂撰写长文为自己的论点辩护，他认为“己卯”和“乙卯”之争，只能将那些字放大照相，让读者评判；并称已请教过方家，仍认为就字形

①施建伟：《走向世界的幽默大师林语堂》，页 222。

来看，“堇堇”比“莲公”合理。

笔仗来往数回，持续数月余，期间有其他研究者以不同方式印证“堇堇”之误。不过面对种种“指正”，林语堂仍坚持己见，最后则不了了之。此间评论者认为，比起林语堂过去论战因观点不同而起，这场红学论战，他则似乎显得失之大意。

此外，1968年的“思凡风波”，则是林语堂的另一件头痛事。

林语堂不止一次在媒体上提出关于佛教的评论。他略带讽刺的笔锋以及半开玩笑的文字，早引发卫道人士不满。他在一篇文章《论色即是空》，把吃迷幻药和佛家的“色即是空”的顿悟境界联系在一起，引起佛教人士抗议。尤其林语堂本身是基督徒，更在有意无意之间加入宗教冲突，无形中提高了冲突程度。

林语堂有回公开表示，在《红楼梦》中最欣赏干练有为的探春，唯独不爱怀春的妙玉；并说带发修行的妙玉是“色情狂的小尼姑”，无论对刘姥姥的嫌恶或是对宝玉的调情，都让人觉得虚伪与无知。他质疑，妙玉蕴藏满肚幽怨，又无法表达，形成了变态心理；对宝玉的另眼看待不但有调情之意，同时因怀春而走火入魔，更显示这个小尼姑耐不住寂寞。①这些极端个人化的评论形诸文字，被台湾报刊转载后，引发一拨接一拨争议。

1968年10月11日，林语堂在台北《中央日报》发表《〈尼姑思凡〉英译》，将民族戏曲《尼姑思凡》译成英文。林语堂表示，《尼姑思凡》代表经典以外的中国文学，充满人生味道，处处可见真情流露；历代给士大夫读的诗词文章，只求典赋绮丽、风雅蕴藉，内容却日渐贫乏干枯。

虽然林语堂是从文学与心理分析的角度，评析民族戏曲的文学技巧，但这种毫无避讳的谈法，触怒了台湾的佛教界与卫道人士，引发一场论战与批判。佛教团体不断致函林语堂抗议，质疑《尼姑思凡》含有黄色毒素；以中英对照宣扬广播，是在诋毁佛教，有害社会人心，违反政府提倡道德教育宗旨；要求林语堂为妄言道歉。

①其实在林语堂看来，《红楼梦》之所以文学成就受人肯定，就在于人物性格的复杂性；每个人都有私心，都为自己打算，行为人格均非十全十美。也因为如此，《红楼梦》中并没有坏人，也无须用道学的角度来评论任何人。但他尖酸辛辣的笔锋，却让这些公允之言很难为一般人领悟。

身为主角，林语堂自然不能幸免于难。不过风波不了了之后，他还是不改利笔，指“在台湾写文章真不容易”；又说，“无意伤及思凡的尼姑，看见一群和尚起来替尼姑抱不平，不亦快哉”，借以自嘲。

晚年曾因《京华烟云》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

在文学的创作上，林语堂主张文章须以“清楚通顺”为第一，不要求摩登，不要讲洋化。他认为新的八股和抽象的写作都要不得，创作必须口语化才能感人；必须跳出传统“做文章”的错误文学观，避免文藻堆砌，才能发挥“自然国语的力量”；要当作家，必须能够对时代起反应。外国文学他推崇的是英国文学，而英国文学的特色就是清楚通顺。

对于翻译，林语堂主张科学作品的翻译应以精确为首要，通顺次之；其他外文译成中文则以“清顺”为要。他有几部英文作品始终没有译成中文，主要也在于还没有找到能清楚通顺的译者。

与大多数中国文学家不同之处，林语堂旅居海外三十余年间，不但作品数量惊人且丰富，而且大部分是以英文写作的小说、传记、散文论著或中国名著的英译，这也让他成为海外知名度最高的中国文学家之一。

除《生活的艺术》（*The Importance of Living*）这本畅销书外，他的三大小说——《京华烟云》（*Moment in Peking*）、《风声鹤唳》（*Leaf in the Storm*）、《朱门》（*The Vermilion Gate*），也在美国洛阳纸贵。介绍中国和印度古代经典的《中国印度之智慧》（*The Wisdom of China and India*），更被美国的大学列为教科用书。林语堂说，他最偏爱的英文著作，是历时三年完成的《苏东坡传》（*The Gay Genius, The Life and Times of Su Tungpo*）。

林语堂来台定居后，转而回到中文领域创作。在“中央社”社长马星野力邀下，林语堂于“中央社”开辟专栏撰文，后集结而成《无所不谈》第一、二集；又出版《平心论高鹗》，讨论《红楼梦》后四十回真伪问题，肯定了高鹗在续成《红楼梦》上的努力与成就。他在轻微中风之后，于香港中文大学主持编纂完成《当代汉英辞典》，其中采用的“上下形减字法”，在台湾取得专利；他还参与世界中文报业协会三千常用字的研讨工作。

1972年10月，耗费五年、厚达一千七百五十页的《林语堂当代汉英辞典》出版，林语堂将此视为著作生涯的巅峰之作。1975年，林语堂被选为世界笔会副会长，同年以《京华烟云》获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

年近八十才戒烟成功

林语堂形容自己是伊壁鸠鲁学派的信徒、享乐主义者，而且“幽默”的形象始终牢牢拴住他。某回他在国外演讲，结束时说，“中国哲人的特色是有话就讲，讲完就走”，果真不回头地飘然离开会场。这足见林语堂的风格与特立独行。

有“笑傲江湖”形象的作家李敖指出，他在台大曾听过林语堂讲授《红楼梦》的考证，林语堂的“玩世不恭之态，溢于言表”，笑嘻嘻的，颇可爱、甚可法，因此李敖从此摇身一变，决定以幽默大师的面目面对世人。

但实际上，林语堂自律甚严，内心有其严肃的一面。大师胡适在林语堂年轻时取笑他是“清教徒”，不但不饮酒、不近女色，还会去做主日学。林语堂的“烟斗”同志、美食作家唐鲁孙说过，林语堂虽然爱笑谈，细细咀嚼他的话，都有高深哲理，而且言行表里如一。

为集中精力创作，教书、演讲、应酬等外务，林语堂是能避则避。曾有记者问他如何写出让读者百看不厌的作品，林语堂的答案很传统：一是写出的东西必须是心得之言，其次是肯用工夫。

林语堂做学问之用心，他的二女儿、《读者文摘》中文版前总编辑林太乙于《我的父亲林语堂》一文指出，林语堂每天早上6点多就开始看书、写作，一直到午后2时；下午休息之后，再从晚上8时工作到子夜，而且林语堂的书房里有二三十部各种各样的字典、辞典和百科全书，偶然碰到不尽知道的字就查。

又如林语堂在西方最畅销的著作《生活的艺术》，不仅成为全美畅销书冠军，在美国《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上更稳居榜首达五十二周，美国印行超过四十版。可是在光鲜外表的背后，却很少有人注意到，林语堂在全书完稿后，仅因为写序言时，感觉原先由批判西方文化入题的方式不甚理想，就把两百多页的稿件全部毁弃重写，才把东方儒家、道家潇洒与积极入世的人生观，写得



1966年，林语堂在台北音乐厅主持“幽默之夜”茶会。

如此传神而富吸引力。

也有友人说，林语堂写作时从不正襟危坐，而是舒舒服服地躺在靠椅中，两脚放在面前的矮桌上，捧着一本硬皮的笔记本，一页写字，一页留白。一杯咖啡，一根烟斗做伴，写累了他就在靠椅中小睡，醒了又继续写。有时他也躲在房里的床上抽烟斗，但从未大意烧坏枕头或被单。

七十岁在香港才与林语堂有深交的国学大师钱穆，曾撰文提到林语堂的一段小故事。他记忆中抗战时在成都初次与林语堂见面，林语堂就是两指夹着烟卷，一面抽烟，一面谈话。烟卷积灰渐长，林语堂谈话不停，手边附近又没有烟灰缸。钱穆一面看着，一面担心若烟灰掉落，将有损主人地上美丽的地毯。林语堂似乎漫不经心，且直到烟灰已长及全烟卷十分之七的程度，“却依然像一全烟卷，安安停停地留在语堂的两指间”。

后来钱穆与林语堂相交久了才了解，“我行我素”只是林语堂的外相，“但语堂另有他内心之拘谨不放松处”，“语堂之幽默，在我认为，尚不专在其



仅抽烟卷之一面，乃更有其烟灰不落之一面”[1]。

不过在林语堂八秩大寿前，因健康的理由，还是毅然戒掉叼了数十年的烟斗。这不是林语堂首次戒烟。不过前一次，他只戒了三星期。

因心脏病突发过世

在家庭生活方面，除了父亲与奶奶外，林语堂毕生感谢二姐美宫。

由于家境不好，林语堂到圣约翰大学的学费是借贷而来，牵累到也从女子中学毕业的二姐林美宫。因男女之别，二姐无法如愿去福州升学，只能下嫁到

①林语堂去台后，宅邸与钱穆住处甚近，两家因此往来密切，这两位原本没有什么渊源、性格差异颇大的重量级文人，竟成了晚年相交甚笃的好友。钱穆的妻子胡美琦说，林家夫妇看起来颇为洋派，但只是性情开朗，无意隐藏自己的情感。林语堂也写过一篇称誉钱穆的文章，肯定钱穆不但是经师，更是不持门户之见的史学家。

山城。二姐掏出四角钱给林语堂作川资，对他说，“二姐是没有希望了，你要好好地读书，要成名”，这让林语堂相当内疚。没想到隔年，怀孕的二姐感染鼠疫病故。此后，只要提到二姐与那四角钱，林语堂都不免流泪，他说，“我青年时所流的眼泪，都是为她而流”①。

林语堂与妻子廖翠凤，一生紧密相依，即使到了老年，两人也不离不弃，文坛传为佳话。夫妇俩有女儿三个，长女林如斯、次女林太乙都走文学路，幺女林相如学科学。生了三个女儿后，林语堂说不在乎传宗接代，廖翠凤就做了输卵管结扎手术避孕。

不过在认识廖翠凤之前，林语堂原钟情于厦门名人陈天恩医师的女儿陈锦瑞。他与陈锦瑞的二哥、三哥都是同学，有近水楼台之便。据林太乙记载，陈天恩不能接受这个不笃信基督教的小伙子，因此将林语堂介绍给厦门富商廖悦发的女儿廖翠凤，这是林语堂第一次受到失恋打击。

与徐志摩和张幼仪的背景相似，林语堂是廖翠凤的哥哥廖照超的好友，两人是圣约翰大学同学，林语堂的姐姐也是廖翠凤在毓德女校的同学。相亲前，家人探询廖翠凤意愿，提及“林牧师家是没有钱的”，但廖翠凤说，“没有钱不要紧”，于是定下这桩好姻缘。

1915年，还是大学生的林语堂与廖家二小姐定亲，但直到两人定亲后四年，林语堂大学毕业、即将留学前，才决定结婚。四年内，两人偷偷通信，被允许在敞开大门的廖家大厅里对坐。两人在欢庆结婚五十年时，廖翠凤还对好友说，当时“未婚夫妇能相对而坐，已经是了不起的开明”。

廖翠凤虽是富家女，但与两袖清风的牧师之子结婚时，就决定婚后生活无论多苦，也绝不向家里要钱。林语堂在美留学时，清华无故取消官费奖学金，二人生活困窘，但廖翠凤始终没有向廖家求救。林语堂曾对朋友表示，廖翠凤没有有钱人家小姐娇生惯养的坏习惯，“她有良好的家庭教养”。唯笃信耶稣的廖翠凤在初嫁林语堂时，对他不信上帝感到十分惊异。

不过林语堂对陈锦瑞那份纯洁的感情始终没有改变，不仅对妻子、女儿从不讳言，在《八十自述》中他意有所指地写道：“我热爱我好友的妹妹。”曾赴美国攻读美术的陈锦瑞，回国常到林语堂位于上海的家拜访。廖翠凤自信地对

①林太乙：《林语堂传》，页15。

女儿说，林语堂是爱过“锦瑞姨”的，但嫁给林语堂的，不是当时看不起他的陈天恩的女儿，而是说过“没有钱不要紧”的廖翠凤。[1]接着她便哈哈大笑，林语堂则不太自在。

1971年，七十七岁的林语堂出现中风初期征兆。在故宫博物院工作的长女林如斯，因为长年抑郁症而自杀，晚年丧女对林语堂夫妇的打击甚大，他们大声痛哭，精神几近崩溃。廖翠凤从此只说厦门话，常呢喃着“我活着干什么”。原本健步如飞的林语堂自此急速衰老，记忆也开始衰退。但他安慰二女儿，“活着要快乐”；他也在文章里讲到，故旧多半去世了，回顾一生无论是成是败，他“都有权休息”。

第二年，林语堂因身心过于疲劳引起十二指肠下垂、溃疡，健康更走下坡。廖翠凤则因精神不佳，只有与住在香港的小女儿林相如同住才比较自在，经常赴港与女儿同住；林语堂却离不开阳明山的“有不为斋”，体力日衰的他只能抱病在台港间奔波。

1975年底林语堂开始坐上轮椅。体力虽衰，真性情仍在。他有一次听到陈家亲戚说，初恋情人陈锦瑞还住在厦门，高兴地直说要去厦门看她。但廖翠凤劝他：“语堂，你不要发疯，你不会走路，怎么还会想去厦门？”[2]

1976年3月23日，林语堂因胃出血送入香港玛丽医院，后因并发肺炎、心脏病突发，于3月26日晚间病逝于香港。4月1日移灵台北，一部《圣经》伴随，长眠于阳明山故居“有不为斋”后园中，享年八十二岁。墓碑由挚友、国学大师钱穆题字。

林语堂过世后，廖翠凤一直住在香港幺女家中，用心整理出《京华烟云》和《林语堂当代汉英辞典》等巨著的手稿，之后存放在台湾的“故宫博物院”。直到1985年阳明山故居原址改为“林语堂先生纪念图书馆”，这些著作和遗物才捐给台北市政府供公开展示。1987年廖翠凤于香港去世。

---

①林太乙：《林语堂传》，页27。

②林太乙：《林语堂传》，页28。

孔子之外最广为西方认识的中国文人

一如众多满腔热血的青年，林语堂早年思想左倾，在东西碰撞的大时代，他原选择了西化这条路，却又发觉，促进中西文化交融是他必须担负的使命，因此毕其一生，都在为中西文化交流而努力。作为中国知识分子，林语堂倾全力将中国文化与精神通俗化地介绍给西方世界，是他毕生的功业。

林语堂晚年选择到台湾定居，但他并没有迷失自己的方向。尽管蒋介石对他极为礼遇；宋美龄还在林语堂夫妇八十双寿时，为文赞誉林语堂具有多方面的卓绝才华，是一位“十足完美的文明人”，但他始终与官职保持距离，一度婉辞“考试院副院长”的职位。

林语堂著作等身。在中文的文艺创作方面，早在20世纪30年代上海，他翻译“幽默”一词，创办《论语》、《人间世》、《宇宙风》半月刊。虽然作品不多，但《论语》半月刊，以“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为编写尺度与态度，提倡幽默文学，形成一股风潮，“幽默大师”的美誉自此加冕在林语堂身上；《人间世》提倡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笔调，倡导性灵文学，成为中国第一本纯散文小品刊物；《宇宙风》半月刊则以畅谈人生为主旨，以言必近情为戒约。这些都让林语堂在中国文坛占有相当分量。

这些提倡贴近人生的刊物，或许在现代社会不足为奇，甚至早已成为畅销书必备的要素，但20世纪初深受传统的束缚，过往中国社会对文章“文以载道”的要求，依旧深深影响着文艺工作者；纯情的新月派、左倾的创造社，虽然让中国文坛大鸣大放，却门户森严，笔战激烈。在这样严苛的环境限制下，林语堂于内师法清代名士袁枚等人，于外推崇美国作家马克·吐温，以幽默的笔调写出寓意深远的文章，的确开启了中国文学新局。

然而他对中文世界影响最大的贡献，莫过于创造了“幽默”二字。

他自己曾说过，“幽默”的意思或与“风趣”、“谐趣”相当，但是英文中的humour多指一种作者或作品的风格，译意仍不如译音的直截了当。但同样是译音，译法可有十数种，当时有人建议译为“语妙”，兼顾音与义，不失为一种选择。林语堂也认为不无可取。

为何使用“幽默”这两字的组合？林语堂认为，“凡是善于幽默的人，其谐趣必愈幽隐，而善于鉴赏幽默的人，其欣赏尤在于内心静静的理会，大有不可与外人道之滋味，与粗鄙显露的笑话不同，幽默愈幽愈默而愈妙”。

最后还是“幽默”在中国生了根。

“幽默”不仅加入中文的形容词家族，而且在中国语言里继续繁衍。现代人说“你刚才幽了他一默”，将“幽”与“默”变成动词与名词，已远超出英文 humour 的用法，这可是林语堂始料未及的。

译了“幽默”一词，其后主持《论语》半月刊时以撰写幽默文学闻名。成为大师级人物后的林语堂，每回亮相手里老端着烟斗，仍是想说就说、想笑就笑，使得外人对林语堂的印象总离不开“幽默”二字。夫人廖翠凤曾说自己原是很严肃的，但夫妻日久相互影响下，也越来越能接受幽默。

林语堂说过，“凡做什么事，我一生都不愿居第一的”。有趣的是，中学和大学毕业，他的成绩都是第二名。他说向来喜欢自由看书，对功课不耐烦，也不肯认真；他的兴趣广泛，迷机械，好代数和几何，对自然科学和地理学有兴趣，但讨厌积分；当物理老师或英文老师都曾是他的志愿，不过如愿当英文教师后，他又投入中国古典文学，且着手改革汉字索引的方法，并率先在《新青年》上发表《汉字索引制说明》，获得蔡元培与钱玄同的声援。

为实现抱负，林语堂曾主张为整理汉字应彻底废除部首编排，因此二十三岁发起部首改变运动，自三十岁发表“汉字号码索引法”开始，又陆续研究出五种检字或拼音法，包括知名的简易输入法，但终究未能全面普及于华人世界。

至于林语堂所编的《开明英文读本》和《开明英文文法》，更在 20 世纪 30 年代起风行全中国，成为中学生学习英语的基本教材。只是此间仍有评论家指出，若论编纂英汉字典的功力，梁实秋依旧略胜一筹，林语堂所编的《当代英汉辞典》普及率还是比不上梁实秋所编的《远东英汉辞典》。

细观林语堂的艺术性格，不难发现他的情痴与文人特质，不难想象他为《浮生六记》中的陈芸、《桃花扇》中的李香君流泪的真情，他甚至肯定《浮生六记》是真正的旷世巨作。

在浪漫之外，现实中，林语堂是极少数成功将中华文化介绍至西方的中国学人。早在青年时代，林语堂即将萧伯纳的《卖花女》译成中文；又由于

林语堂学贯中西，不仅能以英文创作，还以英文形式将中国古典名著介绍给西方读者，他曾被西方社会誉为除孔夫子外，另一位最广为西方人认识的中国文人。

论林语堂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应如美国《纽约时报》报道他逝世消息时所述："林博士以渊博的西方知识，导引他的国家和人民旧有观念现代化。"又如日本《每日新闻》所形容：林语堂"对于让外国人了解中国以及中国文化，所作的贡献，超越十名大使的价值"。更有人称许他最擅长"向西方人讲中国文化、向中国人讲西方文化"。

"酒店关门时，我就走"，林语堂生前十分欣赏英国首相丘吉尔这句话。他认为，人生在世好比在小酒店独酌，但是酒店总要关门。他曾说，"生命的目的就是要享受人生"；人"终必一死，终于会像烛火般熄灭"，不过更重要的是，人"虽然知道生命有限，仍能决心明智地、诚实地生活"。这就是林语堂式的豁达。

蒋梦麟

Jiang Menglin

经世济国与晚年孽婚

1994年，台湾诸事不顺，尤其让负责农业和林业的“行政院农业委员会”伤透了脑筋：死猪肉贩售风波；强烈台风致山区严重泥石流；口蹄疫爆发，不得不宰杀上万头猪；高尔夫球场开发导致水土保持争议……诸多问题折腾，官员研究了半天，觉得问题出在“农委会”的风水不好，终于决定从尘封的仓库里抬出“农委会”创会祖师——有“台湾现代农业之父”称誉的蒋梦麟铜像，坐镇“农委会”一楼大门，希望这位对台湾土地与农业最有贡献的学者，能一改“农委会”的衰运。

就像国民党主席连战在国共第三次会谈前，于北大的演讲中提到，1949年后“北大好多好多的老师跟同学们好像种子一样，跨洋过海到了台湾，尤其到了台湾大学，把自由的种子带到那里去，在那里开花结果”。除了提到傅斯年与胡适外，连战没忘了提醒北大学生，一位赫赫有名的

北大校长也到了台湾，在台湾发光发热，这就是史上首见三度代理北大校长，并为北大开创基业的蒋梦麟。

前半生以北大校长身份享誉学界，后半生随国民党播迁去台，蒋梦麟没有太多的时间清谈。这位曾以孙中山秘书身份协助创造实业计划的留美学者，借着推动土地与农村改革，具体实现了孙中山“均富”、“耕者有其田”的理想，低调地成为所谓台湾奇迹的奠基者，为台湾的农业发展、山林保护、水利建设奠定了坚实根基。

从 1950 年开始，蒋梦麟主动挑战保守人士，在舆论挞伐下，坚持推动人口节育政策，全面抑制人口增长速度，以求经济快速成长，甚至不惜以个人生命辩护；最终以独立超然的学者地位，说服了蒋介石等人，在台湾逐步推动家庭计划以抑制人口增长速度。在蒋梦麟过世后，相关政策执行长达二十年，台湾施行家庭计划绩效世界驰名，生育率由 1961 年的 5.6%降到 3%以下，避孕率超过 90%。

欣赏老子“功成而不居”胸襟的蒋梦麟，为人处世也如同自己信仰的准则，始终低调而不愿居功，也不愿出些贪图浮名的风头，这让他即使身居官场，都能维持极佳的人际关系。蒋梦麟办事精细、干练，是个具高度自信心、对自己理念坚持到底的人。他自幼即不满教会学校刻意推动宗教教育。北伐后在担任国府教育部部长期间，蒋梦麟立即废除宗教教育课程，关注学校课程安排；也对大学合并、管理问题毫不放水，以至于得罪了一大批国民党大老，质疑他管得太细、太繁、太不留情面，连吴稚晖都批评他“无大臣之风”。

只是讲究实事求是的蒋梦麟，对此封号甘之如饴，足见他的修养与心性。深受杜威实验主义熏陶的蒋梦麟，对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更强调必须放弃“万灵丹”的想法，必须看得远、站得稳，一步步前进再前进，这也成了他一贯的为政与处世之道。

孙中山文胆　三度代理北大校长

蒋梦麟，原名蒋梦熊，字兆贤，号孟麟，笔名唯心，浙江余姚人。1886 年 1 月 20 日出生于浙江余姚县杭州湾旁蒋村。祖父曾在上海经商，经营钱庄，但

早逝。钱庄有赖蒋梦麟的外祖父扶持而得以继续经营。蒋梦麟父亲蒋怀清仍是地主，也是钱庄股东，经常往来上海，家庭生计无虞。因为颇早接触洋务，所以蒋父期待儿子能接受西方现代教育。

蒋梦麟是家中幺儿，母亲毛氏早亡。他六岁进私塾接受科举教育。但蒋梦麟个性活泼好动，相当不适应。十二岁时，蒋梦麟的父亲送他入蔡元培主持的绍兴中西学堂就读，①同时接受经学与西学教育。两年的时间为蒋梦麟打好了学术底子，了解西方科学实验的认知方法。直到盗匪横行后，他才因举家迁徙上海而辍学。他在上海初步接触英文。居住两年后，又因为义和团之乱迁回浙江。后曾一度入杭州的教会学校学习英文，但因为对教会强制的宗教教育排斥而与全体学生一同退学。

蒋梦麟之后一度加入由学生自组、由章太炎命名的“改进学社”就读；随后于1901年考进浙江省立高等学堂，但因为先前参加学潮，被列入黑名单，所以就读时改名蒋梦麟。当时他对兴办《新民丛报》的梁启超与鼓吹革命的孙中山相当佩服，但仍认为革命困难而遥遥无期，并认为做官可以光宗耀祖，是向上层社会爬的阶梯，所以决定继续参加科举；1903年，十八岁的蒋梦麟考上秀才，仍继续在浙江高等学堂就读。

蒋家原希望蒋梦麟继续科考入仕，但已接触新知识甚至革命思潮的蒋梦麟，内心矛盾与冲突已让他把目光放在出国攻读西方科学上。他评估西潮不可抵挡，因此积极准备赴美留学，先参加现今上海交通大学的前身上海南洋公学入学考试并得以通过，就读两年，为赴美留学做准备。

当时因为日俄战争结束，日本获胜，许多留学生主张通过日本向西方学习，纷纷劝说蒋梦麟留日求学，但他仍坚持赴美留学。②由于未考取官方公费，他于1908年8月拿着父亲资助的数千元学费，前往加州大学留学。取得硕士学位后，于1911年转往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教师学院攻读博士学位，师从于实验主义哲学大师杜威多年，钻研教育学。1917年，三十二岁的蒋梦麟以《中

①曾自称自己有绍兴师爷性格的蒋梦麟，在《新潮》一书中提到当时绍兴有三大名人，其一即为当时的中西学堂校长、翰林出身的蔡元培；其二是为反清革命牺牲的举人徐锡麟，是蒋梦麟在中西学堂的算学老师；其三则是在绍兴中学担任教务长的鲁迅。

②蒋梦麟在南阳公学期间，曾应浙江中西学堂友人马子夷、陈伯平之邀，原打算赴安庆参与徐锡麟起义，但蒋家亲属则劝蒋梦麟赴日一游，因此他在日本停留一年后才返回浙江，却也因此逃过一劫。

国教育之基本原理》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

蒋梦麟返国后，先在上海商务印书馆担任编辑，兼任江苏省教育会理事。隔年在上海创办《新教育》学刊，与北京的《新青年》遥相呼应。在旧金山曾出任革命党媒体《大同日报》主笔的蒋梦麟，此时还为写作《实业计划》的孙中山搜集资料、参阅英文稿件。

1919 年发生五四运动，北大校长蔡元培力保学生免受军阀逮捕，为学生爱国运动开了先声。但随后一次次游行示威与抗议，学生与北洋军阀冲突越演越烈。蒋梦麟在这段时间也参与了工商学报联合会，支持罢工罢市。为抗议北洋军阀肆意逮捕游行学生，蔡元培于 7 月 23 日愤而辞职回到杭州，并推荐三十四岁的蒋梦麟北上代理北大校长职务。①个性持重的蒋梦麟在风雨飘摇之际稳住了局面。直到蔡元培复职后，蒋梦麟转任北大总务长，并正式进入北大教授教育学。在 1920 年蔡元培赴法访问期间，蒋梦麟再度代理北大校长。②

1923 年，蔡元培不满北洋军阀干预司法独立，再度离京赴欧，因此北大三度由蒋梦麟代理校长。③期间蒋梦麟历经艰难困境。1926 年 3 月 18 日，段祺瑞执政的北洋军阀政府开枪镇压学生运动，造成死伤。知名报人邵飘萍等人在《京报》连续对北洋政府提出批判，竟被诱出东交民巷遭逮捕枪毙，引发轩然大波。在这一拨镇压行动中，蒋梦麟也被列为逮捕对象，因此他避居“六国饭店”，以假身份经北京搭船到上海，才躲过一劫。

---

①蒋梦麟曾说，当时蔡元培要他回北京后转达，仍有回北大决心，也愿为北大负责。至于蒋梦麟则要求，他此行是代表蔡元培个人而非北大，同时仅为蔡元培监印。蒋梦麟执掌校务后，据罗家伦回忆，蒋梦麟在对学生演讲时就已提到救国之道在于增进文化的基础工作，以自己的学问为立足点。这也成为蒋梦麟的教育方针。期间蒋梦麟力邀杜威与罗素来北大担任客座教授，引起中国知识界轰动。

②蒋梦麟曾回忆，他代理校长任内，李大钊任校长室秘书主任兼图书馆主任，因此素有往来。他形容李大钊像是旧式士大夫，有责任感、忠心、温和厚道。他也回忆，当初李大钊向他提起想帮毛泽东在北大找个职位。两人商定后，他写条子，才派了毛泽东图书馆书记工作，月薪十七元。参见蒋梦麟：《新潮》，致良出版社，1990 年，页 120。

③当时北京八所大学因面对北洋政府以不再供应经费相逼，因此采取“不合作主义”，不承认北洋政府的教育总长，并联合关闭学校。但蒋梦麟任内坚持蔡元培的学术自由与独立精神，主张北大办学绝不能中断，并努力提升北大学术与科学教育实力。但当时军阀势力强大，加上左派学生不满国民党与蒋介石，不时在校园中抗议，维持北大的经费又相当吃紧且受军阀钳制，让蒋梦麟相当为难。

1927 年 4 月，蒋介石的北伐军定都南京，随即任命蒋梦麟为浙江省府委员兼教育厅厅长，稍后又任命他为第三中山大学（即浙江大学的前身）校长。1929 年蒋梦麟出任国府教育部部长，任内他推动国语教育，废除文言文，积极要求金陵、沪江、圣约翰等教会学校立案登记，同时撤销宗教科目。基于对三民主义的信仰，蒋梦麟首倡党化教育，其后却为了中央大学校长人选、劳动大学停办问题，得罪党国要员，愤而辞职抗议。

蒋梦麟离开国民政府后，胡适等人原希望他重回北大主持校务，但日军进逼，办学条件严苛，蒋梦麟意兴阑珊。在傅斯年与胡适奔走下，北大获得协和医院与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支持，得以扩充装备，才让蒋梦麟于 1930 年正式接任北大校长。虽然蒋梦麟积极推动学术研究，创立多项制度，又邀聘徐志摩、梁实秋、周作人等出任研究教授，但日军侵华势力猖獗，企图推动冀察特殊化，随时可能用兵；蒋梦麟也时常被“请到”日本宪兵队约谈，甚至被列为应予逮捕名单。

1937 年后，日军全面侵华，抗日战争爆发。北大、清华、南开先迁往湖南，在长沙合组临时联合大学。但因南京被日军占据，长江中下游震动，蒋梦麟面见蒋介石，建议联合大学西迁到云南昆明，因此 1938 年，西南联大在大后方成立。只是北大多有旧人认为联大有损北大的地位与利益，蒋梦麟在抗战期间又未积极主持校务，而多由清华大学的梅贻琦代掌；加上部分北大教授与蒋梦麟的妻子陶曾谷不和，因此对蒋梦麟颇不满。不过蒋梦麟的代表作《西潮》正是在这段时期完成，并于美国出版。

由学转政　出掌农业

1945 年初，蒋梦麟受甫担任行政院院长的宋子文之邀，担任行政院秘书长。由于违反他先前手订《大学组织法》中关于官员不得兼任大学校长的规定，引发北大人士骚动，纷纷要求蒋梦麟去职，由在美国的胡适接手。最后在傅斯年、朱家骅力劝下，蒋梦麟决定离开学界，于 1945 年 9 月辞去北大校长职务，改由胡适接任；又因胡适仍有驻美大使身份，因公滞美，因此由傅斯年暂代校长一职。

蒋梦麟有心往政界发展，其实有迹可寻。除了与蒋介石、宋美龄、陈诚以及国民党人士的交情外，早在 1933 年，日军进犯长城防线，在蒋介石的默许下，蒋梦麟与何应钦、胡适、丁文江聚会后决议，由蒋梦麟出面探访英国公使蓝浦生，探询可否安排中日停战谈判。虽然最终因为英国使馆探询外交部，得到蒋梦麟所言应属“个人意见”而作罢，但国民政府初步摸清日军的动向后，随即派出黄郛签订了《塘沽停战协议》。[①]

1941 年，蒋梦麟除主持西南联大校务外，也兼任中国红十字会会长，数度往滇缅等地视察红十字会业务，亲自揭发军队拉夫的流弊；[②]在重庆大后方期间，常出席外交等官场应酬活动。因此蒋梦麟入阁，并不让人讶异。但胡适在从美国返国前，还是不死心地写信劝蒋梦麟辞职，重掌北大。

接任行政院秘书长后，蒋梦麟当选国民党第七届中央监察委员以及国府国大代表、地方行政委员会委员、善后救济报告委员会委员、最高经济委员会委员。1947 年 3 月，宋子文辞职，蒋梦麟也随宋子文离开行政院。其时国民党政府僵化，政务难以推动，让蒋梦麟感到遗憾。1948 年，蒋介石又委由他出面主持中美联合组成的善后事业保管委员会，统一管理联合国在抗战后期的援华剩余物资以及相关工业工作。

同一时间，蒋梦麟出掌国民政府在农业工作的职务，成为他一生最终奋力实践的志业。1948 年 8 月 5 日，六十三岁的蒋梦麟接受蒋介石任命，在南京接掌同样由中美两国合组的“中国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简称农复会）”，成员包括蒋梦麟、平教会负责人晏阳初、农林部农业试验所所长沈宗瀚以及美方专家穆懿尔（R. T. Moyer）、贝克（J. E. Baker）等五人，蒋梦麟任主任委员。

一如蒋梦麟自己的追忆，中国以农立国。他出国留学时，就怀抱着改良农业以救国人的精神，首先进入加州大学农学系就读；半年后思想转变，认为中

①吴湘湘：《民国百人传》，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71 年，页 88。

②蒋梦麟借着红十字会运送医疗物资的机会，深入边远山区，看到了拉夫的残酷。他甚至估计，抗战时期有超过一千四百万名壮丁未入伍而死于拉夫。他返回重庆后，给蒋介石写了封报告信，揭发其中残酷的流弊。原本陈诚认为蒋梦麟此举太容易得罪人，愿为他分担责任，提出亲自为蒋梦麟转信的主张，但蒋梦麟最后决定独力承担政治风险，因此自行上书。蒋介石接获报告后随即查办，最终并枪毙了从中牟利的高官。蒋梦麟：《新潮》，页 41。

国必须先解决政治与社会问题才能有效复兴，才改念社会科学，进入社会科学院教育系，副修历史与哲学；又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教育学博士，希望从政治、社会角度，彻底解决中国面临的农业问题。

在观念上，蒋梦麟对孙中山的“均富”思想十分认同。早在1910年，还在加州大学研习社会科学的蒋梦麟，就与赴美的孙中山在旧金山晤谈。孙中山一度希望蒋梦麟能协助翻译《议事规范》等书籍，好让完成民主革命的中国推动民权革命之用。蒋梦麟返国后，又与余日章、宋庆龄一同协助从广州移居上海的孙中山，用英文写作《实业计划》，因此蒋梦麟对孙中山推动中国富强的概念以及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的理念，自然知之甚详。[①]

“农复会”的概念与经费源于晏阳初于1948年初出访美国时，争取到美方允诺每年在援华四亿元的经济援助款项中，移拨百分之五至百分之十用于中国农村复兴与建设用，并由中美合组委员会管理。作为学界泰斗、北大老校长的蒋梦麟，自是蒋介石与同侪眼中的得力人选。

不过蒋梦麟自述，当时蒋介石约他到官邸一叙并交办任务后，他先是担心“农复会”与善后事业保管委员会的工业建设会无法兼顾，也担心国民党政府无法全力支持。[②]蒋介石先是强调，农工建设不能分离，所以要蒋梦麟同时担起两份责任；他也允诺全力支持蒋梦麟推动的土地改革方案，并从无锡等地展开试点，一切由蒋梦麟全权负责，国民政府甚至可以派兵“打老虎”、支持土地改革。之所以选择无锡试点，是因蒋梦麟考虑到无锡已有轻工业基础，推动土地改革不至于遭到地主太激烈的反对；即使需要用兵，从邻近的南京调兵弹压也比较容易。对于此行，蒋梦麟甚至以“与虎谋皮”来形容其大不易。

作为非官僚体系的“中国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农复会）”，“联合”代表平等合作，不但体质特殊，属于中美共管，并非单纯遵行美国或台湾当局的指令办事；同时决策属于专家讨论议决，也不同于一般政府机关，一切都必须尊

---

①蒋梦麟也提及，五四运动发生时，他将北上代理蔡元培职务，孙中山勉励他“率三千弟子，助我革命”；日后杜威来华访问，也是由他引荐杜威到上海与孙中山晤谈。孙中山去世前停留在北京铁狮子胡同顾少川宅时，蒋梦麟也曾亲往探视，但当时孙中山已无法开口说话。蒋梦麟：《新潮》，页71。

②蒋梦麟：《新潮》，页24。

重各专家组的专业意见。

相较于晏阳初主张先扩大农民教育再推动农村经济，初期“农复会”的专家群显然主张先以科学方法抓增产，改革农村不合理的土地产权分配，再配合推动农村教育。蒋梦麟不但将孙中山的土地改革主张放在行动纲领中，更表明土地改革、人口问题、农民组织才是他在“农复会”的主要工作与大方向，也需要花较多时间来思考、研究。至于其他的行政事务与措施，一如农复会“秘书长”蒋彦士所描述，蒋梦麟一向“琐事不管，公事不看”，争议或政策则由专家共同讨论议决。

获得蒋介石的同意与经费支持后，“农复会”展开一系列试点计划，第一步就是在各地实施“二五减租”，让现有租金直接减掉百分之二十五，保障佃农权益，并在湖南、广西、广东、云南、四川等地设置办事处。蒋介石委由蒋梦麟等人到全国农村考察，兼而宣传国民党政府的农业与土地政策。

只是虽然蒋梦麟提出了公平分配与科学增产两个方向，并力主须以均富作为终极的农业政策目标，但失去民心的国民党已无力回天，迅速地失去政权，无锡等地的试点一直没有实现。蒋梦麟回忆，他在地方考察时，曾发现在地方出现“伪土地改革者，杀”的标语。[①]蒋梦麟因此一度先到台湾巡视，与当时的台湾省主席陈诚、财政厅厅长严家淦研究“农复会”迁台事宜，并获得陈诚允诺在台湾全面推动土地改革。在四川、广西等地为农改考察奔波后，蒋梦麟于1949年秋天搭包机离开大陆，飞往香港。

推动土地改革　实践均富理念

抵达香港后，蒋梦麟一度闭门谢客，动向不明。美国第七舰队协防台湾海峡后，蒋梦麟也搭包机去台。[②]

抵台后，蒋梦麟在“农复会”的工作面临巨大困境，这当然与“农复会”的合组性质有关。美国不满蒋介石政权，一度打算袖手旁观，各项援助工作中

---

①蒋梦麟：《新潮》，页16。

②马勇：《蒋梦麟传》，河南文艺出版社，1999年，页330。

断，年度拨放的预算改为六个月给付一次，随时可能生变。美国相关机构还打算逐步撤离台湾，这不但让播迁后气势衰败的国民党惊讶而尴尬，海峡局势更显得混乱。担任“农复会”美方委员的专家穆懿尔，兼任美国合作分署代表。美国经合总署授权穆懿尔可随时依政局变化关闭“农复会”等单位，撤离美方人员，且不负责台方“农复会”人员的安全与协助撤往美国，可见情势的紧张，遑论开展“农复会”业务。

事情如麻，非仅美援一项，如何让蒋介石率领的“国府”政权获得合法性与正当性，成了内政外交的棘手难题。蒋梦麟受蒋介石委托，以参加“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董事会议名义前往美国，真实目的是企图说服以就医名义流亡的李宗仁尽快放弃“代总统”职务，让已经通令下野的蒋介石能够顺利复位。赴美期间的“农复会”主委职务由美方委员穆懿尔暂代。蒋梦麟此行带着白崇禧的亲笔信，劝李宗仁返台或放弃“代总统”职务。不过见面后，李宗仁无任何反应，反而在美国继续批判蒋介石，让蒋梦麟十分尴尬。①

处于惊涛骇浪中的蒋介石，为争取美国援助，除重用与美国关系深厚的“陆军总司令”孙立人外，并在美方暗示下，迅速撤换陈诚的台湾省主席职务，让立场亲美的吴国桢接任，政坛议论纷纷，也使得素与陈诚友好的蒋梦麟，对蒋介石的固执己见深感不满，忍不住在“驻美大使”顾维钧面前抱怨。直到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美国恢复对台援助，台湾局势趋于稳定，蒋梦麟才返台长期担任“农复会”主委职务，执掌农业工作。

“农复会”下辖土地、水利、农业、畜牧、肥料分配、农民组织、卫生七个组，几乎统管台湾所有农业奠基工作。为争取基层农民支持，巩固国民党统治基础，蒋梦麟取得蒋介石的尊重与授权，全面展开土地改革工作。两个主要发展方向是“生产与分配并重”、“农工平衡发展”；基本理念还是孙中山所倡议的“均富”目标。

当然美援的态度也直接影响“国府”的政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为对付共产党力量，美国在太平洋地区鼓励各国推动土地改革。美国在“中美经

①李宗仁赴美，蒋介石在台掌控党政军大权，顺利就任“中华民国总统”。1952年，“监察院”通过对李宗仁弹劾案，1954年正式罢免李宗仁“副总统”职务。李宗仁则于1965年返回大陆，三年后病逝。

济援助协议”中，规定实施土地改革是“农复会”的业务之一；美国国会通过的“共同安全法案”，也规定土地改革与改善教育卫生列入技术合作项目，作为计划型援助。

蒋梦麟在《新潮》一书中指出，“农复会”的主要工作，一方面是推动公平的分配，另一方面是推动科学增产。如果没有公平分配，增产只会贫者越贫、富者越富，反而造成社会纷争；不谈增产只谈分配，只是均贫而非均富。因此均富目标是要实现公平分配而非平均分配，兼顾生产与公道，这正是蒋梦麟的基本理念。至于如何推动公平分配，就是要实施土地改革，落实“耕者有其田”，彻底打破现行租佃制度的不公平分配机制。①

受美国社会科学熏陶，杜威门下的蒋梦麟，很清楚在推动大规模土地改革时必需的完整配套与科技、统计支持条件，因此他先改组台湾的农会组织，让农会由日据时代的地主与日本政府主导，为收购粮食而设置，肩负指导农业生产任务的联合性垄断组织，变为农民自发性活动互助单位，②为台湾社会的整体发展，甚至国民党深入农村的统治基础，奠下根基。

蒋梦麟始终主张，农会不能离开农民；农会应协助推行政策，不能让农会变成政府的衙门。在蒋梦麟的建议下，“行政院院长”陈诚决定把农会与农业金融合作社合一，让农会去除生产目的单位的角色，而能提供农民适当的小额贷款。在蒋梦麟积极推动下，台湾迅速建立了以省农会为最高单位，下辖二十二个县市农会、三百二十四个乡镇区农会、近五千个农业小组、基层会员达七十万人的农村管理互动体系。他推出决定农会具体决策的理事全数须由农民出任的硬性规定，以保障农民参与权利。但农会总干事则可依专业知识需求而外聘，以求农会成为经济合作组织而非政治组织。

此外，蒋梦麟了解，想实施土地改革，最辛苦的工作在于土地总归户，借以确定土地产权归属关系。经“农复会”专家规划，前后动员两千八百多人，经一年半工作，耗资台币四百多万元的巨资，填写了六百五十万张卡片，终于能落实查核八十二万笔、总计二十六万公顷的出租地。这也让蒋梦麟能腾出手，继续推行“三七五减租”、“公地放领”与“耕者有其田”等政策，全面落实土地改

①蒋梦麟：《新潮》，页13。

②蒋梦麟：《新潮》，页15。

革。

1951年，由蒋梦麟任召集人的“行政院”设计委员会，共推三个草案，希望全面推动土地改革。其中获得采用的，即为1952年中推出，强调“耕者有其田”的限田办法。根据此一办法，地主仅能保留最多二甲水田，且非自耕农不得保留；已放租土地须依“三七五租约”，租金最高以收获百分之五十再打七五折，亦即收获的百分之三十七点五给付地主当做地租，同时承租耕地除非佃农放弃，地主不得收回；至于地上物可经承租人请求附带征收。

蒋梦麟表示，如不限田，将使富者越富，此举绝对有利于农民生活、增产，让社会经济趋于安定。在他主张下，台湾当局推动“公地放领”，公有土地直接卖给佃农耕种，地价规定为耕地主要作物收获量的两倍半，并分十年摊还地价，一举造福十四万佃农成为自耕农。此外，政府主动收购地主土地，借着发行土地债券、出让公营事业股票等补偿方式，推动工业投资以及资本流动，影响面积约五十万公顷。这正是孙中山的“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理念的具体落实。

美援的支持与持续投入，让“农复会”有较多的经费可以从事相关政策补贴；加上蒋介石与陈诚的支持，更使得蒋梦麟的土地改革无后顾之忧，顺利分三步走，温和地解决土地产权与租赁的争议。

蒋梦麟指出，中国土地问题争议两千年，与历代兴亡关系最大，兼并之风使百姓受害，史有明鉴，因此孙中山首先提出“耕者有其田”的构想，将一举解决土地改革问题，也就是“土地主权国有”，但“所有权为民所有”，并归于耕者。①

科学增产　培育人才

蒋梦麟日后多次强调，为了避免日本实施土地改革时的流弊，相关措施按三民主义设计推动，比起日本限制非自耕农、地主保全土地的做法要温和，更能避免日本发放债券，却因通货膨胀失去补偿意义的弊病。发放实物土地债券，

①蒋梦麟：《新潮》，页29。

能同时造福农民与原土地持有人；土地债券与公营事业股票各半给付的措施，则是为免刺激通货膨胀，以求促进社会经济良性循环。简言之，即是采用温和主义，避免清算斗争。

至于公营事业股票偿还地价所引发的问题，蒋梦麟主张在估价、流动资金、筹措技术等方面寻求改进并具体落实。他疾呼，限田是有饭大家吃，让农地转成资金，朝工业发展走。农业未来要继续增产，配合科学技术的应用，全力增产，达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的目标。

在初步解决公平性的社会分配问题后，蒋梦麟的注意力开始转移到与科学增产有关的各方面配套条件完善工作上。由于逐年拨放的美援改为长期性计划，国民党政府成立“美援物资相对基金”，加速农业与经济发展，农复会预算渐渐宽裕。除积极增强林业工作外，蒋梦麟也把较多预算放在培育人才与改善农业环境等工作上。

在美国协助下，蒋梦麟于 1954 年成立仿效美国“四健会”的组织工作，诉求训练农村青年脑、身、心、手的健全、健康，训练大批农村青年掌握先进的科学技术与经验，以求改善农村境况，成员近万人。他指出，科学方法增加生产、推广科技就是“四健会”成立的目的。这批台湾未来农耕服务队的先驱，在“农复会”的协助下，成为将先进农业技术推广到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农技种子部队，俗称“草地大使”。蒋梦麟更要求这批农业专家，绝不能坐在办公室空想问题，而必须亲自抽出时间与农民直接沟通，了解农民需要。

为了推广农业的信息，蒋梦麟在“农复会”首创台湾光复后第一份杂志《丰年》。为吸引农民的注意与阅读，《丰年》创刊时打破了国民党政府的禁令，采用中日文合刊的方式印行，直到三年后，认为推广中文已见成效，才逐步改为全由中文发行。为了让农民有兴趣阅读，《丰年》不但字体较大，并且邀请名画家绘制漫画，提高读者兴趣。各项农业领域的重要措施，都是《丰年》报道

的重点。[①]

此外，蒋梦麟主张，农民最需要的就是减租与土地改革；其次是水利；至于在肥料与防治病虫害方面，台湾地域狭小，不比大陆，问题影响深远，必须格外重视。他在多次环岛实地考察后强调，中国历史上始终没有做好森林保护，所以水患频仍，影响农业生产，必须把保护森林列为农业重点工作。他认为，植林是技术问题，只要有经费、有专家就能办到；保林则是立法、行政、司法执行管理的综合问题，要处理好相当不容易，但社会发展不能与天争地，保护森林才能保护子孙，追求短期利益将造成永世后患。

在蒋梦麟的推动下，"农复会"编列大批的造林、保林经费，法定保林并禁绝滥垦滥伐，以免破坏森林育成，使水土失去均衡。他强调，保林出问题势必导致水利与农业受牵累，也将影响工业建设；森林是台湾的生命线，必须把基础打好，毕竟台湾耕地面积仅占土地的四分之一，其余为山地，有开发上的压力，保全山地、发展林业才是为长远计。他力主开发台湾西部沿海海埔新生地，借新建设为退伍军人与一般工人提供工作机会；同时开发山中荒地，便利交通发展，以台湾独特的农业条件寻求农业发展。

另一方面，蒋梦麟对水利建设的关心，逐渐落实在具体的建设项目上。1955年，国民党政府经反复讨论后，决定在桃园县石门峡谷兴建水库，集合相关部门设置筹备委员会，预估经费约新台币一千两百万元。为表示对这个重大建设的重视，筹备委员会由陈诚担任主任委员，蒋梦麟、尹仲容、严家淦等执掌台湾农业、产经、财政的重要财经官员共四人出任常务委员。

年届七十的蒋梦麟也为石门水库数度赴美争取美援预算。石门水库兴建的原始经费是以实施"耕者有其田"后，农民购地而交还的地价款项为主，再加上美国开发基金贷款美金两千一百五十万元，且由美国安全分署提供工程协助。

---

①《丰年》的名称也引发了一番争论。包括蒋梦麟在内的"农复会"干部，都主张这份"农复会"的机关报应该取名"宝岛"，但在"美国大使馆"担任新闻处处长、身兼《丰年》执行编辑的美国人许伯乐，却从中文出发，以备忘录的形式提醒，"宝岛"因袭自日人的称呼，易被曲解；同时"宝岛"泛指台湾全部，无法专指农业、农村；再则"宝岛"可能会有鼓励迷信、不自食其力的负面影响，因此他坚持新刊物应命名为"丰年"。蒋梦麟最后也从善如流，接受了这份专业意见。钟博：《传记文学》，第六十四卷第五期，页78。

1956年7月7日，攸关台湾发展的两大重要建设——中部横贯公路与石门水库同时开工，石门水库成为台湾北部最大的水利工程。期间陈诚因担任“副总统”兼任“行政院院长”，为免物议，辞去主任委员职务；1958年8月后改由蒋梦麟出任主任委员，他把大多数精力与时间放在建设石门水库上。[1]五年后，石门水库基本建设完成，并转交台湾省政府石门水库管理委员会管理后，才改由台湾“省主席”黄杰接手。

蒋梦麟执掌“农复会”以来，1949年推动“三七五减租”，1953年践行“耕者有其田”，完成整体土地改革与农业转型重要工作；担负起四年一度的台湾农业计划的规划与推动工作；并建立起一支专业农业大军，以农村技术交流为主力，协助落后国家推动农业增长，前往各地农村访问交流。

由于农田水利与教育工作的杰出贡献，蒋梦麟在1958年8月获得第一届菲律宾麦格塞塞奖政府服务奖[2]，奖励他借土地改革、组织农会积极改善农村生活的贡献与努力。

蒋梦麟也主张，台湾必须推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四大建设。在经济建设方面，须开拓农工产品外销市场；政治方面要简化政府机构，提升办事效能，专职专责；并应全面提升国民知识水平，才有助于台湾进一步向上提升。

为了人口节育不惜被杀头

在国民党迁台初期，台湾工业并不发达，为刺激工业发展，采取农业贴补政策，稻米等农业生产大批销往岛外，换取外汇。蒋梦麟的“农复会”曾推动节省大米，改吃甘薯的措施，搭配军队大米减量，改用甘薯填补，并推广以甘

①石门水库导水隧道工程于1960年完工，解决了一大工程障碍，也是水库迈向正式运作的重要里程碑。不过向来强调办实事的蒋梦麟，没有安排任何庆祝仪式，反而选择邀胡适一同在水库周边的桃园县角版山游览、避寿。

②雷蒙·麦格塞，出身寒苦，曾当过汽车修理工，于1953年当选菲律宾总统。于1957年3月17日因飞机失事而遇难。约翰·洛克菲勒三世因此捐款成立麦格塞奖金，每年选择六名对亚洲政治服务、社会服务、文学、科学、美术、新闻事业特别有贡献者予以表扬，并给予美金一万元奖金。

薯适度取代大米的主食地位。

一直到1957年，蒋梦麟仍主张应全力推动米类增产，其次增产食油作物，避免依赖进口而消耗外汇。但他相当清楚，在耕地面积与农业技术条件的限制下，科学增产有其极限，为尽快积累资本，唯一的方式即为限制人口扩张速度，降低粮食消耗与消费支出，才能让资源集中在经济支出上，复兴农业，推动整体经济起飞。

1959年4月，蒋梦麟发表以中英文并刊的《让我们面对日益迫切的台湾人口问题》，号称台湾人口节育政策的最重要文献。蒋梦麟以学术与农经大老身份疾呼，台湾人口大幅增长，1958年即超过一千万人，远超乎科学预估；若不克制，十年内将超过一千五百万人；不到1980年，就会增长为两千万人，产生严重压力，因为这等于每年增加一个高雄市的总人口数，消费一个新增石门水库所能增产的粮食量。

他强调，人口压力带来负面影响，不但衣食住行消耗惊人，水利资源无从跟上人口发展，将进一步压迫农业与工业生产，也没有适当的空间可以容纳新人口，人均耕地面积将大幅紧缩。唯有采取人工节育，抑制这种恶性循环，否则"自然调节作用将不幸地自行发挥平衡力量"。

具有西方社会科学背景的蒋梦麟，对抑制人口的学说与措施早有接触。1922年，蒋梦麟担任北大校长期间，即介绍提倡生育控制学说的玛格利特·桑格夫人[①]来华讲学，因此蒋梦麟与北大教授对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并不陌生。蒋梦麟于1950年初到台湾后，与"农复会"、"农林厅"等学者一同环岛考察，立即发觉民间疾苦太多，衣不足暖，食不够饱，婴儿死亡率高，子孙满堂的观念让生育问题与家庭处境恶性循环，必须彻底改善。

1951年，蒋梦麟率先发表《土地问题与人口》一文，要求正视人口急速膨胀问题，并以《礼记·大学》中的"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则财恒足矣"为诉求。他在1952年《关于限田政策》的说明中，再度提出

---

①玛格利特·桑格(1883～1966)，女性生育控制的先驱者，美国《时代》周刊选出20世纪对世界影响最大的一百位名人之一。她曾在贫困的纽约市下东区当护士，立下提倡节育的志愿。1914年，她出版《妇女反叛者》杂志（后更名为《节育周刊》），并发表《家庭人口限制》的小册，一度被控邮寄违法文件。1916年她在布鲁克林创办第一家节育诊所，并因此被捕。桑格其后周游世界，宣传节育的重要意义。



人口问题的严重性，强调必须有全盘统一的计划推动。但由于社会保守，压力颇大。蒋梦麟未明确提到节育的构想，而只是说，台湾人口迅速增加，恐在数十年后让台湾成为贫穷之地，就如同森林滥伐有长期危害，都是数十年后才看得出严重性的危机。

蒋梦麟此时虽主张解决限田问题后，须尽速解决人口问题，但一切讲究科学证据、实验主义的蒋梦麟并没有轻举诉求，而是由“农复会”委员贝克先在联合国同志会报告，提出台湾生产速度无法与人口增长相均衡的观察，建议应由台湾当局对家庭采取相关限制办法。蒋梦麟一次次地实地考察，在“农复会”小规模推动补助家庭计划，同时邀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乔治·巴克里来台担任“农复会”顾问；并于1954年提出台湾人口研究报告，以科学数据分析台湾人口成长趋势与因应之道，从科学着手，为提出彻底解决人口问题的方案做准备。①

1957年1月，蒋梦麟通过媒体提出，稻米产量每年平均增产五千四百吨，人口增加率为百分之三点六，也就是年增约三十五万人口，以每年每人平均消耗糙米一百五十点七五斤计算，每年须增产五万两千六百余吨，与当前产量仅仅大致持平而已，所以需要推动科学增产，相对提高增产速度；也必须同时推动灭鼠，以免鼠疫流行及耗损粮食。

1959年，在各方质疑的压力下，蒋梦麟终于正式提出以节育解决台湾的人口问题。

在《让我们面对日益迫切的台湾人口问题》一文中，蒋梦麟以1957年的科学统计数据指出，台湾人口增长压力相当于每年消费一个石门水库所增长的粮食，台湾人口增长率过高已形成经济重大负担，必须提倡节制生育，抑制百分之三点三的人口成长率；台湾国民所得年增率不到百分之五，国民生活消费所需年增率却将近百分之十三，生产力跟不上消费资源能力。他指出，根据统计，消费增加的百分之三十四，直接来自人口增加的压力，生产消费出现失衡趋势，资本无法积累，生活水准将有下降之虞。同时，百分之五十的经济建设需要美援，但人口增加、消费偏高，使经济自立收支平衡目标更难达到。

蒋梦麟认为，只要人口增长率低到百分之一点五，就可以化解危机。毕竟

---

①吴相湘：《民国百人传》，页51。

人口品质比人口数量更重要，如超过人口与资源间的比例限制，生活水准一定会降低，因此不能只重视后代繁衍而不重视后代的品质。但他坚持，必须以道德劝说加上提升民众素质，使得避孕成为共识，而不是采取“法律禁止手段”。

1959年4月13日，蒋梦麟召开记者会，宣布决心积极提倡节育，且已要求政府高层不要干预他的行动。他甚至说，如果因为提倡节育闯下乱子，“宁愿政府来杀我的头”，太多的人口中，“至少可以减少我这一个人”。对于节育方式，他主张保险套是较方便、直接的方法。

这篇花了一个多月完成的文章，刊出后引发热烈讨论，“头可断不可不提主张”的慷慨陈词以及强调“为往后数十年规划”的做法，虽获得舆论支持，可蒋梦麟也说，自己并不想做节育专家，所以不愿再多讲。他只是有感问题不解决，人口品质下降问题无从解决。

另一方面，批评声浪也陆续传出，尤其其中蕴涵节制人口以提升经济的观点，与传统强调“财散而民聚”的观点背道而驰，更让蒋梦麟饱受抨击。

人口节育被反对者批评为“极端个人快乐主义的邪念”，“主张性交自由”；有人批评他的计划节育“说法荒谬”，“如果还有一丝人性”，应该“自杀以谢国人”。更有人指责蒋梦麟除了违反国父遗教、违反传统道德、违反儒家学说外，国民党“国策”是“反攻大陆”，势必需要兵员，必须有充足的人口，工业建设也需要劳力，蒋梦麟反对“人多好办事”的论点，因此被冠上“杀人于未生之前”的罪名，还被列为“民族罪人”，更可能“与中共是一丘之貉”。天主教团体基于反对节育的教义，也强烈反击。①

不过主持“道德重整运动”的军方老将、“总统府资政”何应钦，则在公开演说中呼应蒋梦麟的主张，指民众应自动量度自己的经济力量，在计划方式下采取避孕方法，限制过多生育，缓和人口问题。不过他认为，私自堕胎是不道德的，应继续禁止，应借公开倡导以达到节育目的。

蒋梦麟并与钱思亮等人提出节育以降低人口压力的主张，认为节育已经不是该不该的问题，而是如何有效执行的问题。钱思亮说，人口压力造成大学入学新生激增，师资校舍均严重不足，必须迅速改革。蒋梦麟等人又将主张化为行动，由“农复会”印行节育知识小册《幸福家庭》，协助解决避孕问题，但因

①钱月莲：《蒋梦麟与台湾农业农村之复兴》，中国文化大学史学研究所硕士论文，1988年，页197。

遭质疑意图“削弱国军实力”，被要求收回销毁。

直到1961年，蒋梦麟还在宣传：家庭计划属于社会问题，人口增加产生教育问题，也让农村负担加重，土地分配不足，由于民众平均知识水准提升，提倡节育一定能够具体落实。他提醒，粮食增产无论如何都赶不上人口增长速度，若不解决，人口问题的影响约在二十年后浮现。

1964年，蒋梦麟故去，人口节制的争议并未了结。在蒋梦麟之后，技术官僚承继这项重要政策；日后被称为奠定台湾科技经济发展基础的“台湾经济教父”李国鼎担任“经济部部长”，也追随蒋梦麟的脚步，推出女性避孕器“乐普”，并推广各类节育措施，但同样饱受批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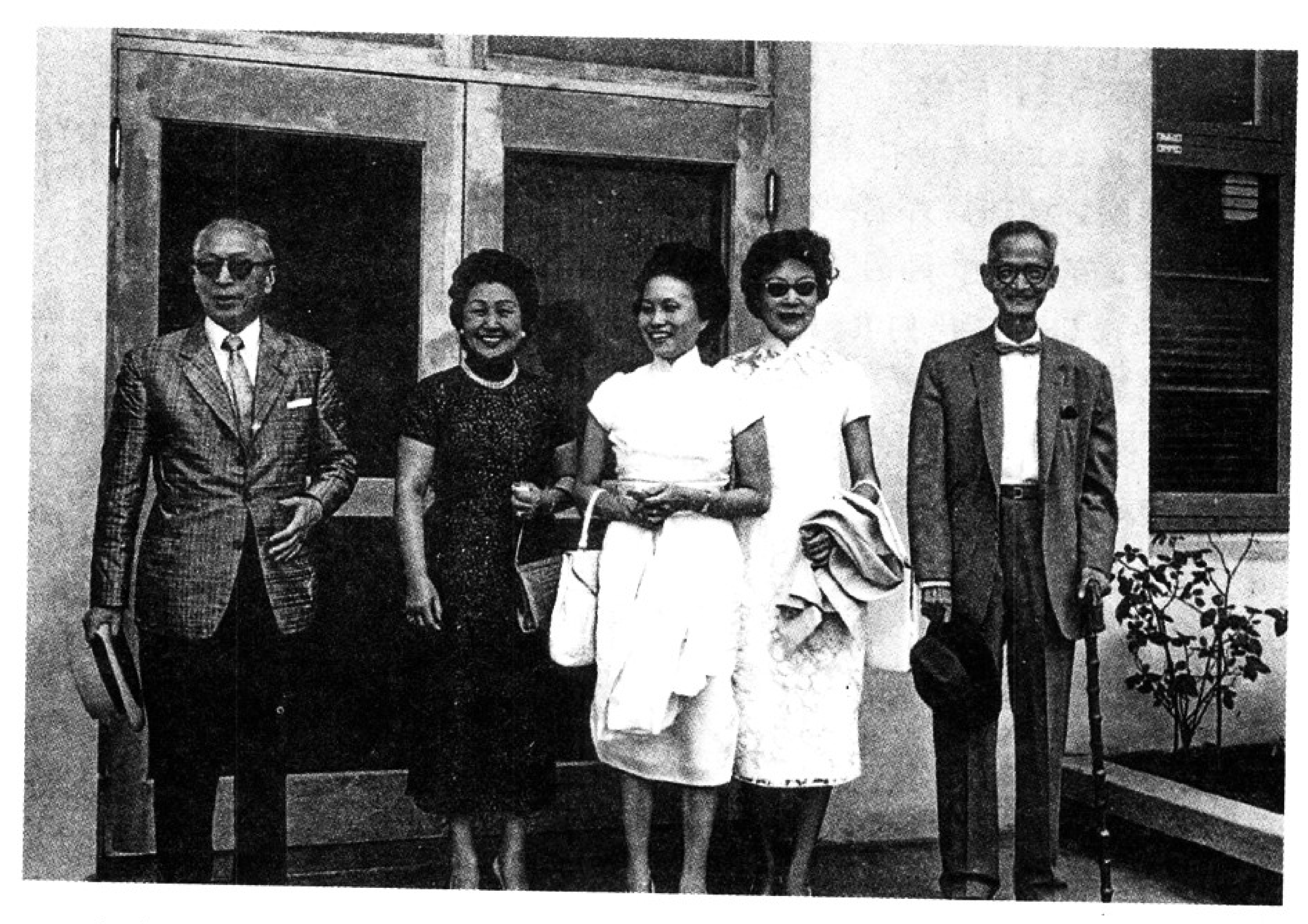
1967年，蒋介石听取李国鼎的建言，终于拍板定案，结束长期激烈的争辩，制定新的人口政策纲领，全面推动家庭计划，以“两个孩子恰恰好”的口号倡导节育，以加速经济发展。评论家感叹，从蒋梦麟于1951年首度提出人口政策新方向起至今，竟拖延了十七年之久。

再婚婚变　拖垮了健康与精力

影响蒋梦麟晚年生活最大者，是他突然再婚又婚变，离婚消息闹上媒体，不可开交。老当益壮的蒋梦麟，曾自诩能再读书、创作十年以上，也希望能再为社会作出重大奉献，但离婚风波拖垮了他的精神与体力，使得精于实务的他晚年竟困于琐事。

1958年5月14日，蒋梦麟夫人陶曾谷病逝。陶曾谷是蒋梦麟在南京国民政府担任教育部部长时的秘书，原是他的同事、北大教育系教授高仁山的妻子。高仁山因反对北洋政府而遭枪决，蒋梦麟宣称要尽朋友的义务，要爱他爱过的人，并且要“更加倍地爱她”，与元配分居仳离，改娶新寡的陶曾谷。此举招致不少议论，间接导致陶曾谷与蒋梦麟的部分朋友相处并不融洽。但思想新潮的蒋梦麟始终认为这些批评是封建社会的旧思想，且婚礼有胡适证婚，不失面子，两人也始终恩爱。

陶曾谷曾在战地担任救护工作，去台后于宋美龄主持的妇女联合会担任常



⬆ 蒋梦麟一生有过三次婚姻，其中第二、三次婚姻都颇有戏剧性，引得满城风雨。特别是他第三次与徐贤乐的婚姻更是港台报刊的花边新闻。图为 1961 年，蒋梦麟（右一）与妻子徐贤乐（右二）新婚不久，好友顾维钧夫妇（左一、左二）前来串门。蒋的这次婚姻并没得到友人的支持，尤其遭到胡适的坚决反对。然而两人依然在一片反对声中，于 1961 年 7 月 18 日在台北家中举行婚礼（因为反对声太强，不便举行公开婚礼）。无奈婚后一年开始，这次婚姻果然让胡适一语成谶。蒋梦麟赴台中出席“四健会”年会时不慎失足骨折。根据两人的离婚起诉书中所述，徐贤乐对病中的蒋梦麟不闻不问，缺少关切。

务理事。陶蒋感情甚笃，婚后几乎形影不离。陶曾谷过世后，蒋梦麟相当悲痛，家中均维持妻子生前的摆设。

蒋梦麟虽与陶曾谷所生的女儿蒋燕华及女婿同住，不乏亲人照料，但陶曾谷过世前，已重病两年，之后三年鳏居，让蒋梦麟相当寂寞，因此部分朋友打算为蒋梦麟说媒。只是蒋梦麟忙于“农复会”的公务，并无下文。1961 年 6 月，鳏居三年多、七十五高龄的蒋梦麟，传出将续弦的消息。亲友闻讯后大感吃惊，蒋梦麟的学生罗家伦甚至以为是有人在搞恶作剧。

然而蒋梦麟续弦之事不假，对象是五十余岁，曾嫁北伐军参谋长、前“国府驻苏联大使”杨杰，在“中央信托局”担任专员的无锡人徐贤乐。徐贤乐毕业于上海光华大学政治经济系，论出身是名门之后，其曾祖父徐寿留学德国，归国后首创中国造船工业；祖父徐建寅创办汉阳兵工厂；父亲徐献庭是革命党；她的堂妹是党国大老居正的儿媳妇。徐贤乐与杨杰离婚后，并未如旧时代妇女陷入失婚困境，她有稳定的工作，在一般人眼中，家世好，品貌双全。

蒋梦麟与徐贤乐相识于一年前。通过表亲介绍，两人在圆山饭店的晚宴中认识。蒋认为徐风度谈吐俱佳，决定进一步交往，以诗“换我心为你心，始知相忆深”，署名“敬献给梦中的你”，打动了原嫌蒋年纪过大的徐贤乐。

在蒋梦麟喜悦证实婚事后，得到的响应却是女儿和北大师友的纷纷反对。谣言很多，蒋梦麟健康问题也引争议。连胡适都说，希望蒋梦麟“这次不要请我，最好是公证”。许多北大故友找到胡适，希望他出面劝说老校长蒋梦麟打消再婚念头。胡适先是托人传话，又找到与蒋梦麟公私交往甚密的陈诚和张群劝说，最后甚至在病中写了封长信给蒋梦麟，希望点醒这位被爱冲昏头的老友。

胡适信中指出，对蒋梦麟先前说要“为国家再积极工作五年”，感到佩服。但外界传言相当多，已到了满城风雨的地步，说新娘还没过门，就已开口要了二十万，并且已花钱买了钻戒、衣服；还听说新娘已查明蒋梦麟的财产状况。他说，此刻不讲实在对不起老朋友；他要劝老友“悬崖勒马”，“忍痛牺牲已付出的大款”，或能保全其他部分，否则余年绝不会有精神的快乐，甚至“不名一文”。

明知蒋梦麟不悦，胡适说，朋友都劝他别说话了，但他以蒋梦麟与陶曾谷证婚人的身份，不能不忠告蒋梦麟放弃续弦，换取精神安宁，用余年帮国家、社会做点积极的事。杨杰何等厉害，最终还是与徐贤乐离婚；蒋梦麟太忠厚、太执著，“别无可能应付这样的人”。胡适甚至讲，如迫于无奈非结婚不可，基于外传徐贤乐要求全部财产控制权，蒋梦麟应该先立好遗嘱，除了儿女及徐贤乐外，自己执掌信托基金。

胡适搬出国家大义郑重其事地说，“老兄是公家人”，对社会责任不轻，只希望能接到这封信后与陈诚慎重一谈。他觉得，两人五十年的友谊应该不

至于要为了写这封信道歉，毕竟“你知道我是最敬爱你的”。

蒋梦麟接到信时，直截了当问胡适支持还是反对。胡适坦承以告，蒋梦麟说，“那信我就不拆了”。事后他对徐贤乐说，为免落了痕迹，他看也不看，而让秘书把信撕碎，丢进字纸篓中。蒋梦麟抱怨，结婚是私事，他有个人自由，别人没理由管他。他甚至直指，外面有个以北大为中心的组织来反对他，因此胡适的信，他不要看。

一如胡适所言，蒋梦麟是个“公家人”，他可以不理胡适，却不能不理“农复会”部属担心新老板娘太奢侈、难相处，更不能不买“副总统”陈诚的账。在胡适的催促下，蒋梦麟去见了陈诚。与蒋家向有通家之好的陈诚，先是转达宋美龄“坚决反对”这桩婚事，又说他的太太也反对，因此蒋梦麟如不打消结婚的念头，两家以后也不能见面了。

陈诚与蒋梦麟两度会面，不仅话讲得决绝，也表达了宋美龄的不悦。蒋梦麟只能答应“再考虑一下”，并说已打算不结婚，只是难以善后。这下蒋、徐可能打消婚事的消息，迅速传遍台北的社交圈，胡适相当兴奋。1961 年 7 月 11 日，蒋梦麟特地到医院探望胡适，亲口证实不打算结婚了，要胡适好好休养，听医生的话。

但外人千劝万劝，始终改变不了蒋梦麟的决心，续弦消息还是千真万确的。

虽然蒋梦麟不断说父女之爱不能取代夫妻之爱，但未获女儿谅解，最后连女儿都没出席婚礼。结婚的理由，蒋梦麟对媒体说，人格必须具备理智、感情、意志三大要素，欠缺一样生活就会失去平衡；妻子故去后，为免独居寂寞、失去平衡，所以再婚。徐贤乐则说是佩服蒋梦麟的学养与幽默，所以愿下嫁。

1961 年 7 月 18 日，在陈诚与胡适等人以为“解除警报”后不久，蒋梦麟与徐贤乐在台北临沂街友人住处结婚，现场亲友不到十人，由张群担任证婚人。双方简单地用印在结婚证书上盖章，蒋梦麟为徐贤乐戴上一只钻石戒指，只从餐厅叫了一桌酒席当做喜宴，随即搭车前往台湾中部地区度蜜月。很多客人甚至仓促得来不及准备礼品。

蒋梦麟伉俪在环岛蜜月旅行中，一路探访亲友。蒋梦麟幸福地说，他不但老当益壮，一切更尽在不言中。8 月中旬，蒋梦麟带着新婚妻子探视胡适，胡



⬆7月18日中午，蒋梦麟与徐贤乐的婚礼在台北举行，证婚人、介绍人一应俱全。蒋梦麟在婚礼上表现得异常兴奋。他高兴地向老朋友表示，自己专门到医院作过体格检查，一切正常，绝对不会害人。另一方面，他还专门在婚礼上发表谈话，说一位从前北大的老朋友，曾经写信劝阻他的婚礼，可是他看也不看就把它扔到纸篓里去了，表现出对胡适的不满。

适只能无奈地接受。

不过蒋梦麟的幸福只维持一年半的时间。1962年底，蒋梦麟赴台中考察期间，因教师会馆地板打蜡，在会馆楼梯间不慎摔伤右大腿股骨，转送台北荣总治疗后并未完全复原，必须依赖轮椅或拐杖行走，此一意外伤害竟也意外成为这段婚姻的转折点。

蒋梦麟在病榻中突然发现，徐贤乐户口已经迁出，存折股票已经过户到徐贤乐名下，图章也由她保管。1963年1月23日，正值小年，徐贤乐携带年饭到医院，但蒋梦麟已然独自离去，决定分居。

在一封致亲朋好友的公开信中，蒋梦麟批评徐贤乐之前不愿随他前往台中，在“开刀最严重时刻，却弃我不顾”；而且只为参加舞会，不留院探视；住院治疗期间疏于照料，更让他伤心。蒋梦麟发现徐贤乐持续转移财产，连女儿的存款与股票都被过户，证明徐贤乐已有离去之意。他要求，相关存款股票应立即交还女儿，他个人财产也应有自主权，因此保险柜存款一律冻结，股票也报失。蒋梦龄自称对徐贤乐的忍耐已到达顶点，需要养病，不能再受干扰，决定不再与徐贤乐见面。

徐贤乐辩称，提出私人储蓄早获得蒋梦麟同意；搬家是为保留“中信局”宿舍承租权，而且只是将户口迁出蒋宅，她仍住在蒋宅。徐贤乐抱怨，自与蒋梦麟订婚后，有人不断居中破坏，两人婚约一度生变，最终还是因蒋梦麟的诚意才结婚，双方并无争执。徐贤乐也暗指蒋梦麟的女儿、女婿从中破坏。

蒋梦麟的女儿则反驳，外双溪土地是她母亲陶曾谷所买，母亲过世后她继承土地，只是地契由蒋梦麟保管，徐贤乐管账，自己毫无过问，不该把责任算在她头上。

话已说绝，蒋梦麟随即委托律师办理离婚。起初委任律师与蒋本人仍多次澄清，发生骨折前，两人恩爱；住院后却发觉徐贤乐不够关心他，开始感到失望；开刀后又发现徐转移存款、迁出户籍的问题，才认为“一切都是假的”，都是虚情假意，于是决定脱离夫妻关系，提出离婚之诉。为摆脱这不愉快的婚姻，蒋梦麟说，愿意每月付新台币三千元生活费给徐贤乐，他个人的财产、饮食将自理，希望亲朋好友体谅他的决定。

从此蒋梦麟与徐贤乐避不见面，一切通过律师打笔仗、打官司。精明的徐贤乐也发表公开信，表示一本初衷，敬爱蒋梦麟，对外界批评一律缄默以

对。她说，面对小人拨弄，她的忍耐到了顶点，希望周遭包围蒋梦麟的人不要逼人太甚。她劝告蒋梦麟，如听信花言巧语，解除婚约，对社会舆论如何交代？她要求蒋梦麟“面对面解决问题”，不要隔空放话。徐贤乐又坚决地对媒体说，蒋梦麟受到集团挑拨，避不见面，“放任别人对付我”，“竟有如此心眼”！她说不愿离开，“生为蒋家人，死为蒋家鬼”，自己“爱人不是爱钱”，结婚更不是做生意、签契约。她坚称分居并非蒋梦麟本意，而是“第三者介入”。

蒋梦麟则借着与媒体对谈时厘清，他是在4月份决定提出离婚申请。他说，1936年与陶曾谷结婚以来，婚姻美满，陶曾谷过世让他深受打击，为振作起来，因此鼓起勇气与徐贤乐结婚。但一年多的婚姻让人失望，“受人所不能忍的痛苦”，家成了痛苦之渊源。他后悔没接受胡适的忠告，愧对故友，于是才拿出认错的勇气、纠正错误。至于其他是是非非，蒋梦麟不愿再多说。

由于这起纠纷已酿成社会高度关注的桃色新闻，蒋梦麟希望外界对他个人私事无须太注意，现在只希望冷静处理问题。他苦笑地表示，自己体力一直不好，所以委托律师处理，离婚理由是“不堪同居的虐待”。

蒋梦麟的离婚状更直指徐贤乐“貌善心险、凌辱女儿、需索敛聚、嫌老恶贫、咆哮辱骂、饱受虐待”，不堪同居。他也首度证实了当初胡适的质疑，指徐贤乐在蜜月期间就不断追问他个人财产，还作成笔记；他的保险受益人与美国财产也都改登记徐贤乐为受益人；趁他在病榻上，徐贤乐迅速过户财产等种种做法，都让人无法接受。

蒋梦麟又直指徐贤乐经常大惊小怪、借故吵闹，不准他吊唁亡妻，还要求女儿搬离；而且竟以费用难筹为由，要求他尽快出院；她曾私自向“农复会”官员借支，同时为配住宿舍问题，在“农复会”与幕僚争吵，让他无地自容。凡此种种让他决定诉请离婚，并索回五十三万元存款。

蒋梦麟在诉状中指出，自己与徐贤乐双方都受过高等教育，不愿过度刺激，之所以在医院神秘失踪，实因不愿再刺激对方。蒋梦麟又澄清，坚持离婚不是遭到女儿挑拨、包围。他说，不愿再与徐贤乐见面，一切依法律解决；对自己的处境，只能感叹：“食少事烦，其能久乎？”

面对蒋梦麟的诉状，徐贤乐气愤地表示，诉状内容都是扭曲的。调解过程

中，徐贤乐一度直闯“农复会”办公室找蒋梦麟，吓得他连忙从后门楼梯避开；徐贤乐见状高呼，见丈夫是合法的权利，她已受到蒋梦麟的侮辱与痛苦，这是“仰仗官职，欺凌弱女”。蒋梦麟自认实在惹不起徐贤乐，随后避居石门水库；徐贤乐一度又以送冬衣为由，要求碰面，蒋梦麟还是躲起来。

不敌女方攻势，蒋梦麟让步表示愿拿出存款四十万元当赡养费，希望达成和解。但因徐贤乐要求蒋梦麟给付价值五十万元的房屋，协调未果。

就这样吵吵闹闹约一年后，双方在 1964 年 1 月 24 日协议离婚，陶希圣当证人，赡养费为徐贤乐主张的五十万元，“农复会”房舍、股票均需交还，但徐贤乐已经提走的二十多万现金则不予计较。由于已身无长物，蒋梦麟只求签字止讼，还是由友人代签支票偿还赡养费，前后总计花费七十七万元（上世纪 60 年代台湾年人均所得不高，有存款百万即被喻为富翁），终于结束两年六个月的夫妻关系。

黯然病逝

虽然好不容易摆脱婚变的阴影，然而此一风波已让蒋梦麟元气大伤，而且婚变期间工作依旧繁杂，形成他沉重的负担。

1962 年胡适逝世后，台湾最高研究单位“中央研究院”出现无人接棒的问题，李济深孚众望，但因严重糖尿病而坚辞。蒋介石与陈诚原希望在国外的原子物理学专家吴大猷接棒，但始终没有得到正面回音。最后由蒋梦麟主持，召集“中研院院士”投票，拥有前“总统府秘书长”、前“教育部部长”、前“外交部部长”等头衔的王世杰胜出，勉强胜过在大陆时期担任中研院院长的朱家骅，解决了一项人事难题。

同年台湾成立“农业教育会”，仍由蒋梦麟出任主任委员。就任新职时他提出，农业对低度开发国家的经济提升非常重要，必须有效提升农业资源利用以及民主原则分配，才能有效增进农业建设发展。

此外，蒋梦麟主持的石门水库工程历经十年，于 1964 年 6 月竣工。完工当天，前后任主委陈诚与蒋梦麟将这些年省下的交通费共计十万五千元，由蒋梦麟具名全数缴回，坚持不领兼职薪资，为台湾政治立下典范。

因身体不适、不断打嗝等症状，蒋梦麟于1964年4月23日住进荣民总医院检查肝病及右腹部的小硬块。蒋梦麟向来注重养生之道，更因陶曾谷是罹患癌症过世，让蒋梦麟谈癌色变，只是婚变以及腿疾缺乏休养，让他的健康大受打击。由于家族有长寿的传统，他对自己的健康仍相当有信心。在住院前几天遇到蒋介石与宋美龄时，蒋梦麟还谈到自己的腿疾大概两个月后就能痊愈，不再需要拐杖助行。

这次住院检查却发现，蒋梦麟罹患肝癌；而且医师判断，病情严重，已无法用放射线或开刀治疗。因此医师并未告知蒋梦麟实情，甚至直到过世前他还不知自己病情有多严重。

住了院且出现黄疸等不良症状，有强烈求生意愿的蒋梦麟，不同一般病人，他积极与病魔搏斗，并坚持返回自宅，不愿住院。但笃信科学的他似乎也有心理准备，直言“如果真是癌症那就没有办法”，因为现代医药还治不好癌症。

一方面为减轻卧病痛苦，也希望他撑到亲眼看见石门水库启用，蒋梦麟的亲友特别邀旅日的国际癌症体质改善研究会理事长庄淑旗①返台为蒋梦麟诊治。医师的细心照料，的确让蒋梦麟减缓痛苦，度过生命中最后一段时间。陈诚在蒋梦麟神志还清楚时前往医院探视，告诉他要好好养病，“活一百岁一起回大陆”。

其后蒋梦麟身体每况愈下，频频打嗝、痰中带血、身体虚弱，不时陷入昏迷，必须使用氧气维生；神志清醒时，他会坚持去除氧气与葡萄糖等维生药物。

1964年6月19日凌晨，蒋梦麟病逝，享年七十四。临终前他还念着石门水库，并说亲眼看到石门水库落成，“这件事总算完成了，我很高兴”。蒋梦麟身后与夫人陶曾谷合葬在阳明山第一公墓。

蒋梦麟一生横跨学界与政界，以自传式作品《西潮》为代表作。晚年创作《新潮》与《近代中国文化思想史》，因腿伤影响写作进度，婚姻波折更让他分

①庄淑旗出生于日据时期。由于父亲和丈夫皆因癌症去世，庄淑旗立志习医，于1950年通过中医师国家考试，成为台湾第一位女中医师；后又远赴日本，取得庆应大学医学博士学位。庄淑旗在日本行医多年，曾经是日本皇室医师，名声相当响。

身乏术，导致《新潮》只写了十六章。这两本颇具代表性的著作没写完，据闻是蒋梦麟最遗憾的事。

蒋梦麟过世前，为感谢庄淑旗的诊治，且有感于台湾癌症预防资源缺乏，拨出遗产的三分之一（约十万元），供庄淑旗医师研究所的癌症医疗研究；多年后，庄淑旗又捐出台北圆山附近的土地与大笔金钱，成立抗癌中心与团体，成为台湾颇具知名度的家族防癌协会。

论蒋梦麟的领导风格，“农复会”人士说，蒋梦麟一到“农复会”，连称自己是“外行”，技术的事一切尊重专家与幕僚决定。蒋梦麟的作风是“鼓励而不吩咐”，他在“农复会”长期致力于农业教育与人才培养，最终培养出坚实的农村工作队伍。

蒋梦麟关于农业与人口问题的努力，使台湾有了转型的机会与动力；而且这两项蒋梦麟着力甚深的工作，出现了他生前意想不到的变化。

自1967年实施人口节育政策后，“结婚三年生一个，隔三年再生一个，两个小孩恰恰好，一个不嫌少”的“3321”节育观念深入人心，短短十余年即看到节育成效；反倒是政策推动二十二年后，因台湾面临核心家庭（以父母子女为家庭成员）架构成形、人口数停滞不前等新的人口问题，台湾当局又于1990年颁布新人口政策，不再提“一个不嫌少”的节育口号。

另一方面，1978年8月，美国政府与台湾断交之后，长期以来的美援中断，受美援扶植颇深的“农复会”因此面临彻底改组命运，成立“行政院农业建设委员会”以替代“农复会”。

和光同尘　择善固执

蒋梦麟在“农复会”的办公室墙壁上悬挂着标语：“教育为进步之本，推广为兴革之本，土地为立邦之本，食粮为民主之本，水利为富国之本，林业为安居之本，农贷为养信之本，畜牧为厚生之本，运销为畅流之本”，这几乎是他一生职志与抱负的总结。

“和光同尘，择善固执”是北大教授陈雪屏对蒋梦麟盖棺定论的评价。在择

善固执的一面，作为杜威在中国三大弟子之一，蒋梦麟身体力行杜威“实验主义”、“教育即生活”的理念，极力反对二元对立，强调“直觉”的经验，全面肯定人习性之可塑性的主张。蒋梦麟一生崇尚科学实证，一切从证据出发。陈雪屏说，蒋梦麟虽然看来与世无争，但只要作出计划，就会持续推动，不怕任何艰难阻碍，全力坚持发展科学，让人佩服。

蒋梦麟在《新潮》中谈到，必须“眼看着天上的星，脚踏着地上的草根，从农民那里学习，不用自己的幻想去教农民，从象牙塔走进广大农村，努力推动民主与科学，使从草根里滋长起来”。基于实事求是原则，蒋梦麟强调，必须知道环境的要求，用科学技术去解决问题；他劝青年们“不要想找万灵丹”，世界上“没有服了能使百病消散的万灵丹”，而必须眼看着天、脚踏地，一步步地前进再前进。他多次指出，“进化从没有一帆风顺的”。

蒋梦麟这种从经验出发，讲究科学论据并坚持到底的做法，一以贯之。就连他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论文，也强调必须运用现代方法研究中国历代教育原则。

然而，讲实事、办实事的作风以及长期的官宦生涯，让蒋梦麟在讲究思辨的学术研究上并没有突出的发展，因此他虽献身北大教育二十二年，致力台湾农村改革十七年，仍自称是“学府中的不学之人”。

不过蒋梦麟对自己“能办事”有高度自信，向来自傲的傅斯年有一回取笑蔡元培与胡适两位师长，虽作为北大功臣，卓有贡献，但办起事来实在让人“不敢恭维”；蒋梦麟则幽默地响应，所以蔡、胡两人是北大“功臣”，他与傅斯年才是真正办实事的北大“功狗”。

蒋梦麟在辞去国府教育部部长职务，返回北京主持北大时，慷慨地对胡适等人说，为振兴北大，维持北大生命不致中断，“辞退旧人，我去做；选聘新人，你们去做”。北大因遭国民党政府降编为北平大学一个学系，一度暮气沉沉，还是蒋梦麟向全国招募到好教授与研究人才，终于让北大焕然一新。

到了台湾，蒋介石汲取统治大陆期间经济混乱以致失去政权的教训，放手让亲美的人才主掌经济、农业与科技部门，加上陈诚对知识分子的支持与

庇护，包括蒋梦麟在内的大批技术精英官僚，有了充分发挥的机会。[1]在蒋梦麟全力推动下，台湾土地改革工作取得重大成就，不但改变土地所有权结构，更激起农民耕作的积极性，使单位面积产量大为提高，使国民党能有机会结合新兴的自耕农阶级，成为安定乡村社会的中坚力量；并为后续农村生产力往都市移动奠定基础，使农业社会得以转型，促进台湾后续工业的起飞。

蒋梦麟毕生有着太多居中协调、执行的事例，当然这与他长时期留美、与美国打交道的经验有关。蒋梦麟执掌的“农复会”，与“美援运用委员会”、“美国经济合作总署”并列为台湾当局与美方合作的三大美援机构；以第二批“庚子赔款”经费设置，主要用以奖励留学生赴美深造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亦由蒋梦麟长期担任基金会董事长。[2]所以蒋梦麟过世后，台湾霎时间少了一座与美国沟通的桥梁。蒋梦麟的老友王世杰说，蒋梦麟的过世是“学术界难以弥补的重大损失”。

旁人虽说蒋梦麟的个性择善固执，却绝非一味尖锐；相反地，他不只一次提到自己有绍兴师爷性格，也就是和光同尘的性格。在南京担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因整顿大学得罪人被迫去职后，蒋梦麟自认为励精图治，却被人视为一意孤行，但回想自己“世居越中，耳濡目染，颇知绍兴师爷化大为小、化小为无的诀窍。今背道而驰，自然碰壁”。他曾感叹“武力革命难，思想革命更难”。他也指出，如“无法得到当局与社会信任，即使成功也事倍功半”。

---

①李国鼎就曾说，台湾财经决策核心的十大技术官僚，包括严家淦、尹仲容、杨继曾、李国鼎、俞国华、俞鸿钧、徐柏园、蒋梦麟、沈宗翰和孙运璇，对台湾经济发展扮演了重要角色。这批人大多数都有高学历、实务经验，甚至有留美背景，不是理工学者就是工程师；加上美方的大力支持，长期运作后形成了政治自行回避的专业决策模式，强调专家治国。蒋经国于70年代主政后，实施党政分离，更强调财经决策的自主性。

②1908年，美国决定退回“庚子赔款”余额一千两百万美金，因此中国正式创办清华学校，组织清华大学基金保管委员会，并派中国学生到美国留学。1924年，美方又陆续退回六百多万美金，另设立中华教育文化基金，由董事会经营，展开促进中国教科文发展活动；同时自1929年起，受教育部委托，负责保管原清华大学基金。不过抗战开始，中美签订平等新约，停止拨付“庚子赔款”，货币又急速膨胀，基金蒙受严重损失。1950年，基金经香港移到纽约经营，现金与股票资产总值约一百六十万美金，年收益约七万多美金，清华基金则余六百四十多万美元。基金除提供学术奖助金，也以研究补助费、讲座与客座教授经费方式陆续资助各大学术机构。蒋梦麟长期以来担任董事长，后续基金总值增长到一千两百万元。

蒋梦麟对学生运动的态度则值得玩味。

作为《新教育》的主编以及北大领导人，蒋梦麟在前期对学生运动当然起推波助澜的作用。因此五四运动之后，蒋梦麟高度评价学生的爱国行动。他说，五四宛如“决百川之水，一泻千里，成新文化的浪潮，把中国腐败社会洗得干干净净，成一光明的世界”。他认为，学运是“笋的生长，而非菌的生长”，是往有希望的那方面走；未来必须把科学与美术提倡起来，酿成“完全的新潮”，这也是他对新文化运动的期望。

不过随着蒋梦麟执掌北大以及学潮泛滥后，罢课与学潮频传，他对学运的支持转为有限度地保留。胡适和蒋梦麟都对学生运动易放难收、学生无意学业的情绪忧心忡忡，因此不但在五四运动周年之际提醒学生，必须容纳反对党的意见；威压不肯迎合群众心理言论的做法，“是暴民专制，不是民治精神”。蒋梦麟抱怨，学生要求更多的行动自由，北洋政府则要求维持秩序，两相冲击下，不管是游行、示威，还是暴动，变成全由校长负责，让他一听到电话响就吓一跳，担任校长的唯一报偿竟是两鬓迅速增加的白发。

蒋梦麟强调，“救国当谋文化之增进，而负此增进文化之责者，唯有青年学生”。因此在他看来，对学生而言，“救国之要道，在从事增进文化的基础工作，而以自己的学问功夫为立脚点”；学生运动是“非常的事，是不经济的、不幸的事”。他甚至认为，学生把罢课当武器“是下下策，是最不利己的方法，是学生运动破产的表现”。蒋梦麟也要求学生与青年应负起知识阶层的责任，并认为五四运动终究是失败的。

蒋梦麟来自江浙的背景以及与国民党之间的密切关系，曾是同僚质疑的焦点，招致了不少争议。除了在抗战胜利后，因兼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秘书长而被迫辞去北大校长外，北大教授张竞生——民初撰写《性史》、于上海开设“美的书店”而闻名的留法学者——在回忆录中直指，蒋梦麟于1929年担任浙江省教育厅厅长期间，与北大江浙派教授如周作人等，由于派系之见，加上不满他宣传性学引发争议，殃及北大，导致他因“宣传性学、毒害青年”的罪名遭浙江省政府拘捕。张竞生批评蒋梦麟为人“狡诈”、“势利熏心”，在北大“任用私人”，是个“无行”的文人。

蒋梦麟因任公职与胡适的争议更是经典。胡适因在上海兴办《新月》，公开发表连串文章批判国民党与蒋介石，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因此一再批判胡适是

"学阀"、"反革命"，要求严惩胡适；国民党政府也下令教育部，警告时任中国公学校长的胡适。这份充满敌意的教育部文件正是由蒋梦麟具名发出。结果胡适将蒋梦麟签发"该校长言论不合，奉令警告"的部令退回，不但拒绝接受警告，更逐条反驳，展现知识分子论政的决心与勇气。这也是胡适与蒋梦麟两人一生间难得一见的争执。

但在北洋政府打算逮捕陈独秀时，蒋梦麟没有和北洋军阀正面冲突。他获友人通风报信后，即悄悄通知李大钊带着陈独秀，搭乘马车离开北京，逃往河北乡间避难。

蒋梦麟一生的遭遇，处理政务的坚持，为了理想不惜杀头的执拗，甚至晚年坚持抗癌的乐观与对生命的渴望，都可以看出他的自信心与意志力。

"五四"之后，发生北大学生林德扬自杀的悲剧。赫赫有名的学生领袖罗家伦，写了文章《是青年自杀还是社会杀青年？》，高谈社会丑陋，没有教会年轻人如何寻找到更多活下去的理由。蒋梦麟随即在报刊上著文严词反驳，强调社会本来就不能自己改良，必须要个人去改良它。而自杀是示其弱、不道德，不是奋斗，是"一个大罪恶"。他疾呼，新人生观不是一时能造成，过渡时代总有许多困难和失望的事，一定要经过困难才是成功的路。生命只有一个，要常保乐观才好。他要求青年在面对社会险恶的环境时，不能选择自杀逃避，而应该积极地"奋斗到极点还要奋斗"。

蒋梦麟和胡适、李大钊等七名学者，在高压统治的北洋政府下，于 1920 年联名发表《争自由的宣言》，强调必须争取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和书信秘密不受限制的自由，也要求废除袁世凯及其继承者制定的五个侵犯公民自由的法令。1926 年"三一八"惨案后，遭北洋军阀锁定的蒋梦麟在北京大学公祭大会上，依旧沉痛地说："我任校长，使人家子弟、社会国家之人才、同学之朋友，如此牺牲，而又无法避免与挽救，此心诚不知如何悲痛。"在抗战之前，蒋梦麟长期冒着被日本宪兵拘禁的风险，维持北大教学不中断，并与日本军阀周旋，更可看出他的勇气。

不同于胡适等人在"五四"初期倡议全盘西化，蒋梦麟对这股西潮的态度，始终是按着科学的精神，强调要进行有机的转化，而不能照单全收。他再三指出，对于欧美的东西，"总喜欢用中国的尺度来衡量"，这就是"从已知到未知的办法"。根据过去的经验，利用过去的经验获得新经验，也就是获得新知识的

正途。所以他强调对于中西文化的接纳，始终维持着混合的尺度，不中不西，亦中亦西，甚或游移于两者之间。他认为，对本国文化的了解越深，对西方文化的了解越易。

蒋梦麟表示，“新思想不能用时代来定，也不能由西洋输入的来当标准”，“新思想是一个态度，这个态势是往进化一方面走”。所以他的眼光，常能超脱西方社会科学局限一隅，甚或过于偏执。例如有人对他说，如果他在北大时，能多给毛泽东一些薪资，不只是当初的十七块或十九块月薪，或许日后就不会出现领导共产党纵横中国的毛泽东了，蒋梦麟反驳道，在中国，“好多有钱的人也成了共产党，因此就算毛泽东不变，其他人也是会变的”，不在乎姓毛、姓王，“社会上发生某些问题，总有某些人会出来的”。

一如罗家伦为《西潮》作序时所说，从中国私塾到西洋自由学府，从古老农村社会到近代都市文明，从满清皇朝到革命洗礼，蒋梦麟同时在西潮与中国传统的熏陶下，置身于中西文化思想交流的旋涡。因此他的见解不只是从学术研究得来，更是从生活体验、文化对比，甚至基层农民的境况中得来，进而表现出摆脱两种传统的新方向。这也是他所提出的“新潮”，一股来自中国农村的自主思考、进展的力道。

出身科举的蒋梦麟，虽然深受西方思潮的影响，但他放弃了一刀切的处理态度，表现出他对祖国、传统文化与人民的情感。他更强调中国人应珍惜以儒家思想为主的道德标准，必须小心保存中国特有的文化，结合中西文化优点来发展新的中国。作为近代中国教育思想的提倡者之一，蒋梦麟坚持，教育真正的目的绝不是使一个人念书认字，可以有学问，得到专长，而是要使一个人离开学校之后有一种理想，有一种热情，有一种希望。

正如蒋梦麟在《新潮》中所说，经验是宝贵的，可是宝贵的经验是要付重大的代价买来的。“我们这一代所经验的无限苦痛，希望可为下一代人作为指引和教训”，当避免的要避免，当保存的要保存，当改进的要改进，当推翻的要推翻。在在都能看到他所提倡的“新人生观”——一种鼓励青年奋斗再奋斗的精神。

但一如他的自述，“旧的忘不了，新的学不会”，“是我们过渡时代的人的一个通病”；左也不是，右也不是，中也不是，是人们一般的痛苦。夹在西潮与

中国巨变之间的蒋梦麟，始终摆渡在尴尬与选择之间，只有到了晚年，才有放手一搏的机会，具体实现个人所长与理念。



殷海光
Yin Haiguang
“五四之子”的自由悲歌

在老树和老房子相伴，庭园、黑瓦、蔓藤相连的台北市温州街漫步，总让人禁不住放缓步伐，就像是穿越时光隧道。这里闻不到都市虚华的气味。缓缓走向台湾大学，靠近温州街附近的新生南路上，有座外观朴实的日式木造平房，名为“紫藤庐”茶艺馆，现在是台大学生与一般民众联谊泡茶、聊天讲古的地方。

这栋平房建筑史可推至 1920 年。日据时期，这座房子是日本海军将官的私邸；台湾光复后，由“财政部”基隆关税局接管，成了前“海关关务署署长”周德伟的官舍。

50 年代起，周德伟与移居台湾的大批作家、学者，常在官舍聚会，针砭时局，月旦人物，像殷海光、张佛泉、徐道邻、雷震、夏道平等人都是座上常客，久而久之，形成了自由主义精英在台聚会的大本营。随着国民党钳制力度的加强，这座简单的房舍似乎成了知识分子一座对抗蒋家

专制统治的堡垒。

在这批精英中，有文人，有雅士，有因为和两蒋搞对抗、搞新党而被关了十年黑牢的雷震，自然也不能错过传承五四精神与自由主义信念的殷海光。从照片与各项文字记载来看，殷海光不是个潇洒夺目如胡适的人，而是个瘦小、固执的学者，但是他一支妙笔，却筑起了一座反抗国民党的言论堡垒，使得他孤独的身影显得如此高大。

不同于对待雷震的硬手，国民党压抑殷海光的手法是慢慢地、一层层地把他逼离所有他投注精神与心血的岗位。没有了《自由中国》抒发言论的阵地，没有了台大的教职，媒体全面的封杀，殷海光的倒下似乎不言而喻。然而他仍不断地奋战，写作、笔战，直到癌症将他带离人世为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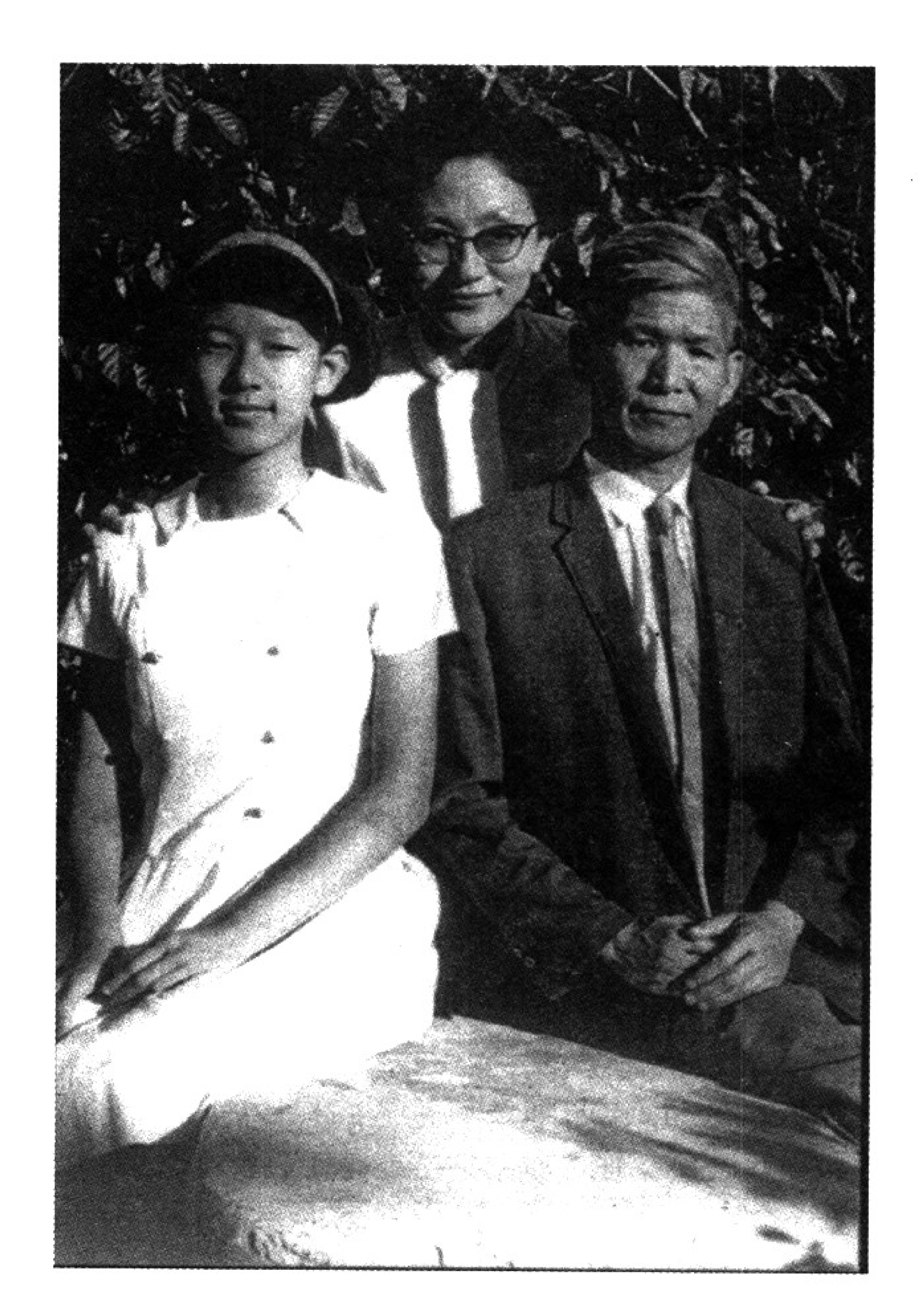
由于雷震遭打压的缘故，殷海光对胡适未能全力驰援相当不谅解。胡适到了晚年，常谈容忍与自由的论调，更让殷海光为这位“五四之父”叹息。自期是“五四后期人物”，甚至是“五四之子”的殷海光，被圈禁在台湾这座孤岛上，放眼中原，历数过往风流人物，却无从施力，也是一种寂寞的悲哀。

由热血青年到国民党文胆

殷海光，本名殷福生，与五四运动同年，于 1919 年 12 月 5 日生于湖北省黄冈县回龙山团风镇殷家楼。殷家是一个普通的耕读之家。祖父殷明万以教书为业，育有三子，幺儿殷子平即殷海光的父亲。殷海光在武昌念中学时并不顺利，大伯殷子衡和父亲认为他“不堪造就”，让他辍学至汉口的食品店当学徒。后来还是殷海光恳求，伯父和父亲才让他复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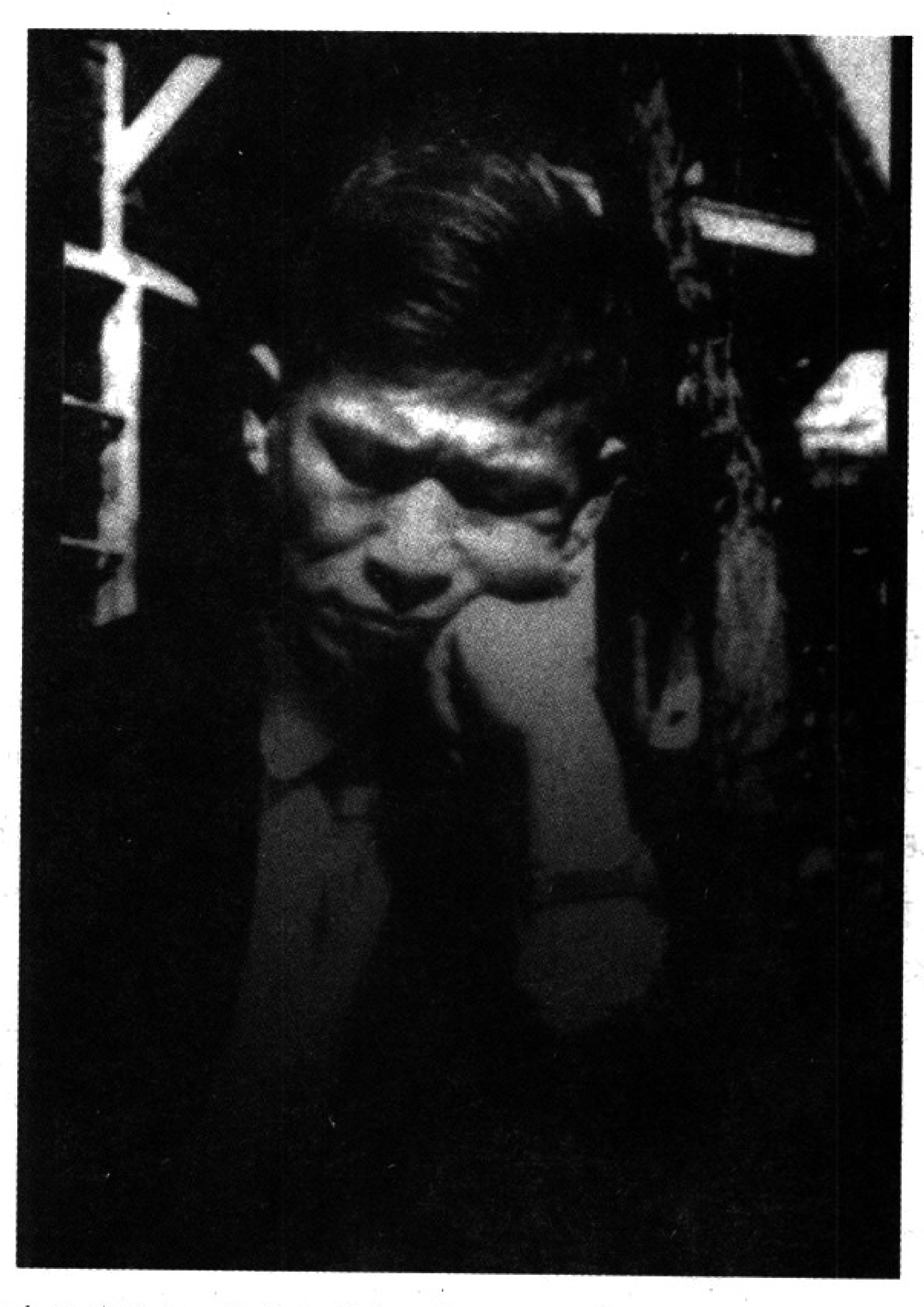
尽管求学之路并非一帆风顺，复学后的殷海光却像是开了窍。1935 年，年仅十六岁的殷海光在《东方杂志》发表第一篇学术文章《意志自由问题的检讨》。其后他拜读金岳霖的《逻辑》，从此对金景仰不已，并直接致函金岳霖。金不仅回信答复问题，也表示欣赏他的见解，让殷格外振奋，更着迷于逻辑学。

殷海光接着以半年时间，将 Chapsman 和 Henle 合著的 *The Fundamental of Logic*（《逻辑基本》）译成中文（1937 年正中书局出版）；也因为金岳霖的鼓励，



⬆ 殷海光夫妇和他们的女儿。殷海光是一个诚朴天真的人，业余时间他特别喜欢养花。有朋友形容他身上有着知识分子少有的那种率真坦白的泥土气息和农村的味道。

殷海光虽然是一位学者，虽然在一生用心最多的学术专业逻辑与分析哲学上并无更多的原创贡献，但他确实是一位不畏横逆而反专制的坚定人物之一。用他的学生李敖的话讲，他最终的成就“恰恰是在人格上的”。



⬆ 沉思中的殷海光。殷海光称自己是一个“头脑复杂而心思单纯的人”。他在公共领域里的某些主张，确实受到过一些朋友的赞许或误解，甚至是批评。因而，他又说：“我是最少被人了解的。许多人认为我苛求、骄傲。但我对自己却更严格，更苛求。”

殷海光的晚年是孤独的，一头忧郁的白发，几多黯淡的心情。他甚至不愿与过去的老友有更多的接触和来往，这时能够到松江路殷宅访他的客人多半是他的学生。聂华苓回忆道：有时，老朋友来了，也不一定邀客入室，“只是靠着野草蔓生的木门，三言两语，一阵哈哈……有时也请人坐在台阶上，一人捧一个烤红薯，谈逻辑，谈数学，谈罗素，谈他最近在外国逻辑杂志上发表的论文……偶尔他也请客入室，席地而坐，一小锅咖啡，一小盘沙利文点心——那样的场合，多半是谈更严肃的学术、思想问题，客人多半也是他的学生”。这种忧郁的心境，主要是因为殷海光对当时现实政治的极度失望，再加上诸多老友对他的不理解以及自身耿直的个性所致。

他决心北上求学，前后在北京待了一年，每星期均固定前往金岳霖、张东荪等清华大学、燕京大学教授组织的逻辑研究会旁听。

可惜就在准备报考清华哲学系时，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殷海光只好回家乡，静待时局改善。1938年，国民政府撤至大后方，准备长期抗战，清华、北大和南开等名校也南迁昆明，合组西南联大，于是殷海光南迁昆明，继续追随金岳霖。这次他终于如愿通过全国高等院校统一招考，进入西南联大哲学心理学系，前后学习长达七年时间。

金岳霖的言教身教，让殷海光深受感染。殷海光直称金岳霖“不仅是一位教逻辑和经验论的教授，并且是一个道德感极强的知识分子”，因此“铸造了我的性格和思想生命”。

此外，在西南联大的这段日子，不仅让殷海光沉浸于逻辑学、自由主义的世界里，一圆求学梦，政治的纷乱与动荡，国家面临外侮的耻辱，也让自称为“浮动分子”的殷海光找到了政治归属。在国民党“三民主义”的党化教育下，殷海光将救亡图存放在了自由民主的命题之前。他也因此被归类为色彩鲜明的右派学生，不时传出与左派学生冲突等纷争。

甚至学者傅乐成还回忆，与日后反蒋的坚决态度相反，殷海光在校园中不时为“领袖”蒋介石与国民党政府辩护，相信蒋介石每遇困境必有扭转乾坤的能力，军阀、共产党、日本人都不在蒋介石话下。

殷海光对政治的狂热不单表现在思想上。1944年10月14日，蒋介石号召“十万青年十万军”，西南联大破例停课动员。已进入清华研究院文科研究所哲学学部的殷海光，也选择投身军旅，成了二〇七师炮一营补给连的二等兵，前往印度接受汽车驾驶训练。八个月后，日本投降，殷海光才退伍返国。因为这段从军岁月，后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背面刻有抗战以来从军学生名单，殷海光（殷福生）亦名列其中。

退伍后的殷海光自称是“不合格的士兵”，更放弃了回到联大继续就学的机会，先在国民政府要员潘公展主持的独立出版社担任编辑；又得到国民党宣传部部长梁寒操赏识，被延揽至宣传部从事文秘工作。殷海光并于此时结识了日后曾大打笔战的学者徐复观，并在其引介下，首度会见了蒋介石。

殷海光同年出版《光明前之黑暗》，这是他的第一本创作。内容简言之是为国民党和蒋介石立言，批判中国共产党与民盟，要求以蒋介石为核心巩固

国家政治。1946年10月，殷转往重新成为政治中心的南京，经好友徐复观大力协助，加入国民党党报《中央日报》主笔群，受总主笔、蒋介石文胆之一的陶希圣领导，这意味着殷海光已被列入国民党文宣核心。其后他又受聘为金陵大学讲师。

《自由中国》的全面批判

只是抗战胜利并未让中国步入安定，国共几次内战已看出此消彼长，黑市经济和通货膨胀让社会动荡，金圆券改革更彻底让民众对币制失去信心，学潮、工潮不断。国民党在前院要应付叩门挑战者，后院还在着火。种种不堪让殷海光在心灵深处不能不挣扎。

1948年，殷海光陆续在各报刊上发表文字《五四与今日》、《我们走哪条路》、《我对国共的看法》、《赶快收拾人心》，又出版《中国共产党之观察》，从这些文章中可以看出其忧虑。殷海光虽然反对共产党的立场依旧，但他对国民党四处传出的弊端、特权已然开始失去信心与过去拥护的热诚，转而要求国民党必须痛加反省，赶快收拾人心。在观念与思想上，殷海光则开始泛谈政治民主、经济平等，并转而推崇胡适的自由主义。

1949年，立场反共的殷海光，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渡过长江之前，随中央日报社迁台。到台初期他仍然是主笔之一，并兼任台湾《联合报》前身《民族报》的总主笔。当时国民党政权刚退守台湾，对外为了防御中国共产党，对内为压制台湾人民的不满，先宣布戒严，又实施军管。因美方迟迟不愿表态支持蒋介石政权，所以国民党政府始终处在风雨飘摇中。直到朝鲜战争爆发，美国基于国际局势考虑，重新给予台湾经济和军事援助，才使得台湾局势逐渐稳定下来。

在积极与美筹建合作关系过程中，国民党尽了相当大的努力，更试图刻意经营、塑造符合美国民主价值的形象。例如殷海光弟子、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国美术学院荣誉教授林毓生就曾指出，蒋政权之所以在50年代初期，自我约束右派威权统治，原因之一，是为保持自己实力，想在国际上保持一点良好形象；另一方面则希望制造一点民主形象，以便争取美国同情与支持，因

此相当不情愿地容忍一些特定对象、特定范围、与特定出版物的有限度的言论自由。

在此大环境下，虽然曾发生“四六”学生逮捕事件，大学的言论与教学仍受到相对容忍，同时台湾大学校园内被允许的言论自由范围又比邻近的政治大学和台湾师范大学更宽。殷海光便在此气氛下顺利获台大校长傅斯年聘为哲学系讲师，教导逻辑课目，前后十七年，并成为在台湾传授、宣扬科学实证论的重要人物。①

另一方面，《自由中国》这本全力鼓吹国民党以民主化争取民心的杂志，也是在这种特殊的环境下创刊，更被默许拥有比其他刊物宽松的批评时政和鼓吹自由民主的言论尺度。这份由蒋介石的文胆雷震邀请胡适担任发行人共同创办的刊物，成为上世纪50年代台湾最具代表性、鼓吹民主自由的象征。殷海光除了出席在台北圆山饭店举行的成立大会外，自《自由中国》创刊号发表《思想自由与自由思想》一文开始，便一直是长期而稳定的撰稿者。

当时殷海光也曾应徐复观之邀，在《民主评论》创刊号上发表《中国的前途》，相当受人瞩目。②只是在迁台初期的这段时间内，殷海光的文字仍大多是探讨国共战争的性质以及可能造成的后果。不过其中较受注目的文章，应为发表在《自由中国》上的《自由主义底蕴涵》。文中指出自由主义有四个层面，即政治的、经济的、思想的和伦理的自由主义，致力于宣扬政治民主、经济平等等主张。

1952年6月，殷海光在《自由中国》发表反思自己心路历程的长文《我为什么反共》。文中称自己思想进入“第三阶段”，不再谈政治民主和经济平等应两者并重，而须“先实现政治民主，才能打开中国数千年的死结”。这成为他反

---

①这段时间是殷海光与各界知识分子往来较为频繁的阶段。1951年，殷海光与张佛泉、徐道邻、周德伟等人合组了一个议论时政的座谈会，约每两周在周德伟“海关关务署长”官舍聚会。此官舍也就是日后引发文化建筑保存议题的“紫藤庐”。

②徐复观在香港创办《民主评论》，是自由主义者除了《自由中国》外的另一尝试。其受蒋介石资助而成立，主张政治民主、经济平等、思想自由。由于与徐复观间的交情，殷海光与《民主评论》颇有往来，但双方关于自由与中西文化思想评价渐行渐远，终于引发中西文化论战，徐复观与殷海光一度也因此产生对立。直到殷海光晚年，双方紧张关系才渐趋缓和。

抗国民党政权的先声。

殷海光当时还动手翻译了美国经济学者哈耶克的经典名著《到奴役之路》，于《自由中国》连载；并发表《政治组织与个人自由》、《独裁怕自由》、《这是国民党反省的时候》、《个人为国家之本》等文章。他坚信，哈耶克《到奴役之路》一书，终于为他十多年的反共找到了正路，从政治上的自由主义，升华到经济上的自由主义与经济科学，催生了对自由经济的坚持。

但随着《自由中国》言论日趋激烈，国民党又在获得美援的稳定情势下，态度逐渐强硬，双方摩擦日益激烈。雷震在殷海光的强势笔锋下，成了国民党的心腹之患。殷海光的强硬态度，不但使原本《自由中国》内有些立场温和的学者吃不消，有时连雷震也无法抑制这种站在钢索上的情势；不过殷海光仍在 1953 年10 月与结识八年的夏君璐结婚，并于次年赴美国进行一年的学术访问。

殷海光返国后，《自由中国》与蒋家的紧张关系没有任何好转，雷震历经多次打击；远在美国的“五四之父”胡适，越来越显得消沉，欠缺作为，被时代磨去了光彩。因此殷海光当时便从纪念“五四”的系列文章开始，反思如何让五四精神中的民主与科学两项核心价值能够在台湾扎根，履行他作为“五四之子”的神圣使命。这也象征着殷海光全然崇拜胡适的时代已然过去，乃至于在雷震案发生后，殷海光更对胡适极端地失望。

至于《自由中国》方面，则自 1957 年 8 月开始，推出一系列社论，以“今日的问题”为总标题，全面检讨台湾的政治、经济、军事、司法、教育和新闻。殷海光获得了台湾知识分子的高度声望与评价，但这也成为国民党与《自由中国》双方彻底反目的导火索。

“今日的问题”系列社论，首先刊出的文章便是殷海光执笔的《反攻大陆问题》。甫升上台大教授的殷海光指出，中国共产党当年在江西只有八百条枪尚且没有被扑灭，现在共产党在大陆手握世界第三强大的武装力量，台湾及外岛需要美国第七舰队保护和支持，这证明它自卫尚成问题，怎么能够“反攻大陆”？他认为，无论就国际形势还是就现代战争的必要条件来说，“反攻大陆的胜算都甚微”。国民党抓住这个口号不放，“弊害横生”。

事实上，蒋介石退守台湾后，一直将“反攻大陆”、“统一中国”这个遥远的梦想当成巩固自身权力、团结内部的力量。殷海光大胆点出其为“国王的新

衣”，在台湾立即引起轩然大波，国民党自然容不下。于是《自由中国》被扣上“提倡反共无望论”的大帽，想要“扯垮反共抗俄的政府”，“主张两个中国”，因此遭到国民党的文宣班子与御用文人连番炮轰指责；连胡适也认为殷海光没必要触碰这个敏感问题，无端去打击其他人的招牌或希望。

不料这并未吓退殷海光。他继续写了《关于“反攻大陆问题”的问题》，反驳国民党宣传“反攻大陆”的做法，是要人民去追求渺茫的幻影。殷海光甚至打算发表《与胡适先生论“反攻大陆”问题》，只是这篇“五四之子反驳五四之父”的文章，并未于当时的《自由中国》上刊出。

不仅继续在《自由中国》杂志上写社论，针砭时局，殷海光甚受学生爱戴，因而经常通过演讲传播理念。1958 年 12 月，殷海光在台大演讲“胡适与国运”。提到对现代中国思想最有影响的人物，他举了康有为与梁启超、陈独秀和胡适，既没提国民党塑造的偶像，对“三民主义”也没有恭维，招致国民党某些人“极度不满”。自此之后，台大学生再邀殷海光演讲，一概遭学校训导处拒绝；殷海光在学校刊物上发表的文章，也被校方主动要求拿掉。

殷海光与当局闹得僵；已决心另组新党的雷震，更是国民党眼中的定时炸弹，已被国民党政府的警备总部盯梢监视，可是《自由中国》一篇篇批判国民党的文章却照出不误，导致一股“山雨欲来风满楼”的紧张情势。在这个当头，胡适为缓和气氛，在《自由中国》上发表了《容忍与自由》，称容忍是自由的根本，没有容忍，就没有自由。

胡适的观点，引发台湾新一批知识分子的反驳，认为容忍就是妥协，胡适不该纵容有大权力的国民党政府为所欲为。激昂的殷海光紧接着在下一期杂志上发表《胡适论“容忍与自由”读后》。他自是尊重胡适，但也指出，古往今来容忍的总是老百姓，导出必须以权力制约权力的观点。

1960 年，雷震积极与台籍政治人物筹组新党，殷海光虽然没有直接参与，但在 7 月的《自由中国》杂志上发表《我对于在野党的建议》一文，分析未来新党的名称、基本目标、政纲、工作重心和基本态度等；又于 9 月 1 日的社论指出，台湾热衷于自由民主宪政救国的人士积极筹组一个新党，作为实现自己抱负的机构，乃“大江东流挡不住”。

但国民党政府已无法忍受知识分子的直接挑战，决心出手压制这股政治热情。于是，“雷震案”爆发，雷震被冠以“包庇匪谍”、“知匪不报”等罪名而

逮捕，随即被判刑十年入狱；新党胎死腹中，《自由中国》杂志遭查封。

惨遭封杀与各界批判

陷于随时可能被捕危机的殷海光，没有忘记自己的道义责任。一向以辛辣与孤傲闻名的殷海光在《民主潮》发表抗议文章，并以殷海光、夏道平和宋文明等三名《自由中国》社论执笔人的名义发表共同声明。

声明中也毫不留情地批评警备总部的起诉书“断章取义”、“东拼西凑”、“张冠李戴”，“这一编织的结果，与我们的文章原义完全不符。我们认为这种举措，关系乎我们个人者尚小，关系乎言论自由者大，关系乎中国政治民主前途者更大”。殷海光甚至预告要把那些被指控的文字，全部搜集起来，印成专册让广大读者公评。

然而要以书生之笔对抗整个政府机器，谈何容易？殷海光虽为雷震抱屈，对胡适感到灰心，但也对国民党政权无能为力。其后殷海光还是写，但却专注于学术研究，不再撰写批评台湾社会政治问题的文字，努力锻炼“隔离的智能”。

只是处于隐居状态的殷海光却未能如愿得到宁静。在《自由中国》杂志之后，新一代的《文星》杂志先后刊出李敖《老年人与棒子》、《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于台湾思想舞台又一次掀开“中西文化论战”。由于《文星》代表60年代台湾青年冲破传统、向思想权威挑战的思潮，已成为殷海光门下弟子主要发声场域。李敖不仅是殷海光的弟子，而且文章笔锋有浓厚的殷海光气味，殷因此被认为是“西化论”背后的策动者，再次被推上舆论中心。

殷海光于1962年10月给弟子林毓生的信中为自己喊冤：

> 据道路传闻，说在西化派这一方面，是我在后面调度。咳！这真是天大的冤枉。年来我形同隐居，不问外事，报也不看了。除教书糊口以外，我唯一努力的工作就是完成中国近代思想史。哪有闲空去搅这个浑水！

尽管不愿卷入论战泥沼，是非还是找上他。1963 年英国《中国季刊》(*China Quarterly*) 刊登台湾专论，其中 John Israel 写的《台湾的政治》提到殷海光，说他学尚罗素，隐含推崇他为台湾自由主义思想领袖的味道。这让反对阵营很不是滋味。徐高阮首先于《中华杂志》撰文直指殷海光为学术欺诈者，没有学术真诚，全盘否定殷海光的人格与学问。

不过谩骂并不能抹灭事实，由文星书店出版的殷海光学术著作《思想与方法》半年后即再版。硬邦邦的书能在短时间内通过市场考验，可说是知识界对殷海光的肯定，这让他感到快慰与鼓舞。

《中华杂志》是由主张复兴中华文化的台湾资深“立法委员”胡秋原创办，与主张西化的《文星》形成强烈对抗。事实上，胡秋原当时颇有声誉，与钱穆、牟宗三、唐君复等人都是徐复观所办《民主评论》中重要的作者，但力主尊崇传统文化，与殷海光一派尊崇西方民主法治、质疑传统文化的论点原本就相互攻讦。

另外，由于胡秋原一路被李敖等人批判为学识与思想不足，并揭露其曾参与“闽变”，因此对《文星》同人深恶痛绝。《中华杂志》与《文星》对中西文化的论战终于演变为胡秋原与李敖的战争。两人一路由笔仗打到法院的诽谤官司，缠讼三十年，最后以李敖要求法院查封胡的房子收场，堪称一绝。

至于出身左派的徐高阮则是台湾“中央研究院”副研究员，与“调查局”、“情报局”和国民党“总政治部”都有渊源，可说是炮打《文星》和殷海光的第一战将。

徐高阮对殷海光的第一击没有奏效，又继续在《中华杂志》发表文章，改指文星书店为“卖国集团”的“知识欺诈教练”；胡秋原也加入围剿，除了批判殷海光“反传统”、“伪自由主义”，还帮他扣上了红帽子，批评言论意图颠覆。一连串的攻讦，说穿了都是针对殷海光而来，这也预告着当局对其下手是迟早的事。

1966 年元旦，殷海光讨论中国近百年来社会文化对西方文化冲击反应的《中国文化的展望》由文星书店出版。这是《自由中国》后，殷海光“独自出发来寻找出路和答案”的结晶，希望找出中国社会文化今后可走的途径。

然而风波不止，当年，台湾当局要求知识界联署给美国政府的长信，竭

力批判亲近中国共产党的学者费正清，遭殷海光拒绝，已是落叶知秋。这段时间内，文星书店先遭整肃。紧接着通过胡秋原和国民党“中常委”张其昀发难，在台大校长钱思亮的授意下，殷海光被迫主动撤掉“国家长期发展科学补助金”申请。没有了每个月六十美金的这笔补助，相当于要殷海光放弃生活费用的一半。

1966年7月，发行半年的《中国文化的展望》被查禁。

国民政府自1930年开始实施“出版法”，至1999年1月25日台湾公布废止“出版法”，在国民政府统治下，强制的出版品送审制度实施了六十八年。上世纪80年代以前，特别是白色恐怖的60年代，是台湾查禁书的高峰。1977年，台湾“警备总部”、台湾“省政府”和台北“市政府”联合编印《查禁图书目录》，其中条列两千多本禁书书目，李敖和柏杨的个人著作被查禁最多，两人知名度也随被禁的数量而水涨船高。

台湾当局当年查禁书籍的理由大致包括与人有关的违反“戒严法”以及与内容有关的违反“出版法”。前者如30年代作者巴金、沈从文的作品，《基度山恩仇记》、《三剑客》、《十日谈》等列名世界名著、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学生文库翻译小说，原因是翻译者或作者“附匪”，没到台湾来；至于后者则占了禁书目录很大一部分，多半冠以“败德”、“诲淫”等帽子，例如《查泰莱夫人的情人》、《金赛性学报告》，还有台湾女作家郭良蕙的小说《心锁》。

至于殷海光的《中国文化的展望》被查禁，理由则是“该书内容反对传统文化精神，破坏社会伦常观念，足以混淆视听，影响民心士气”。

被逼离台大　含恨而终

1966年8月，台湾“教育部”致函台湾大学，拟聘殷海光为“教育部”教育研究委员会委员。

其实在此之前，胡秋原就已致函台大，批评殷海光学养不足，不配做教授，最多只能做个职员。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打击，殷海光意识到，这是国民党“调虎离山”，以调职达到解聘目的。甚至特务机关也介入了风波，软硬兼施地要殷海光离开台大。1966年8月12日，根据殷海光的自述，“警备总部”出

动三名高阶特务对他进行问话，并且强迫他接受“教育部”的聘书。但他并未屈服于特务的恫吓，仍然坚持不接受。特务因为他是知名学者，担心逮捕他引发国际争议，因此而不敢多加留难。8 月 25 日，“警备总部”又派了更高层级的官员，带着“教育部”聘书到他家，明白地告诉他：“政府要你和台湾大学一刀两断。”

事已至此，殷海光大事后主动致函台大校长钱思亮，表明自己没有一定在台大待下去的意思，不过希望得到一些时间，设法到别地谋生；或者转到研究中国近代历史之类的纯学术机构，从事研究，让他完成预备著作的《中国近代思想史》。他甚至做了最悲观的打算，“如果连这都办不到，我再设法做点小生意谋生”。台大同意给殷缓冲时间，以台大教授之名再聘他一年，课表照开但终止上课，而且第二年 7 月，殷与台大的一切关系脱离。

9 月，当局还是劝殷海光接受“教育部”的聘书，但送聘书到殷家的居然是安全人员和党部人员，殷海光认为“他们像恶霸一样，强暴了女人，又要受害人自己代他们掩饰”，于是愤慨地拒绝了聘书。他说：“我敢拿生命打赌，我不会接受那张聘书，我也不会去做官。”

在这段时间内，殷海光饱受特务跟监的困扰。在李敖的建议下，为了避免连累上门求教的学生，殷海光在门口贴上了“不见学生”的条子。甚至哈耶克来台访问，希望一见殷海光，都被特务机关从中作梗，这让殷海光愤怒不已又莫可奈何。但他仍坚持，“只要活着一天，便会追求真理、自由、正义与友爱”。

只是年初被迫放弃补助金已经让收入少了一半，拒绝聘书这个决定虽然有“义不食周粟”的味道，也等于是断了自己的经济来源，殷海光于是致函美国的朋友找工作。为了生计，他也接受齐世英之邀，为《时与潮》杂志撰文。

向来孤傲的殷海光此时也不得不向友人和学生求助。1967 年 1 至 3 月，他先后写给许冠三和张灏的信中提到：

我是一个很不善谋生的人。说来也惭愧，离开校门二十多年后，依然“两袖清风”……我的收入被切掉了一半，另一半今年 7 月 30 日停止。所以，生计马上临头，躲也躲不掉。……我如今，头发如霜，现实里的一切，

什么也不属于我，连基本的生存也成问题，还要student-friends来支持，并且还要向那陌生的“学术市场”出售自己。

1967年3月，殷海光感到身体不适。在几位学生催促下，他到宏恩医院检查，竟被诊出是胃癌，随即转到台大医院，5月1日动手术，胃被切除三分之二。此时哈佛大学决定聘殷到哈佛与史华慈从事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研究，但其赴美手续一直受到刁难。直到11月，哈佛燕京学社主任裴理哲亲赴殷海光宿舍，当面议定在殷海光未离台前，研究费照发。

拖着病身的殷海光，虽对撰写中国近代思想史做了准备工作，却始终没有动笔，反倒是在养病中对自己以往的作品做了反省。1968年9月他写到：“我二三十年来，与其说是为科学方法而提倡科学方法，不如说是为反权威主义、反独断主义、反蒙昧主义、反许多形色的ideologies而提倡科学方法。”并检讨了他所崇奉的“五四”：“自五四以来，中国的学术文化思想，总是在复古、反古、西化、反西化，或拼盘式的折中这一泥沼里打滚，展不开新的视野，拓不出新的境界。”

在殷海光的晚年，也与先前因历史文化与五四定位永生争议而翻脸不联络的徐复观，重新拾回了交情；或许是殷海光认为够格的知识分子已然不多，不希望当时还与《文星》杂志大打官司的徐复观双方两败俱伤，因此亲自出面去找徐复观，要他设法“休兵”。受到徐复观的影响，在病床上的殷海光对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思潮的汇通，有了深一层的认识。他也勉励一生中相得相敌数次的徐复观，超越现实自我，不计外界毁誉，探求中国的历史文化。

在生命的最后，1969年，对于他曾经信奉、最后却是打压他最甚的国民党，殷海光不改锋利，以英文撰写长文《剖析国民党》，指出国民党因为一党专政造成的种种弊端。这一年，也是五四运动五十周年，殷海光在家中放爆竹庆祝，并于《大学》杂志发表《五四的隐没与再现——纪念五四五十周年》，其中说：

五四运动提倡民主及科学，五十年后，民主完全落了空，科学的基本态度也很少被人接受。但是，如果二者是人的生活所必不可少的要素，那

么就会有许多人不断地追求它们。如果有许多人不断地追求它们，那足见它们还是社会文化变迁的动力。如果它们还是社会文化变迁的动力，那么迟早可能有再现的日子。

6月，殷海光因为癌症复发住进台大医院，医院已经束手无策，只有让他再度回家疗养。许多学生和朋友前去探病，殷海光还是忘情地长谈：

我思想发展的轨迹有明显的条理的，一方面我跟反理性主义、蒙昧主义、褊狭思想、独断教条作毫无保留的奋斗；另一方面，我肯定了理性、自由、民主、仁爱的积极价值，我坚信这是人类生存的永久价值。

由于国民党当局的全面封杀，殷海光从国民党文宣核心终至贫病交迫，连医药费都得通过学生接济。1969年9月初，与“五四”同年的殷海光，在白色恐怖中，病情再次恶化。9月16日下午5时45分，殷海光在夫人夏君璐陪伴下，病逝于台大医院，时年五十。

殷海光过世后，他在台大哲学系建立的自由派学术园地也遭整肃。1972年底，在台大森林馆第一教室举行的一场“民族主义座谈会”上，台大哲学系讲师王晓波在会中谈统一中国，副教授陈鼓应以国民党未实践孙中山的民族主义而批判国民党。当时台大哲学研究所研究生冯沪祥起身批判陈鼓应“专门攻击政府黑暗面”。陈反驳道：“大家都知道你是职业学生，有意见你向上级报告好了。”哲学系学生钱永祥也接着指冯“职业学生的话不能听”。

这场争论后不久，1973年春节刚过，钱永祥等三名台大学生被“警备总部”逮捕，罪名是“为匪宣传”；接着陈鼓应和王晓波也被约谈后逮捕，这就是台大校园的“哲学系事件”。

虽然被捕的哲学系师生通过校长阎振兴奔走后保释，但同年发聘书时，台大校方并没有与国民党政权相对立。不同于过往傅斯年的治校风格，台大选择了屈服，陈鼓应没收到聘书，被迫离开台大；次年6月，王晓波等十余名教师也不获续聘；1975年，又有专任讲师遭解聘，台大哲学系三年间总计被解聘十三位教师，而且立刻出现递补名单，甚至哲研所被“教育部”勒令停招一年。当时校园即盛传蒋经国主导的政战系统是幕后黑手。

经此事件，台大哲学系师生不再过问社会政治。70年代末至80年代的台湾民主化运动中，台大法学院扮演主要角色，哲学系反而缺席。直到1993年的“五四”之后，由台大自由派学者组成的“澄社”主办“台大哲学系事件二十周年”研讨会，多位在当年目睹“哲学系事件”、如今成为台大教授的出席者要求学校重新调查此一事件，并对当事人受迫害的问题有所补救，才获得平反的机会。

“五四之子”的光芒

殷海光故居位于台北市温州街，离“紫藤庐”不远，也是一座日式砖造平房。院里的护城河、小水池和花草树木，都是殷海光被软禁期间亲手挖掘或栽植的。夏君璐印象深刻，当时每天总有一部吉普车停在温州街的台大宿舍门外，特务守得无聊时，还会打羽毛球打发时间。如今温州街附近的戒严气氛不再，“紫藤庐”也没了当年“密谋造反”的政治味，反倒是空气中依旧弥漫着浓浓的人文情怀，吸引许多推动人权、人文的非政府组织来附近设立办公室或工作室。

“紫藤庐”这栋老屋，因为地利与人和，恰巧折射出了1949年后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台湾经历的三个时期。[①]早在为国民党稳固政权的白色恐怖时期开始，殷海光等人经常于“紫藤庐”聚会，形成对抗蒋氏专制政权的堡垒；并在“反共抗俄”的共同旗帜下，建立了《自由中国》、《文星》、《大学杂志》等刊物的发言台。只是雷震入狱，殷海光遭软禁，《自由中国》无疾而终；李敖与《文星》杂志被国民党无情取缔，另辟道路、主张“台独”的彭明敏则长期流亡海外。

直到70年代末期，随着台湾社会活跃，各类型民主运动逐次展开，包括于1975年创刊的《中国论坛》，吸引了一批以温和批判的方式，撰文要求台湾实践自由、民主、法治的学者参与，台大政治系教授胡佛、杨国枢、林毓生等人

①台大政治系教授、纪念殷海光先生学术基金会董事江宜桦于《谁为自由主义传薪火》一文分析了这三个阶段的差异。

成为新的学术中坚，与当时的党外人士相互呼应，要求国民党终结戒严专制；“紫藤庐”则成为党外运动人士的避风港，陈映真、李敖、陈鼓应、施明德等左、右、统、独政治立场者都在此出入。

自由派学者与党外运动相唱和，胡佛和陶百川曾奔走、助成“民进党”成立。但不同于雷震、殷海光以身殉道式的实践，台湾这批以留学美国为主要背景的知识分子，并非反对运动的主体，多以批评政府与施政为主要号召；冲锋陷阵甚至身陷牢狱的政治任务，则交给了一批批的党外运动人士。

但由于自由思想扩散，社会团体屡屡以抗争手段争取权利，国民党政府终究无法继续采取高压手段压制民主的发展，因此在蒋经国推动与默许下，国民党开始松手，雷震的组党理想终于在1986年，由“民主进步党”代为实现；1989年，杨国枢和胡佛等人成立“澄社”，通过知识分子论政团体，赓续《自由中国》以来促进自由主义社会的理想，形成一股书生问政的风潮。

只是这股理想主义与自由主义的浪潮，因为理念维系不易，社会日渐多元，加上政治人物催生本土化的民粹潮流，终于逐渐显露疲态，转而被视为一种“保守主义”的观点，甚至变质为学者投身政坛的终南捷径。怀有中国情的自由派学者，不得不深思统独与民主的优先性问题，因此也不得不另觅一个与实际政治势力保持距离的立足点。①既然理想不再，“紫藤庐”终于成了商务往来的茶艺馆，自由主义与党外抗争遗留的气息反成了商业卖点，文人与寻求人文味者交错，使“紫藤庐”走入商业与文艺交错的时代。

作为西方产物的自由主义，从“五四”以降，与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有着难以言喻的亲近性。包括强调自主性，抗拒专制的基本原则，不但与传统中国士大夫从小被要求读圣贤书，培养道德勇气与独立批判性，不惜成仁以取义的精神相通，“五四”揭橥的自由、民主、法治目标，更可化约为自由主义的法治原则。

因此当接触到传统自由主义大师哈耶克的理论后，胡适、殷海光都大为折

①根据江宜桦的分析，知识与行动既然有隔阂，当本土化趋势主导了反对运动的走向，便导致了知识分子必须有所抉择而分离成不同阵营。因此第三阶段的“澄社”成立时，发起成员虽然坚持论政而不参政，希望凝聚原先书生论证的政坛氛围，但本土化潮流带动的统独之争，还是让部分创社成员选择离去，“澄社”也因此与处于上升阶段的“民进党”越走越近。

服，成为了自由主义的信徒。

只是这批五四人物，其主张自由主义以及反抗权威的精神，经过政治的解读，都曾不见容于当局，也因此产生了大批的历史悲剧。但中国知识分子对社会改革的理想性已根深蒂固，于是自由主义在历经磨难后，如今又成为两岸学界讨论的重要焦点。

其实回顾殷海光在自由主义道路上的坚持，也不过是思辨上的自由和逻辑上的真理，在今天看来，都只是知识分子应该具备的基本共识与原则。但在台湾，因为统治者担心失去权位的恐惧，采取了不同于逮捕监禁等强制手段的软性挤兑措施，因此殷海光病逝前九年以及其逝世后二十余年总共长达三十年的岁月，“殷海光”三个字就像是黑板上被抹去的粉笔字。

尤其自雷案发生至殷海光去世间的九年，他形同被软禁，传媒对殷海光的动态，包括罹癌，不敢有只字提及；连过世的消息，也只是寥寥一百字简讯处理，大略叙述殷海光临终前嘱将遗体捐给台大医院。台北《中央日报》关于殷海光的生平，更只提到殷海光曾是《中央日报》的主笔，《自由中国》的这一段被一笔画过，只字未提。①

殷海光过世后两年，夏君璐带着独生女移居美国，离开伤心之地。直到雷震出狱后，1976 年在南港与深坑交会处的南港公墓，挑选一块约一百五十平方米的高地，命名“自由墓园”；1978 年初，才由周联华牧师于怀恩堂主持告别仪式，将殷海光的骨灰移葬于此；其后，1979 年雷震病逝，亦火化安葬于“自由墓园”。

1994 年，殷海光去世二十五年后，“纪念殷海光先生学术基金会”成立了，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李远哲、院士李镇源和台大校长陈维昭都出席盛会，随女儿、女婿定居美国加州的殷海光遗孀夏君璐也专程返台。夏君璐对于台湾政治气氛的改变无限感慨地说：“实在无法想象二十多年前我先生卧病在床，正一步步走向死亡，门外却仍有特务在守候的情景。”

1967 年殷海光在宏恩医院诊出胃癌时，即口述遗嘱提到：“在我的思想快

①在殷海光病痛期间出力甚多的李敖，更批评殷海光在生前死后这段时光中，被各方人士神话、党化、国化，把殷海光形容成迷途知返的中国文化的坚定维护者。他更在自传中形容，在国民党强权统治松懈后，各式各样殷海光的朋友跑了出来，“大作殷海光秀”。

要成熟时，我怕没法写下来，对苦难的中国人民有所贡献；对青年一辈，可能没法有一个最后的交代。《思想与方法》、《中国文化的展望》只是一个开始，何况我又一直在改变和修正我自己的思想。我若死在台湾，希望在东部立个大石碑，刻着‘自由思想者殷海光之墓’。身体化灰，撒在太平洋里，墓碑要面对太平洋。”

对照着国民党威权统治的日薄西山，虽然不是个很有活动力的运动领袖，甚至也只有在学术小圈圈里才得观其风采，但殷海光敢以个人力量坚毅不屈地对抗国民党，终于让国民党的围堵转为扩散，使他成为台湾思想界的启蒙导师、名副其实的“五四之子”，也是难以再创造的重量级大师。

在待人接物上，殷海光曾引李敖的评语自嘲，说他自己“为人应世笨拙不堪”，不同于李敖的灵巧、自卫。殷海光说自己和他人接触时，从不轻易判断他人别有用意，也常因此吃亏；但这也被他形容成“理想主义者常常不免为他的理想付出这类吃亏的代价”。不过，李敖还是笑他书呆子气十足，容易被小人利用。

在思想与信仰上，一如殷海光所剖析，他的思想不断在转变，从国民党的青年文胆，到信仰胡适思想、坚信唯有胡适思想普及于民方能救国，到坚持自由主义，乃至于晚年对传统文化较为温情的观照，殷海光在思想上逐渐走出了五四一代的新路，不再为德先生或赛先生的命题所困扰。

也因为如此，要求胡适恢复五四时代坚持的殷海光，对胡适晚年趋向保守、高谈容忍比自由重要、提及“若想他人容忍我们的见解，我们必须先养成容忍别人见解的气度”，是如此的难以忍受。他批判胡适是妥协的自由主义者，在海外为国民党擦脂涂粉，甚至“心智已死”，照亮时代的明灯被浓雾掩盖。他甚至认为自己在思想努力的进程上，要超过胡适一百年，超过钱穆至少五百年；他甚至说，终生崇尚美国文明的胡适，在学养与思想根基上太为浅薄。

殷海光于逝世前以口述方式完成《海光文选》，他在自序中说：

> 中国现代的五四运动，也难免受这种历史命运的支配。作为一个历史事件来看，五四运动已经过去了。如果历史不是循环的，那么这个事件就不会回头。我自命为五四后期的人物。这样的人物，正像许多后期的人物一样，没有机会享受到五四时代人物的声华，但却有份遭受着寂寞、凄凉与横逆。



⬆ 殷海光与夏君璐合影，摄于1954年新婚不久。夏君璐十七岁读高一时就迷上了殷海光。之后发誓一定要跟殷海光好，从此义无反顾。殷海光在夏君璐眼中，是全世界最有学问、最了不起的人，所以打定心思，要跟他一辈子，即使当佣人也愿意。1948年，殷海光寄给夏君璐一本哲学书。夏君璐的父亲在读书时，发现了书内的金条。那是殷海光给夏君璐去台湾的路资。夏君璐后来去了台湾，嫁给殷海光。殷海光去世后，夏君璐去了美国，还干了很久的大厨，每天在餐馆工作十四个小时。

这或许是自命为“五四”后期人物的殷海光，对他心目中真正的五四人物——胡适的一种暗喻式的抗议。也因此他认为，五四运动的两种倾向，包括反偶像主义与偏向的声诉，一是起了情绪作用，动荡效果大于建设；其次则造成思想与信仰的不宽容，结果把科学当成了唯科学主义，导致推行西方民主带来了悲惨的结果，因此他才在晚年提倡中国传统与西方自由主义对话的问题。但他也指出，“五四”的盛名，让“五四”成为守旧派炮轰的箭靶，把中国近代祸乱的责任全部推给“五四”，但想要中国新生进步，还是要靠“五四”提倡的民主与科学。



雷　震
Lei Zhen
与国民党恩怨难分的一生

不必为我悲哀，应为我从容就义感到骄傲。

——雷震

"万山不许一溪奔，拦得溪声日夜喧。到得前头山脚尽，堂堂溪水出前村。"这是南宋诗人杨万里的诗《桂源铺》。

曾是蒋介石手下党政要员、"政治协商会议秘书长"、"反共抗俄"样板的雷震，在迁台之后，由于鼓吹推动民主政治，成立新政党，被国民党政府以莫须有的罪名判处冤狱十年，由党政高层沦为阶下囚，遭国民党集团式的压迫与围剿。

雷震案发时，年近迟暮的胡适，对蒋介石的高压手段已束手无策，只能借雷震在狱中度过第一个生日的机会，手书《桂源铺》一诗慰问。诗中暗喻身陷囹圄的雷震，正如一股清流，被阻挡于万山围绕中，只能期待终有一日云开雾散。雷

震感念胡适的友情，把这首诗放在每本日记与回忆录的封面上。

中华革命党出身　党政资历完整

雷震，字儆寰，1897 年 6 月 25 日出生于浙江长兴县小溪口镇，谱名雷用龙。父亲雷天寿来自河南罗山，因移民开垦南下；母亲陈氏是浙江当地人。

雷震于 1903 年进入私塾受教育，父亲在他十二岁那年过世；1910 年，雷震先后进入安长小学堂、浙江省立第三中学接受新式教育；1916 年，参加反帝游行，同年毕业后赴日留学，正式更名为雷震。

1917 年，雷震在日本东京举行的"五九国耻纪念会"上，由国民党大老张继、戴季陶介绍，加入中华革命党。[①]1918 年，北洋军阀政府与日本签订《胶济铁路密约》，留日学生哗然，倡议"罢学归国"。雷震响应号召返国支持运动，但在亲友劝告下，于当年 12 月再度赴日。

日本留学期间，雷震先后就读于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附设中国学生特别预科文科、名古屋第八高等学校，并于 1923 年入京都帝国大学法学部就读。1926 年 3 月，雷震自京都帝国大学政治学系毕业，进入研究院，跟随知名宪法学者森口繁治研究宪法，但只读一学期，即于当年冬季返国。

1927 年，蒋介石领导国民革命军光复浙江，甫自日返国的雷震以党员身份执掌浙江省立第三中学。经戴季陶介绍，雷震进入国民政府法制局担任编审，局长为留英且同样专修宪法的王世杰。雷震从此与王世杰建立了紧密的联系。[②]在为国民政府工作期间，兼任中央军校教官、中央大学法学院教授

---

①雷震：《雷震全集》第十册，台湾桂冠图书公司，1989 年，页 413。

②随着戴季陶担任国府考试院院长，雷震历任国府考试院编译局编纂、铨叙部秘书等职务。不过国民党内派系分歧严重，尤以陈立夫、陈果夫的"CC 派"最好斗，屡发起党争。CC 派称国民党初期右派分子与进步党员背景者为"政学系"；又称在汪精卫任行政院院长时的内阁成员与部属为"改组派"，王世杰即被归类为"政学系"首领之一，雷震自然也有此色彩。日后雷震被蒋介石重用，从事党政、党际协调工作，尽可能维持派系中立，却仍免不了被说闲话。他也最厌恶国民党内派系攻伐，相互斗争、整肃致死方休。《雷震回忆录之新党运动黑皮书》，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3 年，页 200。

等职务。

1931年雷震与宋英女士于北京结婚。婚后当选国民党南京市党部委员，继任书记长及常务委员，负责宣传工作。他提出《行政改良刍议》，主张国民党进行组织改革。第二年，雷震担任中国国民党南京党代表大会主席团主席。

1934年7月，王世杰担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雷震获拔擢为教育部总务司司长。由于中国与日本关系日趋紧张，雷震陆续发表《抗日抵货之合法性》、《热沪情势之透视》、《救国应先恢复民族精神》、《荒谬绝伦之日本声明书》、《日侵占榆关与世界大战》、《我们要起抵抗的心理才能排除困难》、《非常时期之意义》、《临难毋苟免》等爱国主义文章，并创办《中国新论》杂志，督促国民党政府抗日。

因王世杰的关系，雷震与国民党关系紧密，被选为候补监察委员，兼任国



⬆20世纪40年代，雷震与妻子向筠及五个小孩一起畅游无锡太湖。雷震很注重享受家庭生活，饮食游乐是闲暇时间经常安排的活动方式。他还喜欢与家人在南京附近踏青，家庭关系非常融洽。

民党政治委员会所属财政专门委员会委员；对日战争爆发后，随王世杰离开教育部，出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设计委员。①

1938 年 2 月，雷震的母亲于长兴家乡遭日军硫磺弹击中身亡，享年六十四，这更坚定雷震抗日到底的决心。一般以 1937 年七七事变为抗日战争起点，但雷震主张，日本侵华战争的起点应从 1931 年九一八事变算起。

国民参政会成立，王世杰出任秘书长，雷震随之任秘书兼议事组主任，负责实质协调与政务推动。1939 年雷震出任蒋介石主持的“国民参政会川康建设期成会”、“全国经济动员策进会”主任秘书一职，同年递补国民政府监察委员。因深获蒋介石信任，雷震于 1943 年升任国民参政会副秘书长，各兼职不变，且多了“宪政实施协进会秘书长”这一头衔。

效忠蒋介石成党政红人

1946 年 1 月，雷震出任“政治协商会议”秘书长，负责协商各党派及国民党内各派系意见，他尽可能维持中立立场。

11 月，国民党推动成立的“制宪国民大会”开幕前后，雷震以制宪国大与副秘书长身份，负责协商与国民党订约筹组联合政府的青年党与民社党参与制宪国大，号称“南京第一忙人”；次年又当选新成立的第一届国民大会代表。同年 4 月，蒋介石当选总统，授命翁文灏组阁，雷震担任政务委员；但年底改由孙科组阁后，雷震决定离职。

1949 年 2 月 12 日，雷震与胡适、杭立武等自由派学者讨论后认为，国民党不做改革、不实施民主宪政、不打文化战，很难对抗共产党的势力和周边的投降、主和论调；因此主张仿照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戴高乐发行《自由法国》的经验，以“自由中国”隔长江对抗“共产中国”的方式，筹备在上海发行《自由中国》杂志，成为“自由中国反共活动”的一环，宣传自由主义与民主、反共思想，并借自由之名义团结在海外的知识分子，重新建立已相当危急的国

---

①1938 年 1 月，王世杰出任军事委员会参事室主任，开始参赞蒋介石党政外交机要。雷震也因此与蒋介石维持了一段长时期的部属关系，仕途一帆风顺。

际关系，扫除国民党政府的不利影响。[①]

为取得蒋介石的认同以及经费支持，雷震于1949年4月3日赴溪口，向已下野的蒋介石报告构想与出版计划。蒋介石答允补助经费，并鼓励积极进行。[②]因此雷震、杭立武、王世杰等人分头向汤恩伯、胡宗南、陈诚募款。行动刚起了头，却因中国共产党军队迅速渡过长江，国共内战激烈，此一构想只好暂时喊停。

在国共内战最紧张时，雷震担任京沪警备司令部政委顾问，与谷正纲、方治协助汤恩伯在上海、厦门等地展开国民党军的防务工作，也曾协助稳定上海金融，被陈诚称誉为“三剑客”之一。

1949年10月，国民党大举迁台，雷震在汤恩伯防卫的厦门陷落后，搭船赴金门，继而在台湾高雄上岸，向蒋介石报告厦门失陷与金门防务问题。随后他被蒋介石任命为台湾防卫司令部材料动员委员会主任委员，台湾防卫总司令孙立人出任副主委，担负筑构防御工事，开征“防卫捐”。1950年蒋介石又聘雷震担任“总统府国策顾问”、“中央银行”监事等职，参赞高层党政军机要，成为蒋介石的智囊。

迁台首创《自由中国》

雷震迁台后，本计划在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会继续推动国民党改造，但他再次与时任“教育部部长”的杭立武讨论后，决定先落实出版政论刊物构想，以团结自由民主人士。两人商定由“教育部”每月补助三百美金，提供办公场所，委由在美的胡适挂名发行人。11月20日《自由中国》半月刊创刊，由“反共抗俄宣传费”补贴，雷震主持，积极宣传自由与民主理念以对抗共产主义。他主张《自由中国》不走知识分子路线，而应诉之于大众。

①根据雷震描述，大陆时期，他与胡适商量筹措美金十万元，在上海兴办日报。胡适认为隔着长江天险与国民政府兵力，情势应该会维持长期僵局。日后国民党迁台后再筹办《自由中国》，也没有当时的大手笔。雷震：《雷震回忆录：我的母亲续编》，台湾桂冠图书公司，1989年，页59。

②《雷震全集》第三十一册，1949年4月4日日记，页173。



⬆ 1949年，雷震一家初到台湾时的合影。就是在这一年，他与胡适、王世杰、杭立武等筹备在上海建立一份名为《自由中国》的杂志，并曾赴溪口向蒋报告，取得其赞同，但因为中国共产党的军队渡过长江威逼上海而未成。雷震协助汤恩伯忙于上海、厦门守备工作，并参与国民党改造工作。1949年10月雷震赴台湾，并再次与杭立武讨论办刊事宜，受到杭的支持。杭当时是“教育部部长”，由他出面资助《自由中国》的成立。11月20日，《自由中国》半月刊在台北创刊，在美国的胡适挂名发行人；雷震为实际负责人，负责经费、约稿、撰稿、校对、主持编辑委员会议等事项。在蒋介石为宣示政治改革决心以取得美援背景之下，自由派人士纷获见用，1950年雷震被蒋介石聘为“国策顾问”。

由于雷震立场鲜明，《自由中国》半月刊杂志出版初期获得蒋介石默许，包括孙立人、执掌“海军总部”的桂永清，甚至日后执行“雷案”并将雷震逮捕入狱的黄杰等人的辖下部队，以及许多国民党机关，都订阅了《自由中国》半月刊，称誉这是最珍贵的“精神食粮”，使《自由中国》成为岛内销量最广的政论刊物。雷震从邀稿、撰稿、编辑、社务几乎一手全包。当时《自由中国》仍维持拥蒋反共的一贯立场。

其实来台后复行视事的蒋介石，初期也对自由派学者相当礼遇，除礼聘胡适出任“中研院院长”、委派傅斯年任台大校长外，台湾当局也积极请托各方知名学者来台，或在国际场合发言著文，声援国民党。在这样的大环境下，礼遇尊重有胡适当靠山、以西方自由主义为主轴的《自由中国》，也不足为奇。

之所以对新创刊物如此容忍，除相信雷震的政治效忠没有问题外，国民党于20世纪50年代“转进”台湾，除强化军备，争取美国支持与认同是第一要务。但当时美国政界普遍对蒋介石抱持不信任感，并不友善，甚至常传出希望扶植第三势力或国民党内新政军势力以取代蒋介石地位的消息。蒋介石暗自饮恨，亦戒慎恐惧，希望以树立西方民主样板的方式，争取美国政府、国会、知识分子与舆论支持。

因此，国民党政府一方面推动土地改革及地方自治工作，又积极召集各“中央”民代机关恢复开会，并于1952年展开县市首长及议会议员选举；另一方面也以培植《自由中国》发行的方式，凸显台湾在国民党统治之下，依旧是享有西方民主运作、言论及新闻自由的地方。

作为蒋介石的文胆，雷震筹备成立台湾省杂志协会，兼任远东新闻社董事长、“大陆灾胞救济总会”理事、“亚洲反共联盟中华民国总会”常务理事等职务。他曾以台湾当局高级官员身份，出席各项会议与送往迎来的典礼。“中日文化经济协会”于1952年成立后，雷震还以留日经验与人脉接任干事长；雷震的老长官王世杰也受邀重新出山，任蒋介石的秘书长。

受蒋介石礼遇之恩，在国民党迁台后初期，雷震曾代表蒋介石，与洪兰友

一同前往香港会见当地反共人士。[1]当时香港政治、经济、社会情势复杂，英国政府虽然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但严禁国共政治人物在港活动，流亡在外的政治人物以香港为中继站，观风向。所以雷震这种半官方的动作并不寻常，行程安排上也颇困难。

在蒋介石授意下，雷震除与钱穆、唐君毅等人联系，也私下与大批暂居香港的所谓“第三势力”进行接触。[2]他想要摸清底细，好积极为国民党展开统战攻势，争取不满国民党独裁、威权统治的知识分子在当时情形下，尽可能接受、支持蒋介石与台湾当局，避免回到新中国成为蒋介石政权的压力。

雷震又与王云五、蒋匀田、莫德惠等党外人士，一同协调解决青年党的内部团结问题。没想到雷震这些在海外的努力与任务执行，竟成了日后国民党制造政治冤狱、构陷他的重要依据。[3]

关系质变　遭两蒋指责为共宣传

历经“二二八”、“四六”事件等军管手段的震慑，台湾的知识分子陷入了对国民党高压统治的恐慌中。因此在雷震主持、胡适精神号召下，《自

---

①早在1950年10月间，雷震为了发行《香港时报》的问题，赴港协调；结果除了与杜月笙接触外，当时他也通过过去的关系，接触了还在香港的王世杰，并与左舜生、成舍我、刘百闵、朱新民、程沧波、莫德惠、卜少夫等民主派接头，不断劝说他们团结对外，并且来台发展。在这一过程中许多人都对蒋介石与国民党颇多微词，雷震则不断为蒋辩护。1951年，雷震再度去港，则是有备而来。蒋介石也委由前“国大秘书长”、CC派人士洪兰友担任副手，与雷震同行。只是雷震原为“国大副秘书长”，这次却因与在野党、民主人士素有交往才领衔而去，蒋介石似有相互牵制的用意。

②当时包括许崇智、张发奎等人都暂留香港，这批与国民党关系深厚，却又是蒋介石政敌的政军人士，结合左舜生等在野党，成立了一个政治性组织。这让蒋介石颇为忌惮，既不愿他们来台成为新麻烦，又担心组织坐大或被统战回大陆，因此只能派人前往安抚协调。

③雷震行前一直质疑国民党明明要反攻大陆，却没有团结在港民主人士的动作，似乎敷衍了事（《雷震全集》第三十三册，页20）。回来后认真作的报告却又遭到两蒋全力驳斥，让雷震相当尴尬。在香港一个月的期间，他先后与不少朋友碰过头，甚至保了一些流亡人士入台，未料却让雷震日后遭遇国民党“为谍作保”的指控。

由中国》慢慢从“反共”的论述中萌芽出关照“五四”以来民主、科学的论调，并成为当时台湾唯一敢说真话、批判时局的政论杂志。尤其是创刊号邀请到胡适、傅斯年、毛子水、殷海光等重量级学者发表文章，更一举争取到高度的社会评价与知名度，成为凝聚这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重要精神堡垒。

相较于毛子水等著名学者，雷震当时不过是蒋介石的亲信和国民党官僚罢了，因此马之骕曾说，当时自由派学者对雷震颇有戒心，并坚持一定要由胡适担任发行人，并由毛子水担任总编辑，以免杂志在雷震的手中变质。[①]殷海光等年轻学者起初对稿件常被修改不满，甚至批判雷震与老国民党全无差别。全赖雷震委曲求全，单薄的《自由中国》才能在一批批优秀学人的努力下，展现出蒋介石意料之外的雄厚威力。

雷震为了《自由中国》四处奔走，除了编务、约稿外，筹措经费更是辛苦。国民党原先允诺通过“教育部”提供给《自由中国》每月三百元美金的补助，在陈诚接任“教育部部长”时一次性地给了一万元新台币后取消，这虽让《自由中国》与国民党间瓜葛日渐减少，却也断了长期财源。所幸立场亲美的吴国桢出任台湾省主席后，在他支持下，《自由中国》总算另获得每月四千美金的资助。[②]美国国务院拨款成立的亚洲协会，也于1952年开始长期订购《自由中国》，每期一千本，每本定价约美金一元，总算让《自由中国》有了一项固定而非国民党掌控的财源。

在海外的胡适，虽对创刊持赞成态度，但是他早从1950年开始，就表示不愿当《自由中国》挂名的发行人。但雷震一方面是行事便宜，另一方面是考虑到胡适这张金字招牌兼保护伞，因此还是恳求胡氏能勉为其难继续挂名。

除了为经费所困，《自由中国》的立场屡遭质疑，更让雷震劳心。早在1949年，就有蒋廷黻鼓吹成立立场亲美的新政党“中国自由党”，希望由晏阳初、蒋梦麟等人发起，继续团结民主人士，推动“自由中国同盟”。《自

①许冠三：《雷震与我》，《雷震全集》第二册，页252。聂华苓也在回忆录中记载，雷震在《自由中国》初期立场依旧保守并倾向国民党。在编辑群中，殷海光坚持要批判国民党，毛子水等人则主张必须克制平和，所以常生争执。

②1953年初吴国桢与蒋介石闹翻而辞职，流亡美国，《自由中国》的经费补助再度落空。

由中国》曾刊载宣扬相关理念的文章，使得美国可能扶植胡适取代蒋介石的说法，甚嚣尘上。

此一时期的雷震并不认为有筹组反对党的必要性与可能性，仅主张以“自由中国同盟”等联盟方式，由胡适领军，多方联合自由派人士，重申支持蒋介石的政治立场，即可解决问题。但在野党的蠢蠢欲动，引起国民党很大的疑虑。有人质疑《自由中国》根本与“中国自由党”是“同路人”，让雷震百口莫辩。

从1951年开始，雷震通过杂志要求进一步推动民主政治的言行，以及对时政与国民党威权统治的批判，已渐渐成为蒋介石眼中的麻烦制造者。加上朝鲜战争爆发，国际情势丕变，台湾因为战略地位关键，蒋介石重新获得美国支持，也让他在整肃异己、稳固权力上，无须太过在乎国际压力。

雷震从香港返台，在国民党改造会中提出检讨报告，建议接受左舜生等民主人士建议，废除学校教授“三民主义”课程及军队党部组织，以团结反共势力，化解疑虑，筹组联合阵线。[①]原以为是中肯之说，且只是反映外界意见，所以大方地抛给政党改造机制讨论。未料不但未获国民党重视，甫接手掌管党、政、军、政战系统的“太子”蒋经国，竟率先在国民党政府举办忠烈祠公祭的场合，面斥雷震此举是“受共党唆使”、“反动”、“危害国民党”，让雷震十分难过。[②]在同年举行的“军队党部改造会就职会”上，蒋介石亦指责雷震的建议“与匪谍、汉奸无异”、“寡廉鲜耻”[③]，等于把雷震的政治思想与属性定了性。

不巧的是，《自由中国》第四卷第十一期刊出夏道平执笔的社论《政府不可诱民入罪》[④]，批判国民党政府的金融管制，没办法用政策抑制投机作为，反而导致不肖的军警和政府人士从中非法牟利的问题后，立即引发第一次《自由

①《雷震全集》第三十三册，页66。

②《雷震全集》第三十三册，页70。雷震当时记载，他在香港多次为两蒋辩护，并驳斥蒋介石打算传子的诸多不利说法，没想到却遭到如此对待；尤其蒋经国只是晚辈，甚至喊过“雷伯伯”，如今却“态度如此没有礼貌”，“说我要造反”，看到“小子可恶”，让他悲痛得热泪满盈。

③《雷震全集》第三十三册，页81。

④《自由中国》第四卷第十一期，1956年6月1日。《自由中国》编辑聂华苓则在回忆录中记载，当初夏道平坚持要著文批判，雷震劝阻无效，只能硬着头皮和蒋介石干下去。

中国》言论风波。

国民党相关单位原打算立即抓人、停刊，所幸被兼任“保安司令”的吴国桢否决，才没有兴大狱[①]；并经王世杰、张其昀、吴国桢穿梭协调，蒋介石文胆陶希圣提笔修改，并发布新一期社论《再论经济管制的措施》后[②]，暂时化解危机。但原先积极订阅的国民党军队，纷纷退订杂志，试图在经济上围剿雷震。雷震获邀参加的公开典礼也越来越少，显示雷震与蒋介石关系渐行渐远。

另一方面，作为《自由中国》“保护伞”的胡适，在美国得知《自由中国》因军方抗议而屈服的问题后，深感不满，认为《自由中国》没有言论自由是最大的耻辱，于1951年9月写公开信，宣布辞去《自由中国》发行人头衔以表抗议，并坚决支持《政府不可诱民入罪》的立场，使此事余波荡漾。[③]

受到胡适鼓舞的雷震既不信邪，也不闪避。一贯的硬脾气，终于让雷、蒋两人形同末路。

胡适则希望《自由中国》多谈时事，少登原则性文章，先取得政府信任后，再展开批评。其时蒋介石为争取岛内外舆论支持，以超乎寻常的礼遇，力邀胡适赴台讲学，于是胡适借机强调争取言论自由的重要性，称努力多了，可以让当权者养成接受与容忍批评的习惯，对国家社会都有好处；并指出当政者必须培养合法的批评，鼓励合法的反对，不当政的人则

①雷震：《雷震回忆录：我的母亲》，页82。吴国桢当时下令不能抓人，但在《自由中国》门口盯梢的军警人员尚在，经雷震打电话向“行政院秘书长”黄少谷抗议，人才慢慢散去。

②当时《自由中国》希望尽可能写得平实客观，但被陶希圣删去三分之一，又添了些内容，才顺利过关。《雷震回忆录：我的母亲》，页84。

③由于胡适请辞同时震撼国民党与《自由中国》，因此在陈诚出面斡旋、解释并无停刊打算和雷震全力慰留的前提下，胡适才暂时打消辞意。但雷震将这封信公开发表，再度引发国民党不满，认为胡适的批判将动摇台湾情势，因此全力在市面搜购《自由中国》，并不准当期香港版出版。雷震因为风波闹得太大，成为众矢之的，甚至连多年的挚交王世杰都曾托病不愿与他见面。



⬆ 1953年，雷震与胡适在闲谈。近年来在中国的知识界甚至有观点认为：雷震比胡适更重要，视雷震具有“圣雄”之人格。

应该做国家、政府的诤臣。①

但胡适这次来台与《自由中国》撰稿人座谈时，正式提出辞去虚有其名的发行人身份。他表示，人在国外却负杂志的发行责任，未免有点假。雷震虽然打算成全胡适，但因大部分《自由中国》编辑的反对，一度又拖了下来。不过胡适十分坚持，再度公开辞职。1953年1月7日，胡适终于辞去《自由中国》

---

①雷震冤狱案被害人、《自由中国》社经理马之驌就曾指出，雷震赴港归来，带回一些舶来品，并帮朋友带了一百美金，却被当时镇压“二二八”有功的台湾“保安司令部副司令”彭孟缉向两蒋密告雷震“走私”、“套汇”。原本还打算用军法法办雷震，经中国文化大学校长、国民党当时的“教育部部长”张其昀说情，才暂不追究。马之驌也指出，《政府不可诱民入罪》发布后，国民党已展开对雷震的监听、跟监，让雷震相当愤恨。巧的是，雷震与彭孟缉的住所相差不远，未免麻烦，雷震决定搬家，但仍受严密监控，直到1960年因案入狱为止，为期长达九年。参见马之驌：《雷震与蒋介石》，1989年，自立晚报社文化出版部，页65。雷震：《雷震回忆录：我的母亲续编》，页99。

发行人职务，只担任编辑委员。

离台前，胡适拿《法华经》的“功不唐捐”一辞，送给《自由中国》，并叮嘱，雷震未来不一定一帆风顺，大家要有思想准备。胡适在离台前与蒋介石的晤谈中，也直言台湾实无言论自由，因为第一，无一人敢批评彭孟缉（时任台湾省警备司令部司令，与《自由中国》因言论尺度已多次起公开冲突，并打算逮捕雷震）；第二，无一语批评蒋经国；第三，无一语批评蒋介石。胡适甚至说，“所谓无言论自由，是‘尽在不言中’也”。

1953年，国民党终究找到机会。《自由中国》刊出雷震长文《监察院的未来》，文中提及国民党在“中华民国国歌”里放入“吾党所宗”的字句，是排他而不智的，引发蒋介石大怒，立刻免除雷震的“国策顾问”头衔。其余包括“中央银行监事”、“国民大会筹备委员”等职务，也陆续遭蒋介石免除。

不过雷震并没有受威胁，《自由中国》提倡西式民主、批判两蒋威权，鼓吹自由主义的舆论方向越加鲜明；相对地，反共文章比例持续下降，并针对国民党政府“监察院”、“国民大会”等制度提出针砭，主张国民党须推动政治改革。与蒋介石撕破脸干的雷震，从此对蒋介石不再抱有太多期望。

影响力越来越大的《自由中国》，在第十二卷第一期刊登读者投稿《抢救教育危机》，痛批蒋经国推动设立“青年反共救国团”，有侵害青年正规教育之嫌，更是为国民党的党化教育扎根，引发两蒋与国民党强烈不满。

此时，为召开延续“国民政府法统”的“国民大会”，国民党争取胡适再度赴台，充当民主门面，但礼遇已不如当年。胡适虽然在离台前向蒋介石要求正确对待舆论的监督，蒋介石则冷淡地响应，说善意的批评可以，但不能丑化或无事生非。

1954年底，国民党党龄长达四十年的雷震，不但被蒋介石批评为“美国海军武官处的间谍”[①]，更被蒋介石亲自下令注销国民党籍，这是他遭政治迫害的开端。但殷海光等人致函雷震，认为他的“断尾”反而是喜讯，可喜可贺。与雷震被开除同一年，被视为台湾最优秀将官的孙立人也因被控“兵变”遭软禁。

另一方面，《自由中国》草创初期，由于坚定的反共立场，曾经成为台湾

①张忠栋：《胡适　雷震　殷海光》，自立晚报社文化出版部，1990年，页113。

"反共文学"、"战争文学"的滥觞。不过其销路有限，大多是政府机关订阅，订户量约一千五百本，每期印刷三千本，长期亏本。后来由于雷震与国民党渐行渐远，大力提倡"五四"以降的自由主义思潮传统，使《自由中国》为台湾民众带来了多元的阅读文化冲击。特别是《自由中国》文艺版出刊后，强调文学作品必须呈现多样化，拒绝刻板印象的拘束，是以又带动"反反共文学"的风潮，各种描写现实生活黑暗面、人民困境的作品，在挑战蒋介石在台湾执政的神话。包括林海音的《城南旧事》、陈之藩的《失根的兰花》，乃至梁实秋、柏杨、於梨华等名作家的力作，都受到雷震与《自由中国》盛名的吸引，刊登在《自由中国》文艺版。

政治愈打压，《自由中国》的销量愈是不断上升，到后来每期至少能卖一万五千本。[①]

屡提批判建言　遭国民党围剿

眼见情势越来越僵，1954 年殷海光受邀访美后，胡适打算由个人作保，美国国务院出面，邀雷震赴美治疗眼疾，或聘他讲学，希望借着他出国化解紧张局面。不料却发生了吴国桢遭免职后赴美散心，向媒体批判国民党是"特务政府"的尴尬之事。虽有胡适保证雷震绝不会在海外放话抨击国民党，又亲自写信给蒋介石，可连居中协调的张群也表示爱莫能助，国民党终究未发护照给雷震。

硬脾气的雷震则是坚决不求美国"大使馆"保护。日后他回忆，当时他的回答是，"宁可吃牢饭，也不能给台湾丢脸"，国民党"为了自己政权，可以不顾台湾体面，我却不能这么做"。

雷震并不屈服于蒋介石的压力，反而借着一篇篇文章，提倡建立反对党，鼓励自由经济，实行法治，团结国家和反对力量，并提倡独立与批评性舆论。《自由中国》的编辑聂华苓，在回忆录《三生三世》中说，雷震的党籍、官爵、

①日后为蒋介石祝寿的特刊由于言词犀利，竟然再版过十一次，发行三万余册，创下台湾杂志史上的纪录。

人事关系，像剥笋子一样，全给国民党一层层剥掉了，只剩下光秃秃的笋心了，孤立在寒湿的海岛上。真正的雷震挺出来了："诚、真、憨、厚，还加上个倔。"[1]

1955年4月，胡适在《自由中国》发表《宁鸣而死，不默以生——九百年前范仲淹争自由的名言》，以谏诤的自由当做知识分子的天职，成为自由派人士最爱的口头禅。

1956年，蒋介石七十大寿，他对外称希望各界杜绝铺张浪费，以进言代替祝寿，提出各项兴革意见，以求"寿人不如寿国"[2]。雷震抓住这个机会，以"对人无成见，对事有是非"的立场，由《自由中国》出版"祝寿专号——恭祝总统七秩华诞专号"，搜集十六篇自由派人士向蒋介石建言的文章，全线提出批判。

结果建言与批判纷呈，有胡适等人针对蒋介石人格与领导性格缺陷的谏文[3]；也有抨击"国防组织"以及特务机构违宪，要求国民党尽速取消军队党部的主张；社论《寿总统蒋公》，则建议选拔继任人才，确立责任政治与内阁制，实施"军队国家化"，革除过去国民党军队仅向个人效忠的陋习；还要求以美国为例，由执政党扶植在野党或党内反对派。[4]十多篇文章中，尤以被国民党开除的"立委"刘博昆发表的《清议与干戈》最为瞩目。该文因批判清末因慈禧无知与家天下君权思想，导致满清灭亡，祸延全体中国人民，被批评者质疑其以古讽今，拿慈禧模拟蒋介石。杂志言人所不敢言，一时令人侧目，洛阳纸贵，当期加印了十一次。

同时，雷震把国民党为蒋介石歌功颂德的"寿序"寄给胡适后，胡适愤慨地在日记中写道："国民党的思想不过如此。"

"祝寿专号"的大动作也引发国民党党、政、军、媒体势力全面围剿，批判《自由中国》是国民党"思想上的敌人"，引进"毒素思想"，恶意诋毁

①聂华苓：《三生三世》，台北皇冠出版社，2004年，页149。

②台北《中央日报》，1956年10月17日。

③胡适虽没有出言批评，却建议蒋介石应学艾森豪威尔，做个"无智而能御众智，无能无为而能乘众势"的元首。

④《自由中国》第十五卷第九期，1956年10月31日。

元首；是想搞“思想走私”，继抗战末期的民主同盟，想再做中国共产党的“尾巴”，为中国共产党统战铺路；是“不爱国、不反共”。因此国民党宣称要“向毒素思想总攻击”①。由曹圣芬主持的国民党党报《中华日报》，以“蛇口的玫瑰”形容《自由中国》，暗示民众可以基于义愤去砸《自由中国》。②

雷震的友人劝他，胡适不在台湾，蒋介石会把气出在《自由中国》上，且有传言国民党已酝酿大规模的整肃动作。③

1957年4月4日，蒋介石在国民党第七届八中全会上，以不点名的方式批判《自由中国》散布毒素思想，危害国家民族与“反共抗俄”使命，是国民党思想上的敌人。局势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

此时胡适在美百般无奈，因胃溃疡而吐血，还在1957年初动了次大手术，大伤元气。

虽遭国民党媒体围剿，白色恐怖气氛蔓延，军警以检查印刷厂方式威胁，但雷震仍未停手。根据台湾历史学者张忠栋的考证，雷震反而与王世杰等人谈到，对蒋介石年纪越来越老，抱持“改革无望”的悲观看法；他也与报人成舍我和“立委”齐世英、夏涛声、王师曾多次谈及，应针对时局发布集体声明。1957年，雷震基于“是什么就说什么”的立场，通过《自由中国》发表十五篇以“今日的问题”为题的系列社论，强调要全面检讨国是，针对军队国家化、财政、经济、美援、中央政府机构缩减裁并、责任政治、地方自治、新闻自由、党化教育、政风败坏、反对党等问题提出主张。

尤其首篇与次篇由殷海光执笔的《反攻大陆问题》，更直言国民党与蒋介石宣称要“一年准备，两年反攻，三年扫荡，五年成功”的政治方略，根本是在讲假话，掩饰短期不可能“反攻大陆”的现实。“反攻”不但可能性相当小，

①例如蒋经国主管的“国防部”总政治部的《国魂月刊》，就发表了《清除思想毒素》的社论。参见雷震：《雷震回忆录：我的母亲续编》，页109。

②《中华日报》，1956年12月24日。并可参见雷震自己对全案与曹圣芬间恩怨的分析。参见雷震：《雷震回忆录之新党运动黑皮书》，页112。

③《雷震全集》第十一卷也公布了一份署名周国光的《向毒素思想总攻击》的文章与宣传小册。这份机密档中提出了九项指示，直指《自由中国》有不正当的政治野心，是三民主义的思想敌人，是中国共产党与吴国桢思想的“死灰复燃”。必须坚定信仰，绝不能让“毒素”渗透到革命阵营里，必须向“毒素思想”发动总攻击，并组织军中党员发动检讨行动。

并让许多问题因此受到拖延而无法解决。所谓“反攻大陆”不过是两蒋可运用的政治资本而已。

这篇直捣政治禁忌的文章面世，立刻被归类为散布“反攻无望论”，国民党政军势力围剿更激烈。外籍媒体评论，相较于《中央日报》等党报，《自由中国》对国民党如同眼中之钉，关系紧张，一发而不可收。

胡适因国民党对当期《自由中国》的全面封杀，一度只看到论战的指责声浪却未见原文，之后保持很长时间缄默，让雷震也极感焦急。他托人向胡适说项，要求作为《自由中国》保护伞的胡适对同人主张要持支持立场。

就在这样的紧张气氛下，胡适于1958年中返回台湾定居。但让《自由中国》失望的是，身兼“光复大陆设计研究委员会”副主任的胡适，对“反攻大陆”的问题自有看法。他并在《自由中国》为他举办返台欢迎会的公开场合批评了《自由中国》的做法与技巧不当，不该碰“反攻大陆”这块招牌。这篇批判文章在胡适要求下，于《自由中国》杂志上发表。殷海光看了不服气，写了篇长文想和胡适打笔战。最后是在雷震的斡旋下，殷海光撤回了文章，直到1989年桂冠出版社出版《殷海光文集》，才将文章收录其中公开发表。

提倡反对党　种下祸根

有关“反攻大陆”的问题一时吸引了很多人一时的目光。紧接着，《自由中国》其他一系列文章又反映关于保障人权、要求改革地方政治与国民党选举舞弊等诸多问题。最终这拨谠言的压卷之作，由雷震交出了《反对党问题》的社论，公开主张“反对党是解决一切问题关键之所在”，为解决两蒋威权乱象，须建立“忠于国家、忠于宪法”的“反对党”。这也为雷震未来的政治动向立下了明确的战略导向。

在胡适返台前，雷震已于1957年8月2日致胡适的书信中，再度希望胡适与张君劢一同出面，领导成立新的政党，以健全民主政治，但胡适谢绝了，并表示希望他“不要冲动”。此事让胡适赴台成了国民党的烫手山芋。

为迎接胡适赴台定居，国民党明着展现高度礼遇，硬是逼走了朱家骅，让在美期间饱受孤立冷落的胡适接下“中研院院长”职务；但私底下，先是劝说

胡适不要筹组新党；另一方面，一本讽刺胡适有高度领袖欲，思想动摇人心、贻害人民的小册子——《胡适与国运》却在胡适抵台前大摇大摆地上市，把胡适与《自由中国》当做思想毒素的论调，对胡适思想展开新一拨集团式攻击，却不见国民党有雷厉风行的查禁动作。

其实在 1951 年 9 月，乐观的胡适早就上书蒋介石，希望国民党自由分化成几个独立政党，把党内派系之争转化成政党之争。1954 年胡适再度赴台，又一次对蒋介石与陈诚提到催生多党制的想法，希望国民党一分为二；蒋介石可居政党之外的制高点。但蒋介石推说，国民党一分为二，他势必要辞总裁，届时党内必然又会因为有人反对而不成。

虽然不愿蹚这趟浑水，不过深受西方民主思想熏陶的胡适，仍在 1958 年 5 月 27 日《自由中国》社餐会上，以“从争取言论自由谈到反对党”为题，主张少提反对党，或可由知识分子组织一个不以争夺执政权为主要目标、但求监督时政的在野党。胡适也明说，自己无意卷入旋涡，也不赞成组党人士拿他当“武器”，或让他陷入斗争；且组党之议，“一定没有结果的”。胡适甚至说，“如果组织成一个像样的反对党，我可以公开地赞成，但我绝不参加你们的组织，更不给你们做领导”，因为“留几个无党无派的人比较好”。

作为《自由中国》“火车头”的雷震，虽然从蒋介石身边红人转变成跟着胡适走，但他绝不仅限于胡适的保守观点。出身官僚体系的雷震干劲十足，更深知以基层组织发展与势力扩张带动思维变化的重要性；加上胡适从陈诚处探知，“只要反攻大陆目标一致，国民党不会不欢迎在野党”，个性冲动、率直的雷震积极奔走，希望组党主张迅速落实。

台湾当时除国民党外，仅有民社党与青年党两个合法在野党，虽不成气候，但了蓄积了一定的社会形象。此外，许多台籍人士通过 50 年代中期台湾各地方选举的洗礼，名重一时，例如台北的郭国基、台南的吴三连、高雄的李源栈、宜兰的郭雨新、云林的李万居、嘉义的许世贤，都是公认不受地方恶劣选风左右的清流，成为雷震积极劝说携手合作的重要目标。

雷震从参与李万居、吴三连、高玉树、郭国基、郭雨新等七十八人发起组织的“中国地方自治研究会”开始，展开了他的组党行动。他也在《自由中国》上发表社论，要求“积极展开新党运动”，但因国民党政府抵制，无法取得许可，新政党始终无法正式成立。国民党又通过新的“出版法”，授权行政机关不

经审判可直接禁止、取缔刊物，对舆论形成重重压力，以此阻挠雷震。

但雷震发挥起他的协调特长，同时与外来籍政治精英、台湾本土籍精英保持密切联系。他常把成舍我、陶百川等人与吴三连、杨金虎拉在一起吃饭、论政，建立日后台湾政坛在国民党之外的“党外”势力雏形。

雷震的串连，让国民党政府提高警觉。雷震的女儿雷美琳于数十年后回忆，国民党特务机关筹组“雷案小组”，一度计划用卡车撞死雷震，幸而有国民党人士善意警告，雷家才得知消息。但雷震不愿意因此更改每天步行路线，[①]家人苦劝，并坚持每天陪雷震一同上街后，雷震才含泪不再走原来路线。

台湾当局日后公布的资料也显示，台湾警备总部早在 1958 年 9 月，即已开始对雷震“科刑论罪”的“法律准备工作”，前后将近两年多时间，罗列罪名，积极搜集、制造证据，直到雷震被逮捕为止。[②]国民党政府为对付雷震，还特定成立“田雨”、“七二”、“支流”等项目，刻意运作，达到“未审先判”的目的，也企图孤立、分化雷震与其他自由派学者，尤其是与胡适之间的关系。

1959 年，“陈怀琪事件”发生，这是雷震将遭政治整肃的先声。风波源于《自由中国》于 1959 年 1 月 16 日第二十卷第二期中，刊登一篇署名军人“陈怀琪”的投书《革命军人何以要以狗自居》，批判军中文化及戴笠等人言行。出刊后却出现陈怀琪出面控告《自由中国》假借他的名义伪造投书。

双方各执一词，对簿公堂。陈怀琪连续在各大报刊登启事，警告《自由中国》损人名节；接着军方又加告雷震伪造文书、诽谤，让雷震为此多次出庭应讯，不堪其扰。

眼看牵扯没完没了，国民党党营媒体攻讦围剿不断，《自由中国》又确无查证投书者身份。明白《自由中国》吃了闷亏，胡适提醒雷震要有打官司、封

---

①聂华苓也曾记载，雷震的司机老瞿在雷震被捕入狱的前几天，意外遭卡车撞成重伤，后不治身亡；老瞿死前自白，曾为国民党政府暗中监督雷震，他怀疑特务为灭口才撞死他。聂华苓：《三生三世》，页 155。

②雷震也曾提过，国民党内曾成立“《自由中国》小组”，与警总合作，陶希圣主持，对每期《自由中国》文章均断章取义地解读，交主管机关办理。他也曾在胡适处看到由他人转交参阅的评论附注。胡适说，此举是“金圣叹评《水浒》、《三国》”，讲的全不是作者的意思。参见雷震：《雷震回忆录之新党运动黑皮书》，页 90。



报馆准备，或者决定“法律争议”必须政治解决。他先在《自由中国》发表批判《自由中国》编辑群未尽查证义务的公开信；又私下恳请王云五，直接上书蒋介石求情，请“宽大为怀，平息风波”；并让《自由中国》放低姿态认错，正式刊登更正启事，同时取消短评专栏后，争议才暂时停止。[①]

蒋介石违宪三连任酿风波　中国民主党成形

陈怀琪投书案让《自由中国》见识到国民党政府的手段，也让胡适深感双方水火不容的为难。为求妥协，保留言论自由的空间，在“陈怀琪事件”落幕前，他不得不以自勠的角度发表了一篇《容忍与自由》的长文，既劝告《自由中国》要小心留意，也劝谏蒋介石应容忍在野批判的意见。在这篇他晚年的力作中，胡适强调，“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没有容忍就没有自由”，“容忍比自由还重要”；他也要求《自由中国》领会，“要别人容忍谅解我们的见解，必须先养成容忍谅解别人见解的度量”，“不可以吾辈主张为绝对之是”[②]。

虽然自认是持平之论，同时向两蒋与《自由中国》提出了道德性呼吁，但是殷海光等人立刻抨击此举是在自我设限、自失立场。殷海光甚至于《自由中国》中发表质疑性文章，“同样是容忍，无权无势的人易，有权有势的人难”，“自古至今，容忍的总是老百姓，被容忍的则是统治者”，因此要提倡容忍，应多向此类人士去说。他更质疑胡适为平息陈怀琪风波的做法，根本是软弱与让步，损害了《自由中国》的形象。

胡适无奈中引张居正的例子对雷震说，张居正早年若不容忍与严嵩周旋，哪有日后治世的机会？他也在《自由中国》十周年的茶会演讲中正式响应，除重申“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外，也指出容忍的态度是政府与社会上有力量的人双方面的事。他并指出，殷海光要他多向有权有势的人谈容忍，但“究竟

①但未料相关风波，依然成为未来国民党指控雷震捏造舆论、配合中国共产党、恶意污辱军人的证据之一。雷震：《雷震回忆录：我的母亲续编》，页74。

②《自由中国》第二十一卷第十一期，1959年12月1日。

是谁有权有势?”拿笔杆子的穷书生会受围剿，就是因为不是弱者，是对力量的一种承认；就是因为运用文字力量的书生也是有权有势的人，所以“绝不可以滥用我们的权力”，必须“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

与蒋介石的关系怎么维系，成了胡适与《自由中国》年轻编辑间的主要矛盾。殷海光等人与胡适的见解相左；加上胡适曾说，有了在野党也未必能解决所有问题，更被批评是在推托，导致双方渐行渐远。但胡适在一次住院开刀的场合仍对雷震说：“我不信教，也不信神，但希望你们祷告，希望常识使老头子（蒋介石）清醒一下。”雷震则说：“我们不能祷告，蒋也清醒不了。”

在此关键时刻，台湾政坛又爆发了蒋介石的三连任风波。1960年，已连任一次的蒋介石理应卸任，敏感的权力交替时刻到了，无论蒋经国或蒋介石的宠将陈诚，都是各方瞩目的焦点。没想到国民党却发动人海战术，以情势紧张为由，强调蒋介石必须留任，并推动由“国大”增添“宪法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方式，为蒋介石无限期的连任取得“法律支持”。

这种打着“反共复国”旗号，违反宪法与民主原则的做法，让台湾自由派学者无法接受，酿成一场大论战。胡适也相当不以为然，同意雷震所提，由《自由中国》连续多次发表社论，反对蒋介石借修改“临时条款”的方式，达到修宪连任的目的。

在国民党发起恭请蒋介石连任的大规模行动与游行后，李政道等旅美学人发表联名信，要求蒋介石停止打算三连任“总统”的行动。雷震与李璜、左舜生等多位台港在野党人士，共同联署声明。胡适则通过“总统府秘书长”张群传话，提出四点主张，直指“国大”开会是宪法遭遇考验的时刻，为了“国家”的长远打算，希望蒋介石树立一个“合法而和平地转移政权的风范”，不违背“宪法”，宣誓不再担任下一届“总统”；如果国民党另有主张，应光明正大说出来，不要用劝进电文等手段，这种手段对百姓、蒋介石“都是一种侮辱”。

但蒋介石已决心三连任，声称要尽领袖的责任，把带到台湾来的军民带回祖国大陆去；国民党甚至打出反对连任的人就是中国共产党“同路人”的口号。无可奈何的胡适不再对外多作发言，仅在日记中记述，传话要求蒋介石不要连任，“只是凭我自己的责任感，尽我自己的公民责任而已”；并对外暗示，增添

"临时条款"就等于实质修宪，不该掩耳盗铃，而他也无意继续当"国大"主席，通过支持三连任的决议。胡适最后虽未辞去政府职务，与蒋决裂，但他在接受媒体访问时简短而明确表明："我仅有一句话，就是坚决反对连任。"

当年3月21日，胡适抱病出席"总统"选举，对蒋介石投下反对票。但蒋介石仍以一千五百零九人投票，一千四百八十一票赞成的超高票数顺利三连任。胡适稍后赴美参加学术会议，暂时离开了是非之地。

5月18日，雷震会同七十二位非国民党籍人士，举行"选举改进检讨会"，提出十五点共同意见，要求公正选举，实现真正的民主；并决议即日起组织"地方选举改进座谈会"，随即筹备组织"中国民主党"。国民党方面则以不符法令，将会"妨害国家安全"为由，表示将不予承认任何新成立的政党。

雷震为"地方选举改进座谈会"召集委员，与李万居、高玉树共同担任发言人。第一次筹备讨论会议在高玉树位于台北市阳明山的私宅中举行。除要求改革选举制度与文化，雷震也主张以政党形式团结海内外反共人士，并应与民族党、青年党展开协商。夏涛声出任筹备中的新党执行秘书；成舍我原本有意积极参与，但因新党内部考虑他正在主办新闻学校，身份敏感，恐怕徒增来自国民党的压力，以致成舍我并未列名。为免被扣上军事叛变的帽子，新党经决议不吸收现役军人入党。

雷震在当年的生日宴中，听到妻子宋英的心愿是"今后平安"，但他在日记中却说，"只怕今生不会平安了"。

7月至8月间，"地方选举改进座谈会"前后在台湾各地举行四次分区座谈会，均遭国民党情治单位密切监控。期间知名反对人士吴三连长子因在台大参加读书会被捕，更让反对党运动蒙上阴影。一心干到底的雷震毫不退缩，在7月与傅正赴彰化县演讲时声明，新党将在10月成立，争取参选县市议员选举。稍后更因情势紧绷，宣布将提前在9月底前成立新党，跨越地域，以和平、非暴力手段争取民主改革。殷海光更于9月1日在《自由中国》第二十三卷第五期撰写《大江东流挡不住》，表示组织政党的民主潮流任何人都挡不住。

国民党政府眼见吓阻无效，由警总出面劝阻也未见其功，见新党即将成立，便决定收网，循"法律途径"制裁雷震。1960年9月4日，雷震、《自由中



⬆1960年，雷震步入台湾“国防部”军法局。他当时被法庭处与“知匪不报”的罪名，判刑十年。

国》编辑傅正[1]、经理马之骕、已离职的会计刘子英共四人，遭国民党当局以“知匪不报”罪名逮捕；国民党警备总部军法处签发拘票三张，作为逮捕傅正与雷震用；同时签发搜索票五张，对雷、傅的住宅及《自由中国》杂志社进行搜查；并于逮捕傅正时，扣押了反对党宣言与名册。

历经十年、共发行两百六十期的《自由中国》停止发刊，[2]正在酝酿的中国民主党也因精神领袖被捕而胎死腹中，这就是海内外喧腾一时的“雷震

①傅正本名傅中梅，江苏高淳人，为抗日响应“十万青年十万军“号召，加入蒋经国担任政治部主任的抗日青年军。1950年赴台后仍加入“国防部”政干班，因佩服《自由中国》理念，自愿担任编辑。傅正是蒋经国嫡系的政战人马，加上爱国学生身份，所以如何处理他也成为国民党大小党官的头痛问题。

②雷震自己也说，管编务、总务的人全遭扣押，稿件、订户名单与账册被没收，当然刊物无须实质取缔就已经瘫痪。雷震：《雷震回忆录之新党运动黑皮书》，页94。

案”。

蒋介石下令　雷震冤狱十年

雷震案爆发后，震惊海内外。遭到诬陷的雷震初入青岛东路警总军法看守所时，曾激动地绝食抗议国民党发动的“文字狱”，直到夫人宋英来信苦劝，才放弃“不吃、不喝、不言”的策略。

雷震了解这是一件政治案件，也担心牵连到太多人产生冤狱，因此曾通过书信，希望宋英找王世杰、王云五出面斡旋；甚至可向蒋经国说明，尽可能化解政治争议，不要牵连无辜的人。但他仍坚持不怕打压，预料自己“必然被法律解决判罪”，并祝福反对党成立。

国民党政府对外公布《自由中国》违法言论的具体事证相当多，共分六大项目，包括宣传“反攻无望论”；宣传接受美援国家应遵守言论自由原则，形同主张美国干预内政；煽动军人愤恨政府；批判蒋介石毁宪连任报道，被认定系为中国共产党统战宣传；挑拨本省人与赴台同胞感情；报道土耳其等国政变历程，鼓动人民反抗政府、流血革命。指控用词严厉，直指雷震等人涉嫌叛乱，其势已不可挽回。

雷震被捕的当天晚上，国民党政府委由中常委陶希圣、新闻局局长沈锜等人邀约各媒体负责人，散布关于雷震触犯法条与六大罪状事证的《〈自由中国〉半月刊违法言论摘要》白皮书，也发动学者为国民党施行军事审判的动作进行辩护。①

感到“极为惊异”的胡适，为挽救雷震，两度在美打电报给陈诚。胡适主张应由司法公开审判，而非用军法审判雷震。他说，《自由中国》在过去十一年内，一直是出版自由的象征，希望“这一象征不被肆意毁灭”，也不希望台湾声誉因雷案受到影响。在接受外籍媒体采访时胡适还强调，《自由中国》是一本自由的新杂志，并对雷案深表遗憾。为此他决定暂留美国，推迟去台湾。

---

①林祺养：《一步一步行入黑牢的所在》，雷震：《雷震回忆录之新党运动黑皮书》，页55。

张君劢也于9月9日致电蒋介石，要求释放雷震。旅美物理学大师吴健雄及其夫婿袁家骝，在杨振宁力促下，请胡适出面斡旋，要求释放雷震。雷震的女儿雷德全也在美多次投书，强调雷震并非想推翻蒋政权。

在草木皆兵的紧张时刻，成舍我与胡秋原以“立委”身份，发表了一份由陶百川执笔的声明，[①]认为雷震是“书生论政”，更无破坏体制或暴力行为，呼吁勿以军法审判雷震，以免伤害言论自由、出版自由、讲学自由与新闻自由，使得台湾的国际形象受伤害。

殷海光、夏道平、宋文明三位《自由中国》社论撰稿人在9月30日也发表声明，[②]表示愿为所写社论负起法律责任；同时指出，书生论政的目的在“反共救国”，对自己的知识与良心负责，何来违法言论？又哪来助敌宣传？殷海光并陆续发表《我看雷震和新党》、《法律不会说话》、《雷震并没有倒》等文，为雷震声辩，直指雷震被捕并非过去言论问题，也非颠覆政府，主要与筹组新党有关。

但蒋介石丝毫不顾任何抗议。10月8日，雷震被军事法庭以“包庇匪谍、煽动叛乱”的罪名判处十年有期徒刑，并迅速被拒绝申请提起非常审判的要求。[③]蒋介石对国际媒体表示，任何人可在台湾自由地进行政治活动，但绝不容许参与颠覆行为。他相信，《自由中国》背后有中国共产党运作，所以逮捕行动“完全依照法律规定办理”。不过美国舆论以“最大的错误”叙述国民党的大动作。兼任“行政院院长”的陈诚却还是表示，雷震涉嫌叛乱，所以依惩治叛乱条例进行审判，任何人都不能自外于法律。

在十年徒刑的判决确定后，胡适、李济、成舍我、夏涛声、蒋匀田、叶时修、陈庆华、曹启文等四十六位台湾社会、学界名流，联合上书蒋介石，要求亡羊补牢，特赦雷震。声明为求周全，并未多谈军事审判与法律证据的问题，仅恳请蒋介石体念雷震过去对国家贡献，予以特赦。蒋介石仍以未有先例为由拒绝。

---

①《联合报》，1960年9月14日。

②《联合报》，1960年9月30日。

③雷震自己也说，他与家人日后得知，原先警特真的打算用卡车把他撞死，但顾及国民党责任难了，改用法律追究，同时最少判十年，让雷震出狱时年近七十，也就没有作为的机会了。雷震：《雷震回忆录之新党运动黑皮书》，页88。

台湾“国史馆”在2002年9月公布《雷震案史料汇编》揭露，“雷震叛乱案”未审先判，完全是依照蒋介石指示办理。根据这份解密的机密档，蒋介石在1960年10月3日上午11时，也就是雷震案宣判之前，亲自在台北“总统府”召集会议下达四项指示，包括：雷震刑期不得少于十年；后续复判不能变更初判判决；判决书要平淡，须注意百姓心理；《自由中国》必须停刊。①

至于为何要军事审理？蒋介石认为，根据刑法根本无法可罚，同时负面效应与军法审判完全相同，所以须依戒严时期审判叛乱犯的法令处理雷震案。因此雷震的妻子虽然在他被逮捕后立即提请司法提审，也质疑雷震不是军人不该被军事审判，却依旧迅速被驳回。蒋介石发出指示后的当天下午，军事法庭宣判判决书，完全符合蒋介石三项指示；并在宣判后迅速迫使《自由中国》停刊。

同时根据台湾近日解密的“台湾警备总司令部”总司令黄杰工作日记显示，为逮捕、侦讯及起诉雷震等人的“田雨项目”，早在蒋介石积极操作下做好了准备。1960年8月3日，“警备总司令部”以签呈方式，以《自由中国》言论有利于叛徒、颠覆政府、影响民心士气为由，计划由军法处究办，并于9月初完成部署。9月2日，蒋介石亲自召见黄杰询及执行情形，指示全案无须由“行政院”负责。行动后，则由“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秘书长”唐纵分别告知李万居、高玉树，相关行动，系处理《自由中国》半月刊旧案，与反对党毫无关联；同时由“副总统”陈诚电告胡适说明。

根据黄杰记载，他答复蒋介石关于雷震刑期的“法律问题”，最高可判有期徒刑十五年或无期徒刑，最少亦将判刑七年。蒋介石当时即指示，一切行动准备，限9月3日6时以前完成，由他亲自决定何时发动，并由“警备总部”下令执行。“国防部部长”俞大维因持反对态度，仅在雷震逮捕后被“警备总部”告知而已。除指示雷震与傅正应同时逮捕，以及要求彻底查明《自由中国》社经费来源外，黄杰记载，蒋介石曾下令，由于雷震乃一“极狡猾之徒”，不可不作最周密之部署；同时须指派头脑清晰、学识经验均称丰富之干练人员担当军法官工作。

---

①《蒋中正总统主持会议商讨雷案》，《雷震案史料汇编》，“国史馆”，2002年，页331。

莫须有罪名

雷震案的侦办与起诉，前后高潮迭起。国民党为了避免被国际批评此举是为了打压在野党成立，一直把问题死锁在雷震的《自由中国》言论“与中国共产党隔海唱和”、批判国民党执政作为的问题上。等到海内外质疑国民党以言论入罪后，有关单位起诉雷震的罪名，又转为追查雷震“外通匪谍”的具体罪名。之所以能判罪的关键，即在于同案被逮捕人刘子英的自白证词上。

刘子英是北京人，雷震担任“国民参政会秘书长”时期的秘书，并曾在“监察院”担任专门委员；1950年自祖国大陆赴港与雷震取得联系后，即入台任“国史馆”人事室主任，兼任《自由中国》会计与“中日文化经济协会”秘书工作。

国民党当局在军事审判过程中，直指雷震担保“匪谍”刘子英入境而知情不报，因此判定他有罪。国民党当局指控，早在1949年，刘子英就已被“警总”认定为重要涉嫌“匪谍”分子，赴台目的在从事渗透工作；傅正则被怀疑是亲中共的职业学生。

根据黄杰记载，刘子英于被捕并遭秘密侦讯多日后写下自白书，表示他受在国共内战时期邵力子之妻傅学文指派，要求他“为人民立功”，赴台负责策动于右任、雷震等人的宣传工作；到港后曾呈请“监察院”要求赴台未获核准，在雷震斡旋作保下始得顺利入境，并于1950年5月中得以入《自由中国》杂志社任会计工作。刘子英并在自白书中承认，他当时曾在雷震书房中，向雷震表达他受傅学文委派到台做工作。雷震虽然反对，并表示“查得很严，你绝对不能做”，却未向国民党当局举发。

这些自白的说法，为雷震“知匪不报”、“为匪宣传”的罪名定了性。雷震家属提出刘子英早在1953年早已离职的事实，并质疑：刘子英遭逮捕时原无“匪谍”罪名指控，为何被捕十日后却案情逆转，突然写下自白书，自承“匪谍”，并证实雷震“知匪不报”？只是质疑与自相矛盾再多，即便自白只是片面之词，国民党也不准两人对质，不让辩护律师诘问刘子英，让雷震无从翻案。黄杰也曾报告蒋介石，刘子英经晓以利害，且自白均通过录音、正式亲自签字



等确认，也不可能翻供。

国民党并通过陶希圣放话，指称刘子英是雷震与中国共产党间的接线生。同时批判当年南京国府时期，雷震以“政治协商会议秘书长”的高位，主张联合政府、国共和谈，瓦解民心士气；赴台后又鼓吹“反攻无望”，主张和谈、国际干涉，其实与过去历史一脉相承。

雷震在庭讯时当场否认与邵力子夫妇关系密切，甚至说他长期以来就不怎么看得起傅学文。雷震辩驳，他不但在大陆时期是最坚决反对国共和谈的人，甚至因此驳斥过邵力子；在刘子英去台前后，他更写过多篇著名的反共、防谍文章；同时被国民党政府指控“知匪不报”的时间，刚好是他防卫台湾最繁忙、用心，也是最受肯定的时候，这种指控岂非不合情理？梁肃戎也强调，杂志发行人仅负行政责任，不应负文责，当局不能借此把人扣上以言论煽动叛乱的罪名。

国民党政府指控雷震持有《新民主主义》、《干部必读》等十八本关于中国共产党政府制度与宣传理论的违禁书籍，显有联共之实。雷震当庭反驳，这些书都是当年蒋介石委由他到香港买的一些参考书籍并公开带进来的。他并在申辩时强调，“一切强加的罪名，全是冤枉”。只是据黄杰工作日记揭露，不必等到当庭审理，蒋介石早在雷震案未起诉前，已要求须在一周内起诉雷震，结案审决更是越快越好，最迟在同年 10 月 10 日“双十节”前结案。

经国民党高层多次具体磋商后，蒋介石坚持，须在起诉书中详述雷震“散播无稽谣言，蓄意制造变乱，勾结匪谍，从事有利于叛徒之宣传”等各种事实；至于傅正虽没有“匪谍”的具体事证，应予以不起诉处分，蒋介石仍主张，他也须为过激言论“交付感训”一段时间。其间曾一度讨论是否可能以“唯一死刑”的甲案判罪，不过在蒋经国等人陆续表达意见后，仍主张对雷震宜采较轻的处理方式，以徒刑论罪，达到吓阻分歧分子目的即可，以免影响民心。

蒋介石对此案介入极深，除亲自修改起诉书，下令起诉、侦察、判决方向，并关心军事检察官、承审法官人选外，连雷震选任的律师都有意见。当黄杰报告蒋介石雷家可能聘请梁肃戎、李公权或端木恺担任律师时，蒋介石还表示以端木恺为雷震的辩护律师较好。

日后雷家还是聘请“CC 派”青壮“立委”梁肃戎，为雷震打这场必败的官司。为配合蒋介石的速审要求，梁肃戎在担任辩护律师期间，面临仅能阅卷六

天就要开庭辩论的不利待遇；就连审判的旁听证都是限量发放两张给雷家与《自由中国》，最后家属只能在求情后进入法庭站立旁听。其实据黄杰描述，雷震等人被起诉次日，黄杰见蒋介石报告案情时，已感觉蒋介石“精神至为愉快，满面笑容”。

胡适无可奈何　在精神上与雷震一同坐牢

雷震案前后，胡适多次向蒋进言，均未被采纳。根据台湾官方最近解密的档案，雷震被捕后当天，胡适在发给陈诚电报中提及，逮捕雷震起码有三项不良影响：显示国民党政府畏惧并挫折反对党运动；台湾当局将蒙摧残言论自由罪名；如控雷震涉嫌叛乱罪名，恐将贻笑国际。陈诚则回复，惩治叛乱条例为“有效法律”，同时案情复杂，雷震确有知情包庇之嫌。胡适眼看毫无转圜，再度发出电文强调雷震案已影响国际视听，同时若有人涉“匪谍案”，更必须交司法审判，否则只是徒增外界质疑政府“用红帽子之嫌陷人”。胡适说，雷震主持杂志十多年，一定有很多言论足以入罪，因此军法机关不得刑求，更不得妄加更大罪名。

虽然引发了国际相当大的质疑与抨击，雷震仍迅速经军法审判定谳。胡适选在10月中旬赴台，两蒋为免引发新一拨的震荡，特地派毛子水先到日本接机、疏通。在此局面下，如何不让情势变得更僵，是否能帮雷震争取到缓刑、减刑的机会，已成为胡适的一大难题。在沉重压力下，胡适明知难保雷震，却又要担心自己与雷震关系太密切，如反应太激切，只怕反而在蒋介石面前更害了雷震。

因此胡适赴台后，虽然对媒体仍坚称愿为雷震司法审判出庭，做“人格、品行上的证人”，甚至还一度激动地拍桌说判决“太重、不公平”，但他也悲观地对殷海光说，虽然《自由中国》的声明与勇气很好、很有道理，“但起不了作用”，国民党无非要把杂志关掉，所以“故非要关、判雷先生”。因此虽然国民党试探性询问《自由中国》能否继续办下去，胡适仍在最后一次编委会议中决定，就此给《自由中国》一个“光荣的结束”。

胡适至此仍未放弃进言助雷震渡过难关的希望。经过蒋介石一个多月的刻

意回避，终于让胡适等到了能与蒋介石对谈的机会。虽然国民党事先已要求不谈雷震案，但胡适仍以国际观感为题，要求蒋介石三思，并说他这段时间在国外“不敢出席任何宴会，连记者也不敢见”。根据胡适的日记记载，蒋介石仅说，“已对雷震十分容忍”，同时办雷震案有“法律依据”；如果雷震背后没有“匪谍”，“绝不会办他”。蒋介石甚至语带威胁地说，不知胡适是否留意，他先前曾向蒋廷黻[1]提到，原本与胡适两人感情很好，但这一两年，“胡先生好像只相信儆寰，不相信我们政府？”不知蒋廷黻向胡适提过没有？

在这番抢白下，胡适连称蒋介石这些话，“太重了，我当不起”[2]；更拿出过去为蒋介石赴美求援的话，“我始终是坚定地用道义支持蒋总统”，说他“至今没有改变”，因此要求蒋好歹感念旧情。

只是言之谆谆，蒋介石坚持如故，因此胡适把这段私下谈话留存起来，未对外公布，不希望再度生出风波，也为蒋介石留些颜面。他也明知蒋介石不可能放过雷震，[3]自己根本无能为力，连在宣布军法覆判时前往采访的记者，都深感胡适“相对无言”的悲哀。但胡适没在公开场合大声声援雷震的做法，激怒同情《自由中国》的人；加上两蒋随后对殷海光等人的迫害，让不少人公开或私下都质疑胡适不够坚持，做得太少，未为雷震案作更多的努力，甚至批评他为避祸、保官位，始终并未到牢中探视雷震。更有人做诗讥讽胡适“途穷未必官能弃，棋败何曾卒向前？”这让爱惜羽毛的胡适痛苦万分，心脏病复发，自此抑郁余生。

1961年6月8日，宋英见胡适，胡适嘱她向狱中的雷震传话：“国民党把他当敌人，我仍把他当英雄、同事、朋友。我虽未坐牢，但心情并不比他轻松，而且在我内心深处，也就是思想上，与他在一起坐牢，他一定也知道。”胡适除了劝雷震留下回忆录，也说希望雷震“把自己所受的打击，看成是追求真理过程中受的曲折和必经阶段，还要相信总有一天，历史会还他公道”。与胡适相知相惜的雷震，则劝胡适千万要保重身体。

---

①时任中华民国驻联合国常任代表，北大旧人，与胡适关系密切。

②《胡适日记》，1960年11月18日。

③见过蒋介石后，胡适再度借着与陈诚会餐的机会，希望他争取军法复审时，给予雷震减刑或释放，以减轻负面影响。但连陈诚都说，他对雷震案实在“无能为力”。

雷震案与后续的整肃

雷震虽然被莫须有的罪名下狱，但国民党并未放松对他以及党外自由派人士的管制与打压，导致国民党执政白色恐怖时期全面展开。

先是李万居持有的《公论报》，因为连续公布两封伪造由中国共产党致雷震夫妇宣称拨五万港币供被捕四人在狱中打点运用的信函，揭发有人企图栽赃嫁祸雷震的阴谋；又鼓吹万人请愿，好帮雷震申冤，遭地方法院严厉处分。1963年，与雷震素来交好的齐世英，由于主办《时与潮》杂志刊登了《访宋英问雷震狱中生活》，并附雷震亲笔《狱中自励诗》，遭国民党停刊一年，雷震也被罚停止见家属六个月。

此外，由蒋介石贴身侍卫王惕吾创办的《联合报》，虽与雷震并无深交，但因同情雷震处境，从雷震被逮捕开始，就发表社论《我们对雷震案的看法》，主张依法律公开审判、绝不株连；并全文刊登雷震妻子申诉状、提审抗告及成舍我、殷海光等人为雷震辩驳的文章，乃至于雷震等人的起诉书、辩状、判决书、非常上诉状全文，甚至把胡适为雷震喊冤说法放在头版头条。雷震审判末了，《联合报》先要求调查刘子英自白证据，又以社论《呼吁总统赦免雷震部分言论刑责》，要求蒋介石应施以特赦，还曾暗批雷震案形同现代“文字狱”。一连串反调虽保持分寸，没有直接对上蒋介石，仍让蒋颇为不悦。随后就发生台湾全体军队以“思想不正确”为由，拒订《联合报》的“退报”运动。《联合报》也被称为雷震“同路报”。

宋英虽然担任“监察委员”，但对困境束手无策，只能不断发表文章自辩。她无奈地说，雷震离开《自由中国》，“不过是一介匹夫”；倾党政军之力对付一个匹夫，实在让人惶恐，因此“现在只能无语问苍天”，但相信未来历史将对雷案有公正判断。但宋英从此在“监察院”惨遭封杀，不但有人要她“少说话”，甚至借场地办记者会都被人拒绝。雷震辩护律师梁肃戎也因为承办雷震案，被人抹黑为“汉奸、卖国贼”，一度愤而与国民党文胆任卓宣对簿公堂。

作为制衡行政部门力量的“监察院”，最初也在非国民党籍人士联署提议下，调查军事法庭审理雷震案证据有无不当。随后在雷震好友陶百川主持下，

成立项目小组调查。陶百川经五个月努力，虽然始终未获准当面询问雷震，仍正式提案，纠正警备总部处理过程殊多不当。只是为避免全面惹怒蒋介石，陶百川仍不敢明言雷案是冤狱，仅表示批判言论违法案件应先适用出版法与普通刑法规范；“匪谍”牵连案件也不应先行逮捕再行侦察；同时不准雷震对质，也明显有违职权调查规范。但警总与国民党不但经讨论后决定对纠正案相应不理，陶百川日后更是几乎被国民党开除党籍。国民党“立委”费希平也因质询雷震案，被国民党停止党权。

另在整体文坛文风的调整下，《自由中国》虽被停刊，国民党当局仍需要确实有效、可以直接被控制的反共文艺空间，因此借所谓“除黄、赤、黑三害”的“文化清洁运动”，以及动员“中国文艺协会”、“中国青年写作协会”、“妇女写作协会”等各级文坛组织，希望彻底铲除《自由中国》所带来反传统、反威权的影响，并彻底扫除有害国民党统治的读物。

雷震冤案为雷震家人带来了莫大的迫害与羞辱。其长女雷美琳尚在台湾一所新闻专校读书，军训教官出了道作文题目“谁是你心目中最伟大的人”，没写“国父或蒋公”等标准答案的雷美琳，把荣耀颁给了狱中的父亲，却让教官大怒，在课堂上斥责其“不要脸”，并威胁要她退学，甚至“不是你走就是我走”。所幸世界新闻专科学校开了三天会后决定让教官走路。这所学校校长就是坚持报人格调的成舍我。据闻，在雷震案中幸免于难的成舍我，曾在探监时对雷震说：“一个新闻记者，一个搞政治的人，坐牢正是一种光荣的资格、一种资本。我以前屡次警告你，再那样搞下去一定会坐牢，你不听话，那你是求仁得仁。”

在国民党的内外折磨下，雷震在狱中虽然因为对短床、硬床板感到不适，却没有作出任何悔改、反省，也没有承认任何罪名，更对国民党把他冠上“资匪”罪名相当愤慨，甚至一度认为“在这个政权的监狱里苟延残喘，是件可耻的事”，所以打算在回忆录完成后绝食，以求在国民党颁布的“自由日”自我了断，以求解脱、抗议。不过当狱中牢友痛骂国民党为“狗民党”，自承有三十几年党龄，曾为国民党做工作而遭党外人士痛批的雷震，仍说自己“心中难过之至”。

但当时狱卒多半同情雷震，没有虐待他，反而给他较多优待，还劝他不要徒劳无功搞自杀。雷震因担心被两蒋扣上“畏罪自杀”帽子，所以也改弦易辙。

相反地，刘子英因“忘恩负义”，在牢里被人揍了一顿，只能移监到一人独居的小舍，日后一直用化名生活。[①]

国民党也因国际舆论视听，不敢再动歪脑筋，[②]或把雷震调到关押重刑犯的兰屿监狱。台湾当局日后解密所公布的《雷震狱中信函》还指出，雷震在牢里除作诗嘲讽“台湾特务遍地，张牙舞爪，这就是警员国家”外，还曾批评蒋经国设立“救国团”、在军中广设党部，应予废除。其立场丝毫不因为被关押而改变。

1961 年 2 月，胡适这位为雷震案在精神上坐牢的自由派宗师，再度因为心脏病住院。雷震连写了多封信，都是劝胡适多保养身体，也对他入狱后家里的经济问题很感忧心。胡适则在 7 月 26 日雷震生日当天，亲笔写下了南宋诗人杨万里的《桂源铺》一诗，慰问在狱中的雷震。杨万里是南宋爱国诗人，清廉刚直，一生饱经排挤而未受重用，还因国事积疾而亡。胡适引他的诗，一方面抚慰雷震，也是以杨万里自况。

心灰意冷的胡适，在牢外遭到的质疑、诟病，丝毫没有暂歇，反而有变本加厉的趋势。因为对中西文化的评价而被围剿，让胡适激愤而苦闷，身体状况急转直下。

1962 年 6 月 24 日，刚出院不久的胡适在“中研院”蔡元培纪念馆主持“中研院”第五次院士会议，由于吴大猷、吴健雄等知名学者皆自美赴台，让胡适非常兴奋。他说，自己虽对物理学一窍不通，却教出了北大物理系系主任饶毓泰与吴健雄两个名满天下的学生。吴大猷是饶毓泰的学生，杨振宁和李政道又是吴大猷的学生，算起来前后“四代”，是他认为“生平最得意的，也是值得自豪的”。但在兴奋之际，他又提到了“我去年讲了二十五分钟的话，引起了围剿，不要去管它，那是小事体、小事体。我挨了四十年的骂，从来不生气，并且欢迎之至，因为这是代表了中国的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胡适接着意有所指而又费力、混乱地说：“海外回来的各位，希望你们去‘立法院’看看，委员

①马之骕则记载，刘子英因为心虚，所以往后不敢再见雷震。同时高玉树早在雷案发生前几天，还通报雷震，国民党可能因为马之骕过去有过与共产党交往的案底，打算借司法压力逼他攀咬雷震。马之骕：《雷震与蒋介石》，页 378。

②雷震：《雷震回忆录：我的母亲续编》，页 351。

们发表意见批评政府，充分地表现了言论自由，'监察院'在那个破房子里，一群老先生老小姐一起讨论批评，非常自由。还有省议会，还有台湾两百多种的杂志，大家也可以看看，从这些杂志上表示了我们的自由。”然而就在结束宴会的时刻，胡适骤然而逝，一代宗师就此与世长辞。①

十年容易，雷震被移往新店安坑军人监狱后，借着有限的资料与资源，写起了回忆录。在刑期届满的出狱前夕，他于牢中也写下了一副对联：“十年岁月等闲度；一生事业尽销磨”；横批则是“所幸健存”。但国民党担心雷震狱中回忆录流传将有不利影响，因此提早在当年7月雷震出狱前夕，经新店监狱私自取得，并送交警备总部审议后，认定有“为匪宣传和诋毁政府之虞”，查扣雷震狱中所写、计约六百万字的回忆录。雷震因此绝食抗议，并上书蒋经国、蒋介石要求发还，同时坚持“不发还文稿，就不出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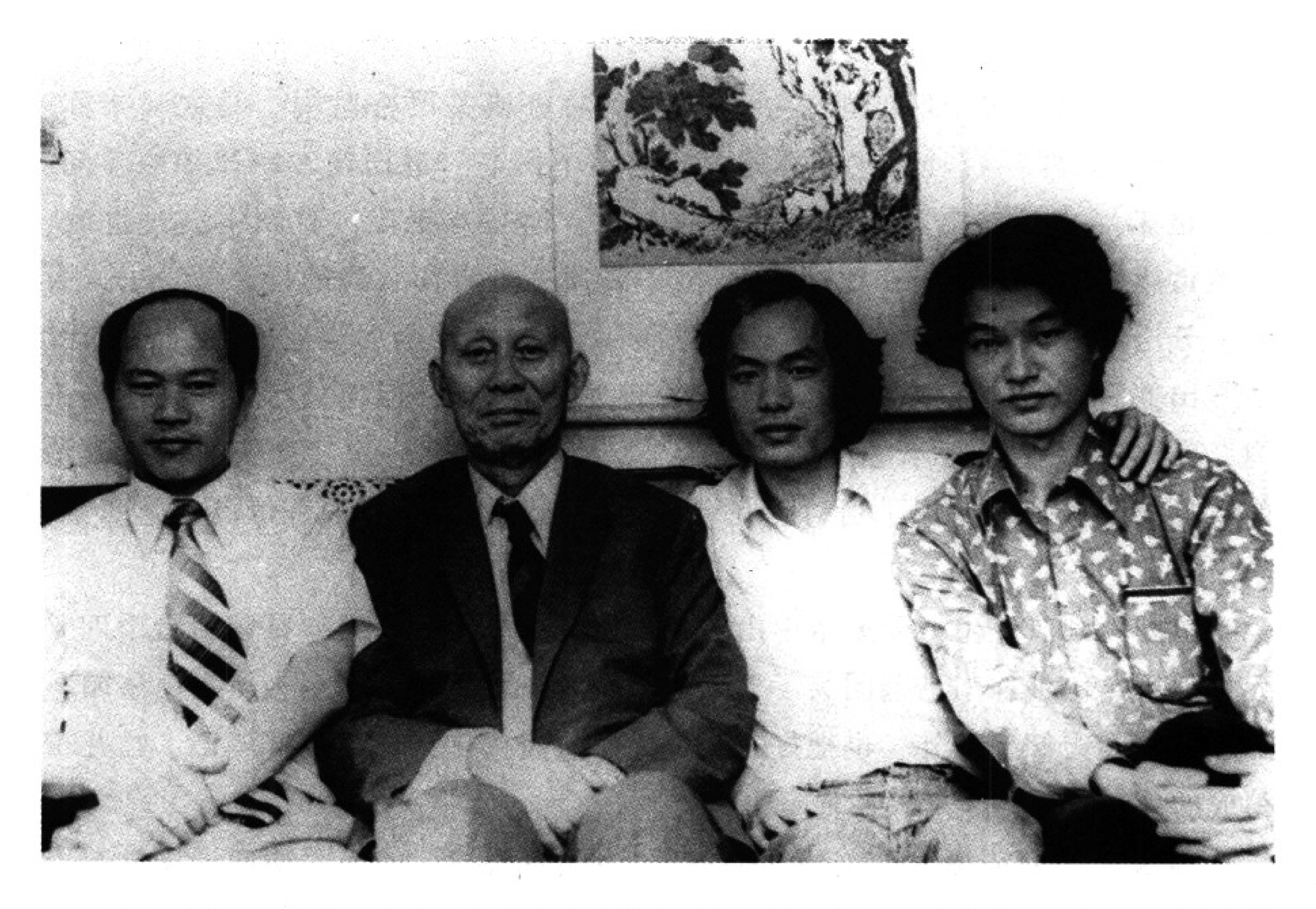
国民党为求一劳永逸，以打算继续将雷震交付感训，无意释放为由，由与雷震素有交情的王云五、谷正纲、陈启天三人出面作证，要求雷震改变拒绝出狱心意，并须写下誓书保证出狱后，“绝不发生任何不利之言论与行动，并不与不利于政府之人员往来”，“如违此言愿受国家裁判”。雷震虽然不肯就范，但陈启天躺在担架上还被人抬来，谷正纲、王云五更不断劝说，坚称要坚持到雷震答应出狱为止。人情压力之下，雷震只能在无奈中含泪答应具结离开监狱。②

四十年后冤狱始得平反

1970年9月4日，雷震十年冤狱届满，清晨6点出狱。为了避免引发新一拨争议，据李敖所述，国民党特地把在台外籍媒体先一步邀请到日月潭旅游、采访，大搞调虎离山之计。不过李敖还是带着两名外籍记者，亲自见证了雷震离开这所禁锢他十年的黑狱。但在《自由中国》与雷震并肩作战的殷海光，却

①胡适过世，雷震在牢里相当伤心，曾悼以“百世永发光辉，先生已无遗憾”。但殷海光因不满胡适并未尽全力营救雷震，坚持不去吊丧，还曾说胡适心智已死。

②雷震：《雷震回忆录：我的母亲续编》，页247。



⬆ 上世纪70年代，出狱后的雷震在家中接待来访的年轻人。台湾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之交的时候发生了一次以中产阶级现代化为诉求的思潮。新的思潮取代了早期雷震、殷海光等人对自由与民主的朴素诉求，但雷震依然以自己的精神获得年轻知识分子的尊敬。雷震晚年的身体大不如前，无法再参与政治活动，深居简出。

等不到他出狱，早在1969年9月16日逝世。雷震在参加殷海光逝世周年纪念会时泪盈满眶，追忆殷海光一生追求真理的大勇精神。

1971年12月，面对国民党政权遭逐出联合国的冲击，以及中美即将建交的巨大阴影，忧国忧民的雷震违反出狱协议，振笔疾书，撰写数万多字的《救亡图存献议》，提出政治十大建议，犯颜直谏蒋介石应引退；放弃一党专政；解除报禁；大赦政治犯；厉行法治等主张，希望两蒋速谋政治、军事改革，以民主化方式应付变局。他更提及应恢复张学良、孙立人的人身自由，及尽速将遭案关押的李敖等青年才俊依法或审或放，不得滥法羁留。[1]次年1月10日，雷震将这份《救亡图存献议》呈送至国民党政府“总统府”、“行政院”，但未获

①金陵：《抚今追昔》，雷震：《雷震回忆录之新党运动黑皮书》，页12。

任何回响，让他心灰意冷。

住在台北市沟子口的雷震，继续遭到特务机关严密监视。马之骕指称，"台湾警备总部"当时曾在雷震房舍对面租下民宅，进出访客一律拍照盘问，监听也未停止，让雷家亲友根本不敢上门，前后八年多。直到雷震过世时，监控雷震的侦防车还停在他的病房外。[①]雷震一度自印《我的母亲》一书二百本，分送友好，却在印刷厂内立即被没收。在国民党全面监控出版品的年代，雷震出狱后补写的回忆录也是偷运到香港才能出版。[②]但他仍与吴三连、高玉树、郭雨新、齐世英等党外人士往来，定期每月聚会一次，交换对民主政治的意见；他也陆续认识了当时仍在台面上的反对党人士，如许信良、施明德、康宁祥等人。

雷震为糊口谋生，受邀帮中山文化基金会从事专题研究，月领新台币四千元。他用这笔钱在南港墓园买了五十坪荒山预备作墓地，命名为"自由墓园"。除预留雷震夫妇墓穴外，也把好友殷海光、《自由中国》编委罗鸿诏、亡儿雷德成的骨灰，一齐搬来葬在墓园内。

1978年，台湾爆发"美丽岛事件"，为免带头抗议的施明德遭国民党政府逮捕后军法审判、枪决，党外人士决定推动施明德与外籍人士爱琳达举行政治性婚姻，为施明德找来些微外援保障。当时就是由雷震证婚，这也是他出狱后唯一一次公开露面。

1975年，雷震摄护腺疾病复发，医生诊断为摄护腺癌，经钴六十治疗，体力日衰。雷震后被检查出有脑瘤，神志不清，身体右半部瘫痪。虽开刀取出脑瘤，但为时已晚。在立下"不发讣，不开吊，身后火化，丧葬一切从简并不进殡仪馆"的遗嘱后，雷震于1979年3月7日病逝于荣总医院，享年八十三。

雷震火化后安葬于"自由墓园"。墓碑自题：《自由中国》半月刊发行人，中国民主党筹备委员雷震之墓。

国民党政府宣布解严后，1988年4月，离蒋经国过世不过三个多月时间，时年八十七岁的宋英公开表示，雷震案是蓄意制造的冤案，"监察院"日后的

---

①马之骕:《雷震与蒋介石》，页65。

②即70年代杂志社出版的《雷震回忆录：我的母亲》、《雷震回忆录：我的母亲续编》。

纠正案未能厘清冤情，还雷震清白，因此她除提出十三项疑点外，更正式要求台湾“监察院”重新调查雷震案，并要求检阅从来不准外人过目的刘子英自白书。4月29日，台湾民间成立“1960年雷震案平反小组”，委由谢长廷担任义务辩护律师，要求新店军人监狱发还雷震出狱时被非法没收的日记与回忆录，并彻底重查“雷案”，还给雷震清白。

但一连串的怪事发生了，先是与雷震监院调查报告附在一起的刘子英自白书从封存卷宗中不翼而飞，并传出已超过保存年限遭焚毁的消息。同时就在台湾“监察院”决定清查雷震案档案时，也意外证实这本涉及雷震任党政要员、《自由中国》社长与许多政要往来纪实的回忆录，已遭军方焚毁，仅有十本雷震日记以及雷震回忆录中点名两蒋严词批判的小部分影印档案稿仍得以留存。

台湾军方当时解释，雷震在狱中撰写的回忆录，原本存在“警备总部”，但“警总”因解严决定将回忆录退还新店军监存留；退还后的档案经当时狱方相关人士开会，认为依监狱行刑法第七十一条第二项规定，基于档案内容“攻讦主义、诋毁国父、污蔑蒋介石”，承办军官主张涉及“国家元首”隐私部分，绝不能流传于世，所以由新店监狱在1988年4月30日通知军情局后，将回忆录全部焚毁。且因稿件太多，浇上汽油后仍足足烧了二十多分钟才焚毁，确定无任何影本留存，处理过程均有会议记录、销毁记录可查。

消息传来，当然让家属愤恨不平，陶百川更连斥是“笑话、笑话”。同时“监察院”在4月22日才决定要调查相关文件，存留了二十多年的私人资料，竟在短短一周内被销毁，毫无存证，明显在回避调查、翻案，先斩后奏，因此不但学者批评是“绝对的错误”，更引发台湾党外人士游行示威抗议风潮。

台湾的监狱管理机构虽为此通过弹劾案，相关官员、军官也受行政处罚，却已无法弥补珍贵史料凭空消失的厄运，甚至有官员说：“烧就烧了！违了什么法？”日后出版的《郝柏村八年参谋总长日记》也提及，李登辉初任“总统”，主持雷案座谈时，曾决定依法不予发还家属回忆录，因此回忆录焚毁非执行人员一意孤行所致。

雷震出狱后，眼看回忆录被没收，以带病之身奋笔疾书，希望重新叙回。可惜的是，最关键的组织反对党部分还没有开始写，他就不幸病逝。狱中日记

确定遭焚毁，等于让这段史实形同空白。其余雷震亲身观察的重要历史事件，包括“联俄容共”、“国民参政会”与“政治协商会议”运作、民主同盟互动、国共内战等，也都或多或少丧失了珍贵的第一手史料。

1988年8月，雷震案当事人刘子英回祖国大陆定居前，发表致雷震遗孀的《辩诬》万言书，说明当年他是在非自由意愿下，受到前后五天的连续侦讯，基于对方提出“雷震已因叛乱被捕”、“别再自讨苦吃”的威逼，自料“官司已经输定了”，才自白承认为“匪谍”，并“捏造谎言”诬陷雷震，以保自身安危。①刘子英说，相关单位指称他受傅学文指派来台渗透，但他前后仅因礼貌拜会过傅学文一次，前后二十分钟，他也绝非“共谍”。国民党只是以此为伪证诬陷雷震，所以全案均为“冤狱”、“党祸”。从此雷震案是冤狱的看法大致确定，只待台湾当局正式宣布，以及提出补偿方案。

2002年9月4日，台湾当局正式平反雷震案，发放冤狱补偿金新台币四百二十万元。

台北市市长马英九也以国民党的历史错误向雷家致歉。台北市文化局长龙应台也在雷震冥诞前夕，前往雷震松江路故居会勘。由于这栋光复初期曾作为省府官员宿舍的木构日式房舍，刚好位于捷运（地铁）出口预定地，又相当残破，无力修复，因此龙应台计划改以纪念碑或展示室等公共艺术方式，在捷运站呈现雷震为自由民主奋斗付出的一切以及他所代表的人文历史意义。至于雷震位于景美的故居，也就是《自由中国》创刊的办公处所，则已经被拆除。

不屈的人格　高贵的灵魂

在国民党全面打压下，雷震以明知被判的悲剧心态参与法庭辩驳，其心境可见是悲壮的，也因此雷震当时在法庭上为自己辩驳时更大声疾呼，国民党把人扣起来，让《自由中国》无法出版，才是最大的打击，所以“冤狱虽然牺牲了我个人，最大的牺牲还是我们国家在世界中的地位”。也正如胡适所说，在雷震被捕后，《自由中国》发不发刊已不再是问题，因为就此停刊反而“不失为光

① 《自立早报》，1989年3月8日。

荣的下场”。也正如胡适预测，《自由中国》的确已经在重重磨难与高压打击中找到它的历史定位。

雷震为国民党高官，为寻求国民党的改造与民主政治的改革，牺牲了权位、名誉、人身的自由，甚至子女也因此远避海外，罪名不过是因为一些批评时政当道的言论以及筹划根本没有任何大规模政治变动能力的政治团体，雷震的天真、无辜，由此可见一斑。也难怪雷震的长女雷美琳在四十多年后仍控诉，雷震所做的一切，都是为国民党好，结果不但受了十年冤狱，家人更在社会上受屈辱，因此她“还是很恨国民党”，“对蒋家更是不要提了”。

雷震案让毕生清誉的胡适困窘，整天愁眉苦脸，最后因心脏病猝死。①但雷震始终对胡适的景仰与尊重从未动摇。关在黑牢里，雷震一度梦到胡适再以“容忍与自由”对他谆谆教诲，要他多听意见、克制自己、容忍他人。②终雷震一生，始终没有改变他对胡适的信任。

在精神上与雷震同坐苦牢的胡适，也在雷震入狱后，借“中研院”纪念蔡元培诞生九十四周年场合，请台大教授沈刚伯就明代大学者方孝孺发表专题演说。胡适高举方孝孺“为主张、思想、信仰殉道”的精神，比为孔子所倡“杀身成仁”；他也批评明成祖专制统治，因怕《孟子》一书的思想危险，删去了三分之一内容而成《孟子节本》，但《孟子》如故；明成祖杀了方孝孺，灭十族，百年之后仍有王阳明学派诞生。这些证明“方孝孺的言论自由固然失败了”，明成祖“要毁灭方孝孺的思想也失败了”。

综观让雷震贾祸的《自由中国》，不过是以自由主义原则对国民党主政下的台湾言论、思想、新闻自由提出检验，并反对国民党以“出版法”、审检制度等公共法令无理限制人民的基本自由。只是在国共隔海对峙的时刻，蒋介石面临美国可能打算在台湾另觅代理人的压力，以及蒋经国打算一统党政军特各方势力的特殊环境，加上雷震彰显筹组反对党的意图，可能将威胁国民党一党独大的局面，终于让《自由中国》被打入政治斗争的对立面，被扣上了“与中国共产党隔海唱和”的大帽子，从此不得翻身，乃至于台湾当局坚持军法审判雷震，并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判处他十年徒刑，以铲除政治威胁。

①唐德刚：《胡适杂忆》，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1年，页175。

②雷震：《雷震回忆录：我的母亲续编》，页351。

雷震为了捍卫自己的理想，付出了入狱十年的代价，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在大时代悲剧下的坚持与悲情。因此他在面对不公平的审判时，仍高呼，“强加给我的一切罪名全部都是冤枉的”，“我的冤狱绝不能欺骗于一时，更不能欺瞒过天下人的耳目”。



傅斯年 Fu Sinian

治学与办事能力兼具的教育家

每逢11月15日校庆，台湾大学校园洋溢的欢乐总让人忘了年纪，年轻学子用舞蹈、运动尽情挥洒青春；校园一隅，校友回“娘家”聚首，共忆在椰林大道骑单车的激情岁月。

2005年11月20日晚上，五位年近八十、经历“四六事件”的祖国大陆的台大校友回到离别半世纪的台北，与老同学聚首。五位老校友原本想参加11月15日台大改制六十周年校庆，没想到就像当年收拾书包回家的过程一样历经波折，两岸的文件审核都很“仔细”，11月18日下午才拿到批准函。

1946年，国共内战使中国再度陷入动荡。相较之下，台湾刚光复，台大才改制，许多年轻人因而从海峡彼岸转到台湾念书。没想到，1947年台湾发生“二二八事件”，紧接着1949年又爆发“四六事件”，在一连串白色恐怖阴影下，许多学生又回到祖国大陆。

错过校庆，五位校友还是惦记着回台大校园。除了文学院、椰林大道，许多建筑对这些老校友来说都是新的，“四六”历史对担任接待的年轻台大学生来说太遥远了。他们竟好奇地问老学长：那时有没有醉月湖？有没有傅钟？有没有傅园（傅钟、傅园都是为纪念台大校长傅斯年）？老校友王士彦笑笑说都没有。“那你们有什么？”王士彦说：“我们有傅斯年。”

傅斯年，五四运动率队扛大旗的旗手，曾用几篇文章骂退孔祥熙与宋子文两任国府行政院院长。他虽与国民党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但一生没当过国民党政府的官。他将北大的学术自由精神，带到海峡彼岸的台湾播了种、生了根。他当台大校长还不到两年，六十年来无人能超越。他的一生可用四字形容：波澜壮阔。

很少人提到，傅斯年家世显赫，出身“开代文章第一家”。先祖傅以渐是清代顺治年间的首任状元。傅斯年固执、守节，对夷狄之防特别重视，自不乐见别人提及此事。[①]他也最佩服重气节、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历史人物，以先贤节操自励，诸葛亮、文天祥、顾炎武、王夫之，都是他敬佩的历史人物。[②]

痛恨日本侵略中国，爱国心切的傅斯年甚至说，作研究，“日本有再好的书也不用”，“少引为快”。他更撰写《东北史纲》，由历史方法考证东北属中国固有疆域，驳斥日本军阀侵占东北歪论及“不抵抗主义”的无耻。他在该书序言指出，“国人不尽无耻之人，中国即非必亡之国”[③]。

其长子取名为“傅仁轨”，也是用以纪念在朝鲜击溃、歼灭入侵日军的名将刘仁轨。[④]日本宣布投降当天，五十岁的傅斯年还兴奋地到重庆聚兴村大街上，

---

①傅以渐是清代首位状元，官至光禄大夫、太子太保、兵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傅家之后代得意科场，成为书香门第。相关记载出自《傅先生在政治上的二三事》，王世杰、蔡尚志选编：《长眠傅园下的巨汉》，台北故乡出版社，1979年，页89。

②傅乐成：《傅孟真先生的民族思想》，《传记文学》第二卷第五、六期，1963年5、6月。

③傅乐成：《傅孟真先生的民族思想》，《传记文学》第二卷第五、六期，1963年5、6月。

④唐太宗时朝鲜内乱，中国应新罗之请以宗主国身份平乱。唐高宗龙朔三年(663)日本以援助百济为名，出动舟师数百，占领锦江口。唐朝遣刘仁轨领兵击之，“仁轨遇倭兵于白江口，四战捷，焚其舟四百艘，烟焰涨天，海水皆赤，贼众大溃”。参见罗家伦：《元气淋漓的傅孟真》，《传记文学》第十六卷第一期，1970年1月。

与民众一同喝酒、吵闹，高兴到帽子手杖全丢了。[①]

五四健将　开创史料学派

傅斯年，字孟真，山东聊城人，1896年3月26日诞生在北城祖宅。曾祖父傅继勋在安徽居官多年，李鸿章等人均出自他门下。祖父是贡生，博通经史，长于武技，精通医理，喜欢旅游。父亲傅旭安，字伯隽，1894年中举，曾任山东省东平县龙山书院院长。傅斯年幼年丧父，由祖父及母亲抚育成人。他自幼天资聪颖又努力勤奋，"从没考过第二名"。十岁即阅毕"十三经"，进大学前对经史与学术源流已极有根底。个性豪爽却又恃才傲物，素有"傅大炮"之称。

傅斯年在北大本科中国文学系就读期间，对文、史、哲均有涉猎。1917年，二十七岁的胡适到北大教古代哲学史，傅斯年由顾颉刚引荐前往听课，两人立即擦出知识与启蒙的火花。原本是国故派期待传衣钵的傅斯年，从此成为新文学运动拥护者。[②]1918年夏，傅斯年与顾颉刚、毛子水等创立"新潮社"，发行刊物《新潮》，同时常在陈独秀等人创办的《新青年》上撰文。他以"文学革新申义"为纲目，主张推动文学革命，不遗余力抨击旧道德、旧文化，文章与言行激切。当时在北大图书馆工作的毛泽东已知傅斯年、罗家伦，也留意过傅斯年曾借阅的书籍。

"五四"期间，巴黎和会的条约拱手把山东地区的权益让给日本，使中国蒙羞，爱国学生因此罢课游行抗议北洋政府丧权辱国，傅斯年正是学生运动的领导者之一。他扛着大旗率学生上街游行，带头冲入赵家楼，打进曹汝霖的住宅，掌掴对和约"欣然同意"的章宗祥，当场被北洋军阀逮捕，名震南北。

①罗家伦：《元气淋漓的傅孟真》，《传记文学》第十六卷第一期，1970年1月。

②胡适曾说，他在顾颉刚《古史辨》第一集序言中看到，原来他初到北大教授中国哲学史，一批学生要傅斯年去听听胡适到底肚里有没有材料、是不是该赶走，结果傅斯年听了第一节课后说，胡适虽然书读得不多，但走的路是对的，要大家不能闹。胡适这才知道，傅斯年暗中做了他的保驾人。参见胡适：《傅孟真先生的思想》，蔡尚志选编：《长眠傅园下的巨汉》，页2。

受到胡适的影响，傅斯年并未停留在革命激情中。1919年，傅斯年自北大毕业后考取官费赴英留学，[①]研究实验心理学。三年半后转赴柏林大学，受陈寅恪、俞大维影响，开始阅读比较语言学与相对论、量子论等学说。

1926年10月，傅斯年接受朱家骅邀请，应聘为中山大学文学院院长，并兼中国文学和史学两系主任，在中山大学创办语言历史研究所。1927年，国民政府创立中央研究院，蔡元培任首任院长，傅斯年在蔡元培支持下设立历史语言研究所，实现了“将东方学正统由柏林、巴黎移回北平”的雄心壮志。他并应用西方所学，主张以经验科学方法治史，让史学成为历史科学，以“史学即是史料学”的概念开创著名的史料派；并分别聘请陈寅恪、赵元任、李济为历史、语言、考古三组主任，进行安阳殷墟考古发掘，为中国建立上古信史。

1934年夏，傅斯年与元配离婚，8月5日与同学俞大维的妹妹、曾国藩的外曾孙女俞大彩在北平结婚，从此两人相伴终身。1929年七七事变后，中国展开漫长的对日抗战，傅斯年一直在北大教课，直到国民政府撤离的最后一刻。

自由派学者　却与国民党关系千丝万缕

傅斯年具有强烈的爱国与民族情操，个人色彩浓厚，对权贵不假词色，具有鲜明的自由派学者风骨。早在1932年，他就曾主动出资参与过胡适筹划出版《独立评论》杂志的工作。

但精明的傅斯年毕生都没摆脱与国民党的关系。

七七事变后，傅斯年参加庐山谈话会，并与毛泽东、胡适、李璜、张君劢、蒋百里等人参与国防参议会；次年兼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943年间，由于不满国民党腐败，加上同情穷人、社会主义思潮，[②]傅斯年多次对孔宋家族开炮，

---

①傅斯年原本因为“五四”的缘故，被认为是激进分子而不欲录取，但因陈雪南力争傅斯年才识过人，才因此让他得以录取。参见台大学生会：《傅故校长逝世纪念专刊》。

②傅斯年曾说，胡适是自由主义分子，他则是自由社会主义分子。

对行政院院长、蒋介石的连襟孔祥熙部属涉入同盟胜利美金券弊案大加挞伐，提出弹劾。他不但接连上书，甚至公开在参政会上要求蒋介石惩罚贪污要从大官做起，指孔祥熙从才能、信望、用人、国际观感、礼教，都不符合阁揆要求，舆论哗然，让蒋下不了台。据闻蒋介石曾宴请傅斯年，希望傅斯年既相信他，也该信用他任命的人。傅斯年当面回绝，指对孔祥熙的批判是全国公论，“至于说因为信任你也就该信任你所任用的人，那么，砍掉我的脑袋我也不能这样说”。孔祥熙终究于1945年下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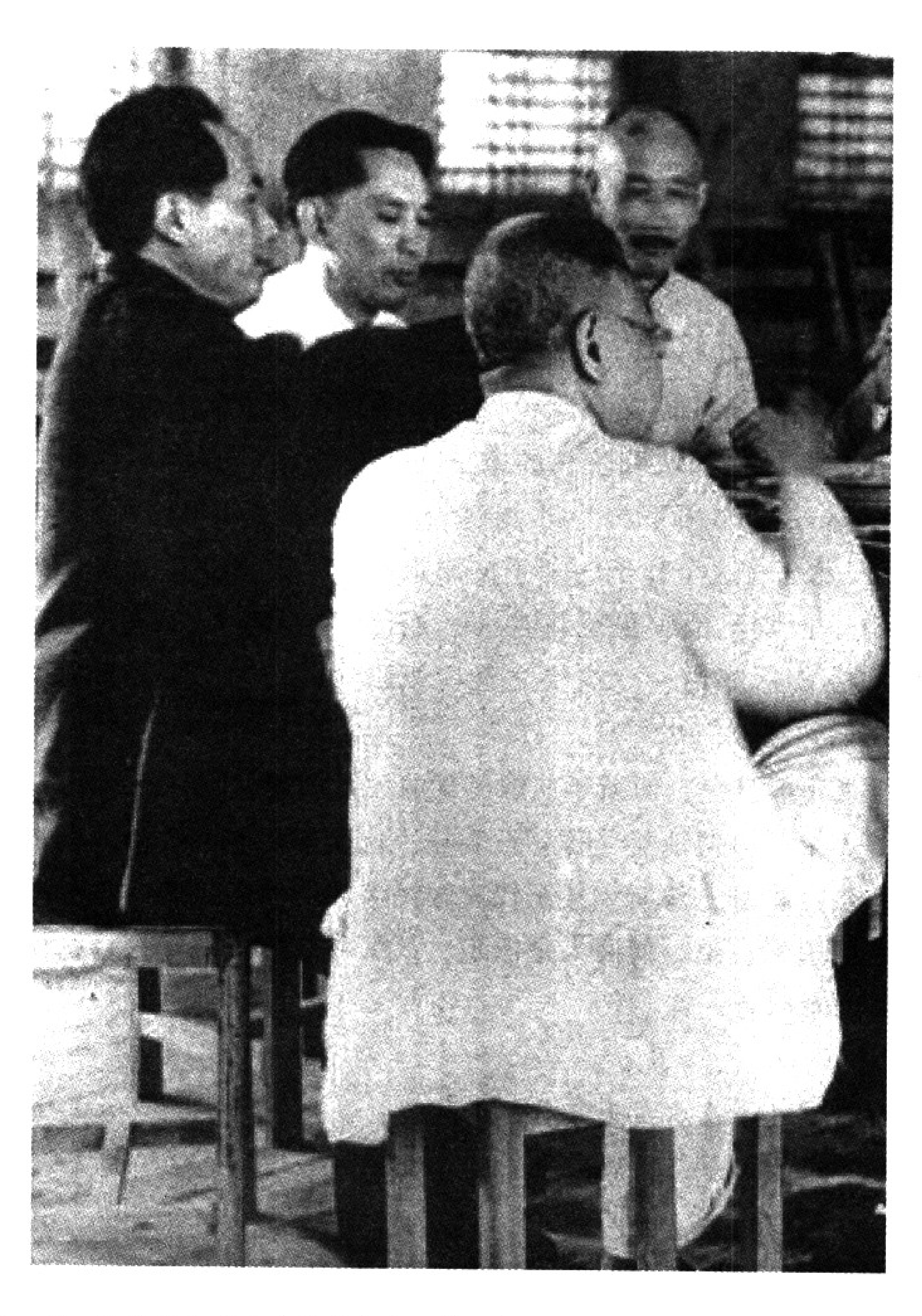
傅斯年更著名的政论文章《论豪门资本之必须铲除》，则点名蒋介石妻舅、接替孔祥熙出任行政院院长的宋子文是官僚资本、化国为家，主张“与国人为敌的宋子文必须下台”才能解政治僵局。尤其1947年2月15日于《世纪评论》发表《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不可》一文，直言宋子文不走，否则国民政府不但吃不消，更恐将自蚀、崩溃、垮台。文章发表后洛阳纸贵，舆论轰动，连胡适都说，“痛快之至，佩服、佩服！”蒋介石不得不再度屈服，宋子文黯然离职。

虽然批评不假辞色，傅斯年与国民党的关系却是异常好。1945年，昆明发生“一·二一学潮”，傅斯年受蒋介石委托，说服学生脱离政治斗争，维护校园正常秩序。当年7月，傅斯年甚至代表国民参政会访问延安，与毛泽东相谈甚欢。据罗家伦追忆，毛、傅两人是旧识，谈了一整夜。毛泽东赞扬傅斯年的五四功绩，并赠章碣诗一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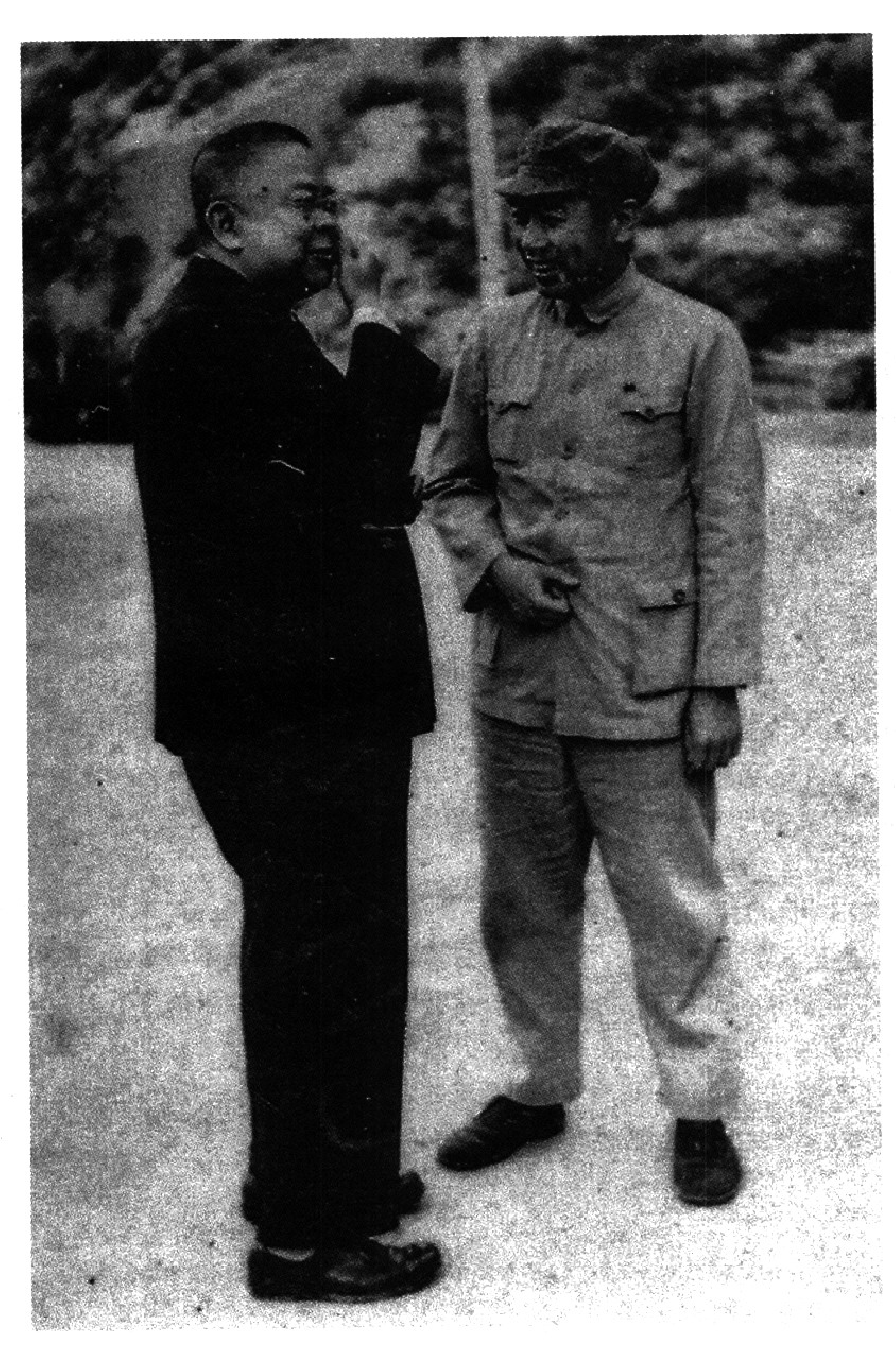
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
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

傅斯年则自谦自己不过是中国的“陈涉、吴广之流”，共产党才是今之项羽、刘邦。傅斯年离开延安后提到对毛泽东嗜读《水浒传》的深刻印象。

与国民党关系虽好，但傅斯年坚持读书人的独立性格，坚决不入国府做官，仅任职学界。抗战后，他曾拒绝出任国民政府委员。在蒋介石力邀胡适任国民政府委员兼考试院院长时，傅斯年大表反对，先代胡适推辞，并向胡适强调，“一人政府即全无办法”，“入阁不如组党，组党不如办报”，独立监督立场不能动摇。他并称此举是蒋介石“想把胡适这朵鲜花插在牛粪上”。



⬆1945年，毛泽东在延安宴请傅斯年。傅斯年和毛泽东当年曾在北大相识。抗战胜利之后，傅斯年被国民参议会推举为访问延安代表团的五名代表之一。在延安访问期间，他们单独在一起聊了一夜，天上地下都谈开了。此行傅斯年跟毛泽东要了一幅亲笔手书，毛泽东欣然应允，以章碣的诗作为交谈的延续，所谓“述唐人语以广之”。毛泽东写的条幅，是晚唐诗人章碣的一首《焚书坑》：“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



⬆ 傅斯年访问延安期间与周恩来合影。

从北大到台大　献身教育

胡适对傅斯年的能力与天分评价极高，他曾说：“孟真的天才，真是朋友之中最杰出的。他的记忆力最强，而不妨害他的判断力之过人。他能做第一流的学术研究，同时又最能办事。”[①]胡适在蒋介石力邀入阁担任行政院院长的人情攻势中，曾建议蒋介石不如延揽傅斯年、蒋廷黻出任。1945年，抗战胜利，兼任北大校长的胡适出任国民政府驻美大使，因公滞美未归，面临大学复员回北京的难题。胡适与蒋介石属意改由傅斯年出任北大代理校长，挑起复员迁校回北京与接收重任。[②]

西南联大则在抗战胜利后解散，北大、清大、南开等校纷纷复员，必须再次大规模迁徙。然而抗战期间，由日本傀儡政权扶植的伪北大，也有教职员安置问题，酿成伪北大教职员街头抗议事件。

傅斯年于代理北大校长后多次声明，北大绝不录用伪北大教职员，指大学须在“礼义廉耻”四字上做不折不扣的榜样，给后代青年们看看，让青年正是非、辨忠奸，否则“下一代的青年不知所取，今天负教育责任的人将成国家的罪人”[③]。他甚至痛斥为接收日据时期伪校产与伪北大教授打过招呼的陈雪屏，“汉贼不两立，连握手也不应该”。

燕京大学对参加伪北大的教授一律解聘。傅斯年说，如果北大做不到，“真没脸见燕京的朋友了”。他又直指舍不得离开的人如果不受谴责，就对不起那些长途跋涉到大后方，抛家别子，坚持国家民族大义的教授与学生。其强硬手腕，终于解决了北大复员难题。在开除依附日军的伪北大教职员，并上书指责国民党政府在战后未能严审、严惩汉奸后，傅斯年说，“我知道恨我的人一定很多，但我不能作乡愿！”

---

①胡适：《傅孟真先生的思想》，《傅孟真先生集序言》，台湾大学，1952年。

②朱家骅：《忆傅孟真先生》，台北《中央日报》，1950年12月31日。

③北平《世界日报》，1945年12月8日。可参见傅乐成：《傅孟真先生的民族思想》，《传记文学》第二卷第五、六期，1963年5、6月。

也因为认定胡适适合当全国最高学府校长职务，傅斯年虽接手北大，化解伪北大教职员难题，却始终定位自己是暂代校长。他努力不懈，为北大争取到新校地、校产，目的是为“断然不愿与别人抢东西”的胡适当开路先锋。当胡适自美返国后，他立刻辞职让胡适重返北大，毫不留恋；也不接受蒋介石慰留，依旧回历史语言研究所。傅斯年自诩为胡适的“清道夫”、“保驾人”。他曾对蒋梦麟说，蔡元培、胡适是北大“功臣”，北大精神创始者，但“办事能力让人不敢恭维”；至于他与蒋梦麟虽会办事，但不过是北大“功狗”。①

1947年，宋子文下台后，傅斯年赴美养病。此时中国内战再起，傅斯年返国出任中央研究院院士及立法委员。1948年12月，情势更加紧张，国民政府即将全面迁台，台湾大学校长庄长恭考虑国共内战不利情势，擅自携眷离台返回上海，由杜聪明暂代。为安定人心，蒋介石决定由具学界硕儒身份的傅斯年出掌台大。

傅斯年考虑再三，并一度以健康为由严词拒绝，最后拗不过蒋介石与教育部部长、老长官朱家骅连番游说，以及国民党二把手、刚接任台湾省主席的陈诚的人情压力，为稳住台湾动荡局面，1949年1月20日辞去立委，赴台接任台大校长之职。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也随傅斯年迁台。此举不但为“中研院”保留许多珍贵史料，也奠定日后台湾历史学术研究的根基。为表尊重与感谢，陈诚亲临机场迎接傅斯年。行前傅斯年却对朱家骅说：“你把我害了，恐我的命要断送在台大了。”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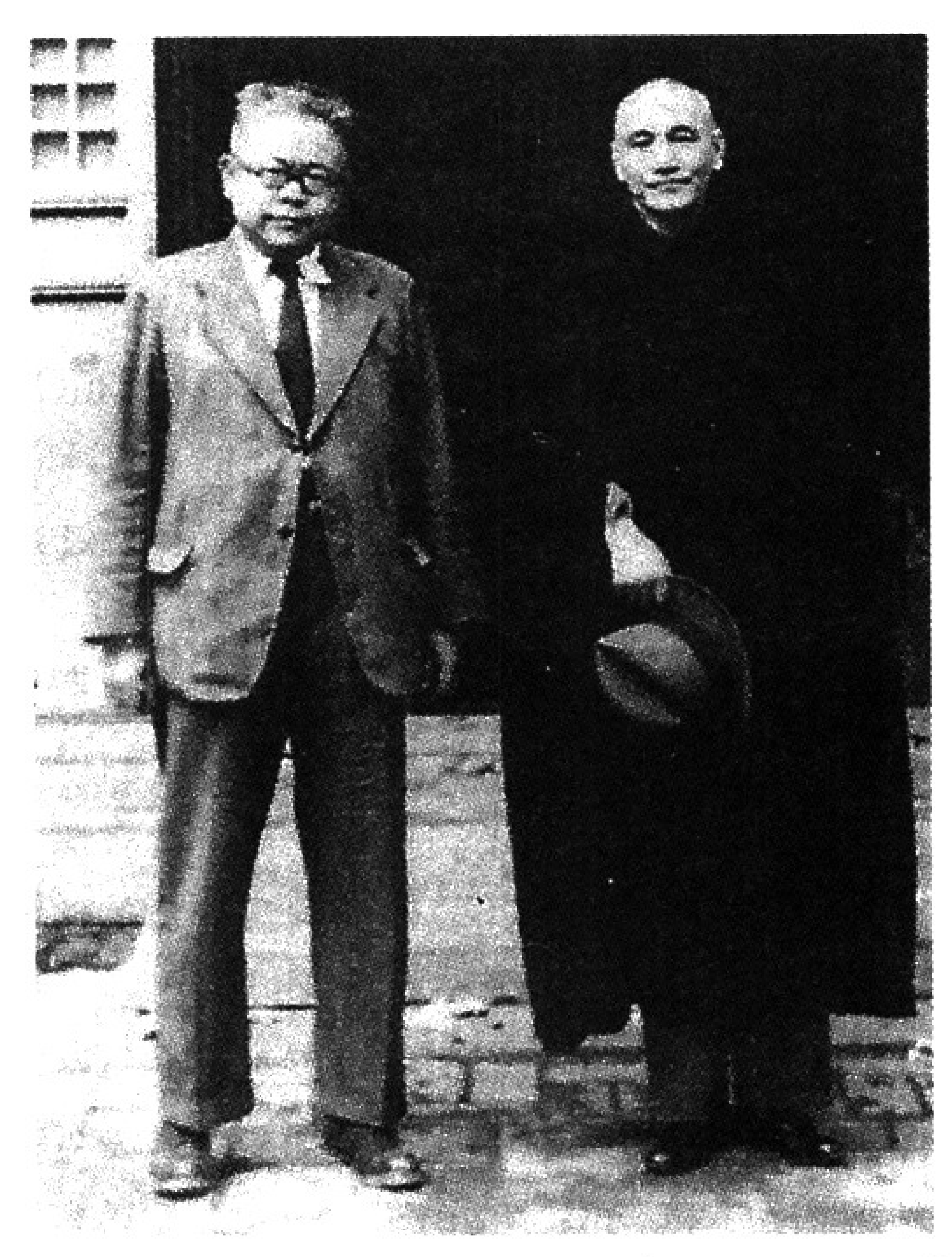
之所以犹豫，傅斯年主要是思考该留在台湾还是祖国大陆。傅斯年对国民党失败早有准备，但还是无法接受。徐蚌会战失利后，受陈布雷、段锡朋相继过世影响，傅斯年在南京鸡鸣寺中告诉蒋介石文胆陶希圣，在身边准备若干安眠药，“现在没有话说，准备一死”③，可见其悲观与无奈。1948年底，胡适与傅斯年在南京对着滚滚长江，思及国府命运，禁不住潸然泪下。傅斯年伤感地吟诵陶渊明的《拟古》诗第九首：

---

①蒋梦麟：《忆孟真》，台北《中央日报》，1950年12月30日。

②朱家骅：《忆傅孟真先生》，台北《中央日报》，1950年12月31日。

③陶希圣：《傅孟真先生》，台北《中央日报》，1950年12月23日。



⬆1946年蒋介石到北平与傅斯年协商处置北大伪教员一事，在同游文丞相（天祥）祠时的合影。

傅斯年是唯一一个敢在蒋介石面前跷起二郎腿放胆直言的人。1944年傅斯年在参政会上向行政院院长孔祥熙发难，揭发其在发行美金公债中贪污舞弊。会后，蒋介石亲自请他吃饭，为孔说情。席间，蒋介石问：“你信任我吗?”傅斯年答曰：“我绝对信任。”蒋介石于是说：“你既然信任我，那么就应该信任我所任用的人。”傅斯年立刻说：“委员长我是信任的，至于说因为信任你也就该信任你所任用的人，那么，砍掉我的脑袋我也不能这样说。”

麦克阿瑟专机到达台湾时，蒋介石亲率“五院院长”、“三军总司令”等政要到机场迎接，并通知傅斯年到场。傅斯年虽然去了机场，但表现出与众不同的风格。第二天重要报纸刊登的照片，当天在机场贵宾室就座的仅蒋介石、麦克阿瑟和傅斯年三人。其他“五院院长”及政要垂手恭候；“三军总司令”立正挺立；傅斯年则坐在沙发上，口叼烟斗，跷着右腿，潇洒自若。当时报纸新闻说：“在机场贵宾室，敢与总统及麦帅平坐者，唯傅斯年一人。”

近年来，“回到傅斯年”渐渐成为学界的一种声音，关于他的一些介绍文字也开始见诸媒体。有人发出这样的感叹：“傅斯年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学问、最有志气、最有血性和最有修养的伟大知识分子中的一个典范。在这个伟大知识分子几近绝迹的世界上，也许不会有人知道，我是多么深沉而热烈地怀念着他们中间的每一个人。”而有关蒋、傅之间的谈话，人们评价：“这样的君臣对话，如此之豪杰气，当今之士，且不说有过，又可曾梦想过?”

种桑长江边，三年望当采。
枝条始欲茂，忽值山河改。
柯叶自摧折，根株浮沧海。
春蚕既无食，寒衣欲谁待！
本不植高原，今日复何悔！

草创台大　为台湾奠立最高学府

傅斯年赴台时仍抱着即将回到祖国大陆的心情，不但许多家产、图书未随身携带，部分家人也没有一同东迁。未料国民党败得如此迅速、彻底，形成台海对峙僵局，竟让傅斯年从此被困孤岛。只是傅斯年到了台湾，便不打算继续流浪，拒绝友人邀他赴美避难，指自己不做顺民，不托庇异国，无可奈何不过“蹈海而死矣”[①]。台大教授黄德时邀他赐字，傅斯年写下“埋骨于田横之岛”的名句，表达他视死如归，与台大学生死生与共的坚持。当时傅斯年家中挂的对联是“六亲不认；四海无家”。

台大学术资源全由接收日本台北帝国大学而来，虽有一定规模与历史，但毕竟处于动荡时期，整顿困难，也欠缺资源与稳定研究环境。傅斯年深信“大学以教授之胜任与否为兴亡所系”，全面从祖国大陆延揽人才赴台任教。在他争取下，蒋介石于1949年初派军机到北京敦请学者，因北京南苑机场已被中国共产党接管，国民党特地在天坛修出临时跑道供飞机起降，才让名教授毛子水、英千里、钱思亮等人顺利离开，陆续加入台大；其余如李济、劳榦、董作宾、陶葆楷、董文琦、芮逸夫等也在傅斯年延揽师资名单之列。由于这批重量级学者的加入，短时间内大大提升了台大师资阵容与学术基础。

延揽对象中仍有许多学者主张留在新中国奋斗。其中最让傅斯年遗憾的应数被他称为“中国最有希望的读书种子”、“三百年来第一人”的陈寅恪婉拒来台。

①陈槃、蔡尚志选编：《师门识录》，蔡尚志编：《长眠傅园下的巨汉》，页156。

另一方面，傅斯年主观意识极强，对人爱恶分明，不免有负面影响。国学大师钱穆，早年发表《刘向歆父子年表》时，以历史考据反证史实，被傅斯年引为知己。但随钱穆转向专注传统文化思想阐述，渐与批判现实、力主科学方法的傅斯年等人分道扬镳后，两人迅速交恶。又因钱穆批评傅斯年提倡的治学方法欠缺系统与整体关照，致北大复校时，西南大后方教授群中，唯独钱穆未获傅斯年回聘；国民党迁台时，钱穆也留在香港发展。

随逃难人潮涌进，台大学生人数突然扩增四倍，突破三千人大关，对校务是一大压力。胡适立即发挥影响力，由“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经费协助，提供七个为期两年的学术奖助金，让台大不必苦苦向台湾当局要钱；在政府财政吃紧之际，傅斯年也向陈诚要到为数不小的经费，盖了三排教室与大批学生宿舍，满足学生需求。傅斯年之所以受蒋介石器重，一方面因其学术地位，另一方面也因他本人行政才干与魄力非比寻常。为大学校务，他可以放下身份到处奔走，上穷碧落下黄泉地要钱。除陈诚、吴国桢两任台湾省主席外，傅斯年甚至直接找蒋介石，绝不空手而回。傅斯年曾自负地说：“胡适比我伟大，但我比胡适能干。”

出掌台大，傅斯年绝非想和稀泥、做烂好人，而是捐弃民初以来建“大学堂”的观念，树立一所现代化的大学，成为学术重镇。

台大前身“台北帝国大学”创于1928年，为日本军国主义者培育殖民地高校生所设，因此为迎合日本帝国需要，遂以培育殖民地人民忠诚精神为创校宗旨。日本并将台北帝大作为前往东南亚发展、侵略的跳板。傅斯年自认首要使命是扭转台大被殖民统治工具化的命运，他提倡人文素养与学术自由精神，摆脱殖民政权强加于台湾高等知识分子的干预与洗脑，脱离大学被强行赋予的政治使命和目的。[①]

为一扫日本殖民统治的流弊，傅斯年标举大学需兼顾学生整体教育目的，要求大学生研习“三民主义”、国文、英文、中国通史等共同课目。他亲自率领成立“大一国文教学”、“大一英文教学”两个研究小组，将原先帝大由教授主持的各科讲座合并为理、工、文、法、农、医六学院，建立学分制度及经营行政事务的中立性学校组织，为台大继续扩充做积极准备。

---

① 《台湾大学第三十七学年度第一次校务会议记录》，1949年4月。

为求提升教学品质，傅斯年提高了教职员待遇，不适任者一律转聘，并实施严格考核管理，严禁贪污及“政客与不学无术之徒混迹其中”。想托关系谋一教职者，几乎绝无仅有；但只要学术卓有成就，无论资格、学历、年龄，一律拔擢。他曾发通知给教师，直言校长可能随时去听课，也随时可能解聘教员，给教师相当大的压力。他并常借私访了解学校各单位有无贪污、收红包弊病。某晚巡视台大附属医院急诊室，发现值班医师溜班，勃然大怒，立即予以免职，没有情面可讲，并立即改革台大附属医院工作制度。傅斯年虽先后摘掉七十多名教员的职务，但因其中多位家境特别贫寒，重感情的他也拜托陈诚拨经费，聘贫寒者任台大图书馆编纂，使同人不至于断炊。①

前国民党“行政院副院长”徐庆钟之子徐渊涛在回忆录中指出，李登辉于1948年在台大担任农经系助教期间，因为与一位日籍教授投缘，违反规定住进教授宿舍，校方发现后进行催收，李登辉不肯搬迁。傅斯年得知后火冒三丈，下令解聘李登辉。只是在傅斯年死后，徐庆钟考虑到与李登辉的师生情谊，才保李登辉重回台大。

傅斯年治学的认真严格，也表现在他对台大学生的课业要求上：学生不能通过私人渠道不考试入学。傅斯年在办公室门口贴上“为子女说项者免开尊口”字条，影响所及，台大在往后数十年一律拒绝靠关系入学。他首创大学考题必须“入闱”出题，出题教授一律集中管理，杜绝说情舞弊，让学生无从钻漏洞。许多台大教授做过这种有警卫在外持枪严加看管的“出题监”②。

此外，傅斯年关于校长必须教师出身，以免沦为政客的主张，已成为台湾各大学近五十年来办校的基本原则。他主张学校聘任教师需高度尊重各系所教授意见，也成为台湾大学行之有年的原则。

①屈万里、蔡尚志选编：《回忆傅先生在台大的往事》，《长眠傅园下的巨汉》，页112—114。

②屈万里：《敬悼傅孟真先生》，《自由中国》第四卷第一期。

四六事件

1949年初，台大校务百废待举之际，却发生“四六事件”，引发激烈学潮。

此事肇因于台大学生何景岳与台湾省立师范学院（台湾师范大学前身）学生李元勋于3月20日下午共骑一辆单车时，不服警察以交通违规为由给予的处罚决定，遭警察殴打及拘留。消息传回校园，人心浮动。原本就对时局与饥饿问题不满的学生，酝酿包围警局，要求警方交人。

晚间十时余，二三百名师院学生沿途唱歌、抗议，赴警察局交涉。经过位于新生南路的台大男生宿舍（今金华国中）时，台大学生陆续加入，聚集了四五百人。虽然在学生包围警局的压力下，遭拘捕者旋被释放，但警方迟不出面安抚，引发学生不满。[①]次日两校千余名学生再度发起游行，打着“反迫害、保障人身自由、反对警察打人”的标语聚集台北市警局请愿，要求严惩肇事人员。最后在市警局公开道歉后，才以“一场误会引起的小纠纷”为由，结束游行抗议。

3月29日，台大、师院与北市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自治会，在台大法学院操场举行青年节营火晚会，宣布在各校学生自治会基础上，成立台北市学生联合会，以争取生存权利、反对饥饿和迫害、要求民主自由，号召全省学生联合，喊出“反对警察国家”口号。当晚，主要表演队伍台大合唱团“麦浪歌咏队”，演唱了《你是灯塔》、《你是舵手》等祖国大陆学生搞学运时常唱的歌曲，还扭起秧歌。潜伏校园的特务通报后，让正面对颓势、急于整肃后方的国民党惊觉，因此这场晚会被定位为“反政府、为匪宣传”、“为迎接解放军铺路而工作”的阴谋活动。

到南京述职的台湾省主席兼“警备总司令”陈诚返台后，下令“警总”副司令彭孟缉清查主谋分子，准备抓人。4月5日，逮捕行动展开，台湾师范学

①《公论报》也刊登了警员投书，直指两校学生不但曾捣毁警察第四分局，并强抓警察长，非法监禁于台大宿舍一昼夜，更殴伤总局警备队长，明显已是扰乱社会治安行为。

院新选出的学生自治会主席周慎源被诱出宿舍，但抗拒后并未被捕，他随即返回宿舍集结学生准备顽抗。两校学生联络后，准备第二天（4月6日）发动大规模示威游行。

师范学院代理院长、日后当上国民党政府“副总统”的谢东闵当天即接到陈诚发出的“特字第贰号代电”，指名周慎源、郑鸿溪、庄辉彰、方启明、赵制阳、朱商彝等六名学生首谋张贴标语，散发传单，煽惑人心，扰乱秩序，妨碍治安，捣毁公署，私擅拘禁执行公务之人员，“肆行不法，殊属居心叵测”；加上纠众集议，“希图实施扩大扰乱”，“警备总司令部”“基于维护社会安全，保障多数纯洁青年学生学业”，应即予以拘逮。电文命令谢东闵立即将六名学生逮捕到案。

当天晚上，陈诚找了彭孟缉、谢东闵和接任校长才两个月的傅斯年在家中开会，宣布决定动用军队进入校园抓人，驱离学生。傅斯年大发雷霆，向彭孟缉力争，抗议如入校搜索查无证据，彭孟缉“须负起政治责任”。但反对无效，国民党军警还是准备拿着台大二十一人、师大七人的黑名单，大动作搜捕学生宿舍，企图一网打尽。

谢东闵当下向陈诚表达辞职之意，再往师院宿舍要求学生交出特定人，可平息纷争，但遭学生批判。谢东闵愤慨地说，我“今天还不如一条狗”，随即率陪同人员离开。

傅斯年则坚持，彭孟缉驱离学生时不能流血，“若有学生流血，我要跟你拼命！”但彭孟缉未遵守约定，国民党部队于4月6日凌晨开始，持枪前往两校抓人。冲突中，无论有罪无罪，呼喊着“团结就是力量”的学生，只要出面质疑即逮捕侦讯，前后逮捕两百多名学生。除列名特定名单上的学生外，其他人三天后陆续被放回，校园中酿成恐怖气氛。加上“警总”宣称在台大已发现为共产党宣传的无线电波，要求入台大搜查，情势一触即发。

对国民党当局不经法律程序进入台大校园逮捕师生，傅斯年说，“要抓人先告诉我，真有罪，我交出人来。”军方对外宣称，逮捕学生经校方同意；傅斯年则登报声明，驳斥军方说法全非事实，台大从未接到通知及同意军方行为；“警备司令部”在台大拘捕学生，全系其擅自行事。他一度拒绝国民党特务入校搜索。

多年后，学生证词显示，傅斯年不但要求承审法官尽速放人，还尽可



能透露消息给可能遭牵连者；并和几位热心的教授努力奔走，筹组教职员联谊会全力抢救、保护学生，让不少被军警羁押的学生转到法院看守所。傅斯年还四处筹钱，主动帮学生交保，更公开要求国民党“勿纵”之外别忘了“勿枉”。

因此相较于师院两百多名住宿生被捕，超过四十人遭侦办，台大遭逮捕、牵累的学生较少，除黑名单学生外，十二名被捕者主要是“麦浪歌咏队”成员。

学生在审讯后，有人被冠上“妨害秩序”、“思想激进、偏激、左倾”，甚至“匪谍”的帽子，更有人险遭枪决。谢东闵在“四六事件”中被外界质疑不够保护学生，导致师院被迫停课、重组，所有学生一律重新登记，再定期复课。台大则因有傅斯年保护，让遭逮捕的学生保留学籍，多数受害学生能够复学，回校继续完成学业。傅斯年甚至安排他们打工，免于经济困难。

“四六事件”中被囚禁一年半，后遭驱逐出境、返回祖国大陆的台大历史系学生樊军说，“四六事件”后，他决定离台，不晓得该坐船偷渡，还用台大学生名义买机票，结果没上机就被拦了下来。傅斯年一边骂他幼稚、天真，一边叫他赶快躲起来。他一度躲在畜牧兽医系牧场里，一天早上想跑出去找傅斯年，被警卫队看见了，这才被捕。

傅斯年事后直接找到蒋介石与陈诚，要求到此为止：没有确凿证据前不能再随便逮捕台大教职员与师生；未来如无新情况，绝不再行株连、拘捕学生；即使有证据，逮捕前也必须经过台大校长批准，并立刻送法院审理。傅斯年的主张形成“逮捕搜索学生须经大学校长同意”的大学自治特权惯例。

“四六事件”虽告平息，但极权统治的气氛仍在发酵，加上国共紧张情势推波助澜，最终成为国民党在台“白色恐怖”统治之滥觞。

首先是国民党政府要求公教人员，包括大学教授，实施连保制度，避免受共产党思想“污染”。所谓连保也形同连坐，严重伤害教师自尊与人格，遭傅斯年拒绝。他强调，台大师生“绝对思想纯正”，有问题由他一人负全责；更基于公平，不能妥协承认无罪师生有罪，再度保全台大成为唯一未实施连保制度的大学。

1950 年，台大举办新年舞会，由于凯等人筹组“海天歌咏队”，在晚会表

演秧歌，又遭部分学生指为“共党歌曲”，台上台下吵成一团。次日台大出现“反共抗俄团”黑函，指称“匪谍”混入校园。此事由傅斯年全力压下，要求闹事学生写悔过书，承认乱发“黑函”，开除其中一人学籍。

但傅斯年过世后，国民党政府逮捕于凯，指控他是“匪谍”，随后枪决；并以“涉嫌叛乱”为由，陆续逮捕陈水木等四十几名台大及师院学生。许多“四六事件”受难学生为恐牵连，纷纷逃亡。陈水木与同案十九名难友也于11月29日被枪决，三十多名学生被判十五年以下不等刑期。“监察院”责难台大管理不当，以致上演“与共产党唱和”的秧歌。一连串事件显示台湾步入白色恐怖时期。

傅斯年虽无力阻止国民党为所欲为，但在高压统治环境下，仍在相当程度内保护学生，避免军警势力侵入校园大肆搜捕，为大学自主维持一定典范。有文献指出，军警机关日后在《历年办理匪案汇编》中，指控台大法学院学生“从事反政府运动，平时活动至为激烈，几已达公开为匪张目之程度，但该校对此毫无反应；且于治安机关逮捕匪谍学生时，竟招致该校当局不满，甚至遭到强硬反对，似此不能协调配合，缺乏政治警觉与敌我观念之态度，值得检讨”。

四十年后的1990年10月，国民党政府“阁揆”郝柏村在打算进台大逮捕街头抗议学生未果后，批评台大校长孙震未尽责任，孙震竟为此表达辞意。各界哗然，都认为孙震失去大学校长应有风骨，更伤害知识分子应有的坚持与原则。

傅斯年反共立场众所皆知，被毛泽东在《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一文中批判，被归类为“反动文人”。即使如此，仍有反对者攻讦他把台大搞成“共产党的温床”。傅斯年则反击，学校不是警察机关，如果知道某人真是“亲共分子”，当然按法律办，不过“我不是警察，也不兼办特工”。

在捍卫大学中立与尊严上，傅斯年也不失大节。台大行政大楼与农学院间的“民主墙”就在傅斯年任内设置的，且越设越长，供学生自由抒发言论，从未干预。

贡献这所大学于宇宙的精神

“四六”学潮当年，傅斯年于11月15日台大校庆致词时表示，日本时代创办台大有其特殊目的，就是为配合日本的殖民政策。他坚持台大要纯粹地办大学，纯粹地“为办大学而办大学”，没有政策或政治目的，也不容许把大学当做学术外的工具。[①]因此傅斯年以哲学家斯宾诺莎所提宇宙的精神在于追求真理的观念，强调台大办学的宗旨为“我们贡献这所大学于宇宙的精神”[②]。

曾说自己对教育“深感苦痛”的傅斯年提到，他要办个“平淡无奇”的教育，[③]让学生钻研课业、身体健康、品行诚实；并推动中国“近代化”，不让中古思想误国，将中国人的自信心寄托在往后的一百年。所以他坚持以“多元主义取代主观主义”，要把兼容并蓄的包容感落实在大学中，让大学成为捍卫多元价值的堡垒。

傅斯年在检讨中国学校制度的文章中，提到办好大学的四主张：第一，政府应尽政府所当尽的责任，设法调整教职员待遇，让教师用心教学，并准备充足的经费，充实学校设备；第二，学校当局应尽责任，拿出为青年服务的热心，为学生解决生活、学业上的各种困难问题；第三，学校须有合理的纪律，使学生有宁静的读书环境；第四，学校必须有良好的学风。

关于台大学风，傅斯年指出，应包括自由的思想、规律的行动、求学的志愿、求真的信心、师生相爱的诚意；同时“宽博的胸襟，爱人的气度，坚贞的风节，乐善疾恶的习惯”，都是良好学风必需的。他不断强调，没有自由的思想，便没有学术的进步。因此虽面对蒋氏政权压迫，傅斯年仍体现大学保障学术自由的抗压性，并将对中国文化的研究借提倡文学、法学当做台大重新出发、成为最高学府的主轴，要求学生看清自己的先祖、怀念自己的文化，终极

---

① 《傅斯年全集》第六册，页227。

②傅斯年：《贡献大学于宇宙的精神》，《百年大学演讲精华》，立绪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3年。

③《公论报社论》，1950年12月21日。

目标则是向西方剑桥大学、牛津大学等具历史性的最高学府看齐。深具豪杰气的傅斯年，也规定以《史记》、《孟子》为台大的公共课科目教材，力主培育学生浩然精神。

在傅斯年推动下，台大成为以自由学术精神为基本原则的一所大学。其上承胡适等人在五四运动提倡的启蒙观念，尊重个人、注重人性、提倡正义，并将追求真理当做大学存在目的与指针，力求以具体行动矫正当时教育制度流弊。

傅斯年曾严词批评大学教育已沦为“过渡教育、游民教育、资格教育、阶级教育”；学校以升学为目的，毫无培养学生精神与能力的办法，让学生考进大学仅在混资格，文凭主义至上，思想空洞，毕业后则沦为斯文游民，对社会毫无帮助。为矫正流弊，傅斯年加紧在海内外吸引优秀学者，充实台大师资，以提高教职员待遇、留住人才为努力目标。他认为大学更必须与中学教育严格区分，让学生步入学术之门。

傅斯年在台大被后人津津乐道的治校经验，便是他用极短的时间，为这所学校建立起长远的制度以及校风，形成学术独立精神与传统。大学自由学风能在国民党戒严时期坚持下去，实不容易。

1949年校庆中，傅斯年又提出“敦品、力学、爱国、爱人”八字原则。从此这八个字成为台大校训，刻在傅斯年遗像之下，以为纪念。

天下英雄独使君

傅斯年对独立人格的重视，借台大教育精神形成传统，他个人也因为对权贵不买账的作风而闻名。1949年，美国将领、盟军统帅麦克阿瑟访问台湾，当然受到国民党政府盛大欢迎，所有政要在旁恭迎，唯独受蒋介石之托而来接机、素称自己“坐无坐相、立无立相”的傅斯年，硬是跷着二郎腿、抽着烟斗，坐在蒋介石与麦克阿瑟旁边的沙发上，以大学校长身份与两人平起平坐。

傅斯年是个人情味很浓的自由派学者。据台大多名教授回忆，度量大、肯认错、不记仇是傅斯年的特质。他乐于接近学生、关心学生，以平等观念对待师生，在严师如严父的年代，甚至以被学生敲竹杠请客为荣，对学生的请见与

回信，绝不假手他人。[1]据闻他有次踱过台大生物实验室，看到学生正在观察草履虫，便说他在伦敦时也看过。有位学生开玩笑地说“吹牛”，傅斯年则大笑而去。他也争取让全体台大学生进行X光检查，[2]避免感染肺结核。检查后轻微患者由台大拨给宿舍暂住，且有工友照顾；重病者准许休学，公费照发，并加发菜金三十元。在资源困难时代，他也要求台大农场硬挤出鸡蛋、鱼肝油、奶粉等补给品定期供患病学生疗养。

傅斯年早年丧父，全赖父亲门人提携照料，因此他毕生乐于帮助故人子弟。胡适夫人与钱思亮一家赴台后，没有地方居住，都是由傅斯年先提供自己位于福州街二十号的台大校长宿舍暂住，再想办法帮朋友找栖身之所。为帮助穷学生，傅斯年积极设立多项奖学金，鼓励清寒学生继续奋斗，以求人人机会均等，避免大学教育成为阶级、有钱人的专利。台湾“中研院院士”李亦园回忆，他于1948年去台后考进台大历史系，两年后想降级转读新成立的文化人类系，因此找傅斯年商量，争取打破规定让他保留奖学金作为生活保障。傅斯年在训示他研究考古、人类学、从事田野调查都是苦事，需耐得住寂寞与辛苦之后，立即同意他的请求。

傅斯年虽是台大校长，但两袖清风，同在台大外文系教书的妻子俞大彩有回还不得已借钱买米。但他曾为了董作宾等几位更穷的朋友，把自己藏书卖了换钱救急。

随手一个烟斗、一顶呢毡帽、一袭长袍是傅斯年的标准造型。但因家贫买不起好烟丝，傅斯年在台湾都是把劣质烟拆开，把烟丝放到烟斗里抽，好过过瘾。傅斯年生前最后一篇文章的稿费，原想拿来做条棉裤，最后他还是指示台大查查看哪个学生最穷，就把钱送给他。最后他只留下二十块，打算请学生吃顿锅贴。

傅斯年一生虽然清贫，却从不为兼职领双薪，他对利与官场之名十分淡薄。蒋介石赠他的“总统府资政”头衔与名位，连他的秘书都不曾听他提起。[3]傅斯年在海外没拿到博士学位，有记者尊称他“傅校长博士先生”，傅斯

---

①那廉君：《办公室里的傅校长》，蔡尚志选编：《长眠傅园下的巨汉》。

②赵源晖：《悼念我们的傅校长》，蔡尚志选编：《长眠傅园下的巨汉》，页180。

③屈万里：《敬悼傅孟真先生》，《自由中国》第四卷第一期。

年就说，他的博士头衔不过是海外颁发哲学荣誉博士，还是以“先生”称谓为宜，“博士”头衔“不值一道”。[①]

当时发生一起轰动台湾社会的年轻男女殉情事件，男子获救，女孩陈素卿香消玉殒。陈女绝笔书经报刊披露，优美文采让人一掬同情之泪。傅斯年因此与数名台大教授提议将这名女孩葬在台大校园立碑纪念，后虽因殉情案另有内情而打消念头，但由此却可看出他感性的一面。

傅斯年以校长之尊，仍经常自顾自地在其他教授前戏谑吵闹、做鬼脸；他的生活态度随便、俭朴，不爱狗，只爱看书，靠薪水过活。据他的夫人回忆，傅斯年脑子里全是“书本、书本，工作、工作”，不喜欢家人办生日，更不记得自己生日；但母亲生日时，傅斯年却总是身穿长袍下跪磕头，展现孝道。

傅斯年晚年糖尿病与高血压严重，夫人早就下了禁口令，每天只能吃半碗白饭、青菜与半个木瓜，也不给零用钱，避免到处乱吃，坏了身体。但傅斯年嘴馋远近驰名，尤其爱吃鱼翅，只要有人以鱼翅请客，他不问是谁，绝不缺席。钱思亮的儿子，日后当上台湾“国大议长”的钱复，小时后寄住在傅斯年宿舍中。他回忆，每次傅斯年领到稿费，都会偷偷找他去打牙祭，最喜欢吃卤猪脚沾上许多酱油。傅斯年不摆架子，爱下棋的他，司机杨国成就是棋友。也就是这位棋友，常偷偷带他到南昌街等地吃小吃解馋，全是杨国成付账。[②]

傅斯年的身体状况长期不佳，加上宵旰从公，每天在台大工作十多个小时，欠缺休息，而在外又邀约演说不断，使得高血压与糖尿病病情持续恶化，并患上胆结石。他的司机说，傅斯年不是不知道身体不好，需要检查，主要是怕检查后需要休息，而傅斯年就是不肯休息。

1950 年 12 月 20 日，傅斯年上午先参加蒋梦麟主持的“农委会”会议，争取保送大量的台大学生深造，下午出席位于台北市南海路的台湾省“议会”第五次会议。一向问政激切的台湾省“议员”郭国基提出一连串质询，包括“教育部”保存在台大的教育器材遭窃问题；质疑台大想搞“秀才教育”，不打算普

①张力耕：《追记傅斯年先生》，台北《中央日报》，1950 年 12 月 21 日。

②钱复：《钱复回忆录》，台北天下文化出版社，2005 年，页 30。

及于一般民众。傅斯年疾呼："奖学金制度不应废止，对资质好、有才能、有智力而肯用功的，仅因为没钱不能升学的青年，我是万分同情的，绝对要扶植他们，不能让他们被摒弃在校门之外。""办学应先替学生解决困难，让他们有安心求学的环境，才能要求他们勤心用功。不替他们解决困难，要他们尽心用功，是不近人情的。"

未料他深恶痛绝的盗窃教材器具案，让傅斯年情绪激动，无法平复。步下讲台枯坐到散会时，他仅说了句"不好，我不行了"，随即跌倒昏迷。抢救至深夜十一时无效猝逝，享年五十五。蒋介石的悼词很具代表性："国失师表。"

胡适为纪念这位益友及"人间一个最难得、最稀有的天才"，1960 年以美援在"中研院"筹设"傅斯年图书馆"。

傅斯年深受学生爱戴，"傅斯年被郭国基气死"的流言四散，台大学生情绪激动，差点串联包围省议会找郭国基算账。由于傅斯年已成为台大精神象征，死后就安葬在台大校门旁空地，这座小型墓园被称为"傅园"。

当年傅园地处僻静，紧邻着占用校地的一排违章木造屋。傅斯年生前认为违章建筑的主人都是做小生意过活，没必要为难人家，也就默许书店、豆浆店、钟表店在校门旁营业；傅斯年过世后，台大直到 1978 年才将违章木造屋拆除。

傅园是由台大邀知名建筑师吴炎设计，有十六根圆柱的希腊式纪念亭，大理石制墓墎放置其中，一旁几何形水池、埃及方尖碑，呈现出浓厚西洋古典建筑风格，展现当时学术界对西方大学的仰慕。如今的傅园和台大校园融为一体，提醒上下课的钟声就是由傅园内的傅钟传来，数十年来不停歇。最特别的是，每节上下课，傅钟都是敲二十一响，这是源自傅斯年的一席话："一个人在一天二十四小时，要留下三小时作为沉思。"

傅斯年过世后，蒋介石原属意胡适出掌台大，但胡适再度以国家需要年富力强的人才出头为由，推荐清华大学化学系毕业、获"庚子赔款"奖学金赴美深造、曾任北大化学系主任的傅斯年挚友——钱思亮接手。

百代之下望见其人，仍光芒万丈

创办广州中山大学文学院与语言历史研究所，创办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主持北大复员，开台大之先河，治学与办事能力兼具，是胡适认为傅斯年毕生的四大成就。[①]

1943年，英国知名历史学者李约瑟到中国访问，由傅斯年接待。这位日后以《中国之科学与文明》闻名的学者，回忆傅斯年是个外形相当胖、头形奇特，而又健谈、西化、有趣的人。李约瑟回国前，傅斯年在一把折扇上写了《道德经》相赠，李约瑟日后则以《中国之科学与文明》第五卷第七分册献给傅斯年与俞大维，见证这段奇异的东西方历史学者的相遇。这是傅斯年温文儒雅的一面。

在学术上，傅斯年为中国历史研究开启一扇窗：推动语言学与历史学结合及现代化，以符合西方科学标准的要求。利用反复实验，考证确定客观规律与事实；用自然科学心态看待历史，让史学成为历史科学；以新工具引出新问题，检验旧材料，开创新的研究领域，让史料研究、搜寻、佐证成为学术研究核心，成就中国历史研究的科学之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正是傅斯年在中国学术现代化过程中提出的科学研究精神。

1929年，傅斯年说服蔡元培，斥资抢救将被转卖日本的明清内阁大库档案，并请陈寅恪整理，成为研究明清历史最珍贵的第一手资料。[②]他襄助的陈寅恪、赵元任、李济，乃至之后一批历史语言研究所学者，已成为两岸史学研究中坚。

傅斯年主张中国历史研究需与经学、史学切割；历史需与时代进行横向联系，厘清时代背景；以科学方法钻研断代史、断世史；以及唯有直接研究、扩

①胡适：《傅孟真先生的思想》，《傅孟真先生集》序言。

②傅斯年在1929年斥资买下的内阁大库档案，包括明清时期诏令、题奏、贺表、黄册、部册等重要史料，原可能遭人焚销，又有被日人购去流落海外的风险，却在傅斯年决断下被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全盘收藏，展开编号解读，查得有效档案三十余万件；并自1930年开始公开刊印，成为现代学者研究明清历史的第一手资料。傅斯年与蔡元培为中国历史保留这一批史料，实在功不可没。

充工具、扩充材料才算真正进步历史研究法等观点，①与主张建立通史，一以贯之，拒绝割裂历史过程与精神，乃至于从古人作品内在一致性进行考据的钱穆的论点相背，两人矛盾冲突，格格不入，不可言喻。②创立史料学派的傅斯年坚信，科学精神才是颠扑不破的真理，没有证据，就不该轻信，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

在气节上，站在“五四”最前锋，以匹夫之言驳斥孔宋权贵，乃至于因义愤填膺，驳斥教育乱象而猝逝，这是傅斯年的冲冠一怒。一如他所言，蔡元培是“今之孔子”，他虽不敢自比是颜渊，但以“勇”传世的“子路亦不坏”。

当胡适被蒋介石人情攻势包围、受邀任国民政府委员兼“考试院院长”之际，傅斯年原被委以说服胡适。没想到傅斯年反过来说服胡适绝不可接受，要他一改客气习惯，不能起念动心，更不能伤害北大与北大精神。胡适因此表态绝不成“政府的尾巴”。

因为傅斯年的真，让他敢于包容朋友，给予温情与照料。他敢于说出真话，为被捕的陈独秀辩驳，称他是“中国革命史上光芒万丈的大彗星”；直言从容就义的李大钊不是“就刑”，而是“被害”；直斥批评胡适者，“你们不配骂胡适之”。因他的直，他敢批判孔宋家族；敢怒批蒋介石让目不识丁的军阀大老粗张宗昌掌理孔孟故乡山东政务，“以为山东无人了吗?”

综观傅斯年一生起起伏伏，虽波澜壮阔，却也充满矛盾。他早年力主全盘西化，反对旧传统、旧学问，批判封建道德，鼓吹个人自由，甚至说保存国粹相当可笑，需全面废除文言文；他期待借文学革命达到思想革命目的，建立西方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信仰，寻找让中国启蒙契机。但傅斯年侧重文学革命层次的议论，仅停留在书生论政与学术圈，在政治与社会改革等议题上均缺乏有力行动。到了中年、晚年，国家遭遇变动之际，他坚持国家气运是匹夫无可逃避的责任，展现的却是传统知识分子格局。而且傅斯年虽未任官，却与蒋介石、国民党关系深厚，介入政务过深，都让他对外难以辨明。

傅斯年的局限，正凸显“五四”以降知识分子的不安与矛盾以及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混乱。傅斯年的分量与影响力，又因为他的政治立场明显遭低估。

①胡适：《傅孟真先生的思想》，《傅孟真先生集》序言。

②王晴佳：《钱穆与科学史学的离合关系》，《台大历史学报》第二十六期，2000年，页139。

这位五四健将、中国现代史学的先驱，最后被局限在孤岛一隅，更是大时代悲剧的剪影。

无论如何，傅斯年一生在民族原则与精神上的坚持是毋庸置疑的。他坚持抵御日本侵华，注重培养学生民族气节。面对日本入侵华北，施以恐怖与威吓统治，傅斯年在北京仍毫不畏惧，鼓吹抗日，以“不屈服”的立场对抗军事强权。九一八事变后，傅斯年以北大历史系系主任的身份，提出“书生如何报国”的质疑[①]；为彰显民族气节，以保国家气运，以及国家必须有史鉴提振民族精神的主张，促成北大教授编纂属于中国人的通史，也就是钱穆的巨著《国史大纲》。

毛子水誉他有“浩然之气”。傅斯年有话直说、不惧权贵，即使面对亦师亦友的胡适也一样。日军入侵华北、热河之际，胡适反对“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论调，主张积极对日交涉，保存实力，遭傅斯年激烈反对，扬言退出独立评论，贯彻“老百姓第一愿望是让国家统一”的主张。[②]他期勉儿子，做人之道必发端于正气，“若不能看破生死，必为生死所困”[③]。

虽仅治校年余，但奠定学术自由风气让傅斯年受台大人景仰。一如自由主义将大学视为公共领域中的批判性言论的知识来源，傅斯年的个人风格形成了对大学的想象。在威权统治时期，他化身学术独立的神圣斗士，成为台湾抵抗政治高压的共同荣耀。其后五十年，台大数次校园抗争事件，都在傅园内的傅钟前、杜鹃花旁慷慨上演，纪念傅斯年的傅钟成了台大自由校风的重要象征。

①陶希圣：《傅孟真先生》，台北《中央日报》，1950年12月23日。

②胡适当时仍反复说明他坚持国家利益优先，以及暂用协调换取保全华北的必要性，最后丁文江居中协调，才化解两人间一场风波。

③傅乐成：《傅孟真先生的民族思想》，《传记文学》第二卷第五、六期，1963年5、6月。



胡　适
Hu Shi

文化大师最后的腥风血雨

1949年4月6日，胡适从上海搭乘客轮赴美，没有以全权大使身份争取美国支持中国抗战的风光，也没有二十六所大学争相颁发荣誉博士学位的风头。胡适婉拒了蒋介石关于驻美大使的委任，在国民政府风雨飘摇之际，无可奈何地为蒋介石尽最后努力。4月21日，胡适抵达三藩市，迎接他的是共产党军队已渡长江、国民党政府偏安局面破灭的政治现实。胡适仅能强振精神地说，“不管局势如何艰难，我始终是坚定地用道义支持蒋总统（介石）的。”

作为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重量级大师，胡适这个名字充满了矛盾与冲突，更是一道无所回避的高墙。在祖国大陆，胡适曾是各方批判的对象，是战犯、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维护蒋介石政权的代表，更曾被一拨拨思想批判斗臭了名声。在台湾，胡适虽有大宗师的地位，却不断成为被攻讦的焦点。有人怪他鼓动新文化，让国民党失去

江山；有人怀疑他的存在可能危及蒋介石统治；也有人觉得年迈的胡适不够激进，不够朋友，没能引领反对运动风潮。但这么多人各自用不同立场去思考胡适、批判胡适、期待胡适，正凸显了他的分量。

为了帮国民政府留些颜面，抵美的胡适取消了与美国政府或国会的会面，整整五个月未去华府，甚至因此引发国民党不满，认为他没有善尽争取美国支持的义务。但当美国发表白皮书，指责蒋政权倒行逆施才搞垮自身政权，与美国并无关系后，胡适出面反驳，认为国府之失在美国借《雅尔塔密约》出卖穷朋友。

此时胡适几近穷困潦倒，没有秘书，不得不出外挤公交车。其后朝鲜战争发生，台湾确立冷战的战略地位，不再需要胡适充门面，此外反得防着获得民众支持的胡适成为美方属意的第三势力领导人，赴台后颠覆蒋氏政权，胡适的处境敏感而孤立。现实的美国政界、学界，把胡适当成过气的边缘人。

在美寓居八年零八个月，胡适只有在普林斯顿葛思德东方图书馆工作的一段时间有固定收入，其余只能靠稿费、版税、储蓄勉强度日，加上妻子江冬秀坚持到美国同住，生活更捉襟见肘。但胡适仍不肯自贬身价，申请美国绿卡。为胡适留下口述历史的史学家唐德刚以《史记》里“孔子适郑”的故事，形容胡适这段在美失意的日子。他回忆，这段时间常用打工用的破汽车接送胡适，“记得有一次我开车去接他，但是电话内我们未说清楚，他等错了街口。最后我总算把他找到了。可是当我在车内已看到他他还未看到我之时，他在街上东张西望的样子，真是‘惶惶如丧家之犬’”。

相较于环境艰困，更大的折磨恐怕是来自留在大陆的至亲故旧对他的批判。继辅仁大学校长陈垣《给胡适之的一封公开信》后，1950 年 9 月 22 日，香港《大公报》发表胡适小儿子胡思杜的《对我父亲——胡适的批判》，随即展开第一次批胡运动，让已被毛泽东定性为“反动文人学者”的胡适雪上加霜。尤其胡思杜称胡适为“人民的敌人、反动分子，罪行早和美帝有关”，更让胡适只能在日记上援引友人所提蒋经国在俄批判蒋介石事自我安慰。顾颉刚、朱光潜等北大旧友，也在一拨拨批判资产阶级思想运动中批判胡适。胡适则强调相信友人只是为了在检讨中过关，而并非真心之论。

1954 年 11 月，第二次批胡运动开始，几乎全中国都被动员起来，出版了八辑数百万字的《胡适思想批判》，从哲学思想、政治思想、历史观点、文学

思想、哲学史观点、文学史观点、考据学、红学的艺术性、红学的人民性等九大方面进行声讨，直指胡适是学术界的今之孔子，以期将胡适在中国被斗臭、斗倒。

胡适倒是幽默以对，“笑颜逐开，大为高兴”，连称对他的九大罪状就是他在学术上的九大成就。其间毛泽东通过渠道向胡适表示善意。例如毛曾表示，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有功，现在要批，应当实事求是。胡适的友人也当面向胡解释，批判的是他的思想，而不是针对他的人格。胡适在日记中则反问，“除了思想之外，什么是‘我’?”

1957年9月21日，胡思杜在北京自杀，切断了胡适与祖国大陆最后一丝联系。而被他寄予厚望的台湾却并没给他些许安慰。

在美国的《自由中国》发行人

国民党退守台湾，在胡适的劝说下，不少知名学者与蒋介石一同赴台，因此虽然胡适在美国自我放逐，却让在台湾的国民党政府延续了中国文化与学术的一系支脉。台湾虽小，胡适总将其喻为“自由中国”。在他高举的自由民主大旗下，由雷震主持的《自由中国》杂志得以在台创刊，成为台湾自由主义的摇篮。

胡适虽远在美国，《自由中国》始终把胡适登记为发行人。胡适的盛名也为言论尺度平添不少想象空间。1952年月11月19日，蒋介石为营造礼贤下士形象，邀胡适去台讲学。这是胡适赴美后难得的风光场面，访台时万人空巷，争睹风采，蒋经国也前往接机。胡适利用这股气氛大胆地对蒋介石说，“台湾今日实无言论自由。第一，无一人敢批评彭孟缉。第二，无一语批评蒋经国。第三，无一语批评蒋总统。所谓无言论自由，是‘尽在不言中’也。”他也在《自由中国》三周年茶会上强调言论自由重要性，提及“在朝的应该培养鼓励合法的反对；在野的应该努力自己担负起这个责任，为国家做诤臣，为政府做诤友”。

只是在台湾打死战的《自由中国》不断地以言贾祸，作为言论自由的鼓吹者，胡适不能对两蒋的作为视若无睹，也必须适度保护《自由中国》招牌下的



⬆1952年，胡适（前排左一）由美国赶赴台湾，与老友重聚合影。图中前排中、右分别为陈诚、王世杰。第二排右起：张历生、叶公超、吴国桢、陶希圣。后排右起：张南如、黄少谷、张其昀、沈昌焕。

人与精神。只是自诩做诤臣，胡适对自我定位别有定见，一如他批评流亡美国的前台湾省“主席”吴国桢在异邦对两蒋的挞伐，有失国家体面也不够负责，甚至因此与《自由中国》年轻编辑殷海光等人大赞吴国桢敢讲真话的意见相左；尤其《自由中国》对着两蒋明干的做法，让夹在当中的胡适相当棘手，因此不止一次想辞去《自由中国》发行人职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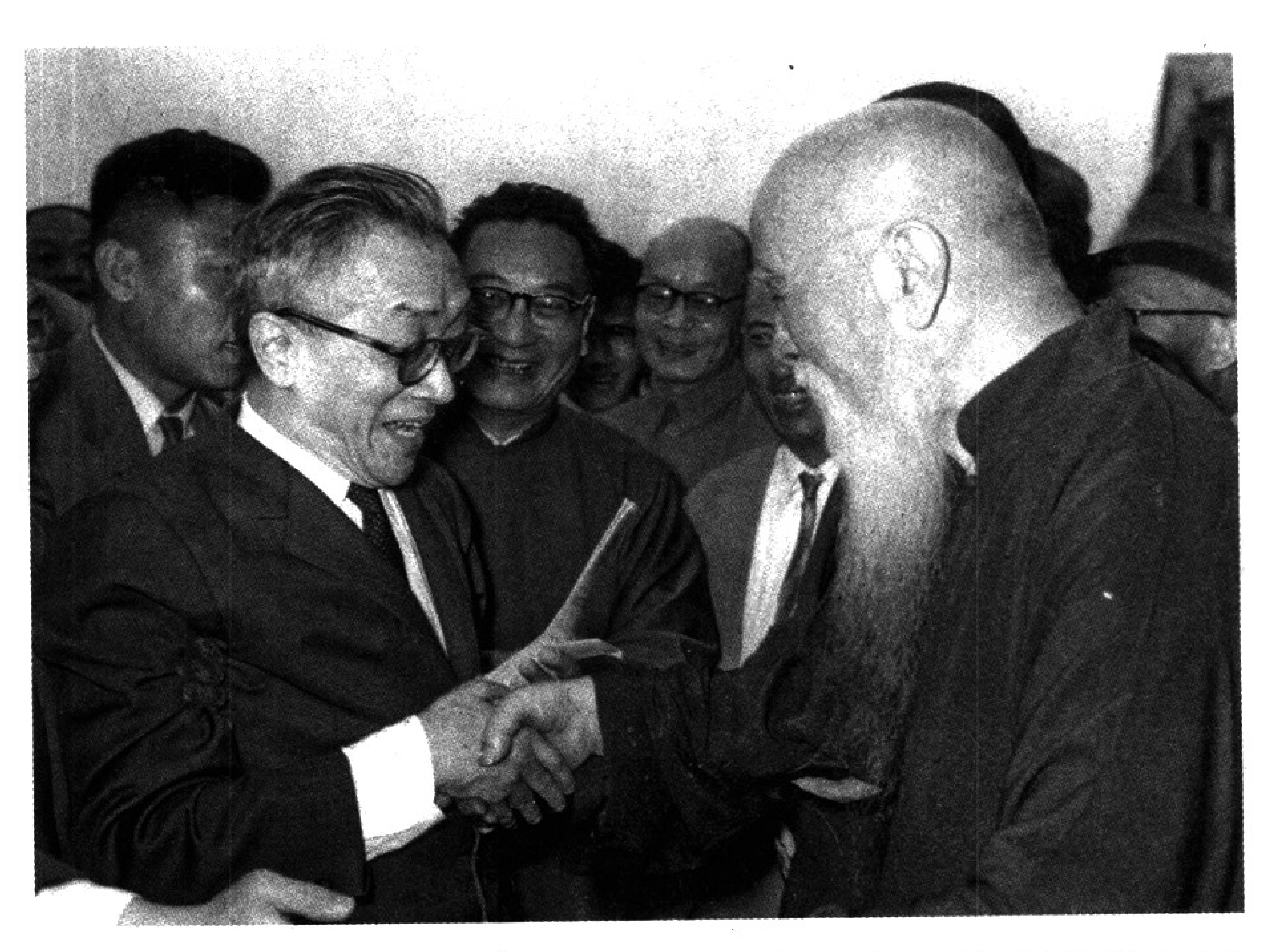
赴台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长”

1954年2月，胡适赴台参加第一届“国民大会”第二次会议，处理国民党

⬆1958年，“中央研究院”在台湾重建，由胡适任“院长”，继续在台湾散播思想与文化的种子。国民政府时期，作为中国最高的学术研究机构，中央研究院最早于1928年成立。但因内外局势动荡，战祸连年，以致当时的研究院是由全国各学术团体选出的评议员的组合，并非一实体的研究单位。直到1948年3月，原来中研院评议会投票，选出八十一名院士，才在南京正式成立了中央研究院。胡适是人文组院士，首届代院长为当时的教育部部长朱家骅。

迁台后首次面临的“总统”选举问题。力求连任的蒋介石又一次劝胡适出马。比起过去，胡适显然有了很大保留，他强调愿为国做诤臣而不愿居官，并全力支持蒋介石。

只是《自由中国》慢慢露出组党与两蒋抗衡趋势，让作为精神领袖的胡适身处嫌疑之地。自知举足轻重的胡适为辟谣，多次表明无意于组党。但在理智上，他仍主张知识分子应可组织几个不以取得政权为目标的在野党。尴尬之际，《自由中国》于1957年以为蒋介石七十大寿建言为由发表系列社论，直批蒋介石领导风格有问题，更主张反对党是解决一切问题关键所在；接着又明指国民



⬆1958 年，胡适博士与于右任相见甚欢。这一段时期，祖国大陆发起了大规模的清算胡适思想的运动。胡适响应说："那时我觉得世界上二三百年来有一种公开的趋向，朝科学民主这个方向走，朝新的科学方法走。那个时候，我朋友陈独秀在《新青年》发表拥护'德'先生（民主）、'赛'先生（科学）。我表示过这样的话：把这个抽象名词人格式，把他看做人，最容易错误的，容易人格化，也就容易偶像化；偶像化了，便会盲目崇拜。……当时，我的朋友陈独秀因只认得两个名词，不知道科学是一个方法，民主是一种生活习惯，是一种生活方式。"

党"反攻大陆"策略自欺欺人，使对立急速升高。《自由中国》被归类为"毒素思想总进攻"，争议核心的组党问题更像一颗炸弹，横跨在蒋介石与自由派之间，只看何时引爆。

1958 年，在蒋介石敦请下，胡适结束在美几近流亡的生活，赴台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长"。蒋介石不但以上宾之礼待之，表示要从自己的稿费拨出一笔款项，配合"中研院"追加预算，帮胡适盖屋居住；还为胡适就职典礼亲自到"中研院"演说，直称胡适的道德与品格高尚，足膺"中研院院长"重任。不过



⬆1958年，胡适与陈诚闲话家常。有关自己的主张在祖国大陆遭到大规模清算一事，胡适继续说："我几十年来对学生讲：我考证《红楼梦》、《水浒传》是要借这种人人知道的小说材料提倡一种方法，教青年人有一种方法，等于孙行者身上三根救命毫毛，可以保护你们不受任何欺骗，什么东西都要拿证据来，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这种方法可以不受欺骗，不受人牵着鼻子走。"

胡适不留情面地当场反驳学术与道德并无关系，"中研院"的责任还是在提倡学术，甚至一再说"总统错了"，气得蒋介石脸色大变，从此未再去"中研院"。

两边都倾心　两边不讨好

在紧张关系逐渐升温之际，胡适赴台没有拆除炸弹引信，倒先成了遭打击对象。一本几近黑函的小册《胡适与国运》在坊间流传，把国民党失去大陆的

责任算到胡适与“五四”头上，批评胡适打倒“孔家店”，造成中国道德文化真空；更大肆抨击胡适有领袖欲，如今《自由中国》言论是要台湾放弃领袖、放弃国防。

眼看《自由中国》与两蒋势成水火，胡适先是再三劝阻雷震勿组政党，他也不会参加或任新党领导；随后更写了有名的《容忍与自由》，强调“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没有容忍就没有自由，容忍比自由还重要”；也要求《自由中国》领会，“要别人容忍谅解我们的见解，必须先养成容忍谅解别人见解的度量”。只是此话一出，又立刻被殷海光等人抨击为自我设限、自失立场。

1960年，蒋介石两届“总统”法定任期届满，台湾政界发起一拨劝进之风。胡适没有沉默，通过“总统府秘书长”张群传话，希望蒋介石为国家的长远打算，树立一个“合法而和平地转移政权的风范”，不要担任下一届“总统”。只是面对蒋介石已决心三连任，胡适不再对外多作发言。在接受媒体访问时他简短而明确表明，“我仅有一句话，就是坚决反对‘总统’连任”。

1960年9月4日，在被盯梢跟踪数年之后，为筹组在野党奔走的雷震被捕入狱。在美国参加“中美学术合作会议”的胡适，立即发电文给“行政院院长”陈诚，指责此举甚不明智，“政府畏惧并挫折反对派运动，必将蒙摧残言论自由之恶名，恐将贻笑世界”。他并公开对外籍记者说，雷震为争取言论自由而付出的牺牲精神，“对得住自己、朋友，也对得住国家”。胡适也强调，雷震绝对是个“爱国”的人，因此他“不是营救雷震，营救的是国家”。不同于台湾反对人士借舆论或联署表达抗议，胡适似乎更相信自己和蒋介石间的私人关系，如事缓则圆，似乎还能有最后的转圜余地。

11月18日，胡适拜会蒋介石，说雷震的军事审判使他在国外“实在见不得人”。但蒋介石刻意问胡适，不知是否听过他曾与人说，胡适这几年来“只相信雷儆寰，不相信我们政府”。胡适连称蒋介石的话太重，先搬出当年赴美求援时所讲“我始终是坚定地用道义支持蒋总统”；又无奈地说，“若不支持这个政府，还有什么政府可支持？如果这个政府垮了，我们到哪里去？”

雷震入狱后，胡适从此远离政治，没有去探监，没能出来领导剩余反对势力组党。《自由中国》的后人痛批胡适退缩，担不上自由主义大师重任。殷海



⬆1961年底，胡适在病床上过了七十大寿，“财政部部长”严家淦前往台大医院探视。胡适患了多年的心脏病，这年11月病突然恶化，赶紧送进台大医院疗养，一住就是四十多天，直到第二年1月才出院。

光更对胡适严加挞伐，让重清誉、好面子的胡适郁郁不已，自承在内心深处，也就是思想上，与雷震“在一起坐牢”。反倒是雷震狱中日记写到，梦见胡适对他说，担心探监引起蒋介石更大的怀疑，不得不却步。

除此之外，台湾学术界的腥风血雨更没让胡适清闲。在一场围绕着传统与现代的论战中，批评者如徐复观等人拿着胡适与“西化论”当标靶，质疑胡适因自卑心理而自贬中国文化，是“现代少正卯”。论战从“拥胡、反胡”逐渐演变成中西文化论战。垂垂老矣的胡适虽有李敖助阵，但也只能深感困扰与愤怒。

猝然去世　是是非非留与后人评论

1962年2月24日，胡适在“中研院”蔡元培馆主持院士会议时突然倒下，



⬆ 1962年2月24日，胡适因心脏病突发过世，江冬秀悲痛不已。尽管胡适心中另有他爱，但两人毕竟做了一辈子的夫妇，虽无他人称美的目光，但自己仍无怨无尤。这里附上胡适的一首小诗，作为其一生小脚注："刚忘了昨儿的梦，又分明看见梦里那一笑。"

⬆ 1962 年，胡适出殡之前，台北有上万人前来瞻仰他的遗容。10 月 15 日，胡适安葬于南港“中央研究院”大门对面的山坡上。这天是入秋以来最凉的一天，细雨霏霏。万余人陪着灵柩出殡，一起送走了这位在中国现代史上散发智慧光芒与温煦气息的学者。

一如十二年前，他的门生兼好友傅斯年骤逝于质询台上。他死后，台湾有三十万人自发地为他送葬，胡适棺木上覆盖的仍是北京大学校旗。

说来讽刺，蒋介石给胡适的挽联“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的确抓住了胡适人格中最敏感而隐讳的独特性。日后殷海光众弟子批判胡适，质疑他的学术成就，质疑他好名，质疑他想当中国“文艺复兴之父”。只是开白话文革命先河的胡适，虽给外界强烈的全盘西化印象，成为现代理性、宽容、温情的代表性人物；但在文化上，他始终是认同中国传统知识分子责任与角色的。

作为唐德刚所谓宗师型划时代贡献者，胡适让人民看到来自西方科学文明的曙光，也让他成为当代知识分子祭酒。

胡适深知自己的重要性与象征性，因此他对中国讲西方文化，对西方讲中国文化。面向中国，他积极引进民主、法治等西方自由主义的基本价值，毕生一以贯之；面对西方，他不断地提出中国文化与现代民主自由科学理性精神相协调部分，作为中国不输其他精神文明的论据。这就如罗素所说，胡适“愿意吸收西方文化中的一切优点，但是他不是西方文化之盲目的崇拜者”。

更重要的是，胡适提倡“用活的语言，用活的文学工具”，打破文化传统的禁锢，让中国文学与现代化得以接轨，且从文字使用上，冲破传统士大夫与庶民间隔阂，让白话文成为语言主体。也正是这股革命，沛然无法阻挡，形成政治、经济、社会全面的变革，让中国产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换言之，胡适触发了中国近代文化史的典范转移，而他正是此一转换中的主要载体。

悲哀的是，无论从倾心西方民主制度角度或传统知识分子角度，胡适都对这股力量深感不安。他不但质疑革命的必要性，要青年面对运动要“冷静”，更一度期待国民党以“好人政治”补政党不足。但胡适“不要儿子，儿子来了”，一如殷海光所抱怨，无论有没有念过书的人，都期待借批胡暴得大名。结果“来自左方的势力，对于胡适思想，清算洗脑，必欲铲除尽净而后快。来自右方的势力，提起胡适思想就消化不良，想尽种种方法把胡适思想从人们的记忆里勾销”。

一如史学家余英时指出，作为被青年当做偶像崇拜的胡适思想以及所谓的胡适崇拜，并非由政治权威造成，而是象征向权威挑战的心理，因此他成了唐德刚口中“近代中国唯一没有枪杆子作后盾而思想言论能风靡一时，在意识形



⬆ 1958年，胡适抱着孙子胡柏堂，自己也露出赤子的笑颜。胡适到了晚年时常感叹过去没有花足够的时间陪伴孩子。这张照片显现胡适含饴弄孙的快乐情景，十分珍贵。

态上能颠倒众生的思想家"。但也因此，无论左右、两岸，甚或激进、保守，都和胡适思想过不去。终其一生，面对来自政治的不信任、压力与封杀，到最后抑郁而终，正是这股革命力量所赋予的原罪。

在这种无可奈何之下，胡适虽常说"狮子与虎永远是独来独往，只有狐狸与狗才成群结队"。但面对一派派盼他登高一呼的人，他的犹豫与天真又无法满足这种角色扮演的需求，使他誉满天下，谤亦随之；也让他为雷震案背负太多不必要的指责与失望。一如回复雷震苦劝他出面组新党之议，胡适只能无奈地说，这股痴心虽可比"愿早生圣人以安中国"，但他平生却绝不敢妄想"有在政治上拯救中国的魄力与精力"。对胡适而言，他的格局始终没有放在"台湾"之上，他反对"两个中国"，也反对"一中一台"。只是历史的悲剧性浓缩在个人身上，台湾的后生晚辈也无从理解胡适的视野，这是胡适的命运与无奈。



⬆ 1972 年，胡适逝世十周年纪念会。他的墓碑上刻着一段白话文：“这个为学术和文化的进步，为思想和言论的自由，为民族的尊荣，为人类的幸福而苦心焦思，敝精劳神以致身死的人，现在在这里安息了！我们相信，形骸终于要化灭，陵谷也会变易，但现在墓中这位哲人所给予世界的光明，将永远存在！”胡适去台定居的第四年过世，不过他的精神遗产至今仍深深影响着中国人，他散发着阳光的身影仍令人频频回顾。

归根结底，虽然胡适没为自由主义写下了不起的学术专著；甚至在方法论上，他提倡的实验主义，乃至于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的原则，都未必是社会科学的重要判准，但他的风格、对理念的坚持，却为自由主义立下了典范。正如他以中国“理未易明”的观念来为言论自由下脚注，胡适认为，言论之所以要自由，就是因为“可能我们自己的信仰是错误的；我们所认为可能是真理的，可能不完全是真理”。他从实验主义精神所衍生出的提倡怀疑，反对盲从，重实证与启蒙，更催生开放社会中的独立精神，形成一种反对僵化与教条的力量。

如殷海光所述，总结数十年来中国国运起伏隆替，“中国人多容纳并吸收胡适思想之时，正是中国比较和平、安定、进步、趋向开明之时”；反之，“胡适思想横遭排斥与嫉视之时，也就是国运乖违，祸乱如麻，趋向固蔽之时”。胡

适在历史上扮演的角色确是一个“昏沉的中国之现代的启蒙导师”，而这股启蒙的力量，敦促中国人在西风东渐之际，必须“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甚至包括胡适自己所持的思想在内，才能成为开放社会中内在稳定与向上提升的根源。胡适的人生，也展现了思想的可贵在于思想是无法被力量打倒的，思想只能经由时代与实践的检验来证明真理的存在。只是这种启蒙的力量，总归需要放在历史的尺度上衡量，也在这种关照下，才得以摆脱近距离观察胡适时笼罩的那层迷雾，窥见他这种“照远不照近”的光芒。